马寅初
经济论文选集

下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下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318千字
1981年12月第一版 198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统一书号：4209·3 定价：（精） 2.20元
（平） 1.40元

目　录

新中国现阶段统一财经工作的轮廓……………………………(1)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7)

革命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反动政府的经济政策之比较……(16)

看得见的成就看不见的成就和想不到的成就………………(25)

驳斥资产阶级的荒谬论调……………………………………(30)

我国一九五二年度国家财政收支预算的优越性
　和特点……………………………………………………(33)

一九五三年国家财政收支预算的特点………………………(39)

新中国货币制度的特点及其优越性…………………………(46)

视察中的八个印象……………………………………………(53)

我国预算的优越性……………………………………………(61)

两种性质不同的物价上涨……………………………………(66)

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73)

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
　展规律……………………………………………………(120)

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
　发展规律…………………………………………………(145)

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170)

新人口论………………………………………………………(174)

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196)

有计划地生育和文化技术下乡………………………………(275)

再谈我的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284)

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296)

重申我的请求…………………………………………………(358)

附录一

马寅初在中华医学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会上
谈控制人口问题 ……………………………………………………(364)
马寅初谈人口问题 ……………………………………………………(365)
马寅初在北京大学谈我国人口问题 ………………………………(369)

附录二

马寅初主要论著目录 …………………………………………………(371)
有关报导马寅初重要活动和谈话的文章目录 ………………………(401)

新中国现阶段统一财经工作的轮廓

（一九五〇年四月）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最近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决定”的通令，对于这项决定我可以分六段来讲：

（一）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目地

第一段，我先来讲我们所以要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目地，根据实际情况，我可以指出下列三个目地：

1．为要缩小财政收支间的不平衡，逐步地达到完全平衡。

2．为要防止金融物价的大波动。

3．为计划经济奠定基础。

我们可以谈一谈，为什么政务院在最近会有这个命令颁布呢？这很明显地是为要渡过已经摆在面前一九五〇年的财经难关，例如收支不平衡、财政有赤字、物价时常波动等等；另一方面是为要使新中国走上现代化、统一化的大道就是实现计划经济，这就是目地。

（二）实现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政治条件

关于实现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政治条件，在现在讲，我们可说是完全具备了的；现在全中国大陆上，除西藏外，已完全解放了，中国实现了历史上所沒有过的眞正的统一，这个统一，决不是蒋介石匪帮统治时代的假统一所可比拟的，在蒋匪统治时期，各地军阀在名义上是统一的，但实际上是实行封建式的割据，所谓统一，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就是过去历史上秦、汉、唐、宋、

元、明、清之全盛时代的“一统江山”，也不能与今天的统一来比较，因为那时的统一不过是在君主的暴力之下才有的，人民惧怕暴力，人民在暴力的镇压下的一群被压迫的奴隶，就是各地的领主与君主之间也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然而今天新中国的统一却是完全不同了，今天，人民做了主人，大家都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真正地做了形式与实质的统一，这种统一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所沒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既然已有了这种政治统一的条件，财经统一的前提也就具备了，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国家，在政治上不会有封建割据，所以政治统一和财经统一是都可以做到的；不过，为什么今天才要统一，而过去却沒有统一呢？这一方面果然是由于解放战爭沒有完全结束，一切都还沒有复常，另一方面是因解放区各地，在过去的长时期內，大都是割切的，所以对财经工作，也就习惯于在分散的状况下，依照统一的原则而各自分散处理的，这在当时是必要而且是正确的，但今天情况已根本改变，今天，除了西藏台湾和海南岛之外，中国大陆已完全解放了，全国的地域交通，物资交流，与币制等等，各方面已统一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统一的只有财政收支，所以现在最后一步要把财政收支也统一起来。

全国各地的财经机关，在不久以前曾一致要求对下列各问题作一个统一的规定，就是税则税目税率的统一、公营厂商的生产计划、原料的来源、产品的推销、物资的采购、外汇使用的分配、內地贸易物资的调拨、物价的管理、铁道轮船的合理使用、邮电的收费等等，所有这些，我们是都要统一的，且已在陆续地统一了，所不统一的，在财经工作的全部说来，就是基本上还是分散做的，因为财政的收入还沒有统一管理的规定，所以只有统一的支出，而沒有统一的收入，这种情况在当时是不可免的，但是现在已到了新的时代，政治已统一了，财经工作当然应该随政治的统一而赶快统一起来，况且财经工作的统一，是早就开始了，现在正是在统一的过程中，而放在面前的问题，就是在这统

一的过程中的财经工作，是要“前进”呢？抑还是“停留”？经过全国财经会议的决定，是要前进，就是要把财经工作从基本上分散经营，进步到基本上统一管理。

（三）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利益

讲到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利益，最明显可以看到的就是：

1. 可免浪费，所谓浪费，并不是指铺张滥用的浪费，指的是办事用钱不分轻重缓急，也不管全体局部的那种浪费，这种浪费是很大的，不比铺张滥用的那种浪费倒还小，换句话说，浪费就是不把经费最适当地用在最重要的地方，而是不适当地用在不重要的事情上，我们的财力物力很有限，一定要把有限的财力物力有步骤地有计划地来使用，决不能用百废俱举的办法的，统一管理就能免去这种错误。

2. 还有些人以为下级机关的经费终是要发的，何不把自己机关所需要的经费从税收中扣下，再把余下来的交国库，这不是一样的吗？但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坐支”的办法是错的，这办法的最大毛病就是地方往往首先照顾了自己当地的用途，把钱截留了。有些需要，在地方看来，可能是极重要的，但从全国看来，就不尽然了。这些可能是并不重要而且还可以是缓办的，可是，地方却不管这些，“近水楼台”把钱都扣了下来，甚至把收入统统用光，不再缴库，若全国下级机关都这样，那还有什么钱留给国家来做全国性的大事呢？一个家庭的收入，其支配如不分轻重缓急，开支也会超过收入的，何况国家？由此可见统一国家财经工作是必需的，且是有利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步入计划经济的道路，而统一财经工作，正是为计划经济奠定基础，我们的财力物力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就必须集中精力于几件大事上，我们的计划第一是要制止洋米洋棉进口，实现米棉自给，我们的米并不是不够吃，而是内地运不出来，因之，在一九五〇年中我们决定要增产粮食一百亿斤，棉田原有三千九百万亩，在同年中计划

要扩增到五千万亩，第二是要多造铁路，第三我们必需要有几个大的钢铁厂，第四要兴修水利，第五要办十几个肥田粉厂，如果国家财经工作不统一的话，所有的财力物力就会被地方上消费掉，而至于一事无成，所以，统一财经之利是很多的。

（四）实现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困难

从全国看起来，统一财经工作，固然是很有利的，但是否就沒有困难了呢？有的，但这并不是基本的，现在我来谈一下所谓统一财经工作的困难：

1. 从地方讲起来，是的确有其困难的理由，他们以为把捐税公粮都缴上去自己就沒有钱了，但这困难不是基本的，只要中央能负责保证，依照预算支付额拨予，绝对不像蒋匪帮统治时期那种只知收入不顾付出，以至使地方因无钱而乱起来了，困难就不会存在的，因此，中央对地方一定要负责，保证预算的支出付予，不仅如此，还必需要恢复地方人民经济所必需的投资；不过，现在还是在战争尚未结束时期，所以，如缓付十天半月的情况或是不可免的，因为我们财政的支付原则还是不变的，就是“先前方，后后方，先军队，后地方。”

2. 第二点，我谈到有些地方或部门，他们要求在经济上多一点机动性，如果统一财经工作之后，地方上的经济机动性就沒有了，故与中央的统一财经工作的要求是矛盾的，而且说从长期的分离处理情况下，要立即转到统一工作，在工作进度上说，是的确有小困难的；因此，有些熟悉旧中国财政历史的人们就怀疑我们能在短期中克服这些困难，并能贯彻这个目地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响亮的回答，他们的怀疑是错了，现在已不再是过去的军阀时代了，不再有封建式的割据，因而也不会再有截留经费的现象了，现在我们是在一个党的领导下，大家只有一个信仰，在同一的信仰下，政治统一了，财经当然也必须统一，而这些小困难，也必然地可以克服的，因为现在的共产党员与新民主人士是都

知道如果财经工作不统一，一定会造成国家经济的大困难，使人民更痛苦，至于地方的困难，那倒还是小的了，我们都明白，只有克服小困难，才可避免大困难。

（五）实现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手段

统一国家财经工作为要达第一段所说的三个目的，要有下列几个手段：

1．整编节约，2．整顿税收，3．清理仓库，4．控制通货，5．实行国库制。

上述五种，都甚重要，整编节约是为节流，而整顿税收和清理仓库物资则为开源，换句话说就是要以开源节流的方法来达到财政收支趋于平衡，再加上四五两种手段来达到金融物价无大波动的目地。

那么什么叫做整编节约呢？就是第一要把“虚估”与“虚报”的人员核实，第二是把能够不脱离生产的人让他回到生产中去，第三是把可能缓办的事，尽可能缓办，这样，我们就可以节省一笔很大的开支。所谓整顿税收，就是公粮要认眞收集，对占全国支出半数以上的税收，更要认眞办理，尤其是工商税，有十分之七八都是虚报逃税的，倘能认眞收起来，有很多可收，公营企业也一律要收工商税，不得享受特殊或例外的利益，且需收回一定的利润，公营工厂，且需算折旧费，一面在清查全国的仓库，这样，就一定能超过一九五〇年概算的收入部份。控制通货，则由税收机关与贸易机关把所有收入一齐交纳国库或金库，要有支付命令才能提款，这样，通货就控制住了，过去的毛病就在于有钱的机关不缴库，国家只好发钞票，通货一多，物价就波动了。如钱能缴库，则以多余补充不足，使钞票不至多发，物价也就不至于波动。所以必需要设立金库，来控制通货，这办法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也曾用过，但做不彻底，如一接到支付令就把所有的经费都领出来去存在与自己有关的银行里去生利。税收机关则还是坐

支，结果还是做不好，现在我们就不能这样，我们必需要彻底地做到。

（六）实现统一国家财经工作与一九五〇年任务的关系

一九五〇年是我们困难的最后一年，但这个困难却是特别地大，所以，我们必须要统一财经工作，才能顺利地克服当前的困难。在这一九五〇年中，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和要求，就是要迅速解放西藏台湾和海南岛，实现全国的和平建设，所以我们的财政，必需要对战费有充足的保证。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要保证全国大约九百万军政人员的生活与工作费用；我们军政人员之所以有这么多，是因为包括了大批的旧军队、旧机关的人员在內，我们对旧人员是一概包下来的，经过逐步的改造，使其转入生产中去，这是毛主席的英明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第三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要运粮救灾，我们去年东北、华北（平原省、冀东）、苏北、皖北都有很严重的灾荒，所以我们要运粮救灾，且还要充分保证各大城市的粮食供给。中国全国的粮食是够吃的，所以缺者，是因交通不便，內地粮食运不出来的缘故。为了要使物价无大波动，就必须要大力保证粮食的供给，尤其是大城市，粮价时常成为物价波动的主因，所以更要充足供应。我们的第四个任务是要有重点地恢复经济与文化事业，我们说有重点的，就是不用“百废俱兴”的方式。总之要完成这四项任务，就必需要有统一的财经工作与足够的筹划，我们决不采取恶性通货膨胀的办法，而是必须采用财政金融大体上稳定的办法的。

（原载《展望》一九五〇年第五期）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一九五〇年八月）

一　共同纲领的规定

共同纲领第一章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宣示了我们国家的性质，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第三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需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沒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第四章第二十六条则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道德方面，则提倡五爱，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说："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

由此，可知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反帝国主义、反官

僚资本主义、反封建主义的。而我们现在所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也正是完完全全附合于我们国家的性质的。我们要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我们要沒收官僚资本，同时我们还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换句话说，就是要实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是一次严酷的阶级斗争，我们要剥夺地主所有的土地，去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劳动农民。这里我们所着重的是“劳动”这两个字，只有劳动的农民，他才可以得到土地，不劳动的农民，那是“二流子”，他是沒有资格被分到土地的。对于地主，我们对他的要求是希望他能够把土地交出来，别无苛求，因为我们土改的目地在于消灭封建的剝削制度，消灭他的阶级，而并不是要消灭地主的肉体，如果地主能够坦坦白白地交出他的土地，我们还是会给他应得的一份，希望他能在劳动中去改造自己。在未改造之前，地主是国民，但是既经改造，他就可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了。

二　两种剝削

我们的目地是在于有步骤地消灭剝削。剝削有两种，一种是封建主义式的剝削，一种则是资本主义式的剝削。土地改革法第一章第一条的头一句话就说：“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地主这一个阶级，是作为封建主义的代表而存在的。地主有着很多的土地，他把土地佃给佃戶，要佃戶按年缴纳地租，租额通常都在产量的一半以上。如果一亩田可产谷二担，他就要拿一担，甚至是地主六成，佃戶只得四成；因此佃农辛劳终日却不得一饱，而地主则养尊处优坐收巨利。有的地主因为他的田实在太多了，所以连自己的田在甚么地方都不知道，自有帐房先生替他收租管帐，地主自己则尽情享乐，整天吃喝着用农民的血汗所换来的山珍海馐，何厚此而薄彼呢？这是不合理的。

此外，富农也是属于剝削阶级的一种，但富农剝削的性质却与地主有所不同。地主对佃农的剝削，是封建剝削；而富农的剝

削，却是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为什么同一个剥削却有两种性质呢？这一点可以从地主与富农对土地不同的经营方法来看。地主把所有的土地租给佃农，自己并不劳动，却要坐享佃农辛劳所得的一半以上，因此地主所加于佃农的剥削，与中世纪时封建领主加于农奴的剥削是相差无几的，因此这是一种封建的剥削。富农则有些不同，富农自己也参加劳动，因为他的土地比较中农多些，自己的劳动力嫌不够，所以他雇佣长工代他耕作，也可能有一小部分土地租出去。雇佣长工和出租小部分土地固然也还是剥削，但这种剥削的性质则是资本主义式的。

三 为什么要保存富农（容忍资本主义式的剥削）

最近发表的土地改革法中，较以前有了一些改变，就是不动富农，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改变呢？我可以据三个理由来说。

甲、第一个理由：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是要联合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份子，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来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因此我们主要的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地主这一个阶级是作为封建主义的代表而存在的，他对佃农进行着残忍的封建剥削，因此我们必需反对他，并且要有步骤地消灭这个阶级。至于富农，则他所进行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式的。我们的政策既然是容纳民族资产阶级的，那么，对于富农这一个阶级，当然也得容纳他。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开工厂雇工人，这中间是剥削的，而这个剥削也正和富农所加于长工者相同。为了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在一定的时间内容纳这种剥削是必要的，并且是有利的。因此，最近发表的土地改革法中，就规定要保存富农经济。

乙、第二个理由：

其次，因为现在中国的形势已经根本不同。在过去，在两年

以前，解放战爭正在大规模地进行着，我们的重点是面，都在乡村，而主要的干线及据点却操在反动派的手里；那时的乡村，和城市是对立的。为要保证革命战爭的胜利，就必需要求农民出兵，出粮和出义务劳动，来支持战爭。因此，当时就允许农民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和财产，以便更多地满足贫苦农民的要求。但是现在我们的革命战爭已经胜利，反动派眼看即将消灭，城市与乡村已不再对立，农民的负担也减轻了。为了更有利地发展生产，保存富农经济是必要的。

丙、第三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就是过去因为革命与反革命的胜负未分，富农不相信人民革命的力量，因之他们是站在反动立场的，他们反对土改，反对革命，所以当时要打倒他。但是现在富农的政治态度，一般地也比以前有了改变，保存富农可以减除一般农民的顾虑，这对于生产是有利的。再就是过去是破坏时期，现在已进入了建设时期，所有城市都已在人民的手中，国家已有能力用贷款的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赏贫农少得的一部分土地。因此，对待富农的政策就必需改变，因为不动富农将更有利于生产建设的发展，和孤立地主。现在全国的地主约有一千万人，势力是很大的，他们常会勾结土匪特务，来暗害人民的事业，是不可忽视的。目前各地土匪特势之所以如此猖厥，就是因为有地主阶级为他们作后台。为了要消灭地主阶级，所以才决定不动富农，并不是对富农特别讨好。

我们的目的是要有步骤地消灭剥削，在目前一方面我们固然要积极地去消灭封建主义的剥削，但另一方面，我们却要容忍一下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这个时期很长，可能是二十年，或三十年，一直要到社会主义的时候，一切的剝削才可以完全消灭。

四　我国经济制度与苏联经济制度的比较

苏联当年曾经行过一种新经济政策，我们现在所实行的是新

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这两个政策的相同处有四点：

1. 苏联的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而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也是工人阶级所领导的。2.苏联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而我国也是如此。3.苏联的人民革命，消灭了封建制度，并把帝国主义从国内赶走，而我们中国的人民革命，也正是把入侵的帝国主义者彻底地赶了出去，同时正在进行着消灭封建制度的工作。4.苏联的政权是掌握在人民的手中，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也正是掌握在人民的手中。

但这并不是说这两个制度是完全一样，而是有其基本上的不同。甚么不同呢？不同的地方在于苏联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以苏联的资本家是沒有发言权和投票权的，而我国所行的则是人民民主专政，是统一战线，民族资产阶级也站在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所以有发言权有投票权。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从字面上看，既是民主，又是专政，似乎有些矛盾，事实上是丝毫也不矛盾的。美国是自称民主的，但究竟是谁享到民主呢？美国的人民是沒有民主的，美国的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民主被操纵在华尔街几个大老板的手里。这能说是民主吗？不是的，这是帝国主义。他们的国运操纵在几个人的手里，都可说是民主；那末，我们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来专政，难道还不能说是民主吗？

五　新民主主义经济

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的大意说中国有五种经济，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而这五种经济成份必须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着重点放在“整个”这二个字上。我们要利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四种手段，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二个目的。而容纳民族资本在五种经济之内，也正是为了要增加国家

财富。

是的，我们新民主主义经济，也是要增加国家的财富，这一点和资本主义经济相仿的。但是所用的手段，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是要用“增加生产”的手段以致富，却不是像资本主义国家之用侵略和奴役的手段来增加财富。其次，资本主义只要少数人富足，而我们则要全国的人都富足。因此，我们五万万人必需要团结一致，要合成一个人，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之下，同甘共苦，我们决不允许有孔祥熙宋子文这样的人，我们希望人人皆能生活，不忍见在路旁下冻死饿死的人。他们同样是人，同样是由父母生的，为什么要这样牺牲呢？凡是到过纽约的人，就都知道，纽约的西岸都是高楼大厦，柏油马路，住的都是阔人，而东岸则臭气四溢，穷苦不堪，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点必有的现象。我们绝端反对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为要防制这一点，我们的政策是求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免畸轻畸重之弊，因此对工业进行扶助，对商业则保护，对专想自己发财的投机家则毫不客气地予以打击。五种经济成份，必须要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求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六　如何从新民主主义转到社会主义？

这里有一个问题发生了。既然整个社会经济都发展了，那么将来又如何转入社会主义呢？到那时候私人资本已很强大，要消灭他不是困难了吗？其实这个想法是错了的，我用假定来说明白，就可以知道到那个时候不但不会有困难，而且是非常自然地就可转入社会主义的大道。我们假定新民主主义是二十年，再假定今年我国有一千家工厂，内中八百家是私营的，二百家是国营的，两者的比例国营是百分之二十，而私营为百分之八十。因为整个社会经济都在发展，所以三年后工厂已有三千家了。但那时国营和私营的比例就不会再是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八十，可能国营已有一千家占百分之三十三，而私营有二千家占百分之六十

七。从绝对数讲，国营和私营都有增加，不过在百分比上，私营却小了。但是因为在数目上讲，私营还是增加的，所以民族资本家也不会反对。再假定六年之后工厂已发展为六千家，内中国营已有三千家，占总和百分之五十，而私营也为三千家，这样，国营和私营资本已相平各占百分之五十。到第二十年时，假定工厂为三万家，内中私营有五千家，占六分之一，而国营有二万五千家，占了六分之五，那时就可对私人资本协商说从新民主主义转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已成熟了，现在可以转入社会主义了，问他们同意不同意，想他们只好同意，这就是不流血的革命。我的年纪太大了，但我还是等待着这幅美丽的远景到来，我们要如此而坚决奋斗，我相信我是会看到它的。

七　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说我们要过三关，第一是战争关，第二是土改关，第三是社会主义关。战争关在基本上已经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的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我们希望土改一关能顺利过去，第三关就不成问题了。土改关是最主要的一关，什么叫关呢？关通常是建在山顶上的，居高临下，形势险要。中国有一句古话，“一夫当关，万夫莫入。”所以过关是很难的，必须要咬紧牙关，拚命往上冲，才过得去。我们现在要打倒封建剥削，而容忍资本主义式的剥削，目的是在于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减少阻力。如果把两种剥削都混在一起于广大群众不利，打起来就困难，关就不容易过去。

八　用什么方法来领导民族资产阶级

我们的政策是容纳民族资产阶级的，但如何去领导他们呢？大家都知道，现在我国有很多资本家都挟着资本逃走了，他们宁愿逃到香港去做“白华”，把钱送到美国英国去花，而外国人却看不起他们，喊他们“怕死鬼”Coward，照外国人的风俗习惯，骂

人家“怕死鬼”，是一种侮辱，只有那些不知耻的白华才受得了，还要嘻皮笑脸地赖在外国，不想回来。现在留在国内的厂家，有好些只剩下了搬不动的房子和机器，流动资金都被“白华”带走了，因此只好停工。在今年三四月间，上海工人失业的有十五万人之多。“白华”以为这是对新政府的威胁，以为工人失业会使新政府害怕，以致只好低头向他们请教。事实上这并不会使我们害怕，对留在国内的厂家，只要是上轨道的，我们是会扶助的。例如在棉花上市的时候，私营纱厂或曾经集资到乡村去收购棉花，但是因为资金短，一时周转不过来，所以只能收进一批，必须在加工纺纱出卖之后，才能再收第二批。这样就有了困难，因为农民是等不得的，为了使农民不等得，只好由国家来收购。可是这样一做，却又使厂家感到了困难，因为等私营纱厂第二次下乡收棉时，棉花已被国家收完了。为了要扶助私厂，这时国家就决定用加工代纺的方法把棉花给他，请私厂代纺，并给以有合理利润的工缴。这样工厂就开工了。这是一种很有力的领导方法，可以使其有所发展，但却不会给他发大财，免得民族资本家走上错路。其次，由国家进行收购产品，也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例如工厂的成品，私商都不收的话，厂家就要停工，则由国家以合理的价格收购，使工厂不致停顿。还有如江浙的茶茧，都由国家收购进来，如果这些东西要私商去收的话，私商或要压低价格，这样农民就要吃亏，所以现在都是由国家收购。但收进来作甚么用呢？只进不出，总不是办法，因此只好政府自开公司外销或内销。有人说这是与民争利，事实上说这种话的人，其所说的“人”，就是他自己。在我们这并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为民争利”。因为如果他们不用压价的方法去剥削人民，我们就不会去收买。我们收买的目的是在于维持合理的价格，使农村里的人民不致吃亏，所以说我们是为人民争利益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民族资本家上轨道不得乱来。去年四月、七月、十一月物价起了三次大波动，米价受囤积的影响大涨特涨，那些兴风作浪的人得了大利，

眞是沒有良心的东西，猪狗不如。现在，我们不怕了，在沪宁一带，我们有存粮六七十万吨，如果那一个人再敢兴风作浪囤积操纵，就让它涨，三十万四十万五十万……，涨到一百万的时候，我们一起出笼，还是二十三万，那时不客气，只好请他跳黄浦！在上海被美蒋封锁时，存煤只有二万吨，可眞使负责同志担心到晚上都睡不着，现在呢？我们有七十万吨存在上海，怕什么呢？谁想囤煤也是死路一条！还有些人则以为钢铁五金国家是沒有的，大可囤起来。好，你去囤囤看，我们有的是外汇，有外汇就什么问题都可解决，你要抬价我们就向外国去买，你还是死路。更有些人痴心妄想天天在等着第三次大战爆发。有一个银行老板，因为他们的银行专以投机取巧为能事，经营不善，所以到现在早已吃空；但他还不想关门，却天天在打听着消息，希望第三次大战能眞的打起来，眞是作梦。我们是一直爱好和平的，我们需要的是经济建设，不要战争，我们坚决拥护保卫世界和平，如果侵略者竟然敢于发动战争，那末首先被消灭的也一定是战争的爱好者，不是我们。

（原载一九五〇年《展望》第六卷第五期）

革命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反动政府的经济政策之比较

（一九五〇年八月）

（此文以土地政策为中心辅以其他各种经济政策成一联系）

本文范围极广、内容极丰，非五六千短篇文字所能发其端倪，不得不缩小其范围，故以土改问题为中心，环绕其周围者则为其他各种经济政策和教育政策，与土改政策有计划地配合起来，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进展。这个目标，就是扩大土地的生产力，提高农民购买力，以促进新中国的工业化。

一　反动政府的土地改革

刚才我说过，这篇文章，是以土改问题为中心的。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在革命过程中，亦集中精力于土改问题。反动政府亦有他的土地政策，这是根据中山先生的主张而来的。本来耕者有其田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反动政府也不敢否认，所以也有过一番计划。但是，他却不能彻底实行，只在少数省份做了“二五减租”这一项。甚么是二五减租呢？譬如佃农向地主佃一亩田，这一亩田的正产物总产量假定是一石米，原来的租约规定是东佃各半，因此佃农需要把五斗米付给地主，作为地租。二五减租就是从地主的收入中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即一斗二升五，还给农民。从此农民只要给地主三斗七升五的地租，农民则可收入六斗二升五。这个政策曾经在广东、江苏、浙江三省行过，以浙江省做得最好，江苏则毫无成绩。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过去浙江省的二

五减租工作，是一些青年人办的，所以办得还好。而过去江苏省则是各县县长办的。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为政不得罪于巨室"，所以都不敢得罪地主，他们怕因减租而对地主翻了脸，以后的事就不好办。例如国民党反动政府要推销公债，县长就不得不向巨室地主叩头礼拜，请他们多买一些。若减租也要县长来做，这就困难了，因为一个人总不能马上翻脸不认人，因此江苏就办不好。这里又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行二五减租呢？他的目的是要减低地价。譬如有一亩田，每年可收租米五斗，这一亩田如果卖给人家，可以值一百元，现在一实行二五减租，地租减少，地价当然就要跌了。这个理由和买卖股票是一样的，这种股票的红利多，它的价钱就高；如果有一种股票一年沒有发红利，这种股票就会跌价。二五减租的目的就是要使地价减低，好让农民来买，这就是土地政策。但这只是政策的一种，还得用其他的政策来扶助配合。再譬如地价虽减低了，而穷苦的农民还是买不起的，这时就必须要由农民银行来放长期贷款。农民可向农民银行借钱去买进田地，用田地的所有权作为贷款的抵押，规定贷款分十五年还清。这就是用金融政策来帮助土地政策之实现的方法。但是农民银行的钱从什么地方来呢？前面我说过农民是用土地的所有权来抵押借款的。所以，农民银行可用土地为担保而发行土地公债，以十五年为期，每年从农民那里收回借款十五分之一，同时可收回公债十五分之一，如此经过十五年后，土地就为农民所有而公债也就完全收回，这就是用财政政策来扶助土改政策的实现。但结果怎样了呢？结果二五减租是做了，而财政金融等政策却不进行，因之地价虽然便宜了，而农民还是买不起，因为沒有地方去借钱。而地主呢？虽然把土地抑价求售，却找不到买主，所以反动政府二五减租的结果反而是两面不讨好。此外还有贸易政策方面，他非但不帮农民的忙，反倒转来毒害农民，例如宋子文的棉麦政策，使大批洋棉洋麦进口，中国的农村产品因而受到严重的摧毁。再谈到工商政策，更是弊端百出，例如春间的茶叶上市和

秋季的棉谷上市，茧行茶庄花行粮行之类经常联合压价，低价收购，对农民进行剥削，而反动政府却视若无睹，不闻不问，因之使农民大吃其亏，痛苦不堪，所以反动政府不但不能实现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反而连二五减租也失败了。

二 革命政府的经济政策

现在，我再把革命的新政府的政策来与之对比一下，土地改革在共同纲领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第一章第一条中就很清楚地讲：“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这里我们必须要认明白一个问题，就是土改并不是要向那一个阶级人民讨好，更不是对农民做慈善事业，我们必须要认定土改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土地是有限的，是一种稀有的东西，所以不能允许为少数人所垄断，而应该公平合理地为在土地上耕作的人所占有，只有这种人他才与土地有密切得拆不开的关系，也只有这种人他才配为土地的所有人。所以，农民是应该有土地的，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决不是恩赐。我拿一个例子来讲，上海的电力公司是外国人的，现在它有十七万个基罗瓦特的发电量，假定他能发展到一千七百万基罗瓦特，那么他的电线就可铺满全中国，你想这样高度的集中，将产生多末危险的事？还记得是五卅惨案那一年，我们抵制外货，上海电力公司就来一下停电，因而所有的厂都停了。看看这个危险多大，再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上海一旦无电，要发生多么严重的问题？又如自来水公司也是垄断在洋商手里，一旦停止供应，上海这些人就会没有水吃，你想这种重要的东西我们能让少数外人独占吗？当然是不能的。这个例子就可以使我们知道民以食为天，而土地为少数人所垄断，这应当吗？当然是不应当的。我们吃的粮食都是农民种出来的，但农民自己在吃什么呢？各位到乡下去看一下，就可以知道农民的

生活简直连牛马都不如，他们勤劳终日不得一饱，因之生产情绪大大低落。现在，土地改革使他们获得了土地，他明白这块田是他自己的了，他就可以安心工作，好好地服侍他的田地，精耕细作，勤施肥料，生产情绪大为高涨，因为他明白自己已不再是被压迫的奴隶，而是主人了。

三　现在我再来讲一讲与土地政策配合起来的其他的政策

1. 贸易政策

我们的土改政策，其目的在使中国从农业国上升为工业国，这是一个总目标，因之各种政策都必须围绕着这一个中心，贸易政策当然不会例外。我国的贸易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我们需要进口的物资有三种，就是粮食、棉花和油。油又分三种，就是汽油柴油和洋油，其他还有二种附带进口的东西，就是麻袋和马口铁，（装米要用麻袋，装油要用马口铁桶，所以这两种东西进口数量不在少数。）这些东西一年要花费外汇三万万到三万五千万，这许多外汇哪里来呢？是用七种物资进口换来的，就是大豆、猪鬃、桐油、皮毛（不是皮革，我们沒有皮革）、茶叶、鸡蛋和矿砂（钨、锑、锡），我们把这些东西运出去，换回大机器、钢铁、拖拉机，那才是正理。可是我们进口的是什么呢？粮食、棉花、油、一句话，还是以农产品换农产品，以矿产品换矿产品。试问这样中国如何能工业化呢？所以说，我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是已经打了胜仗，获得了胜利，但在经济上我们还是非常落后的。因之我们的贸易政策第一就是要使粮食和棉花不进口，预计东北今年可增产粮食一百亿斤，所以今年粮食一定够的，不必进口了。虽然现在有个别地区的水灾很严重，但我们已有准备，相信我们即使遇到同去年一样的水灾，也不要紧，我们有准备。我们不但有决心和帝国主义斗爭，还有决心和天作斗爭，并且十分肯定的相信，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棉花我们计划今年增产七百五十万担，使美棉不再进口，因

为太不合算了，例如过去中国棉花市价在二万八千元时美棉价要合到三万三千元。

汽油则一时还沒有办法，固然我们石门有油，但交通不便，即使铁路铺就也还是不上算，因车运太贵，最好是用管子，这在短时间是办不到的。

以上就是我们的贸易政策，这个政策是完全配合土改政策，帮助农民，使中国经济得以复兴的。

2. 工商政策

工商政策也是扶助土地改革，帮助农民翻身的，在从前，一般的工商界总是想尽方法去剝削农民，例如春季茶茧上市或者秋季棉谷上市的时候，因为农民急于把自己的东西脱手，一般到乡间去收购的工商业家就会趁此机会联合压价，农民只好忍痛出卖。还有当农民急需买进农具种子等的时候，一般工商业者又乘机抬价，剝削农民，使农民更加穷困，更加痛苦。为了要使农民翻身，我们不能单希望土改之后，每个劳动的农民有了二亩田就会一切好转，我们还要用工商政策来配合，从多方面来帮助农民。我们的工商政策就是如此，正当茶茧或者是棉谷上市的季节，如果有人想压价收购，我们就进行收购，用适当的价格，不使农民吃亏，不许工商业家进行剝削。待农民需要农具、肥料、种子，而工商业家企图抬价时，我们就抛售。因此有些人就说这是与民争利。事实上他所说的“民”就是他自己，我们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为民争利”。我们承认合理的利润是必要的，但是对于投机暴利则我们一定要打倒。我希望先知先觉的工商业家们，必须要努力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才有出路。对于正当的工业，我们一定扶助，对于正当的商业，我们要保护，但是对于投机者，那就绝不客气，坚决地打倒他。这就是我们的工商政策。

3. 财政政策

解放战争的初期，我们的重点都在乡村，所以农民的负担是特别重，他们不但贡献了他们所有的钱粮，更有大批的人参加了

革命的战斗队伍，那时可说是城市吃乡村。现在，全国都已大部解放，情况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城市当然需负起一定的责任，起码也得各养自己，乡村养乡村，城市养城市，才算公平合理，因为自己的快乐必需要建筑在他人的快乐上，那才是对的，如果把自己的快乐去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上，是不人道的，我们决不允许这样做。乡下的农民是穷困的，他们的生活状况只要就近到浦东去看一下，就可以觉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这里要相差一百年，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苦而这里的人又这样享受呢？这是沒有理由的，所以我们决定把农民的负担一再减轻，原来农业税要达到农业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上下，后来改为百分之十七，再改为百分之十三，而且只税正产品，对副产品以及因劳动工作或善于经营而多得的，也不多征。还有农业交易税征得很宽，又决定今后交易税只适用于经过牙行和交易所的买卖，举凡国营商店、合作社、固定工商业和人民，不经过牙纪交易员直接成交者，一律不征交易税，对农民推销家庭手工业品和农副业品，也不征行商税。由此可见我们的财政政策，也是配合着土改而予农民以帮忙的。

4. 金融政策

为了要消灭城乡对立，眞正地做到城乡互助，内外交流，首要条件就是要使人民币下乡。如何才能使人民币下乡呢？我们必须要组织联营银行到乡村去放农贷，或者是去收购产品，同时还得把工业品带去，使农民拿到了人民币可去买他们需要的东西，这样不但人民币可以下乡，且连工商业都沾了好处。不过，这个问题谈起来是容易的，做起来就困难太多，因为要农民对人民币有了信心，才能谈到人民币下乡，不然今天下了乡，不到明天它又上城里来了。如何能使农民相信它呢？当然只有物价稳定。现在，物价是稳定了，可是所花的力气可眞不在少数，由于毛主席与中央人民政府正确的领导，以及各部门负责同志认眞的执行，所以这一次统一财经工作，终于获得了一个大胜利，物价稳定了。同时，这也就为人民币下乡具备了一个前提，农民的购买力必然

地将在各种政策的配合帮助下，逐渐提高起来。以东北为例，一九四七年销售的布疋是八十万疋，一九四八年是一百二十万疋，一九四九年是三百二十万疋，一九五〇年预计可能达到九百万疋，因为本年的第一季度已经销售了二百五十万疋。这就是说农民在土改之后，再加上各种政策配合扶助，生产增加，生活改善，购买力大为提高，这是布疋的销售情形，至于绦袜皮鞋之类，当然还不会有大出路，因为时间还不会到，现在还正在开始的阶段。

5. 交通政策

现在我再讲一讲交通政策是怎样配合土改来帮助农民翻身。我国粮食本来是够吃的，我们可以用实际数字来说明它。照算每年平均可生产粮食二千三百亿斤(包括米、麦、高粱、玉蜀黍等)，去壳后净产粮食一千八百亿斤，以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来平分，每人每年有三百八十斤粮食，大人小孩扯平，是足够的。但为什么过去还要洋米进口呢？就是因为交通不便，许多有粮地区的粮食运不出来。例如云南、湖南、四川，都有丰富的粮产，但却运不出来，因之形成了当地的谷贱伤农，而许多城市，却因无粮或少粮，因之谷贵伤民。我们为要消除这种现象，因此在去年一年中，曾把全副精力集中在交通的恢复上。以津浦铁路来说，国民党反动派在他对这条铁路实行兽性的破坏以后，说我们起码要花一年半时间才能修复，还说内中还少四百万枝枕木，必需要到美国去买。但是，我们只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把它修复了。不仅如此，我们连一枝枕木都不曾向美国去买，所有的枕木都由人民送来的，由此，可知只要发动群众，大家团结一致，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交通不便利的结果，会使有无不能相通，而农民吃亏却顶大。当然，农民看到粮食不能运时，也决不会任粮食堆存甚至霉烂，他们一定要想法子使粮食变成容易运出的东西，把它运出来。例如四川，他们把粮食酿成大釉，贵州则把粮食酿成茅台酒，山西出汾酒，云南出火腿，而事实上真正为人民大众所切需的粮食，

却因之而感到不足。为此，我们决定要发展交通，用交通政策来扶助农民，使他能早日翻身。现在成渝铁路已在动工，这条路的钢轨都是我国自己造的，现在我们的鞍山炼钢厂有二只四百吨的炉子和一只六百吨的炉子，只是现在还沒有轧钢的机器，所以必需把钢运到四川的大渡口，由大渡口的轧钢机轧成钢轨后，才能使用。如果这条成渝铁路铺成了，那么国内的交通就可以路路通了。那时重庆将成为西南的集散地，长江水运自然也将增加，一般城市也就自然繁荣，农民的产品也有了一定的销路，购买力就大大提高，工商业因之而有了发展。那时农村多余的劳动力就可转入工厂路矿工作。这是我们用交通政策来帮助农民的方法。我们的哲学是要大家都好，不允许某些人特别好，某些人却遭冻挨饿，我们要坚决地打倒人剥削人的制度。

6．教育政策

最近中央召开了一次高等教育会议，标题是要为工农子弟开门。从前可曾有工农子弟跨进大学之门的吗？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有几个是工农子弟呢？天理良心，打仗是农民打的，我们怎能坐享其成呢？虽然，我们幷不是全然沒有危险，但至少我们幷不曾直接拿起过枪炮上前线。那么，为甚么工农子弟就沒有机会能够上大学呢？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要到处办速成中学，立即眞正为工农开门。

其次，我们的教育政策要求教育的理论与实际一致，学用一致，千万不能像过去那样，学出的学生与实际联不起来。如过去农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仍旧教书，另一就是改行做生意。这就是理论与实际配不起来的结果。再如浙江大学农学院蔡院长说今年螟虫害很厉害，据他说如果全国的农业生产有一成受害，即将减产二百三十亿斤粮食，而螟虫害通常是二三成都会发生的，所以必需要大批的人才去配合农民工作，方不致受害。可知教育政策实在也是帮助农民翻身的一环。

由此，可知我们帮助农民翻身，不单是土地改革一次，更不

能认为只要分配了土地就甚么都成功了，我们还有许多种政策来配合，这才能使农民眞正的翻身，而购买力也才可以得到提高，富强、独立、自由的新中国也由此而得以实现。

（原载一九五〇年《经济周报》第十一卷第七期）

看得见的成就看不见的成就和想不到的成就

（一九五一年六月）

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国防、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工作，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使国家和人民生活的面貌焕然一新。兹把这些成就分为：（一）看得见的成就，（二）看不见的成就，（三）想不到的成就三种，来叙述我对于短短的一年多以来实际工作的体会心得。

看得见的成就

这一类的成就，明白时事的人大概都已经知道，我不过在此地重新提一提。（一）十几年来的通货膨胀忽然停止了。去年三月以来，物价趋于稳定。在今天，一面在朝鲜进行抗美援朝的任务，一面在国内进行各式各样的建设，而通货依然不膨胀，物价依然稳定如故，这一点已足以令人骄傲。（二）三百多年来始终沒有平衡过的财政，今日已接近平衡。（三）国内旧的交通早已恢复，新的正在建设。（四）自去年五、六月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开始以来，不仅调整了公私关系，而且也部分地调整了私私关系，今日之联营组织就是调整私私关系的结果。（五）土地改革，在华东，已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民生产情绪异常热烈，购买力开始提高。（六）今年政府全心全意地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各地正在举行土产展览会，所得结果都不错。（七）水利工程，可说有一日千里的进步。现在我们决心治淮，遵照毛主席的意思“一定要把淮河修

好”。要知道现在的治淮，与反动政府的“导淮”，比较起来，实有天渊之别。导淮委员会，导了二十年，一无所成，此是人所周知的事实。（八）至于文教方面的成就，更难以计算，如华东这次为镇压反革命举行广播大会，直接收听的有五百多万人，间接的尚不在此内。如果在乡村间也设收音机听讲的人可达几千万。

看不见的成就

以上是几种看得见的成就。此外还有看不见的成就，比这个看得见的还要大。从前的中国人大都不问政治，自己的生活与政治脱节。就是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也抱“为科学而科学”“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其原因或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太腐败，不同流合污，故抱独善其身的态度。现在思想转变了，知道政治前途的光明，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所以人人要问政治；而政府的人也与以前政府的人不同了，要人民参加政治，大家也都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种都是思想上的转变，看不见的成就，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宗教界的革新也是看不见的思想上的转变，看不见的成就。基督教徒第一次发表革新运动宣言时，签名者只有一千五六百人，现在已有二十多万人，非思想转变，何能致此！天主教徒也在开始转变，以前他们以为宗教第一，爱国第二，现在好多天主教徒也知道了爱国第一，宗教第二，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解放前每个青年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光明，在延安及老区；一是黑暗，而黑暗遍中国。年青的人要想向光明跑，只有改名换姓的方能逃出家庭。现在除台湾之外，光明遍中国，连以前最顽固的父母，现在也鼓励子女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这不过几年的功夫，竟有这种转变，不是思想上的转变，又何能如此。现在参军的人很多，我们浙江省有一个小乡村，报名参军的就有五百人之多，因为人人思想上认为这是自己的事情，国家的事情与自己的事情一样，这是第三个例子。第四，农民以前的思想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现在反过来了，“好男才要当兵”。所以我们到处有

民兵。有一派美国反动分子、要蒋介石从台湾来进攻大陆，我们倒很欢迎。从前他有五、六百万军队，其中不少是机械化部队，都是美式装备。那时我们还沒有民兵，尙且打得他落花流水，全军覆灭。现在台湾不过四、五十万军队，倘若他要来，我们眞不胜欢迎之至。老老实实说，我们现在的乡村，放来的人沒有通行证不要想跑进去。就是我本人要想回家，沒有证明也不能进去。我可以说一个例子，浙江有一个村子由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子在村口放哨，有一个人担了担柴，要跑进这村子。放哨的孩子盘问，他因沒有通行证不许他通过，但因他是小孩阻止不了，只得让他进去。但沒有走出村子，小孩就敲锣，全村人都跑出来，拿了武器，把这个人包围，把他的一担柴拆开来看，內中所藏的都是枪弹，是为挑到后山去供给土匪特务的。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蒋介石军队要想开到乡村里去是自投罗网。我们沒有这许多解放军布置在各个乡村的角落里；但是我们有三万万多的农民可以抵抗他。就是蒋介石不用陆军而用空军降落伞部队民兵也可以消灭他，这就是土地改革后必然的结果，也是思想上转变后的一种成就。乡村的好人现在要当兵了。第五我们对弱小民族称少数民族，亦称兄弟民族。过去反动政府对弱小民族都用镇压政策，现在我们改用团结政策，一视同仁。所以今天西藏也愿意进来，这是思想上的感召。

想不到的成就

关于想不到的成就，我可以举一个实例。东吴大学有一位教授，思想很顽固，到今天还在东吴大学教美国亲属法，不但害了自己而且害了学生。但是儿女很进步。这次“五一”国际劳动节上海有二百多万人参加游行，诸位都知道的。他的女儿是腰鼓队队长，他阻挡她参加，父女大闹一场，女儿逃出家庭，就在群众面前站起来控告她的父亲，说他的父亲思想如何如何顽固！如何如何反动！如何镇压进步青年。她说：“我的父亲学问是有的，但是

好学问要好人来用，若落在一个坏人的手里，那糟了。比如一把刀握在生产者手中可以利用生产东西，若握在强盗土匪特务手中，他却用来杀人。学问也如此。”这是大义灭亲的实例。所以我想思想反动的父母，不但群众要攻击，自己的亲人也要攻击。所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这一句话，已经不对了，要看自己的作法了。这不但是看不见的成就，而且是想不到的成就。同时我们社会的思想也改变了。以前我们在旁的人，会觉得她大逆不道，而现在却觉得她是对的。现在我们不说她是大逆不道，而说她是大义灭亲，这也是思想上想不到的进步。这又是一例。(三)又如这次土地改革，本身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从土地改革中，可以看出农民的思想与作风，与解放前是大不同了。解放前他们受种种压迫与剝削，过牛马的生活，以为他们的命运是天注定的。现在开始认识了自己，认识自己是新中国的主人翁，知道他们的命运，操在自己的手里，他要增加生产改造环境。从前他们受天的支配，现在他要改造环境支配天了。从前他背上封建势力的枷锁，现在他自己建立了乡政权。这也是短短一年多来想不到的一种大成就，这又是一例。在短短的一年多以来的成就已经如此之大，再过三、五年，其成就更非吾人能想象。

进步为什么这样快

最后我要讲一讲我们的进步为什么会这样快？原因当然很多，不过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上领导有方，在下团结得好。因为领导处处用群众的力量来表现建设的能力。群众如何会团结呢？因为他们知道领导者是眞正为人民服务。但群众的力量伟大在那里呢？举一例以明之。比如杭州这次的土产交流展览会，开得很成功。政府幷沒有花多少钱，估计不到两亿，但实际上花钱很多，都是群众自己出的。他们知道土地改革后农民购买力提高，土产有出路，他们有信心。因此愿意出钱出力。现在无锡、苏北、上海各地，有的也已经在开，有的即将开。杭州的展览会

因天气不好，常常下雨，影响了去参观的人，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因为人和，所以仍然是成功的。人力可以克服一切，参加杭州展览会的，有二百五十个单位，西自迪化①，南自桂林，都来参加。各单位之间互订了三百多个协议与合同。协议是因为不晓得要买多少东西，就先订一协议，以后再根据实际需要订立合同。通过展览会，不但桂林、迪化与杭州直接发生了关系，即桂林与迪化也因杭州的媒介而发生了关系。因此影响很大，为以后全国土产交流打开了出路。以前东北除沈阳外沒有好的茶叶吃，但杭州茶叶却霉烂卖不出。今年这样一来，各地可以吃好茶，杭州茶叶也有了出路。岂非两得其利吗？杭州的绸缎可以销到迪化去，因为迪化许多人骑马，灰尘多，往往出门回来全身是灰，穿了缎子马褂，回来一打扫就干净了。他们决定买杭州缎，用他自己的土产来交换。杭州展览会的成功全靠发挥群众的力量，浙江省政府只用了两亿人民币。根本原因，是上面领导得好，下面团结得好，因此可以利用群众的力量来完成一切。

（原载《光明日报》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① 迪化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下同——编者。

驳斥资产阶级的荒谬论调

（一九五二年二月）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二月八日对解放日报记者发表谈话，驳斥所谓“资产阶级一无军队，二无枪炮，拿什么来进攻？”“明明是你们的干部自行失足落水，却嫁祸于人”等等否认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对工人阶级、共产党猖狂进攻的种种荒谬言论。

马寅初说：在人民民主革命已经取得胜利、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已经确立的今天，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有组织地在全国范围内全体规模上向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但是，这决不是说它们就放弃了进攻，三年以来，它们在有意识有计划地向我们进攻。他举了几个例子说：北京中国银行发生好几件案子，资产阶级用一千万一个月来收买经济情报，这不是进攻是什么？各地所有的大贪污犯几乎都与不法商人有关，这不是进攻是什么？现在不法商人的“攻守同盟”岂不是向国家集体进攻的一例吗？

政府三年来对工商界的扶助是仁至义尽的。但是像上海正泰橡胶厂的资方，以怨报德，仅仅谎报轮胎成本一项，就盗骗国家资财达三百四十七亿，其他可想而知，这还能说不是他们在进攻吗？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某负责人在北京开会时，听到政府将有大量的机器定货，立刻通知他所经营的企业，引起了上海五金器材的巨大涨风。又如在北京有一个曾在国民党政府里做过“盐务总办”的缪秋杰，和盐商关系密切，他混进中央财委机关里来，听说盐税要加了，一个电报，东南沿海盐商的资金立刻集中，收

进一万七八千包，市场上沒有盐了，盐商却大发其财，这还不是他们在有计划地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不顾国计民生，从中获得暴利么？

有人说革命干部是“自行失足落水”的，但是，革命干部们长时期在农村中沒有变坏，进城以后，思想上才起了变化。如刘青山，参加革命二十年，成为革命的叛徒都只是最近一年的事。为什么呢？这还不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吗？还不是他们引诱、腐蚀的结果吗？怎么能说“嫁祸于人”呢？

马寅初说：资产阶级三年来的猖狂进攻，已经使国家在各方面都遭受到很多有形或无形的损失，这些损失，是很难计算的。资产阶级如此嚣张，是决不允许的。我们的国家经济必须是以国营经济为领导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向社会主义发展，我们决不允许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奸商、投机家、小偷们冒险的乐园，成为一个趦趄不前的，混身瘫痪而最后又落到殖民地深坑里去的国家。

马寅初严正地批判了某些人散布的恶意的谣言，如：“搞三反、五反，要修改共同纲领了！”“你们不是说四个朋友三个敌人吗？怎么要打倒朋友了？”马寅初说：我们今天要反掉的，并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腐朽堕落思想和行为。至于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四个朋友的一个，政策一点也沒有变。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四个朋友在一起，三个朋友都很好，但是你这个朋友却拆了烂污，和那三个朋友过意不去，那么，那三个朋友自然要联合起来，反掉你拆的烂污了。何况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是有法律根据的。共同纲领第十八条，不是明白规定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吗？

马寅初说：共同纲领是大家签字同意的。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又明明白白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国营

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不是很明白吗？必须是“在国营经济领导”的前提之下，才能谈到“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由此看来，共同纲领是工商界所赖以保障正当企业合法地位和经济利益的，理应严格地遵守。但是今天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早已脱出了为他们的代表人物所签字同意的共同纲领的范围，公私兼顾变成以私害公，完全和共同纲领相反。至于偸税漏税，更为共同纲领所不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有缴纳赋税的义务，为共同纲领第八条所规定，因此逃税偸税是严重地违反共同纲领的。这是谁“不够朋友”呢？资产阶级的这种不够朋友的行为，难道还不应该反掉吗？

马寅初说：上海过去一直是投机码头，交易市场上是极其龌龊的，长时期以来，这些恶习已经根深蒂固。上海的工商业家，应该老老实实地改造思想，过去有错误的，应该及时回过头来，低头认罪，重新从事有利于人民的事业，彻底清除坏思想和坏作风。今天谁替人民多做一分事，人民是看得清的，就是到将来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人民也忘不了他的这一分功绩。工商界人士口头上都说“我要为人民服务”，但“为人民服务”不能仅从口头上去了解，还要从心底里做到为人民服务。在过去反动统治时代，谁能偸漏税款，谁的手段高，谁就受亲友尊敬。现在时代不同了，行贿偸税被视为可耻，因为它侵害人民的利益，就对人民犯了罪，就为人民所共弃。

马寅初对上海的十六万店员工人寄予极大的期望。他说：上海的不法商人是极其狡猾的，有一个商人有四本帐，四本都是假帐，眞的帐在他自己肚子里，店员工人们应该勇敢地行动起来，揭开那本隐蔽的帐簿，站稳立场，分别善恶，坚决地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一日）

我国一九五二年度国家财政收支预算的优越性和特点

（一九五二年八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二年度国家财政收支预算，已经本月六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据薄一波部长的说明，编制这个预算的基本方针是：继续巩固国防、稳定物价，并进行全面恢复和重点建设。这个预算的总收入及总支出在编制时已经达到完全平衡，薄部长说：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我们国家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出现的最有利的情况。我们全国人民听到这个消息，将如何的欢欣鼓舞，加紧努力，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来保证新预算任务的胜利完成，庆祝毛主席的正确、伟大和光荣的领导！

（一）优 越 性

这个预算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将“巩固国防”、“重点建设”、“全面恢复”和“稳定物价”这十六个字的任务能够全面做到。这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

我们都知道，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国家（包括它们的附属国和殖民地）的物价，是受自发的供求律所支配，政府是无法控制的。它们一面发动侵略战争、扩大备战经济，一面又要安定秩序、稳定物价。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将四件事完全做到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要加紧军火生产，发动侵略战争，就必须增加大量的经费。经费来源不外三种：一、增税；二、发行钞票；三、募

集公债。增税的结果，必定要减少人民的购买力，减少民用物资的需要，这些物品的价格必然要跌落。若发行钞票，膨胀通货，结果物价必定高涨。再若发行公债，除人民使用储蓄购买公债不影响物价外，如由人民节约消费来购买，其影响物价将与增税相同；如以公债向国家银行押借，则其影响物价将与膨胀通货相同。现在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因遭受迭次大战的损失，那里还有储蓄可以应募公债！所以他们的物价是不会稳定的。不是跌，就是涨。无论涨与跌，都是减少人民购买力的结果。于是民用工业倒闭，失业工人增加，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危机。秩序又那里能安定！如果限定物价，战争经济就无法扩展。所以他们对这四件事是不可能全面做到的。其结果是招致经济的崩溃。远的不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就是这样的。美帝国主义扶持蒋匪帮发动内战，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今天美帝国主义还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发动侵朝战争，能够逃出这个命运么？据估计，美国每个成年男子每年的税收负担，已从一九二九年的一百五十一美元，增加到一九五一年的八百六十美元，但预算的亏空还是一年大一年。据美国财政部三月间宣布，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二会计年度头八个月中，收支不敷已达七十五亿多美元；一九五二到一九五三会计年度预算的亏空，将达一百四十四亿美元。在一九五二到一九五三会计年度预算八百五十四亿美元全部开支中，军事费用就占百分之八十八·八，其他行政、教育、卫生等非军事开支不过百分之十一·二了，其中教育费不到全部开支的百分之一。所以税额增重、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生活水准继续下降、失业增加、人心惶惶，这还不是自杀的道路么？

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国家，包括过渡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对于巩固国防、重点建设、全面恢复和稳定物价这十六个字的任务，能够全面做到。因为我们运用的价值律是改造过了的价值律，受经济计划支配的规律；所以在重点建设、巩固国防、全

面恢复的要求下，可以做到物价稳定；并且物价稳定，更是巩固国防、重点建设和全面恢复的必要条件。苏联在建国后不久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先进经验，光辉的照耀着我们。我国一九五〇年三月底统一财经工作展开后，全国物价即迅速的趋于稳定。两年多来，在物价稳定的条件之下，巩固国防和重点建设更着着的胜利前进。据统计，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重庆、西安六个大都市的批发物价指数，如以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为一〇〇，则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为一一三。一年间只增加百分之十三。“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半年余来，物价已全面的稳定了。这与美国不是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么？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会词中教导我们：“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我们今年的预算，也正是优越性的一个明证。

（二）特　　点

我们这次预算的几个特点，主要的有如下述：

一　收支完全平衡

财政收支以平衡为原则。赤字预算固然不好，收入剩余过多也不是很健全的财政，因为这将不能使所有的钱用到最有用的地方去。我们编造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时，只能说接近平衡，对于物价也只能说基本稳定。今年财经情况根本改观了，财政收支既完全平衡，物价亦全完稳定。这种完全平衡与稳定，且在执行一九五一年度预算过程中就已经达到了。这不仅是蒋匪帮统治时期所没有过的，也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现象。而且“三反”“五反”所归还国家的财产，还未计算在内，足证今天国家财政的丰裕了。

二　建设走向和平

帝国主义国家的财政全部开支中，军事费用至少要占百分之五十，近年英国就是如此；法国占百分之五十九；美国则近百分之九十，已如上述。这是帝国主义战争经济本质及其侵略政策的反映。和平民主国家情况就完全不同，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用于国防的支出，如一九四五年也不过占发出的百分之四十五；一九五二年的预算，国防支出就降低到百分之二十三·九了。这又是和平经济本质的反映。我国因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又处在加强国防建设的情况下，一九五一年度的预算还是国防支出占第一位，经济建设居第二位。一九五二年度预算中则已经易位了，建设（包括经济与文教）已上升到第一位，且占全部支出百分之五十以上，国防支出则降到第二位。足见我国的经济亦是大踏步的走向和平。

三　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增长

一九五〇年国家财政收入中，城市税占第一位，农业税占第二位，国营企业利润收入占第三位。一九五一年城市税收虽仍居第一位，但比例相对减少，国营企业利润及折旧提缴则上升到第二位，其绝对数字增加更大；农业税则降居第三位。今年中央和地方国营企业利润及折旧提缴比一九五一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九·八三。如将列入全国预算的地方国营企业利润除外，今年国营企业利润实增百分之八十八·五。“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共同纲领第二十八条）。今天国营企业利润及折旧提缴收入迅速上升，是社会主义经济成份迅速成长的指标。

四　工农联盟的基础日益巩固

反动政府统治时代，农民负担是极其苛重的。孟子就说过封

建社会里农民的生活情况："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农民生活更要恶劣，到蒋匪帮统治时期，农民的穷困已经到了极点，出钱、出力之外，还要出命。可是解放后的中国农民，分田分地，生活大大改善了。全国解放以后，农民的负担又逐年降低。一九五二年我国的农业税收入已降到第四位，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二，并将地方附加税并入正税一道征收，这样一九五二年农民负担将比一九五一年减少许多。在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农民负担又减轻，工农联盟的基础必日益巩固。

五　文化教育的惊人发展

文教建设亦是和平建设的要素。一九五二年文教支出增加尤多，比一九五一年增加百分之一百八十四·八三。为培植国家建设人才，下半年起，全国高等学校、中等技术学校、师范学校、工业速成中学的学生全部发给人民助学金，普通中学的助学金亦较一九五一年增加。由于文教事业的发展，全国小学生将自四千三百余万增到四千九百万，中学生将自二百余万增到三百万，高等学校学生将自十七万增到二十一万。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解放前反动政府统治下的青年所受饥饿和压迫的情况，公教人员捉襟见肘、朝不保夕的苦难，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生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和公职人员是多么的幸福呵！前途又是多么的光明呵！

我们的财政经济情况能够这样的迅速好转，是由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使各项物质建设能有计划有步骤的前进。而尤其重要的，还是几年来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普遍进行着思想改造，使人人的政治认识水平不断提高，以主人翁的态度，热爱祖国，热爱领袖，坚强团结，朝着同一目标前进，故能发挥无比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推动国家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像荆江分洪工程中的劳动模范，每日挑两万

多斤泥，行走一百三十里路程。像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的创造，以及其他成千成万的劳动模范与战斗英雄，和成千成万的创造发明，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涌现的可能。群众力量的无穷无尽，据根在此。马克思说："理论一掌握了群众，便立刻成为物质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预算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原载一九五二年《经济周报》第三一四期）

一九五三年国家财政收支预算的特点

（一九五三年三月）

一九五三年国家财政收支预算已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预算不仅是生产的预算，建设的预算，而且是增进人民福利的预算。为了更好地认识它，我们可就以下各方面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一 理论上的认识

应该特别指出，新中国的财政收支预算是在十分巩固的基础上编制的，而一九五三年的预算又是以过去三年恢复阶段所获得伟大成就为其基础，因而它必然有更长足的进步。今年的比去年进步，而明年的一定会比今年更进步。面对着这么一种与资本主义体系国家预算根本不同的人民预算，首先从理论上去认识它，这是完全必要的。

兹就理论上，把我们的国家预算作如下的分析：

（一）谁都知道，预算是一个国家在一个特定时期中要执行的政策的具体反映，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是和平或是战争，用不着听或是读他的那些冗长的报告，只需摊开他的预算，就一切都明白了。因为需要和平的国家，必然致力于国家建设，因而他的预算支出也必然是偏重于经济建设费用；而爱好战争的国家，就必然倾全力于军事费用。我国外交政策是和平的外交政策，所以我国的预算也就是以生产和建设为主。

（二）预算不仅是收入得越多越好，支出也是越多越好，但

它有一个必须绝对遵行的原则，就是要保证收支平衡。人民国家的预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收入越多，可用于经济、文化建设的经费也越多，经济、文化建设支出越多，社会生产力就越高，而生产力一经提高，与之相适应的购买力就必然提高，从而人民的文化、生活、福利都在日益向上。我们的国家预算就正是这样的，因此它不仅是生产、建设的预算，也是增进人民福利的预算。

（三）一个最好的国家预算，为了造福人群，在它的支出部份，行政费和国防费必然是比例地小于国家建设费的。像这样的预算，过去只有苏联才有，而现在，我们以及和我们同路的新民主主义国家都做到了这一步。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新的胜利。

（四）由于我们的预算不是消费性而是生产性的，因而它还起着因果相循日益扩大的作用。因为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取得越多用得也越多，所以生产力也越大；反过来说，生产力越大，购买力也越大，文化、生活、福利也越益增进，从而国家收入也越多。这样因果相循相互转化，直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但是，有些人对于这一点似乎是认识不足的，例如当报上发表了薄一波同志的报告后，因他的报告中曾指出一九五二年可能节余三十万亿元以上，有些人于是乎就连想到这可能是“三反”“五反”退补数字。事实上如果能够仔细研究一下，这种错误论调是不会有的。因为这笔退补数字在一九五二年的预算中并未打入，而是打入一九五三年其它收入中的，且它的数目仅是三万亿，不及一九五二年节余数字（预算节余二六〇五九五亿加上各机关团体拨款后来用去的约四〇〇〇〇亿）的十分之一，更不及一九五三年预算收入部分超过一九五二年收入部分余额四四二二一〇亿的十四分之一。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当它被排列在国家预算中，却是并不过分重要的。

（五）一九四九年以前，那时解放区还仅限于农村，国家收

入差不多全靠公粮，也就是说所有负担都落在农民的身上。全国解放后，城市回到人民的手里。客观情况即已改变，负担面当然要随之改变，这时国家预算收入部分的第一位慢慢地由工商税取而代之了，这是第一阶段，而现在，第二阶段开始了，在这一阶段中占国家预算收入第一位的，将不再是工商业税，而由国营企业收入和信贷保险收入逐步替代了。这说明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领导地位的不断增长。

（六）从预算的收支中还可以看出，我们和美帝国主义之间是沒有絲毫相同之处的。在美国，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差不多全数落在日益穷困的人民身上，而日盈累万的富翁却是一毛不拔。再从支出来说，为了满足少数垄断资本家进行掠夺并追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欲望，美国的预算支出了大量资金来订购军火，以维持其搖搖欲墜的霸权；发行了大量钞票，以弥补其预算赤字，于是乎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购买力减退、民用生产减少、工人失业、生活困难等等的厄运就必然临到了悲苦的美国人民的头上。这和我们中国人民的幸运遭遇，是万难比拟的。

二 事实的佐证

仅作以上的分析是还不够的，这里我们还可以引证一些具体的事实和数字，俾能更进一步地认识我国预算的优越性。

年度 项目	一九五二年预计收入（百分比）	一九五三年预算收入（百分比）	增减百分比（－）（＋）
总收入	一〇〇	一〇〇	
各项税收	五〇・八三	四九・一二	（－）一・七一
其中：工商业税	三六・四五	三七・四六	（＋）一・〇一
农业税	一三・五二	一〇・九九	（－）二・五三
其他	〇・八六	〇・六七	（－）〇・一九
国营企业收入	二四・六一	二九・九七	（＋）五・三六
信贷保险收入	一・三三	四・四〇	（＋）三・〇七
其他收入	二三・二三	一六・五一	（－）六・七二

先从一九五三年预算的收入方面谈起罢。为了便于分析起见，我把一九五二年的预计收入数和一九五三年的预算收入数列表于前。

从这个表里可以看出，一九五三年预算收入百分比较一九五二年增加最多的是国营企业收入，它的百分比增长了百分三五·三六；其次是信贷保险收入，它也增长了百分之三·〇七。再次是工商各税（包括盐税、关税、流通税、印花税、利息所得税、屠宰税、交易税等）一九五三年的百分比要比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一·〇一，而农业税和其他税收则都减少了。如果用具体数字来说明这种增长的情况，则如下表：

项目＼年度	一九五二年预计收入数	一九五三年预算收入数	增减百分比（+）（-）
总收入	一八九二七八一	二三三四九九一	（+）二三·三六
各项收入	九六二一八二	一一四六八五二	（+）十九·一九
其中：工商各税	六八九九一九	八七四七九二	（+）二六·八〇
农业税	二五五九〇二	二五六五〇〇	（+）〇·二三
其他	一六三六一	一五五六〇	（-）〇·八九
国营企业收入	四六五七八八	六九九八五二	（+）五十·二九
信贷保险收入	二五一〇〇	一〇二八〇〇	（+）三〇九·五六
其他	四三九七一一	三八五四八七	（-）一二·三三

注：预计收入和预算收入项中的数字单位为亿元。

这个表清楚地告诉我们，以绝对上数字看，各项税收并不是减退而是增长的，不过它的增长速度很慢。国营企业收入就不是这样，它增长的很快，而信贷保险收入则增长的更快，这就十分有力的说明了国营企业的重要地位及其领导作用。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九五三年预算中农业税只增长了百分之〇·二三，这说明国家是有意识地在预算收入上照顾农民，稳定农民负担以利农民的生产。

现在，我们再从支出方面来谈罢。

项目＼年度	一九五二年预计支出数（百分比）	一九五三年预算支出数（百分比）	增减百分比（－）（＋）
总支出	一〇〇	一〇〇	
国家建设费	五八・四五	五九・二四	（＋）〇・七九
其中：国民经济建设费	四四・七七	四四・三四	（－）〇・四三
社会文教建设费	一三・六八	一四・九〇	（＋）一・二二
国防费	二六・二一	二二・三八	（－）三・八三
行政费	一一・八五	一〇・一九	（－）一・六六
其他	三・四九	一・五六	（－）一・九三
总预备费	〇	六・六三	（＋）六・六三

这个表最值得注意的是国防费支出的缩减。如所周知，正当艾森豪威尔声嘶力竭地高叫扩大侵朝战争的年头，我们预算中的国防支出居然缩减了，这说明什么呢？这也说明了我们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优越性。这就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沒有影响我们建设的进行，而且还可以在不影响国防实力的情况下抽出力量来进行经济建设，这是足资我们骄傲的。

其次，这个表上所列百分数两年间增减虽然不多，但同样可以理解，如按绝对数字来说，各项建设经费的增加则是惊人的。下面就是一九五三年支出预算和一九五二年预算支出数的比较（见下表）。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一九五三年预算中，按照绝对数字与一九五二年作比较，除其他支出一项降低外，其余都是增加的，而增加最多的则是国家建设费。

在预算的支出部份，国家建设费这一项下包括国民经济建设费和社会文教建设费两款，文教建设费的用途正如它的文意，用不着多所解释，而国民经济建设费就不简单了。到底什么是经济建设呢？大家一定会想到，这当然是指生产建设而言的。但是，这种

项目 \ 年度	一九五二年预计支出数	一九五三年预算支出数	增减百分比（+）（-）
总支出	一六三二一八六	二三三四九九一	（+）四三·〇六
国家建设费	九五四〇二四	一三八三三五一	（+）四五·〇〇
其中：国民经济建设费	七三〇六九九	一〇三五二七六	（+）四一·六八
社会文教建设费	二二三三二五	三四八〇七五	（+）五五·八六
国防费	四二七七七〇	五二二五三七	（+）二二·一五
行政费	一九三三六九	二三七七九六	（+）二二·九八
其他	五七〇二三	三六四七〇	（-）三六·〇四
总预备费	〇	一五四八三七	

注：预计支出和预算支出项中的数字单位为亿元。

回答事实上只对了一半，因为我们所要进行的还不是一般的生产建设，诸如轻工业建设，农业生产建设等等，而是着重在重工业建设，它包括钢铁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燃料工业、地质勘察、建设工程、铁路建设等。一九五三年预算支出中，国家建设费占百分之五九·二四，加上总预备费中必然会有一部份流入这一项目，则国家建设费已超过百分之六十，一个国家能够用这么多的资金来从事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这将是一个多末大的力量，它不仅能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提高人民的购买力，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文化水平，而且还将进一步改变我国经济状况落后的面貌。

最后，我们还可以来研究一下美国预算的本质，以及它和我国预算的基本差异。在美帝国主义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这一会计年度的预算中，其收入分有百分之四八·五的来源是个人直接税，而支出部分，仅直接用于军备费用的即达五百八十二亿美元，占总支出的百分之七十四，像他们那样的预算，虽取之于民，却用之于己（指华尔街的大老板们）。在这样的预算下面，小工业被扼杀了，大的日用民生工业又转化为战争工业，大老板在军事订货单的飞舞中坐食暴利，人民则喘息于税重物贵的高

压下，出钱、出力甚至出命。

而生活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的中国人民呢？由于各种经济事业的顺利发展，我们的生活在三年中已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一九五二年全国国营企业中的员工，就曾获得一次普遍地增加工资，据初步统计，国营企业中员工所得工资比一九五一年一般增加了百分之十一——三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比较一九五一年增加百分之十五——三一。这还是仅以货币工资来说的，若以实际收入来说，那就增加得更多了。如一九五二年国家用在劳动保险方面的经费有一万六千亿元，用在工人宿舍建设的经费有两万八千六百亿元，计建造了二十一万七千多间房屋，能容一百万人居住。此外，在医药、卫生、文娱、生活等方面，也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所有这些，都是美国人民所急切想望而暂时还得不到的。

所以，无论从理论上或是事实上，我们都可以十分明白，一九五三年的预算的的确确是一个生产的、建设的、同时也是增进人民福利的预算。这个好的预算是和好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分不开的，让我们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胜利而欢呼吧！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新中国货币制度的特点及其优越性

（一九五五年三月）

自从三月一日起，新的人民币发行了，旧的人民币已陆续收回。连日来市场稳定，物价稳定，币值稳定。充分说明了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旧的人民币，是符合人民的愿望，并且也表现了新中国货币制度的优越性。

一

新的人民币是在金融物价稳定的基础上发行的。这跟资本主义国家在通货膨胀和物价不稳的基础上的"币制改革"，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信用扫地，纷纷企图通过"币制改革"来使货币信用起死回生。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德国发行新的马克换回旧的马克。当时德国战败以后，赔款很大，支多收少，预算不能平衡，唯有多发纸币来抵补。由于赔款，必须购买外汇。但当时德国已有的外汇，尚不足以应进口商的需要，只有在市场上高价和私人竞买，结果外汇飞涨，纸币也因此多发。外汇既少，势非到各国市场售卖马克，吸收各国金银不可，结果马克又多发，且愈售愈跌，以至不可收拾；马克发行愈多，物价愈涨，预算收支更不能平衡，唯有一再多发。这样因果相循，沒有止境，以致于马克崩溃。

再看蒋介石反动统治时代的情况。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反动政府不实行合理的战时财政政策，只依靠印刷机，滥发纸币，以致造成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贫困和破产的局面。

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税收，以关税、盐税、统税为主要来源。后来加征所得税，但征到的数目有限。而官吏贪污和战争支出却很多，一切税收远不足以供当时的需要。于是企图发行公债，弥补收入。又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信用不好，加上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政府长期搜刮下，日益贫穷，所以，购买公债者很不踊跃。抗战时期所发行的公债，大多停留在“中央银行”库中，发而不销。于是就企灵于印刷机，滥发纸币。

国民党反动政府滥发纸币的为害，更甚于发行公债。因为：一、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发行的公债，集中于少数亦官亦商的人手里，国民党反动政府和他们是一体，公债非还本不可。至于纸币，则散布四方，大半在人民群众手中，国民党反动政府一贯对人民不负责任，也就存心使纸币不能兑现，任它成为废纸。二、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信用很低，发行的公债不易推销，而纸币可以命令强迫行使，并且无须有充足的准备。三、公债要付利息，纸币不负利息。四、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信用不佳，公债往往打扣发行，如九折，八五折，甚至六折、五折；但必须十足收回。发行纸币刚好相反，照十足发出，打折扣收回。蒋介石的“法币”收回时，就打了很大的折扣，使人民遭到很重损失。五、公债在要用钱时不能立刻发出，而纸币可随时发出。

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法币”，就是在这种种考虑下发出的。由于蒋介石反动政府信用不好，发行公债，只能做到“发”的地步，不能做到销的地步，所以只能以“总预约券”（公债的代名字）作抵向“中央”“中国”“交通”“中农”四家银行借款，这四家银行无力承受，或无款可放，只得用纸币垫款。结果，公债发行增加一百亿，纸币——“法币”增加也一百亿；公债发行增加二百亿，纸币——“法币”发行也增加二百亿。二者总是亦步亦趋，十分密切，这种通货膨胀，称为“烟幕下的通货膨胀”，即发行公债其名，通货膨胀其实。

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法币”愈发愈多，物价飞涨，没有止

境。人民、尤其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最难维持，很多成为饿莩。购买力削弱，生产事业日形衰退，这就产生了一连串的不良现象：一、通货膨胀，二、“法币”贬值，三、物价不断上涨，四、官僚资本集团愈富，五、人民愈穷，六、游资充斥，七、屯积居奇，八、物价更上涨，九、一般购买力更削弱，十、生产事业更衰退。一言以蔽之，这都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表现，也是由于滥发纸币的直接恶果。

所以，我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对于通货膨胀，已视同毒蛇猛兽。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不顾人民的要求，相反的，向人民进行了更疯狂的进攻，使通货更加膨胀。蒋介石反动政府异想天开，以“法币”按三百万换一的比率，命令人民兑换“金圆券”。并强迫人民以金子向国家银行兑换“金圆券”，结果，上海和其他各大城市人民的金子、金条、金元宝尽被他搜刮而去，逃亡台湾，而不值钱的“金圆券”留在市场上，为害无穷。蒋介石的“币制改革”，简直是强盗行为。

二

我国国务院决定发行新的人民币，收回旧的人民币，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于第一次大战后的德国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币制改革”。

由于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优越性，全国大陆解放不久，在很短的期间就把全国财政彻底统一了，国家预算收支平衡，通货膨胀的道路以此阻断了。银行货币收支也做到了平衡，所有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合作社等库存资金除保留零星用费外，一概存入国家银行，使国家银行有可能利用这些存款供应借款者的需要。此外，政府又掌握了大量物资，进行全国性的调剂，如以川米接济上海。因此，自一九五〇年三月以后物资供求也得到平衡了。外汇收支也早已平衡了。有了这四种平衡，即财政收支平衡，货币出纳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和外汇收支平衡，五年来全

国各地物价很少变动，人民币信用之高，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今天新的人民币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兑换旧的人民币的，新的人民币价值的稳定是毫无疑问的。

有人可能会问："物价既然稳定，币值不变，何必要兑换呢？"我们都知道，旧的人民币币面太大而单位价值太小，人们在心理上总有异常的感觉，在写的方面和算的方面也很感不便，计算剩除尤其不便。今天新的人民币以一元换旧的人民币一万元。二百元一根油条改为两分，七百元一个鸡蛋改为七分。这样不但使人民的心理解除异常的感觉，并且，在写算方面少了4个圈，便利更大。在国际上也不再表现我国纸币的单位价值太小了。旧的人民币票面上只有汉文，少数票子才印有蒙古文和维吾尔文。新的人民币印有汉、蒙、维、藏文字，有利于在兄弟民族地区流通。因此发行新的人民币就成为人民的要求。人民政府也就决定发行新的人民币来满足人民的要求。

在新旧人民币兑换过程中会不会有奸商趁机捣乱抬高物价呢？我以为是不大可能的。如果有这种行为，国家就会依法严惩。因为新旧人民币的折合比率很好算，一种商品原卖一万元，现卖一元，原卖二百元，现卖二分，奸商取巧图利是很难的。尤其重要的，现在城乡交流的物资，大部分都掌握在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手中，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在人民心目中均有极高的威信。奸商如要乘机抬高物价，是逃不掉各方面的监督的。私营工商业者都应该明白，服从国家的法令，正是私商接受改造的表现。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才会有光明的前途。从前我国很多奸商以黄金、硬币和外币作投机，他们造谣捣乱，以纸币换取金银硬币掀抬物价，压低币值，今天国家的币制已经统一了，金银投机机构——交易所已不存在，这也是保证市场平稳的一个原因。新的人民币发行以后，市场稳定，物价稳定就是充分的证明。

有人又要问："新的货币有没有黄金作保证金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行虽然规定黄金作标准，但都

已不兑现，有等于无，保证的作用消失。即使拿黄金保证来说，我国国家银行保有的黄金量和外汇对发行的比例也远远超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定标准。我们一九五四年的黄金量比一九五〇年增加了十倍以上。而我们给纸币的保证远不止政府保有的黄金，而主要的是政府掌握了的大量物资。我们政府掌握的物资，单拿米一项来说，为数已可观。米对人民生活的作用来说远比黄金有意义。其它如棉纱、棉布、食油等民用必须品都是掌握在政府手里。这是人民币价值的最重要的保证。此外政府又有数百个大规模的工厂和矿井，都具有极大的保证价值。

就货币发行额对国家预算和国家生产总值的比率来看，我国货币制度远比美国的现状优越。美国现在发行额为二百九十七亿美元，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度预算为六百三十余亿美元，国家生产总值为三千六百亿美元。这就是说发行额将占预算的一半，占生产总值的十二分之一（即百分之八多一点）。它的百分比，所以这样高，主要是由于财政收支不平衡，往往靠增加发行来弥补。美国公债原已达二千七百五十亿美元，去年年底可能增到二千八百二十亿美元，公债销不出去时，则交给联合准备银行作抵押，由银行借款给政府来支用，结果必然在货币方面表现膨胀。这些公债的利息相当重，这些利息负担却落在人民身上，而收入则归了资本家。我们的预算，不但收支平衡，而且有相当的剩余。我国国家投资均由预算拨出，所以不必负担利息。我国一九五五年发行的旧人民币六万亿元公债在预算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目的仅在吸收民间闲散着的资金，而使之投于广大生产之用，而少数利息分散给储蓄存款户，借以鼓励广大群众的储蓄。这些都是我国金融制度的优越性的表现。也是我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的表现。

三

新人民币的发行，说明了我国货币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巩

固。但有些人对新中国货币制度的特点及其优越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还不了解我国现行货币制度远较过去所谓银本位、汇兑本位的货币制度为优越。对于这些问题，也有必要来谈一下。

所谓银本位，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它的面值必须和它的实值相等，就是一元银币的价值和一元币所含生银的价值须相等，如此它方能发挥货币的功用。这样，国外银价涨落的变化，就会影响到国内的银价；国内银价涨落的变化，就会影响到纸币价值。结果，就使国内纸币价值随着国外银价涨落而变化。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反动政府改以银元为本位币。英美两国，尤其是美国，从此就通过国际银价的变化，支配了中国币值的变化。美国抬高银价，中国的白银就纷纷外流，币值上升，物价骤跌，正当工商界就难以维持，生产无法发展，经济无法繁荣；反之，美国银价下跌，国外的白银纷纷流入中国，币值下降，物价上升，人民的生活难以维持。总之，扰乱金融，操纵物价之权完全操纵在美国。一九三四年八月，美国宣布了白银国有，提高银价，收购白银，中国白银就开始大量外流，仅一九三四年七月到十月为止，流出了二亿五千六百万银元，为我国空前的白银出超额，国内金融因现银骤减，信用收缩，周转愈觉不灵；由于银价上涨，物价下跌，加以信用紧缩，筹码缺乏，物价更跌；国内因银价上涨，进口货便宜，所以外贸进口较多，本国货外销困难，入超大大增加了。可见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的以银元为本位的货币制度，正驱使中国沦为美国殖民地。在我们新中国，在人民民主专政之下，我们决不能使我国货币制度任别人操纵，这样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的银本位也已一去不复返了。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伪法币制度，实质上即是金汇兑本位的货币制度。金汇兑本位，是本国的货币依靠与外国货币订固定的比率来标明本国货币的价值，同时依靠无限制买卖外汇来维持这种比率。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伪法币制度，开始还

想对英美两国同时讨好，而最后便完全落入美国的怀抱，受美国的控制。这种半殖民地性质的货币制度，有利于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有利于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地国家政治上、经济上的控制，有利于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地人民的剥削。我们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之下，我们在政治上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和繁荣的新中国，在经济上也要建立独立的统一的和稳定的新币制，决不能也不愿眼见我们的货币和帝国主义国家货币联系在一块儿，随它涨落，使我国失去金融上的控制权力，使我国物价和市场受帝国主义国家操纵。

所以，所谓银本位和汇兑本位都是依赖帝国主义的。惟有我国现行的货币制度是独立的自主的。

现在大家都已看到，人民币已充分发挥了货币的各种机能。人民币的价值随着人民政府威信的高涨、生产的发展、国家掌握的物资也日益增多，在人民群众中已具有坚定的信用，已成为我国一切交换、出纳、收支等所不可缺少的货币了。在我国现行货币制度之下，货币的发行不但有物资保证，并且完全适应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无所谓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这是因为我国的货币制度为人民政府所掌握着的。

再者，由于我国国际收支已达到平衡，无入超需要弥补，并且，世界和平民主的市场贸易范围日益扩大，对其他国家的贸易也由于采取了多样的交货方式，人民币的对外价值也很稳定。

所以，今日的人民币是真正的货币。由于人民币人人信任；国家银行根据社会的需要发行；又因我国财政收支早已达到平衡，也不致因财政困难而多发一文；同时有国家银行严密的管理；有大量物资掌握在国家手中，有忠诚为人民服务的强有力的政府为后盾，在这样巩固的基础上，人民币信用将日益增长，成为世界上最完美最健全的货币之一。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三月九日）

视察中的八个印象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我视察浙江先后三次，第一第二两次的视察方式是先听取领导报告情况，然后根据情况分别开座谈会实地视察，并选择比较好的，比较坏的，中等的三种类型同时进行。因为许多代表联合起来进行视察，每人所问不过几次，且各人皆凭个人兴趣发问，很难得出一个系统。最近一次视察，改变了视察方式，我依照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个人亦可以单独视察，座谈时采用对谈方式，一问一答，均由同去的友人（现任会议记录秘书）用速记法录下，共视察了10个县市，约2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个渔业合作社。全部记录，因字数太多，尚未加以分析和整理，在这里我只能把视察所得的印象分别说一说，以供大家参考：

（一）我第一个印象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一个声势浩大的农业增产运动，正在全省范围内顺利进行，这个事实有力的教育了农民群众，坚定了他们参加合作社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特别在全省基本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抓住当地的增产关键，采取了许多打破常规的办法，发挥高度的劳动积极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去冬以来，在若干地区，不少群众下雨披着蓑衣，晚间点着汽灯，忍寒冒雨地抢修水利，兴建扩建和恢复大、中型水利工程和小型水利，大大地减少了旱涝威胁。他们从各方面挖掘肥源，无论男女都在挑塘泥，播绿肥，并积其它各种土肥，很多地区积累的肥料超过去年一倍以上。今年因晚稻缺少肥料很多，全省人民群众用了脑筋四处找寻天然肥料，已有20多个县30多处发现了一种泥炭。这就是很早

以前，当湖泊沼泽地区水生植物的遗体逐年积累以后，因土壤通气条件不好经过长时期的腐烂分解，就变成象煤炭一样的东西，其中氮素含量一般在1.5%以上，最高达1.77%。

浙江在改变耕作制度，改进技术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工作，如扩大双季稻，有的地区去年不过有几十亩田的试种，而今年已扩大到几千亩，甚至几万亩并普遍地 采 用 了 密植。双季稻中的连作稻在头作割起二作种下的时候，往往需要很多人力，于是历来不下田的妇女，也普遍下田耕作了，而且有的已经学会了栽秧的技术，且少数妇女所掌握的技术反 在 男 子 之上，不过好多妇女也因此得了血吸虫病，她们的大肚子不一定是可喜的。

浙江著名的四明山区是抗日游击区的中心，在过去从来沒有人种过双季玉米，但是有人种过夏玉米，也有人种过秋玉米，并且都获得丰收，于是技术推广站认眞地总结这个增产的经验，分析了全区的自然条件后，肯定种双季一定能够增产，结果全区推广的1,630亩双季玉米全部获得丰收，象四明山区这种事实 全 省各地是不少的。

（二）第二个印象是：现在在农村中城镇中，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目前工人农民正在广泛地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不但有乡与乡的竞赛，社与社的竞赛，还有队与队，人与人的竞赛，不过我觉得农村中无论男女，工作的强度太高，于身体健康定有妨碍，若再不顾一切积极推动竞赛，在长时期内，会不会出现得不偿失的后果？

我在视察中把重点不但放在竞赛上，也放在生产指标上。浙江省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但有全年增产指标，还有季度、月度及小队生产计划；有的地区，既有集体主义精神，又有个人的责任；既有指标，又有措施，这就是他们工作越干越有兴趣，劲头越大的道理。但也有些社不考虑实际的具体条件和可以利用的潜力，把指标规定得往往偏高，以致谁也不敢相信能够按时完成，在强度过高的基础上，若再迫他们完成这样的任务，他们或会置

之不理，索性不管。有一社在我询问生产指标时，社长以修订过的指标答我，说得头头是道。但在散会后，从别的社员中得悉社长沒有以原来偏高无法执行的指标告我。不过在若干地区，一般指标是妥当的，既有具体內容，又符合实际，可是副业往往不包括在內，而且副业种类亦太少，主要原因是领导同志把正业估得高一些，把副业估得低一些，使农民有一种“副业不合算”的错觉。这是由于数年前因粮食生产不足，曾片面强调粮食增产之所致。至于家庭副业则根本谈不上。

（三）第三个印象是：浙江省多少年来，由于盲目开荒，滥伐树木，破坏了地面被覆，以致大雨时期，“水顺山流洪水大，雨停天干地遭殃”，各级领导为了满足农业生产的迫切需要，曾努力发展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工程，开展了大规模的开渠挖塘筑壩运动，个体农民从来办不到的事，合作起来就能办到了，对抗旱排洪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后兴修水利，党领导决心进一步貫彻民办公助的方针和费省效大的原则。现在山坡上已经育起幼林，沿江岸已经修堤植柳，但要消减干旱威胁，避免洪水灾害，还有待于大水库的修建，大河流的根治。目前广大群众在雨季时还不能欣赏“随下随滲无洪水，雨后多泉水长流”。不过大水库的修建，大河流的根治（如浦阳江、曹娥江），需要庞大的财力、复杂的技术和较长的时间，在短时期內很难得到显著的成就。

（四）第四个印象是：无论在农村或在山区，广大群众的劳动观念已经产生，劳动习惯已经养成，这是最可喜的一件事。——“社会主义眞是好，就得大家搞，坐着等不到”。“山上全是宝，勤人挖得到。”比过去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的依賴思想大不相同了。“到社动一天是一天工，在家坐一天是一天空”。这是一般的普遍的认识。就是地主以及反革命分子在合作社由初级转到高级的过程中日益在分化，也表示愿意遵守政府法令，积极劳动改造，立功赎罪，顽固的反革命分子越来越少了。今日富农的地位：“出租土地无人要，想找雇工无人当，投

机买卖无门路，放贷私款怕告状”，除了安心劳动以外别无出路了。

劳动亦产生了幸福的婚姻。青年男女在选择对象时，总以劳动能力为第一条件，然后再谈进步，婚姻观念根本改变了。劳动也产生了幸福的家庭，妇女参加了生产，逐渐脱离了从属地位，受到尊重，昔日的夫妻不和、婆媳不和、邻里不和的气象，现在一去不复返了。剥削思想，无论男女老幼均认为可耻，浙江新登县全县已无一个窃盗，足见在马列主义光芒照耀之下，新的婚姻新的家庭，新的道德风尚，正在一天一天成长起来。

（五）第五个印象是：集体思想正在萌芽。几千年来，习惯于小农经济的农民，很难迅速地把个人主义的思想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思想，这样的转变必然是长时期的过程，但很自然地这个转变已经开始了。以浙江新昌县的农民高级合作社为例：社里有这样的情形；去年社里有12户的小麦折价入社，还有11户当初也同意折价入社，但因为资金较足，劳动力较强，一看小麦丰收，就不愿折价入社了，并且不信社里能比他们增加50元以上的有 5 户，其他 7 户都比去年增加 5 元以上。新民社春花总收入合起来是5,238元，不折价入社的11户除外，每户平均比去年增产27.6元，这是预分数，实产还要超过。这11户，受了这样大的教训，他们的个人主义思想不能不受到影响。

同是这个新民社，以整个社而论，不能说无集体思想。据新昌县长谈，全年全县蚕种比去年增加了300张，但因为桑叶不够，倒掉了800张，实际比去年减少了500张，但产量不受影响，因为今年比去年每张多收入 4 万元。新昌派人到嵊县、绍兴、余姚、上虞等七县去调剂桑叶，但因为调拨来迟，便受影响减产。主要原因是过去都养土种，今年全部改养改良种，改良种比土种每张多吃90斤到100斤桑叶，领导人员对这一点估计不足，所以倒掉了800张，损失了 4 万元。但是这个新民社虽然自己的桑叶还不够吃，反把桑叶调拨出去供给别的社，因为别的社的蚕快要上

山，如果沒有叶吃，便全部要倒掉，新民社抱自我牺牲的精神，使自己的一部分蚕饿了三天，造成减产，这是集体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据高级领导者谈，这样的高度集体精神在全省范围內还不多见，但无疑地各地一天一天在增长着。

（六）第六个印象是：各地所看到的耕牛不甚肥壮，有的是瘦弱的。主要原因是：（1）因饲养有问题，（2）牛栏不经常打扫消毒；牛身上生牛虱，吸牛血，耕牛当然难得肥壮，而看牛者也不经常刷牛体，除牛虱，夏天夜里很少熏烟驱蚊，我所看到的几个牛栏猪圈，根本谈不上卫生。看牛者大半是小孩，一人看一头，待遇每月不过10元左右，不负责任，所以耕牛到处乱跑，损害农作物。我以为要在全国范围內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尙须等待若干年；在短时期內，尙须利用牛力耕田，耕牛问题不能不重视，尤其在集体思想还未普遍发达的时候，更不能不重视，似应订立一种制度，有专人负责饲养，及时检查评比，并及时对社员进行爱护耕牛的思想教育。

以上所说的情况当然不是普遍的，浙江也有好多地方把耕牛养得很好很健壮的，如宣平县大源乡之先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海盐县欤城乡之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繁殖耕牛和饲养耕牛都有很好的经验，当可推广至省內各地。

至于新式农具如双轮双铧犁，在浙省大都搁置不用，一因犁身太重，加以铁轮，容易陷入泥沼，虽水牛亦拖拉不动；二因两只耕牛向无合作的习惯，先后快慢不一致。我足迹所到的地方，都用旧式木犁耕田，故绍兴有“双轮双铧犁，小孩当马骑，干部看了一肚皮气”之歌。最受农民欢迎的是抽水机（机械水车），首先是因为农民认识了扩大水浇地是战胜自然灾害、保证农业增产的重要关键之一，且除灌溉原有的水稻田外，还可变旱地为水浇地。其次因为使用抽水机比使用人力或畜力水车效率大，成本低。

（七）第七个印象是：农民亦认识了科学知识之可贵，开始

利用之以为自己谋利益。杭县良渚乡，在养蚕生产中推行了“椎蚕高溫，夜间感光，多回给桑”的快速养蚕法，获得显著的增产。感光的好处，是使蚕室內日夜有光，小蚕到夜间便不会伏在吃剩下来的残余桑叶和蚕沙中，减少小蚕的遗失，并且日夜能够平衡食桑，发育也就整齐。最好蚕室上方及东西南北四方墙壁，用白纸裱糊或石灰粉刷，使反光能射到上层及內边蚕筐，不过乡村中多茅棚，根本不能用白纸裱糊或石灰粉刷，这是无可避免的一种限制。

我到过著名的“龙井茶”产地——杭州市郊区梅家坞村，村里的“十月”高级社于1955年利用了科学知识，战胜了自然灾害，使茶叶生产获得丰收。“十月”社数次接到气象台的寒流（降晚霜）警报，全社由青年突击队带头，连夜在茶园里烧烟堆，终于战胜了晚霜的危害。

浙江嵊泗县有35个渔业生产合作社，入社的渔戶占渔戶总数的95.3%。到“小雪”边，全县500多个生产单位开洋，平均每个单位产鱼二、三十担，有一个捕鱼40多年、62岁的老社员李阿林，从来沒有到过这样远的洋面去捕过鱼，现在人心齐（意思有组织）且及时发布气象消息，保证安全生产，再远他也不怕。

象这样利用科学知识来生产的例子，全省范围內是不少的，兹不谈。

（八）第八个印象是：农民在新旧生活对比之下，对于党的感激，对于现在幸福生活的满意，对于美满前途的信心，是到处流露出来的。浙江萧山县城北区荣星高级社交给我带给毛主席的一封信，是一个好例子，它说：“在反动统治时代，我们有七个‘多’，（一）破舍多（全村共有52戶，其中23戶是破舍），（二）破衣多（占全部），（三）黄胖多（36人），（四）长工多（26人），（五）讨饭多（24人），（六）屈死多（23人），（七）卖女多（8人）。自分得土地后六年来感谢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这七个多的痛苦已经基本上消减了”。新登县在解放前流传着这

样的两首歌。

长衫畈，看看一大畈，
秋收一箩担，
稻桶一竖起，
无米烧年饭。

*　　　　　　*　　　　　　*

长衫畈，东塘畈，
挑出一大担，
回来一提篮；
日亦忙，
夜亦忙，
大水来了哭一场。

今日情形大不同了，总听到这田是千斤田，那家是万千户，他们就是过去“稻桶一竖起，无米烧年饭”的人家，现在碰到洪水，他们再不是哭一场，而是奋勇地战胜了洪水，有人力可以胜天之信心。

绍兴县亭山乡贵山片现在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衣裳穿得簇簇新，
马路铺得天天平，
产品起到一千二百斤（连作稻每亩产量高达一千二百斤），
肚皮吃得结等等，
参加合作社都吃的有得多，
单干户互助组饿煞自之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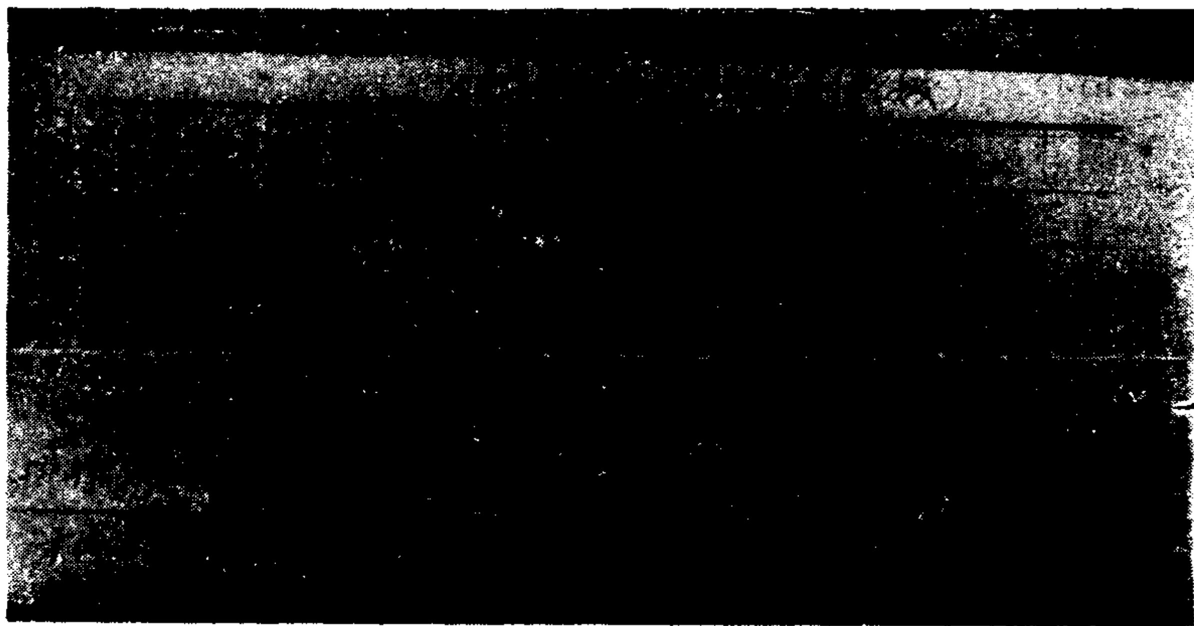
*　　　　　　*　　　　　　*

人民政府理勿错，
各到各处马路做，
造起桥高又高大又大，
小工一个都不“抓”（读“可”）。

日佬时候炮台造一个，
走到城里小工“抓”（读“可”）。
我话勿去做，
巴掌吃得老老大，
话话无处话，
下书出来鸡要“抓”（读“可”），
看见妇女要强霸，
青年妇女打扮老太婆。

在别的地方，农民反映说，在吃的方面，“过去是糠菜半年粮，现在是年年卖余粮”。在穿的方面，“过去是有吃无戴，少铺无盖，现在是身上穿的市布衣，黑夜盖的花贡呢”。过去所穿的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是：“新一件，旧一件，洗一件，换一件”。

（原载《光明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马寅初先生作为人大代表到浙江省视察。这是他作关于知识分子情况的调查时的记录手迹。

我国预算的优越性

（一九五六年七月）

我今天要讲的是李先念副总理代国务院所提出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我用报告中的收支数目字，作一个理论上的说明和科学上的解释。以下我分八点把它说清楚：

第一点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在使生产关系改变和生产力的提高，但沒有先进的生产工具先进的生产制度和先进的生产方法，虽然改变了生产关系，仍然不足以提高生产力。所以依照1955年的决算（以农业生产为例），政府供应农民饼肥和化学肥料450万吨、农药9万吨，并且减价40%供应新式农具51万部，对1954年的灾区政府继续拨付复堤、修垸经费3亿元，帮助农民新修和整修了许多小型水利工程，贷放水车17万辆，扩大和改善了灌溉面积6,500万亩。在水利建设方面，1955年完成土方14亿多公方，石方1,400多万公方，混凝土60万公方。

至于先进的生产制度，则农民所习惯的单季稻，如条件许可，都改为双季稻（连作稻和间作稻），生产方法是深耕密植。

采用先进的生产资料、生产制度和生产方法的结果如何呢？结果很好。1955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获得了丰收，这个丰收与1955年的气候也不无关系，粮食总产量达到3,680亿斤，完成年度计划的102%，比1954年增长9%；棉花产量达到3,036万担，完成年度计划的117%，比1954年增长43%，其他各种主要农作物，除了甘比1954年稍有减少外，都有不同的增长：甜菜比1954年增长61%，黄麻增长95%，烤烟增长28%，花生增长6%，

茶叶增长17%，蚕茧增长44%，各种水果增长10%。

第二点是生产力既然提高了，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既然获得丰收，则农民的收入也应该增加，所以1956年的预算报告说："在农业已经合作化以后，为了使农民能够增加收入，合作社必须准确地分配收入，这就是说不要从生产所得中拿过多的部分用在生产费用、公积金和公益金方面去，而要尽力保证最大多数农户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并且使工业品和农业品的价格保持合理的比例。同时政府决不使农民的负担过重，所以在1953年规定了三年以內稳定负担总额，增产不增税的方针，把总的征收数额（包括地方附加和乡村自筹经费）稳定在1952年夏征和秋征总额388亿斤细粮的水平上。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工人的工资可以不增加吗？不。这几年来，社会主义工业的迅速建立和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发展，工业生产力也大大地提高了，1955年与1954年比较，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增长：原煤增长17%，焦炭增长22%，电力增长12%，原油增长22%，生铁增长23%，钢增长28%，钢材增长28%，硫酸增长9%，烧碱增长18%，硫胺增长9%，机车增长88%，內燃机增长36%，发电机增长97%。因为工业生产力提高了，所以工人的工资也要提高，1956年的预算规定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提高14.5%，其中物质生产部门、重点建设地区、高级科学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工人的工资将有较多的提高。

第三点是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和工人的工资都增加了，因此他们的购买力也加大了。他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也必须适当的增加，因此政府决定适当地发展轻工业，以便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所以1956年的预算把轻工业的支出增加了。因为轻工业产品的绝大部分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生产的，如果眞正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只增加工资还不行，还要使他们能够买到更多的价廉物美的东西，这就是要发展轻工业生产的道理。五年计划原来规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

88.8%比11.2%，约等于八比一。现在既要发展轻工业的生产以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就要增加一些轻工业方面的投资，所以要把以上的88.8%比11.2%的比例稍稍更动一下，改为87.5%比12.5%，约等于七比一（据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看起来，好像这样更动于重工业不无影响，其实不然，因为轻工业的特点是投资少，建设易，获利多而且快，可以更有效地积累资金，用来更多更快地发展重工业。

第四点是农民的收入和工人的工资都增加了，他们之间的团结一定更加巩固，这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工人的工资何以与农民的收入同时增加呢？其间有无相互的联系呢？有的。例如1953年是工业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加了31.7%，主要的原因是1952年的农业获得丰收，给1953年的工业带来了足够的资料。又如1955年是工业增长速度最慢的一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只增加了8%，主要原因是1953年、1954年两年的农业生产遇到欠收，1954年的棉花产量比1952年还少18.3%，这样就使得工业因农业供应的原料不够，不能继续前进。由此可知，工业与农业之间有相依为命的关系，这就是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

第五点是人民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增加了，就是轻工业的产品加多了，因此之故，1956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势必增加，预计将达到460亿元，要比上年增长15%，比五年计划中规定的1957年的水平498亿元只差38亿元。1956年主要商品和日用百货的零售计划，比上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第六点是社会主义的任务在提高物质生活之外还要提高文化生活，但以上各点所说的，只是关于物质生活的提高，至于文化生活怎样呢？是否也要提高呢？是的。1956的预算规定："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支出为35亿多元，比上年增长25.34%。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新招生16.3万人，毕业学生6.4万人，在校学生将达到38万多人，比上年增长32%。中等专业学校

新招生44.4万人，毕业学生17.9万人，在校学生达到80.1万人，比上年增长49%。普通中学（包括高中和初中）新招生213.7万人，毕业学生97.6万人，在校学生达到506万人，比上年增长30%。小学校新招生2300万人，毕业学生1380万人，在校学生达到6200万人以上，比上年增长17%。1956年全国医院和疗养院病床将增设6万张，总数达到33.9万张，比上年增长22%。1956年内国家预算对科学事业的支出比上年增加一倍以上。

第七点是为保证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提高，1956年国家预算用在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支出，共占本年支出总数的64.96%，其中经济建设支出为160亿多元，占本年预算支出的52.22%，比1955年经济建设支出决算数增长17.04%。社会文教事业支出为39亿多元，占本年预算支出的12.74%，同1955年比较增长18.36%。

从以上所述可见我国的预算以三分之二的收入用于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建设事业，这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预算中所从未见到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此。相反的资本主义国家预算中占首要地位的是国防支出，而我国的国防支出怎么样呢？1956年我国国防费在国家支出预算中所占的比重为19.98%，比1955年国防费在支出决算中所占的比重下降2.17%，仅此一端，已足以证明我国的和平政策之所向，亦足以证明我国全体人民的愿望之所在。

第八点是经济建设事业和文教卫生建设事业的支出以及国防费的支出为数甚大，试问款从何来？款从国营企业收入和各项税收而来。国营企业收入包括国营工业企业收入，国营交通企业收入，国营商业企业收入，国营农林企业收入，及其他企业和事业收入，共为143亿多元，占本年预算收入的48.19%，各项税收包括工商税收、农业税收、关税、盐税共为139亿多元，占本年预算收入的47.02%。在此139亿元税收中，仅工商税收一项占99亿多元，主要是由于1956年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转的增长比较快。

此外农业税收入为30亿多元。

把以上各项收入总起来看，大半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收入和社会主义事业性质的工农商税收，可以说钱是取之于民，但亦用之于民，完全合乎社会主义的原则的，这样就保证我国可以胜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八日）

两种性质不同的物价上涨

（一九五七年五月）

近几个月来，市场上有一部分商品价格上涨，有些人就对国家的物价政策发生了疑虑，这是很不应该的。前几天，我就这个问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谈话，兹为使全国人民了解现在的物价上涨与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物价飞涨性质上的不同，特写这篇论文，就教于国内的社会人士。

一　今日的一部分商品价格上涨

我认为今日一部分商品价格上涨，必然要带给我们一些困难，但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所不能避免的一些困难，因为我们对于计划经济经验不足，而关于计划经济的统计也感缺乏，因此物资供应上难免有供求不相应的毛病。我们的新社会发展得太快，几乎天天有新问题，好些新问题是向来沒有遇到过的，连听都沒有听过的。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人，大有力不胜任之感，换句话说，工作赶不上时代的要求。然而这个赶不上，是一个好现象，事实上虽然是赶不上而思想上总想努力赶上，这样在工作中只有进步，决不致有退步，而这个进步是从坚苦奋斗中得来的。我们的经济建设也是如此，一有新问题就需要求得一个新解决，实际上不能很快解决，但主观上总要克服困难努力解决。因此，在过去七八年中我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得能稳步地提高。我们要推进基本建设，所以必需供应生铁、钢材、木材、水泥等生产资料，这些资料的供应当然紧张起来，这是一个好现象，因为紧张的状况反映了求大于供，从而产生了增产节约运动，清理仓库运

动，以及交流经验，相互学习的种种措施，社会物质增产上和思想上逐年推进了一步。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例，1953年(第一年)基本建设投资额约为六十五亿元，1954年约为七十五亿元，1955年约为八十六亿元，1956年则为一百四十亿元，比1955年增加五十四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增加了，生铁、钢材、木材、水泥的需要量也就逐步增加，就业人数也非逐步增加不可。1953年支付工资的总额约为六十五亿，1954年约为七十四亿元，1955年约为八十三亿元，1956 年则为一百零七亿元，比 1955 年 加了二十四亿元。1956年原定计划新增职工八十四万人，但实际上增加了二百二十万人。工资总额支出增加了，工人的购买力也就增加了，猪肉、食油以及其他副食品和各种消费品的需要量也就要增加。因为政府对这些食品的收购价格不甚合理，不得不提高它，作为鼓励农民增产合理的措施。总而言之，今日一部分商品价格的上涨，反映着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了一些困难，要求我们努力克服，其性质与国民党统治时期全部（不是一部）商品价格飞涨的性质完全不同，因此，我在下面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物价政策和市场情况简略地写出来以供读者们参考，并作比较。

二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物价和市场情况

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国通货之日趋于膨胀，大抵由于发出入总预算不能平衡所致，即在对日抗战之前，亦未达到预算上之绝对平衡。不过彼时币值稳定，预算上不足之数，不难以奉债的方法来填补。后经八年抗战，国民党又贪婪无厌，百方搜刮，人民穷困不堪，安得余力来接受公债，而预算上的赤字才日益加大，出多入少，不能左右逢源，只得以发行纸币来替代公债。发行愈多，物价愈高，而物价愈高，发行又愈多，互相循环，靡有底止，人民对法币之信心远逊于实际发行膨胀之程度。在币值日益跌落之情况下，国家之支出不能不随物价之飞涨而大增，财政情形，经济状况，加速恶化。在此情况下，正当的办法先平衡预算

而后再改革币制，但抗日战争停止之后，又继之以内战，预算无法平衡，只得反其道而行之，先改革币制而后再平衡预算。据财政部长王云五发表的谈话中所表示的意见先改革币制使物价稳定，而物价的稳定，可使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同时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回过头来，又可使币值维持共稳定，此唱彼和，互为因果。此国民党政府不待财政收支完全平衡，先行改革币值的用意。结果，币制改革，除能提高新货币（金圆券）单位价值外，其本身是不能稳定币值的。改革之后，以金圆计算物价，与以法币计算物价，数字上虽有差别，实际上并无二致，因为财政赤字太大，且月月增加，预算上的数字虽可以减少，但决不能减少赤字或收支差额，因此新币不得不蹈旧币的复辙，继续向下跌落。

（一）反动政府剥削工人农民的办法

依1948年8月19日上海市场价格，黄金黑市，在法币五亿八千万元左右，美钞黑市在一千一百万元以下，纹银挂牌为六百二十万元（一两），银元黑市每元在七百五十万元左右。可是反动政府规定兑换价格为黄金一两兑金圆券二百元，以金圆券一元合法币三百万元兑换率折算即黄金每两合六亿，超过8月19日之标准二千万元，美钞每元一千二百万元，超出标准一百万元以上，纹银每两九百万元，超出标准二百八十万元。以上黄金美钞与纹银三种均是富有阶级所持有，大部分持有者是豪门达官买办，发国难财，发胜利财，发接收财，与发“戡乱财”之流，他们都大获其利，至于银币则每块六百万元低于8月19日之标准一百五十万元，而持有银元者大部分是工人农民与小公教人员。他们因不信法币，收到工资之后，惟恐币值日跌，辛勤所得顷刻间化为零星小数痛苦可知，故相率以法币兑换银币，原为保值。待用之时，陆续零星出售，以充购买日常必须品之用。8月19日之标准为七百五十万元，而政府收兑之时，仅给以金圆券二圆（合法币六百万元），一般贫苦老百姓莫不大受打击。如反动政府稍稍关心民生疾苦自应予工农与公教人员以平掉的利益，即不能实行平

掉，亦应在一定限额内提高其折合率。乃反动政府竟不顾一切，贯彻其一贯的作风，维护了特殊阶级之既得利益，反在穷苦工人、农民及公教人员身上剥削其仅有的资产，平时既不保持其货币购买力在前，最后又要剥削其小得可怜的资产，结果中产阶级，就因通货膨胀与这种剥削而没落，贫苦的工人、农民更不必说了。

（二）不能发行公债只能发行纸币

财政赤字日益增长，曾用美援抵补其一部分，但据美国联合总署驻华分署署长赖朴翰的谈话，国家预算与美援运用是两回事，故财政赤字，原拟发行金圆公债以为抵补，但事实证明，发行公债是财政部长的单相思。在八年抗战期中，反动政府所发的公债，因人民太穷无力承受或购买，故只能做到“发”不能做到“销”（销不出去）的地步，结果不得不用“总预约券”向中央银行抵借，于是通货膨胀，物价随之而飞涨以至于不可收拾。人民依然贫苦，若仍靠发公债以弥补预算之不足，就要重蹈旧币的复辙。以上所述还是有关于行政预算。除此以外，尚有所谓戡乱中之军事预算，美国驻华分署署长赖朴翰所谈“国家预算与美援运用”是两回事，就指此而言。军事预算内容秘密，局外人无从揣测。

（三）金圆券的关键在物价

查反动政府的限定物价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全国各地各种物价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 8 月19日各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圆券出售，由当地主管官署严格监督执行。这一条的用意就是一切物价与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 8 月19日的标准以三百万比一的兑换率折合。但实行不久，完全失败。理由如下：

（甲）条例中的收兑金银及美元的价格，反动政府为讨好豪门达官买办，自己就不照 8 月19日的标准兑换，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谈了。

（乙）凡接近解放区的物资，皆逃入解放区出售，造成国民

党区域内物资的贫乏，连黄金亦逃入解放区，因此不久黄金的价格超出官价一倍（每市两四百金圆券）。

（丙）上海之公用事业和外国人所办之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等等，因物价飞涨，纷纷向市政府要求补贴，否则必须准其加价，若二者均不可行，只得关门大吉。但上海四五百万的居民，不能一日无电灯，更不能一日无饮水，足见硬性规定的限价政策，非改变不可。中国自办之公用事业，亦无不要求加价，否则非仰给于政府之补助不可。因此之故，金圆券非多发不可，走上旧法币走过的路线。

（丁）人民从各方面查得反动政府内部空虚，又不积极生产，纷纷将物资收藏起来以待来日，市上物资日见短绌，引起一般人的匮乏恐惧心理，政府亦不向人民说清楚理由，故为时不久虽出高价，亦无物可买。

（戊）在官警监视之下，在若干场合，抬价虽不可，偷工减料则不在禁止之列。于是油条短一些，面包小一些，绍兴酒价同而味不同，丝绸价同而质不同。凡此种种皆是打破物价冻结之方法，亦是加价之变相。

（己）有些物资非进口不可，不得不把新币的外汇汇率差不多提高十分之三，一切进口原料和物资当然也要提高十分之三。这样用进口原料制成的物品决不能冻结于8月19日的标准。报纸即是一例。如上海某大报报价虽不涨而广告费几天内几涨一倍，因非涨不可也。

（庚）习惯上的巨大数目，一旦缩小，容易发生心理上的偏差，对物价很有些影响。例如人力车，在旧法币下，原给予二十万元者，用新币时至少给一角，即等于三十万元旧币。

（辛）物价的稳定，除了求通货适量，币值健全，还要使物资的生产能和消费平衡，忘了这一点，无法使物价安定。上月30日国务院发言人谈今后物价总趋势可以保持稳定，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使物资的生产能和消费平衡，一面提高收购价格、鼓励农民

多多生产，一面压缩机关、团体、部队、学校的购买力，使之减少消费，使生产与消费平衡。这在前几天在新华社记者访问时我已经说明白，不必再谈。但国民党政府不是这样做，不能这样做，亦不愿这样做，加以文武官吏之贪婪无厌，豪门买办之追求暴利，那有物价不飞涨，经济不崩溃之理？

三 结 论

我写至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物价问题（一）在普遍上涨，（二）在物资的破坏和贫乏。先谈第一点。物价的狂涨，前方士气的低落，与整个后方的混乱，二者是互为因果，循环推演的。在国共交谈的时候，国民党心目中只有军队和装备的数字，以此种数字去和对方相关的数字作单纯而机械的比较，而不考虑其他有关政治，经济的基本问题，即造成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主要原因。一个政权犹如一座建筑物，假如它的基础深厚，结构坚牢，则定能屹立不移，经得起风吹雨打。假如它原来的基础本就不够深厚，结构本就不够强固，还要兴风作浪，进行內战，把基础挖坏，把结构弄得松弛无比，则纵沒有风雨的震撼，最后也会自己趋于崩溃。一方面，自身加速腐败减少其抵抗力量；另一方面，相对的，使对方力量更容易增加与发展，所以通货不断的膨胀，物价不断的飞涨，实不啻为一种牺牲的自杀政策。

再谈谈第二点。反动政府搜取了民间的物资，如中央信托局的大豆，民管纱厂的棉纱，去换取外汇，在正常的国际贸易下，国与国之间互通有无，那当然是好的，但国民党政府在“戡乱”时期所进行的国际贸易完全是病态的，不合理的，因为它从国外换回来的是军火。一颗大炮弹，“轰”的一声，不仅共本身化为乌有，而且还破坏了许多旁的物资，杀了许多自己的人。这样不仅浪费了已出口的物资，还破坏了未出口的财富，并且杀死了很多具有生产力量的壮丁，基础一天一天地挖空，结构一天一天地

破坏，政治和经济焉有不崩溃之理？倘国民党能反其道而行，以外汇换回生产资料如钢材，机器，电气设备等等，则可能不会垮得那么快。这正是今日我们之所为，使经济基础格外坚强，使社会结构愈益巩固，物价虽不免时有小小波动，但全是生产过程中的曲折，不必过虑。

我们今天的物价上涨，恰和国民党时期根本不同。第一，不是普遍上涨，只是少数物价上涨。这少数上涨的物价，大部分的负担是落在购买力较高、负担较轻的消费者身上。对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来说，影响不大。第二，是建设性的上涨，不是破坏性的上涨。国民党时期物价上涨对国民经济产生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的物价上涨，如猪肉、食油的涨价，主要是因为提高了收购价格。收购价格提高了，就可以刺激生猪和油料的生产的增加。农民买肉买油虽然多花一点钱，但增加的收入远远超过增加的支出。再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如果不提高出售价格，国家财政收支就会不平衡，财政收支不平衡对国民经济是不利的。稍稍加价，使财政收支平衡，显然是正确的。

（原载《大公报》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二日）

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①]

（一九五五年一、四月）

资本主义工业，经过国家几年来的利用、限制和改造，大部

---

① 这篇写作开始于1955年1月，完成于1955年4月底，我写这篇论文是因为我预见到政府本一贯的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迟早一定会采取和平改造的方式，而且一定采取逐行逐业改造的方式。换句话说，政府一定采取“吃葡萄”的方式，不采取“摘苹果”的方式，决不致大企业一个一个地合营，置中小企业于不顾。北京市由于瑞蚨祥、稻香春、同仁堂的被批准公私合营，三业的同业皆遭受很大的影响。致造成公私合营的同仁堂拥挤不堪，买药者需领牌子排队，而私营药店门前可罗雀，几于不能维持生活；同时患病者很感不便，大为不满。因此我就想到政府，既认民族资产阶级为四友之一，势必依照“一视同仁”的方针，采取逐行逐业的合营。这对资方来说，是一条光明的道路。而在企业改造的过程中，同时也进行资方个人的改造。但政府亦不会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故办法上亦当“有所不同”，这就是说私方要接受公方的领导，就是要接受改造，这是“有所不同”的真意义。把两句结合起来，就是“有所不同，一视同仁”。把企业改造与个人改造结合在一起，以便最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和公民。

但公方代表在处理内部事物时，也有做得不够合理的地方，如我讲第一方面的矛盾时，讲到公方对私方没有使用的地皮，不予估价，我认为不合理，我的朋友就说我有庇护资方之嫌。不料国务院在1956年2月8日（在本文后一年）规定“土地也应该进行适当的估价”，把这个偏差纠正过来，足以证明我并没有庇护资方之嫌。

这篇稿子曾于1955年5月送请陈云副总理看过，求他指出错误，以便更正。他在回信中说：“这篇文章中许多关于政府方面公布过的或讲过的政策，我看了之后，觉得符合情况。关于‘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说法，后来我改过了一些，改为‘既要有所不同，又要在一些方面一视同仁’。因为在一视同仁前面加‘在一些方面’几个字，更合乎事实些，决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一视同仁。所以加‘在一些方面’几个字，更合乎事实些，立论更牢靠些。”现在我就依照陈副总理的意见，把“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标题，改为“既要有所不同，又要在一些方面一视同仁”。

这篇论文是根据公方和私方的意见写成的。当然，从政府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来讲，对其中某些私方观点，应该批复，但因为我是站在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地位说话的，故我的说法可以不必与他们完全相同。陈副总理在致我的信中亦认为可以不必完全相同。

事情演变到今日，我在文中提出的所有矛盾，都按照我所提出的解决方法一一解决，我所主张的全行全业合营，亦已完全做到，我的预见已变为现实，心中觉得非常愉快。我平日喜读经济史，以史学研究者的身分，不能预见最近经济发展的趋向，则何贵乎有此史学研究者耶？为慎重起见，最近我把这篇论文送请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仔细地核对一遍，并请其作些补充。兹将其补充文字，加以括弧，作为各段按语，列入本文，以供读者参考。

分已经转变为各种中级形式（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合营前，这些企业通过国家加工订货，初步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成分站在企业的外面，企业的生产关系沒有大的改变，因而难以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发展生产，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经过对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学习，企业內部积极要求向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发展，因而纷纷申请公私合营。首先上海市在1953年冬季重点发展了十四个公私合营厂，为上海市进一步发展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的工作创造了经验。这十四个厂，包括机械、电气器材、纺织、印染、橡胶等规模较大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于1954年1月2日宣布公私合营。经营半年多后各厂职工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经营管理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生产上出现了一片新的气象。

至1954年底资本主义工业正式公私合营的有九〇四戶，上海一市直接接受加工订货的大小私营工厂共约八千六百余戶。1954年在若干种行业中（不是一切行业）存在着若干困难；某些厂家原料供应不足，某些生产任务不多，这都是由于公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因忙于发展生产，沒有把它好好地管理起来的缘故。但是这些困难，都是改造中的困难，也是前进中的困难。我们曾说过企业在改造中一定有困难，但一定可以克服，矛盾一定可以解决；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发生了；矛盾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和统一，把整个社会向前推动，直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为止。现在先把各地工商业人士表现出来的各种不同的矛盾归纳为六个方面，述之于次。

六个方面的各种不同矛盾：

（一）公私之间的矛盾分为五点：

甲、地方工业和私营工业之间的矛盾。有些是国营有任务，而私营沒有任务；或私营任务不足，国营尙在扩建；也有一个地区在停工，别的地区在新建；

乙、国营商业、合作社和私营商业之间有矛盾。社会主义阵地的扩大和私营商业的维持之间有矛盾；

丙、公私合营企业中有公方代表和私方代表之间的矛盾，表现在有职有权，守职尽责方面。有人反映没有使用的地皮，不予估价，认为不合理；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按：丙项，“没有使用的地皮，不予估价”，1955年有些公私合营企业的土地没有估价，或估价很低。但全面合营时，国务院在1956年2月8日发布了“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其中第二项，已规定“土地也应该进行适当的估价”。）

丁、在加工定货方面有矛盾，主要表现在工缴利润的偏高偏低，有的工业利润偏高，如铅笔；有的偏低；有的按照工厂改进生产情况，随时核减工缴，失去奖励先进的意义；验收也有过宽过紧；任务分配方面，时有时无，忽松忽紧；

戊、表现在税收问题方面的是：有人反映，工商业系虚盈实亏，资金普遍枯竭。税局执行税法是有问题的。

（二）劳资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改善经营管理和增产节约方面。私营工业的成本和开支，一般高于公私合营工业，而质量、产量一般低于公私合营工业，它的次货多，浪费大，增产节约一般停留在口头号召上，推不动。

（三）供、产、销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不平衡的问题上。其严重性是很多产品原料供应不足，但有的因盲目生产，形成生产过剩，销不出去。需要的东西生产不足，不需要的东西生产过剩；有的地区积压，有的地区脱销。

（四）有利可图和无利可得之间的矛盾，上海一般大型厂反映“有利可图，无利可得”，但一般中小型工厂则反映1954年是“无利可得，也无利可图”。其中有的是牵涉到劳资关系方面，如年奖、福利以及不急需的安全卫生设备费用的支出太大，使业务计划和财务计划不能配合。有的牵涉到公私关系方面，如交了税款，完成了公债任务，又提了公积金及职工奖金以后，流动资金枯竭了，再没有钱发付股息红利。理应四马分肥，现在三马分

了，一马沒有着落。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按：“（四）有利可图和无利可得之间的矛盾”，从全国范围来看，下列材料，可供参考。

1.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六年来私营工业、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利润分配情况是：（以盈余为100%）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所得税	26.53	36.50	35.28	39.87	38.01	35.27
资本家及小业主所得	31.54	24.11	28.99	16.48	19.66	21.21
其中股息红利	20.28	13.81	15.63	9.03	9.20	10.29

估计资本家所得的股息红利约占企业资产净值的3.80%，占资本的5.10%。

2. 根据税务总局的统计：工商业所得税的平均税率是：

	公私合营	私营
1951	25.95	23.08
1952	27.99	20.87
1953	29.22	28.04
1954	29.60	25.62（查帐户31.16，民评户23.50）
1955	33.66	24.83（查帐户29.91，民评户21.79）

根据上述两个统计来看，国家征收的所得税，约在30%上下，资本家的股息平均可占到五厘多。）

（五）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之间的矛盾：

甲、表现在批发商方面的一般情况是留不下来，转不出去，包不下来；

乙、表现在零售商方面的一般情况是人事臃肿，戶数过剩，营业差，利润小，收入少，开支大，收支不能平衡。有人指着代销、经销、批销说“这是社会主义经营，资本主义开支”；

丙、表现在中小工业方面的一般情况是设备差，技术低，资金小，分散落后。1954年任务不足，有的沒有任务，改造有困难，维持也有困难，因而有人说，“商业一批一批地改造，工业落在后面，工不如商”。

（六）在计划与步骤方面的矛盾：

甲、有人主张慢慢过渡，不宜太快；但遇到有具体困难的业戶，要求快快改造，或者急迫希望干脆批准歇业，万不宜拖。一般有条件走上公私合营的戶，无一不要求快快公私合营，主要是为了解决困难，放下包袱；

乙、有人认为对工业应该先吃苹果，也有人认为应该先吃葡萄，不然葡萄就会烂了。对商业应该逐行逐业改造，不应该逐戶逐店拣好的吃。北京有几家商业合营后，同业很有意见，如北京同仁堂合营后，南京同仁堂的营业额也被带动提高，影响其他同业的营业。

现在我们依照毛主席的“有矛盾，有困难，但有办法”的指示，一定要把以上六个方面矛盾一个一个地解决；解决之后过了一个时期，情况就会好些；预料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不断地出现，不断地解决，而国家向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一定逐步地继续不断地上升。

让我们分别讨论一下。

第一个方面的矛盾——公私之间的矛盾

第一方面的矛盾（公私之间的矛盾）分为五点，第一点：

（一）矛盾——地方工业和私营工业之间的矛盾。有些是国营有任务，而私营沒有任务；或私营任务不足，国营尚在扩建；或一个地区在停工，别的地区在新建。

（二）实际的情况

目前在若干种行业中存在着若干困难，某些原料供应不足，例如针织工业，几年来年年向上发展，原料供应和产品数量也年年增加，但今天在原料供应上有困难了。又如制革工业和皮件工业，在生产皮球、皮鞋、皮箱等厂中，也觉得原料供应有困难，因此任务当然不足了。但也有因盲目生产，形成生产过剩，因此任务不足了。例如制药工业中的针剂、片剂以及医疗器材工业，皆有生产过剩、任务不足之感。

木材加工工业，主要在东北及其他大城市中，很有困难，原因是木材在产地加工，大材大用，小材小用，在国营建筑部门中也自行加工，因而在私营工业中加工数量就减少了。金笔等文具工业，在解放时戶数不多，因为生意很好，大量发展，现在就过

剩了。另外有些行业五年来有了相当的发展，从发展中带来了困难，如机器、电机及医疗器械就是发展太快了。

有的工业，国营有发展，大的工厂建设完成，就投入生产，这是很必要的（如沈阳电机厂）。有的工业，地方国营有发展，有的私营有发展，有的双方都有发展。

追究以上各种发展的原因大致为：

甲、在抗美援朝中前方需要大量的慰劳品；

乙、基本建设方面的需要，对机器工业及电机工业刺激很大；

丙、商业部门在加工订货中有盲目性，需要量不够正确，计划性不强，如1954年上半年“泻肚子”，下半年又“争货源”，相隔不过几个月，来了一个大转变，这些助长了盲目生产。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按：“追究以上各种发展的原因大致为”，指出了三点，大体和陈云同志在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上讲的相同。我们记得陈云同志大体是这样讲的，供参考：甲、主要是“抗美援朝的军事加工订货”；乙、主要是“1953年开始的基本建设，大量进行机电加工订货”；丙、主要是“由于社会需要一时很难摸清，过去加工订货大部分只有金额计划而无产品产量计划，商业部在1953年上半年压缩库存，下半年又扩大加工订货，其中是有一定盲目性的，各方面的订货增加，工厂就增加设备，加班、加点和增加工人；1954年订货减少，设备和工人就过剩。”并不完全是商业部的问题。）

总而言之，目前困难的情况如陈云副总理所说：“（1）公私皆有的行业，公私皆有困难（如第一机械工业部某些厂也有停工现象），不过私营的困难更大些；（2）全国各地皆有困难，不过上海、天津向为工业集中的老基地，其困难比较更大些，譬如机器工业，有的在内地发展了，也就影响了上海和天津的机器工业。这些都是由于工业发展了，领导上没有加以管理的缘故。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无论何种工业，在发展时，必须加以管理。这是从过去几年经验中得来的教训，可以说是在过渡时期中的一个原则。如果发展不加管理，就不免造成盲目生产。过去有些工业，只要很好地加以组织，就不必大量扩充。如机器工业的潜在力很大，本来不必扩充设备；由于我们在发展中没有加

以管理，才造成了困难。过去我们只看到发展的一面，沒有想到发展后结果的一面。此后我们要好好地利用这个教训——任何工业在发展中，必须加以管理。我们刚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三年，而过渡时期相当长，日后经验更丰富，不难把这个原则肯定下来。”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按：陈云同志讲话的要点如下：

1．“从经济类型来看，公私都有困难，但因国营工业的生产任务和原料分配得多些，困难就少些。某些私营工业的生产任务和原料分配得少些，困难就多些。”

2．“从地区来看，全国都有困难，但由于解放后新建的工厂都在内地，各地地方工业，不断增加产量，就近使用原料，减少向上海、天津进货（同时上海、天津的私营工业，亦有某些盲目发展），以致上海、天津的困难最为突出（如以机械业来说，则沈阳也很困难）。不过上海、天津向为工业集中的老基地，所以困难更大。”）

要管理在发展中的工业，正如陈云副总理所说，必须依据下列二个具体条件：（1）私营全部原料或绝大部分原料要由国家掌握；（2）私营全部产品或绝大部分要由国家统销。如此办理，就能把私营工业纳入国家计划之中，不致再有盲目生产之危险。仅有国营有计划而私营沒有计划是行不通的。在1954年以前，还沒有这样的条件，目前有了条件，可以在生产上逐步提高计划性了。纱布实行统购统销，所以棉纺织业的生产比较稳定，就是一个例子。

解放以来，在五年中，我们沒有把管理私营工业生产的领导机关建立起来，而各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也沒有领导私营工业的生产。商业部是掌握加工订货的机关，1951年至1953年间尚能担任这个任务，现在仅靠商业部不行了。轻工业部也管不到那样多，那样深。中央各个部，大多自己忙不过来，管不到私营工业。1954年成立了地方工业部，既管地方国营工业，又管私营工业，可惜时间上迟了一些。

中央和地方都须建立和加强对私营工业的管理领导机关，地方工业部要很快的开展工作；一个部不够，可以增加新的领导机

关。大的城市须建立几个工业局，不按经济成分分局，而按行业性质来分，用“一条鞭”办法来管理和领导。一个局把全行业的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和私营一起管理起来，作全面安排，在各行各业和公私之间，逐步做到有一个统一的平衡的计划。如是国营工业和私营工业之间的矛盾可以暂时解决，不致再有“国营有任务，私营沒有任务”或“国营尚在扩建，私营任务不足”的现象发生。所以按行业性质来分，用一条鞭办法来管理，是根据以上这个原则订出来的办法。

（三）矛盾的解决方法

依一条鞭的办法，只要国营可以让出一部分原料和产品，就由国营让出一部分生产任务和原料给私营工厂，使之能够维持生产。一面利用现有工业，控制管理并减少新建和扩建，如原拟五年计划增加纱锭二百七十万，现在可以减少一些。但这样做并不等于把所有落后的工厂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一部分工厂仍须被淘汰。政府的方针，希望是有的加以改组，有的以小并大，有的须搬家，有的须淘汰，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是不可设想的。南通大生纱厂带一个嘉定的小厂，就是个以小并大的好例子。华东地区铅笔厂最多，可是西北地区一家铅笔厂也沒有，两地区之间未能合理分工，似有搬家之必要。

但许多行业并沒有国营工厂，有之亦很少，如医疗器械等，国营让无可让，即或能让亦不多。因此不仅公私之间须加以调整，即私私之间和地区之间亦须加以调整。尽一切可能了解各行各业（有问题的和沒有问题的）的生产情况、设备能力、原料供应和销售情况，加以研究和安排，使已有问题发生的行业，得能解决其问题；沒有问题发生的行业不致再发生问题。

第一个方面的矛盾（公私之间的矛盾）第二点：

（一）矛盾——国营商业、合作社和私营商业之间有矛盾。社会主义阵地的扩大和私营商业的维持有矛盾。

这个问题的讨论，移至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章，

本章专讨论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故不赘。

第一个方面的矛盾（公私之间的矛盾）第三点：

（一）矛盾——公私合营企业中有公方代表和私方代表之间的矛盾。表现在有职有权，守职尽责方面，有人反映有了职位，沒有工作，又有人反映“守职容易尽职难”。表现在清产定股方面的，有人反映沒有使用的地皮，不予估价，认为不合理。

（二）实际的情况

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公私关系是比较突出的。公私关系有正常与不正常的二种情况。不正常的关系，大致表现在有职有权，守职尽责的问题上。据反映合营后，企业好了，工作多了，但私方却感到无事可做。究竟责任应属哪一方面呢？大致有三种看法：

（1）责任在于私方，下面四点可以说明：

子、私方认为合营后问题解决，万事大吉，一切依赖公方；或则有些私方在合营前即参加社会活动，合营后，更弃企业于不顾，专心于社会活动；

丑、合营后，企业性质改变，私方所熟悉的工作，一般空起来了。但新的经营管理方法，私方还沒有好好学习，以致插不下手，形成眞空阶段，无事可做；

寅、私方存在自卑思想，工作不主动，公方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有意见也不提；

卯、私方对于结合企业改造，进行个人改造，认识不够。

（2）责任在于公方，因为公方认为要搞好公私团结，它应起主动作用，所以事先往往不与私方充分协商，既不指出私方的缺点，亦不表扬它的优点。

（3）责任在于公私双方，私方沒有诚心诚意地接受领导，公方也沒有主动地教育私方，帮助其改造，沒有重视统战工作。

（三）矛盾的解决方法

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负责同志也承认，过去对私方代表的改造

工作做得不够，有些人安排也不够恰当，有职有权，尽职尽责也未完全做到，故有的私方代表感到合营后无事可做。今后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注意下面几个环节：

（1）公方必须贯彻政府的政策，使私方有利可得，有事可做；

（2）公方在企业中办事，必须事先与私方充分协商；

（3）根据私方的能力和职位分配适当工作，使之有职有权，并应帮助私方解决困难，指出缺点，表扬成绩，勿太客气，但亦不可太粗暴；

（4）对进步的与中间的，固应团结、教育、改造与使用，对落后的亦不能放弃，应争取他们，改造他们，加以使用，对破坏者则应提高警惕，于必要时依法予以处理。私方有的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消极怠工，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用金钱主义腐蚀职工，大部分摇摆不定。这种情况增加了工作上的困难，必须彻底铲除。

贯彻政府“有职有权，守职尽责”的政策，同时彻底消除资方的破坏作用。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按：“（三）矛盾的解决方法”：“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负责同志也承认，过去对私方代表的改造工作做得不够，……今后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注意下面几个环节……”按照文章中的意见来看，可能是1955年1月5日国务院（八办）召开的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上，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许涤新副主任的发言。依此来看：

1. 承认工作做得不够这个问题，许副主任发言中有这样一段：“从过去一年的情况来说，我们对公私合营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但还存在着一些缺点：(1) 在进行企业改造时，对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改造注意不够，少数企业在人事安排上不尽妥当，有些企业，私方代表还未能‘有职有权’、‘尽职尽责’。这问题应引起重视。(2) 有些企业在合营后，不顾供销平衡，盲目增加产量，致质量下降。这是主观主义的做法，加重了供销平衡的困难。(3) 对于原有合营企业的整顿工作做得不够，有的还未进行整顿，有些则整顿了尚未巩固。”

在发言中还提到资方的积极性和消极性。

2. 今后要注意“下面几个环节”这四点，许副主任的发言是这样说的：

“1.公方必须贯彻国家对于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政策（如人事安排、清产定股、利润分配等）。2.企业内部应兴应革的事，尽可能的要在事前与私股充分协商，理由是：私方对企业情况熟悉，有经验。3.根据资方的能力、职位，分配他们以

适当工作，使其有事可干，有职有权。有困难应帮助他们解决；有缺点应指出；有错误应批评；有成绩就应表扬鼓励。4.在合营企业中，对进步、中间分子固然要团结、教育、使用他们；对于落后分子，亦不应放弃使用和改造，应该争取他们倾向进步；对顽固破坏分子，要保持警惕，并采取适当的办法加以惩处。”

3. 原稿（4）最后一句，“私方有的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大部分摇摆不定。这种情况增加了工作上的困难，必须彻底铲除。”

上述许副主任发言也有类似的一段，原文是：

“但亦有一些人把合营作为丢包袱的办法，而不去努力创造条件；还有一部分资本家用种种办法来抗拒社会主义改造，例如消极怠工，抽逃资金，用加薪的手段腐蚀拉拢部分落后职工，有的更加恶劣，破坏生产设备，抗拒把企业纳入公私合营的轨道，这些情况，无疑地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

以上所引许副主任发言，可供参考。）

第一方面的矛盾（公私之间的矛盾）第四点：

（一）矛盾——矛盾表现在加工订货方面的有：（1）工缴利润的偏高偏低，有的偏高（如铅笔），有的偏低（如文具）。（2）有的按照工厂改进生产情况，随时核减工缴，失去奖励先进的意义。（3）验收货品有时过紧，有时也过松。（4）在任务分配方面，时有时无，忽松忽紧。

甲、矛盾——工缴利润的偏高偏低

（二）实际的情况

几年来中央商业部始终执行陈云副总理指示的：“按照不同情况，保证私营工厂按其资本计算，在正常合理经营的情况下，每年获得10%左右，20%左右，到30%左右的利润。这个利润是按正常合理经营中的中等标准来计算的。某些工厂成本低，质量高，便可以得到比较多的利润。反之某些工厂成本高，质量低，它们所得到的利润便会比这低一点。”工商界代表一提到加工订货，也承认私营工厂一般有利可图，这证实了工商部（现称商业部）贯彻了这个原则，因而利润有高低之别。

（三）矛盾的解决方法

今后仍希望继续贯彻陈副总理指示的原则。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计算生产、成本的方法极为复杂，工厂设备和生产条件等又多不同，因此仍不免有偏高偏低的现象。今后只有在不断改

进工作中，逐渐做到更加合理。任何一方，如认为过去有不合理之处，可以重新提出协商，加以调整。

乙、矛盾——按照工厂改进生产情况，随时核减工缴，失去奖励先进的意义。

（二）实际的情况

资方说："由于增产节约之后，成本有了降低，工缴也可以降低，但把增产节约以前的也要减，使企业利润减少，则增产节约对企业不起刺激作用。有时成本送到国营企业那里核减了，但私营企业不知那一项应减，所以核减对企业不起指导作用。"

有人反映，政府对代用品创制缺乏奖励，大丰化工厂是一个好例子。该厂制造某种产品，原来生产成本为一千七百元，实际核价一千五百元。后资方增加设备十万元，成本降低四百元，核价随之也降低四百元，结果还是亏本。这样对今后增加设备，降低成本的积极性就消灭了。我们不但对降低成本要予以奖励，对新产品的出产也应加以奖励。现在工厂出品，还是老花样，新产品太少，似应注意技术改进，仅靠验收不够掌握。

（三）矛盾的解决方法

闻公家方面对技术改进、提高生产率所增加的利润拟作如下的处理：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由于改进技术、节约原料、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所增加的利润，在半年内应归工厂所有；过了这时间，大家再协商。这样做，可以奖励私营工业的积极性，对国家企业都有好处。

丙、矛盾——验收货品过紧

（二）实际的情况

关于私营工厂按质交货往往以次顶好，使国家遭受损失的问题，公私双方各有意见。私方认为国营商业对商品检验有时过严，有时很松，特别是要货供应市场时，就对检验工作放松。公方亦认为这是事实，不过这个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是由于目前检验的办法，除了一部分商品已采取科学方法检验外，还有不少商

品不能不凭眼（比如搪瓷制品、皮革制品等），不能不凭手（比如棉产区收棉和呢绒毛线产品），不能不凭嘴（比如茶叶、糖果罐头食品），不能不凭耳（比如乐器）来辨别质量。这种方法当然是不十分科学的，但在目前条件下，检验仪器不足，不少商品还没有适当的检验仪器，暂时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检验。现在加工订货中，产品品质虽有不少改进，但由于一部分厂方粗制滥造，不顾质量，只求数量多，利润大，乘国营公司加工订货中要货急迫，不可能件件检验，只能是采取抽查办法，所以往往在商品到了批发部门批售出去，到了合作社、零售公司、私人零售店出卖时，才发生问题；或者到了使用部门，消费者买回去使用时才发生问题。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多得不可胜数，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1）有关于日用百货方面的，如上海某厂制的军用胶鞋底一穿即断；（2）有关于工业器材方面的，如某种机器全部不能达到最低标准，如交电公司加工之皮线，规定长度为三百米，但发现长短不一，长的人家买去当然不说话，短时就要求国营赔偿；（3）有关于医药方面的，情况更严重，因为这是和人民生命直接有关的，如北京某厂产的磺胺嘧啶片（消炎用的）经过卫生部门检验，有80%不合格的。

（三）矛盾的解决方法

由于这些厂的只图私利，不顾公益，粗制滥造的结果，不仅使国家遭受损失，而且对人民生命安全有关，所以对商品检验，决不能放松。加工定货时，一定要在合同上载明产品规格和品质，并且要采取严格的检查办法，进行检验。有些产品需要化验的，一定要进行化验。同时也应要求工厂，对产品品质实施严格检查，应建议各工厂，必须有检验产品规格的人员，主持此项工作。产品规格和质量好，不仅商业方面便于出售，而且能取得购买者、消费者的满意，可以扩大销路，促进工厂扩大生产，保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同时也能保证工厂获得正当利润。这是私营工业应走的方向。

丁、矛盾——任务分配方面，时有时无，忽紧忽松。

（二）实际的情况

加工订货的计划性，对公方来说，有时不免有出入，政府机关对私厂任务的计划性不够正确，比如北京有一家麻袋厂，做了麻袋的计划，计划局口头指示他们，可照计划做，但不肯书面批示。以后纺织工业部就照他们的计划调拨（用自己原料，产品由国家调拨），直至1954年5、6月份才说不能多生产，需要减产一半左右，而实际上，他们在半年内已完成计划70%—80%。后来为了服从国家计划，10月份起减产，停工二个月，受了损失。所以他们希望今后政府部门对私厂计划的正确性要加强。

国营公司在加工订货方面，是有盲目性的，计划性不够强，需要量不够准确，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到加工订货的商品，大部分是供应社会消费需要的，而人民消费需要，是往往有变化的，同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农业比重大，不能沒有季节性，农产品原料又不足，一部分依靠进口的工业原料，也往往不能及时进口，因此表现在加工订货方面，就难以做到完全沒有时多时少的毛病。

北京大学是一个小单位，在支出方面一切似可按预算计划进行，但也有例外。例如1954年度决算与预算相较，完成情况较差者为固定资产设备购置费，只完成88%。主要原因是因为仪器设备采购有种种困难，不能完全按计划进行。在编制预算及在调整预算时，计划采购某种仪器的钱准备了，但常常无货；钱不准备，又忽然有货进口，或在某地发现有货。由于这种情况，就往往使提出预算的各系科及主管单位在编造预算时有偏高的倾向。

但时多时少，时紧时松的错误，不一定全在公方。私营工厂往往把加工订货的任务看做单纯的买卖关系；在淡季沒有生意或生意减少的时候，要求加工；在旺季生意好的时候，拒绝加工。因此国营方面本身固须加强计划性，但对私营工厂亦须加强具体领导。

私营工厂必须要认识国家加工、订货、包销、收购计划准确完成的重要意义。目前上海一市直接接受加工订货的大小私营工厂共约八千六百余戶，其间接为国家的加工订货进行零件、加工等生产的工厂为数亦属不少，实际上，可以说整个上海私营工业已形成为业业协作与相互依存关系，也可以说它通过加工订货已与国家在经济上建立联系打成一片，发挥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为国家计划经济的执行，创造了良好条件，决不能把加工订货视同单纯的买卖关系。

（三）矛盾的解决方法

供、产、销是一般生产活动的前提，沒有机械设备，材料和电力等生产工具的供应就根本不可能进行生产；供应不经常，生产必然也不可能经常。自1953年下半年以来商业部已尽了最大努力，注意淡旺季生产的均衡安排，工作上虽已有改进，仍然是不够的。1955年工业方面统一安排后，情况可能会好些，但估计仍然不是一下就能做得很好的。

第一个方面的矛盾（公私之间的矛盾）第五点：

（一）矛盾表现在税收问题上。有人反映：工商业是虚盈实亏，资金普遍枯竭，税局执行税法是有问题的。

（二）实际的情况

他们说税务问题中有一个矛盾，就是税务机关一定要完成国家税收任务，与私营工商业的负担能力有一定的距离。税局认为，工厂有一定的生产任务，就有一定的工缴利润，因此也就必须完成一定的税收任务。但私营企业的管理很落后，达不到估计中的利润，这一问题始终沒有解决。因此他们要求税局必须把征税工作与改善私营工商业的经营管理结合起来。他们以上海染织业工厂为例，说上海染织业工厂的生产任务与另一个厂相同，因此所得税也应该一样；但因为它沒有烧碱回用设备，一个月浪费一万元，九个月浪费了九万元，而所得税还是五万元，所以这个厂就赔钱，对缴税有意见，而另一个厂则有盈余。于是他们以为贯彻

协商精神很重要，事实证明：凡是事先经过协商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税收工作也就顺利，否则问题就多。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按："实际的情况"第一段，据我们所知：历来国家的税收计划是根据税源与税法制定的，政策与任务是完全一致的，由于对税源不摸底，有时税源缩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完成任务，也是完全允许的。因此，并没有矛盾。

"说上海染织业工厂的生产任务与另一个厂相同，因此所得税也应该一样；但因为它没有烧碱回用设备，一个月浪费了一万元，九个月浪费了九万元，而所得税还是五万元……"根据我们所知，这是期中估征，在年终汇算清交的时候，还是有盈余课税，亏本的将估征的部分退还企业。这样国家税收任务与私营工商业的负担也不发生矛盾。）

有人反映税务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税局对税法的解释不一致。西安有四个区，依同样的办法纳税，在甲区算合法，在乙区算违法，他们希望税务总局对税法的解释能统一一下。

这个问题很复杂，由于费用支出和资本支出的问题，包括低值易耗品的具体解释，大修理和小修理的划分问题。

因企业规模的大小不同，所以一只价值二三百元的小马达，在大企业，可能当成低值易耗品处理，而在小企业则可能成为主要的动力设备。又如有些价值很大，可能是易耗品，有些价值很低，可能不是易耗品。在上海列为低值易耗品的就有几千种之多。国营企业对低值易耗品的规定也不一样，计算亦不同，重工业的规定和轻工业合作社的规定也不一定一致。又如大小修理划分问题，也不易解决，因为牵涉到是否增加设备的价值，是否增加使用效能和延长使用年限等等各种标准问题。这些问题1954年汇算时，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由税务机关和工商界协商确定。

（三）矛盾的解决方法

今后公家准备从1955年起责成税务机关选择某些条件较好的行业（如棉纺、卷烟等）分类排排队，分别进行调查研究，摸一摸底，能否在同一行业中，找出一个大体可以适用的标准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在解决工作中，工商联和同业公会对税务机关当然要加以协助。

守法违法的界限问题——必须说明，由于税法上某些规定不够明确，各地解释不能一致，所以有些工商户漏税，并非出于故意，或被税局错征的也有。但另一方面，也有不老实的工商业户，利用财政机关工作中的缺点钻空子的。这就造成了守法违法界限的不容易划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今后的办法是：凡税法有明确规定，应纳而未纳的税款，就是偷税，应算违法。规定不明确，又未能判明是有意钻空子，这样的是漏税，不算违法。至于税务机关，因解释不一致而误征了的，查明后应随时纠正。

第二方面的矛盾——劳资之间的矛盾

（一）矛盾——劳资之间的矛盾：主要在改善经营管理和增产节约方面，私营工业的开支成本，“一般高于合营工业，而质量产量一般低于合营工业，它的次品多，浪费大，增产节约一般停留在口头号召上，推不动”。

（二）实际的情况

对于中小工业，单纯的思想教育还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与企业改造密切结合，必须帮助他们改进生产，提高技术，降低成本，反对粗制滥造。过去照顾落后的政策是对的，但不能老是照顾，以致停滞不前。私营工业的开支所以大，其中一个理由是工资高。对于上海的工资改革问题过去还未办到，但实际上应不应办，民建会与工商联可以考虑，因这也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内部问题之一。广州本来也是一个高工资的城市，工资改革，做得很好，各地似可仿行。无论如何，工人福利确实高的应降低，以适合国家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新措施。

私营工厂产品的质量，一般低于合营的，为满足人民需要，应注重产品质量，这就须从推动工人提高质量方面着手，而不应从工缴方面着手。但在私营工厂的生产关系未曾改变以前，要鼓励工人的积极性，也是不容易的。至于检验产品质量，责任有些

不明确，例如布发生了次品，有的推纱不好，有的说织的不好，也有怪染料不好。象这种情况究竟责任在谁，很难断定。希望政府有统一的检验机关，解决责任问题。

奖励先进，照顾落后，淘汰有害，这是对的；但不能老是照顾，致使其停滞不前，所以要把奖励先进的精神贯彻下去，使中等经营标准的再努一把力。过去工厂技术一提高，成本一降低，工缴就立刻调整，以致资方代理人就有不正确的想法，认为何必提高技术。现在公家已决定把由于提高技术而得的盈余，在六个月至一年內可由厂方所得，工商业中人认为很满意。

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原则和精神，国家对私营工业予以加工订货的任务，把产品的种类、数量、规格、价格、原料的耗用量、验收标准、交货日期等要求都规定在合同上，因此这个合同就是国家计划的具体表现，私营工业必须保证按时按量按质完成国家给予的任务，必须及时地供应全国基建、军需民用的需要。所以过去有一部分人把加工订货单纯了解为“生意买卖”的看法，是大错而特错了，应该把它看作为“自始至终的严肃工作”。要晓得私营工厂只要为国家加工订货，就已经不是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而是一种中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了。它对于国家经济计划的完成，不但负有道义上而且负有法律上的责任，决不能视同普通的买卖关系。若私营工厂不按照合同办事，经常出次货和脱期交货，使有些商品大量堆存仓库，则不但影响了国家计划的完成和浪费宝贵原料，损害人民的利益，而且对其企业本身的改造和前途，也会发生不良效果。

有些工业，不仅浪费宝贵的原料，而且有粗制滥造品质低劣等情形。上海三十八家橡胶业私营厂，在1954年 6 月份产品中就有二万二千打次货胶鞋，浪费了六十吨橡胶。他如五金翻砂、元钉、铝器、针织內衣、搪瓷等业的次货也很严重。各地消费者对品质低劣的产品，意见是很多的。产品品质低劣，不仅影响了销路，使企业遭受困难，而且也浪费了国家宝贵的原料。

但资方有人辩护说：我们很多私营合营的工厂，由于检验产品品质的仪器缺乏，以致定出的标准规格并没有严格的科学依据，所以在厂内发生次品率忽高忽低，在交货时发生退货忽多忽少的情况。这是资方的辩护。但据上海某纺织厂的工程师的反映，解放后整个社会固然有了极大的变革，但在私营企业中工作的技术人员，仍然受着严重的束缚。由于资本家的经营方针完全从唯利是图的目的出发，以致整个工业混乱而无计划，对生产和技术不够重视，更谈不上设备上的改进，只要是有利可图的"任务"就接受下来，到期交不出货，就拼命催赶，赶出来的货色质量上有问题，就叫技术人员去办交涉。有时技术人员为改进生产提出建议，资方不是强调困难，就是敷衍了事。

私营工厂不能按质按量按时交货，所以政府派员驻厂监督加工，订货任务能够按期、按质、按量完成，是国家加强对私营工厂社会主义改造的另一种重要措施；一定要先搞好加工订货，才能自加工订货中级形式进入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故加工订货是为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创造条件。

驻厂人员，不但监督资方履行合同完成任务，而且要督促资方改进生产和经营管理。在改进生产时，既要进行企业改造，也要对资方进行思想改造。资方有的觉得很自卑，就得结论说"企业改造容易，个人改造困难"，其理由是企业改造有党和公股的领导、工会和职工群众的监督、国家的支持，又可以订计划，订指标，所以比较容易；个人改造，"孤零零"既不能订计划，更不能搞指标，所以困难。这样就会在思想上把企业改造和个人改造分了开来。殊不知企业改造，其目的是在改进生产，而改进生产是资方思想改造的物质基础。驻厂人员要监督资方遵守政府的各项法令政策，制止资方的一切违法行为，一定要不断地与资方违法行为作斗争，这对资方说来，就是直接改造资本家个人。

派员驻厂的性质，与公私合营的公方代表的性质不同，他们不是直接参加经营管理的，乃是推动、监督、协助资方搞好生产，

完成加工、订货的合同任务的。一切管理企业，进行生产的责任，还是全部要由资方来负责，因此派员驻厂，并不改变企业的性质，资方应主动努力充分利用企业改造，成为个人改造的有利因素，把企业的逐步改进成为逐步进行个人改造的动力，反过来，又以个人的进步思想来推动企业前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企业改造的同时，个人也得到改造，才能把企业改造和个人改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一切全在乎资本家“主观的努力”，无所谓“容易”与“困难”之分。在这里我们又得了一个原则——就是企业的改造和个人的改造一定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矛盾的解决方法

在资方，接受公方的指导，把企业的改造与个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努力学习，提高技术，降低成本，改进生产。在公方，奖励先进，淘汰有害，照顾落后，但不能永远照顾，致使其停滞不进。

第三方面的矛盾——产供销之间的矛盾

矛盾——产供销不平衡的问题很严重，很多产品原料供应不足，不需要的东西生产过剩。有的地区积压，有的地区脱销。

（一）矛盾——关于原料供应不足

（二）实际的情况

如棉纺工业，因1954年水灾严重，棉花产量减少，1955年生产任务减少，其好处可趁减工停工时期检修机器，但有些行业建议加强外销工作，采用以纱布调换棉花进口办法，可以继续照常生产，充分发挥生产潜力，继续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并且不影响工资收入。

有时因原料分配不妥，偏于一方，致形成供应不足。如广州工业界反映，皮革的分配最近二三年来分配在广州的很少，因而使制革业生产陷于半停工的状态。原料供应问题在中南区也很严重。尤其是在自产自销的工业中。

国营公司因原料供应不足，减少对私营工厂的加工订货任务，因此对私商不能按时按质调拨，对私商营业额影响很大。另一原因是过去私商可以向外地进货，现在受地区差价限制；又因取消了批发商，私商只能依靠国营，因此货源问题对私商有很大影响。

原料供应既然如此困难，势必设法克服这些困难，其办法不外乎组织节约和推广代用品。其已经实行而且有成就的有如下几种：

（1）降低原材料的消耗定额——如火柴工业方面，以松香代部分石蜡，不但降低消耗定额，且提高了品质。

（2）降低燃料、电力的消耗定额——在用电用煤方面，1954年1—9月，在二百匹马力以上工厂中推行节约用电的结果，共节约电力三千二百万度，可用以纺制十六万件棉纱。1954年9、10两个月，在用煤一百吨以上的工厂中推行节约的结果，共节约用煤二万五千吨，足供发电厂生产四千七百万度电力。

（3）以国产原料代替进口原料——如造漆工业方面，过去用的人造树脂、熔剂、钛白粉、立德粉、立索尔红等进口原料已逐步自给或用国产品代替。

（4）以廉价的原料代替昂贵的原料——如金笔工业方面，1954年全年节约黄金七百两。

（5）组织收回和利用废料——如印染工业方面，过去印染过程中抛弃的废液，含有燃料及烧碱，经利用脚水套染，每年可节约染料十万元，收回烧碱每年可节约二百万元。

以上各种节约和推广代用品的办法，都是应当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进行的，任何以节约作为偷工减料、降低质量的借口，都是不能允许的。

在私营工业中，节约原料，节约燃料电力，推行代用品工作，对于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以及私营工业本身，都有很大好处。首先，使私营工业降低了成本，扩大了销路，发展了生产。据估

计，上海私营工业产品中，原材料、燃料电力一般都占成本的70%以上，节约代用的结果，对于销路有困难的工业，是降低了成本，扩大了销路；对于原料供应有困难的工业，则相对地或根本地解决了原料问题，因之为扩大生产创造了条件。其次，节约本身，就是改善工厂经营管理，改善生产技术，发掘生产潜力的动力。节约的意义是积极的，不仅原料供应有困难时应当节约，原料供应无困难时也应当节约。不断地从生产过程中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积累资金，发展生产，这就有利于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私营企业的改造，同时有利于资方和资方代理人个人的改造。

有利于企业和个人的改造是什么呢？那些原来认为原材料的消耗定额不可能降低的工厂和个人，那些原来怀疑能否利用国产原料以代替舶来品的工厂和个人，一定能够在它的和他的实践工作中取得教训，改变保守观点。这就是只要开动脑筋，积极性和创造性可以尽量发挥，各种思想障碍也可以一扫而空。苟不然者，在产品质量太差，销售不掉时，则片面要求国营经济照顾收购；在浪费原料，因而成本太高，无利可图时，则埋怨国营经济收购价或工缴太低，因而接着产生销售靠国营经济，生产靠工人群众，资金不足靠银行贷款的错误看法，而忘记了自己有改进企业管理和生产技术的责任。因此要解决原料供应不足的矛盾，非开动脑筋扫清各种思想障碍不可。

我们对于私营工厂的要求如以上所述；对于公家，亦希望对于有成效的代用品使用，亦应有适当的奖励。工商界代表反映，目前对于这方面注意不够，有的工厂花了代用品试制费用，计算工缴时，不仅沒有得到鼓励，连这笔费用也无着落。这样自然不能提高大家节约原材料，创制代用品的积极性。

（三）矛盾的解决方法

闻财政部方面，对于工厂试制代用品的试制费用，认为于计算工缴时，可以准许列支，当告税务机关进一步了解情况，研究

解决。① 在资方，应促其加紧学习，开动脑筋，发挥他的积极性，改变他的保守观点。

因棉花产量不足，我们必须作好收购工作和供应工作。有些干部不认识这一特点，在粮食统购统销、棉花统购和物资供应工作中，曾经采取若干错误的办法。例如动员种棉很多的农民出卖余粮，供应棉农的粮食不够或品种不当，不认眞执行以棉花代缴农业税的政策等等，这就增加了农民种植棉花的思想顾虑，助长了缩减棉田，或以好田种粮，以坏田种棉的现象。为了鼓励农民按照国家计划扩大棉田，必须尽最大可能保证对棉农的粮食供应。

（一）矛盾（一续）——关于因盲目生产而形成的生产过剩。需要的东西，生产不足；不需要的东西，又生产过剩。有的地区积压，有的地区脱销。

（二）实际的情况（一续）

过去因大家忙于搞生产，沒有想到生产发展的结果，以致造成生产过剩。在机器工业方面，如电动机发电机大的不能做，小的做得太多。中国机械业落后，大多是修配厂；私营能制造的国营也能制造。在技术方面，能制造的沒有销路，有销路的却不会制造，因而形成生产过剩。

（三）矛盾的解决方法（一续）——以减产或停产来解决矛盾。

中央对私营和公营工厂，抱“一视同仁”的态度，故解决这个矛盾，愿由国营先减或先停，让与私营以维持私营。但不准做积压的产品，必须做销得了的产品。目前机器工业的情况是我们需要的机器，私营厂不能做，有些国营厂也不能做；他们能做的，

---

① 税务总局已规定自1955年起，按下列办法处理：如其试验已经确定为失败，不再继续试验的，可以作为当年度费用一次列支；如其试验虽然失败，但仍继续试验的，可以作为预付费用处理；如试验已经成功的，则其全部试验费可以比照开办费分5年摊销。——编者。

我们不需要。一四一项大工程中，大约有半数的非主要的机器，要我们自己去做。有的一种配件只要一个，并不是所有的私营厂都能做。我们已说过我们机器制造工业多数是修配厂，制造能力本来并不大，如要从这种情况发展到能自己制造，不知要经过多少年。但也不必因此而悲观；现在是过渡时期，将来情况会好转的。

但许多行业，并沒有国营工厂，即有亦很少。如制药、制造医疗器械、文具、金笔等工厂沒有国营的，所以国营让无可让，即或能让亦微不足道。因此不仅公私之间要加以调整，即私私之间和地区之间，也要加以调整。以后私营机器工业任务的来源有：（一）商业部的加工订货，如小五金；（二）国营机械工业部让出来的；（三）私营自产自销的一部分。

在调剂中要对上海天津两地的工业特别加以照顾，同时也要照顾其他各地。这是：(一)因为津沪是工业的老基地；(二)津沪沒有基本建设；(三)各地地方工业的发展，影响了上海工业的生产和增加推销上的困难，如热水瓶、缝纫机、牙膏、牙刷等原来可以销内地，现在内地也发展工业，使津沪货物积压。因此津沪商业在下降，两地批发商最多，沒有买卖而转业又有问题。因此必须较多照顾这两个城市，对全国经济是有好处的。

机器电机两业虽然有困难，但有有利条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约占全部的三分之二，正需要机器工业。国家建设的高潮在1956年和1957年，地区在西北、中南、华北等地，这两个工业将来一定有出路，竟可迁一部分工厂到那边去，但仍须防止盲目发展。人员可以在地区之间调剂；如生活习惯和气候有关系，则上海的人员可以去武汉；天津可以去太原和大同；南满可以去长春和北满；西北是平地建厂，需人更多。

（二）实际的情况（二续）

东北沈阳市工业情况，目前基本上是中小工业问题，是产销问题。沈阳是工业多，商业少，工业戶约占全部工商戶的三分之

二，而中小工业则占工业户的90%，加工订货占私营工业生产总值的90%。沈阳工业的弱点是资金少，户数多，设备差，其优点是厂长经理中由技术工人出身的多，技术上很肯钻研，生活很朴素；工人方面，工作亦很积极。在国家经济恢复时期，抗美援朝的军需，加工定货起了一定的作用。1953年前加工任务多，一直很顺利，到了1954年一、二季起，因抗美援朝战争停止，加工订货减少，一部分停工，收入减少，于是欠工资，欠税款，问题比较严重，国营工业才把一部分加工任务让给私营来做，但困难还是存在的，工人和资方的情绪都不很稳定。后来工商联、工商局与工会等各方面进行了一些工作，认为沈阳中小工业这么多，过去是围绕着重工业发展起来的；这些工业（如机械水暖设备）的供销问题，沈阳市是解决不了的，虽1954年三季度从国营工业那里拨了一部分出来，四季度还是不行。

（三）矛盾的解决方法（二续）——革新技术，试制新产品来解决矛盾。

在这样的情形下，大家认为私营工厂自己要开动脑筋，想些办法。下列两种已有相当成就。

（1）从思想认识方面、从学习方面来求解决，因为思想通了，解决问题就容易些。通过参观技术革新展览会、生产安全设备展览会、苏联展览馆后，受到了实际教育。

（2）在业务方面，认为什么产品都要国家包下来是不好的，因为国营公司自己的积压也多；因此认为革新技术，试制新产品，是私营工业的一个出路。目前主要的是搞马拉农具，已基本成功（质量与效力方面）。但生产这些东西后，光靠东北来解决是不够的。

东北不能单独解决供产销的平衡问题，必须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安排一下。这也是从经验中得来的教训。

（二）实际的情况（三续）

目前国营、私营、公私合营都有产品积压的问题，情形各各

不同，不能用“一条鞭”的办法来处理，惟有依据各种工业的不同情况来分别研究解决。例如目前普通铅笔有积压，但高级绘图铅笔又供不应求。1954年第二季度以来，铅笔已有积压现象，可是青岛、徐州、济南各地半手工业式的铅笔厂还在开设。现在上海厂机器很多，可是北京厂还要添置新的机器，未能作到相互调拨。华东地区铅笔厂最多，可是西北地区一家铅笔厂也沒有。各地区厂家未能合理分工，未能规定产量，以致有的品种积压，有的又脱销，技术人员上海多，但与上海有关的各厂向上海要求调派技术人员去帮助，也未曾得到同意。技术未能很好地交流，就造成国家资财不必要的浪费。上海根据中央指示，应当作高级绘图铅笔供经济建设制图之用，可是木材公司不能供应一等木材，而在北京又可以买到一等木材。中国百货公司给上海各厂的生产任务的计划性和调拨推销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全中国的铅笔厂家数少，不过十三家（手工业工厂在外）。十三家的职工不过一千数百人。上海一地每月生产量，以往约达每月全国总产量（约二百四十万打）的一半。由上海铅笔公司投资的并已公私合营的有哈尔滨、北京、重庆三厂。以上公私合营四厂连同国营天津、旅大两厂的生产量约占全国产量的90％左右，因各自为政盲目生产，形成产品积压。

（三）矛盾的解决方法（三续）——召开专业会议，共同协商解决。

解放后，卷烟和火柴两业一度都有困难，轻工业部自1950年开始召开专业会议，经过安排，产、供、销就平衡下来。其他行业似乎也可以采用类似的办法来改善产、供、销的情况。因此铅笔工业中有人极欲利用火柴卷烟两业的经验，由一个中央主管部会同中国百货公司、中国木材公司和各该设厂地区的主管机关以及各厂的负责人等，召开一个铅笔工业全国性的专业会议，来解决各地区在供销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并借此推动改进品质，提高技术，降低成本，交流经验。相信这个会议是会有助于铅笔工业

问题的。

这个会议是与第一方面第一点矛盾的解决方法之精神相符合的。我们讨论第一方面矛盾的第一点时，我们曾说过：以后用“一条鞭”的办法来管理和领导，换句话说，以后的管理机关，不按经济成分来分，乃按行业性质来分，一个部或一个局把全行业的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和私营一起管理起来，作为全面安排；在各行各业和公私之间，逐步做到一个统一的平衡的计划。因此我赞成这个专业会议，由一个按行业性质成立的部来召开，以求事权统一。

（二）实际的情况（四续）

现在让我们谈一谈次货问题，可以分为两段，一段讨论如何减免日后的次货，一段讨论如何处理过去积压起来的次货。

（1）私营工厂不按质交货，就产生次货问题。这问题影响很大，推究其原因，不外：（一）企业经营管理不善，技术低；（二）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的计划性不够，有时中间改换任务，致形成积压；（三）资方的偷工减料；（四）原材料品质低；（五）资方有的以为公方验收过严，不但无标准，且脱离实际（如搪瓷无正品）；（六）零件外包后，制造零件的企业粗制滥造；（七）劳动纪律不好；（八）恶性循环，次品越多越困难；越困难，次品越多；（九）很多私营和合营的工厂，由于检验产品品质的仪器缺乏——制定出的标准规格并沒有严格的科学依据，所以在厂內发生次货率忽高忽低，在交货时，发生退货忽多忽少的情况；（十）有些企业为了增加产值，多得利润，不按照国家规定的品种计划生产，盲目地生产那种价值大的、容易生产的、但常为社会不需要的产品。例如上海国营制药厂，不愿生产产值低而有销路的产品，却专心生产贵重但销路困难的药品。有的工具厂不生产产值小的小工具，而只生产产值大的大工具，这样，从一个企业来看好象产值增加了，但国家计划受到了破坏，并造成产销脱节和资金的积压。

有了以上各种造成次货的原因，有人建议公家要加强领导，资方要积极改善经营管理；可以采用卷烟火柴两业的经验，召开专业会议，但一定要有领导。没有领导的专业会议，恐贯彻不下去。工会也要加强工作，积极配合，一面加强劳动纪律，订出切实可行、不脱离实际的验收标准。检验产品时，要推广下厂检验的办法，一面可以推动改进，一面可以使干部了解实际情况。

（2）以上不过是日后如何减免次货的办法。对于过去已经积压起来的次货，应如何处理也成为问题。若不处理，浪费原料，造成国家巨大的损失。我个人以为不妨仿行1954年上海三十三个访销队的办法，到农村和矿区向广大消费者以贱价推销。兹把这个办法介绍于下。

（三）矛盾的解决方法（四续）——组织访销队，下乡推销。

在全国展开农产品收购工作的时候，上海国营商业部分组织了百货、棉布、医药、化工、交通电器、五金等三十三个访销队，携带样品、样本、说明书、幻灯等宣传资料，到农村和矿区，用典型调查、商品巡回展览、消费者座谈会、个别访问等方式，向广大消费者介绍上海出产的工业品，做了三千多万元的生意。

十五个以访问农村为主的百货访问推销队，是其中的一支主力。从1954年10月间出发，二个多月光景，他们的足迹，北至黑龙江，西至乌鲁木齐，南至云南，遍及全国半数以上的省市。他们一边宣传推销，指导消费；一边具体了解农民的消费习惯和需要，虚心倾听农民对上海工业品的批评和意见。

过去上海有不少工业品行销全国，可是上海国营商业部门，并不完全了解广大农村消费者的需要和习惯。这次百货访问推销队下乡后，看到了一幅新的图景，在互助合作运动大大发展之后，农民购买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消费习惯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浙江省舟山群岛上的礁潭乡，解放前没有一个农民用热水

瓶，现在90%的农户有了热水瓶。但竹壳热水瓶瓶胆不结实，常炸裂。沒有提手，农民上山下田，携带很不方便。因此我们不但要了解农民的消费习惯，也要晓得供销规律。

舟山群岛农民解放前穿卫生衫的人只有20%，都是地主富农，现在上升到了60%。这个群岛以出海捕鱼著名。第一第四季度棉毛衫裤、卫生衫裤销路特别大，商店生意特别好。农民们在寒冷天气出海捕鱼穿上这种棉织品，非常暖和，但须注意，农民欢迎的是开襟的棉毛衫裤，取其灵便，不惯用“不开襟的”，这也是一种供销规律。所以要扩大商店的生意，同时又要供应农民的需要，不能不注意于农民的消费习惯与当地的供销规律。这是国营商业提高工作质量，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代销店经销店增加生意的重要关键。

百货访问推销队，因为要听取农民们对上海工业品的批评和意见，特在各地召开农民座谈会，并访问个别农民。农民们对下面这些工业品的批评和意见最多：

（1）卫生衫裤、衫子都不开襟，袖筒和裤脚都是罗口，腰身和腋下太窄，农民都感到穿脱麻烦。农民下水田、上高山均须把裤脚卷起，倘裤脚太小，又是罗口，无法卷起，很不适用，不愿购买。

（2）北方许多地方的农民都有蹲在地上吃饭，谈天，休息的习惯。裤子的裤裆和裤脚太小，裤脚又是罗口，一蹲下裤裆就绷破了。因此西洋式的衫裤，到了中国，非结合中国当地实际情况改变一下不可。

（3）球胶鞋，鞋头和鞋底太窄，尤其是双钱牌和力士牌球胶鞋。一位河南省的农民在座谈会上当场伸出一只穿着球胶鞋的脚让队员们看，球胶鞋穿上还不久，鞋头布面已破裂。这位农民说：“俺庄稼汉天天上山下地，脚板特别宽，工厂应该考虑农村中实际情况，多给俺庄稼汉做些大号鞋，鞋头鞋底一定要宽些。”

（4）雪青色的袜子在延安成了畅销品，因为它的颜色跟陕

北黄土高原的色彩相调和。

（5）西北是“五月小，六月大”，原因是五月是麦收季节，既不闲，钱也不多，六月麦子上场，农民有钱有闲空，就要到市场去买东西，故批发站一定要及时进货，不必太早，亦不要太晚。

（6）江西省全年雨季多，橡胶鞋有畅销的市场。

中国百货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接到报告之后，首先把现存的西式卫生衫大部分改为全开襟的卫生衫，很受农民欢迎。

这次百货访问推销队在各地所举行的商品巡回展览，引起了广大农村消费者的兴趣，也说明了过去还有不少工业品沒有和农民见面。黑龙江省尙志县人民政府工商科的一位同志参观商品展览会后写道：“我县很少看到这些商品，说明我们国家很多工业品还沒有直接跟广大农村消费者见面，希望你们向上级百货批发站提意见，根据我县百货公司和农民们提出的品种、规格，签订合同，让我县充分进货，促使工业品能及时销到农村中去。”

提供些意见：

今日国内的经济学者，盛谈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这是值得重视的事。但我以为于研究经济规律之外还须研究供销规律；例如在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按劳分配是经济规律；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调整之后，生产率不断地提高，这也是一种经济规律。这种经济规律是普遍的眞理，不因国别而有所不同。但我们的工作，不能至此而止，还须进一步把普遍的经济规律和国内当地的实际情形相结合，就是必须使普遍存在着的经济规律和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供销规律相结合，方能作为领导群众工作的指针。只研究经济规律，而不研究供销规律，其错误与只讲理论、不结合实际之错误相等，因此，我在此提供些意见，幸高明有以教之。

倘我们能注意当地的消费规律，则第三方面的主要矛盾（需要的东西生产不足，不需要的东西又生产过剩；有的地区积压，

有的地区脱销）也可以解决大半矣。适合农民需要的，尽量生产；不适合农民需要的，不要生产。这样就能适应当地供销规律的要求。

第四方面的矛盾——有利可图和无利可得之间的矛盾

（一）矛盾——有利可图和无利可得之间的矛盾。上海一般大型厂反映："有利可图，无利可得"；一般中小型工业反映今年（1954年）是："无利可得，也无利可图"。其中有的是牵涉劳资关系，如年奖、福利以及不急需的安全卫生设备费用的支出（所谓业务计划和财务计划的不能配合）；有的是牵涉到公私关系方面，如税收负担和公债任务等，一致认为交了税款，提了公积金及职工奖金以后，流动资金枯竭了，再沒有钱发付股息红利。三马分了，一马沒有着落。

（二）实际的情况

关于流动资金枯竭问题，据上海工商业中人的分析，有以下几项原因：

（1）工商界有的反映，一般的税局在计算所得税时与工商业的盈余有一定的距离，如企业的超额奖、超劳保的职工福利等支出，税局在计算所得税时，有时予以剔除。所以按所得税来看，盈余大，而实际余额不大；

（2）资金合理使用问题。生产计划与财务计划制订上有问题，如有些设备可以缓办的，由于劳方要求举办也办了；

（3）在加工订货方面，私商经营管理不善，不能按质、按量、按时交货，次货积压，有的工厂次货率竟达100%，造成资金积压；

（4）上海1954年共认购公债一亿二千六百万元，以今天的现金变为将来的现金；

（5）私营工业加工订货任务不足，有的工厂长期陷于半停工状态，而企业的开支不能减少；

（6）国家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的计划性不够，有的中途改换任务，致形成积压；

（7）1954年分掉了一些股息和红利，估计这一部分很小；

（8）上海也无例外地有些工商业抽逃资金。

政府与私营工厂的争论，一部分集中在费用列支问题上（包括工资、福利费、奖金的列支问题）。由于各地各行各业开支都沒有一定标准，在公家很难作出统一规定。目前情况是一地一个样，一行一个样，甚至一戶一个样，而且五反后，有些私营工商业有随便扩大开支的情况，费用大小不一致，更使工资、福利和奖金的高低多少，大相悬殊，很不合理。即在总路线提出后，有些工商业仍有故意扩大开支的。税务机关为了保护国家税收，在计算所得税时就不得不加以控制。(控制是应该的，但有的剔除过严也是有的。)例如：

在工资方面，大小悬殊很大。最高的每人每月有几千元（进出口业中的现象），最低的只拿几十元；广州有一进出口商，自五反后调整工资达十三次之多，职工工资增加到420%，资方增加到825%；某地一工厂股东二十一人都担任经理、副经理，工资非常高；另有一厂夫妇两人，丈夫任厂中工程师，月薪一千八百折实单位，妻担任经理，月薪六百元。

在奖金方面，奖金名目有十九种，其中生产奖金很大。有的厂为了多得奖金，有意地把生产定额降低，形成变相分红。根据1953年3月上海二十七家企业的调查，其中奖金的情况如下：所发奖金等于工资10%—20%的有七家，21%—30%的有三家，31%—40%的一家，41%—50%的四家，51%—60%的二家，61%—70%的三家，71%—80%的一家，81%—90%的二家，90%—100%的一家，150%、174%、694%的各一家。

在福利费方面，根据天津调查，福利费有三十六种之多。简单举例，有一工厂除了年终双薪生产奖金之外，尚有福利费十三种之多。有一厂每年支出福利奖金二十四万元，另外每人还有三

百九十六元伙食津贴。还有一厂单发工作服、制服一项，一年中发布的四套，防雨布的一套，呢的一套，还有皮猴一件。

以上这些不合理的开支，不仅对国家税收有影响，而且对企业经营和工资改革都无好处，对公私企业职工间的团结有影响，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不利。有人认为其中不免有用增加工资、奖金、福利等手段来腐蚀工人，甚至来收买工人与政府对抗。无论如何，以上这些不合理的开支，在计算所得税时，是应该剔除的。

（三）矛盾的解决方法

这问题很复杂，一下子解决不了，1954年汇算清交采取的办法是：（一）一般仍按1953年汇算时的标准开支；（二）如在1954年工资已有变动，其变动经过劳动部门批准的可以列支；（三）工资有变动而未经劳动部门批准，但未超过同业一般水平的，也可列支。但这些办法尚不可能解决目前工资、奖金、福利不合理的问题。这问题只能随着企业的工资改革逐步设法解决，一下子解决是不可能的。上海的工资改革问题闻目前还不能提，实际上应不应提，民建会与工商联可以考虑，因这也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内部问题之一。广州市也是高工资的城市，已经改革，做得很好，上海亦可仿行。

以上是关于工资、奖金、福利问题不彻底的解决。

（二）实际的情况（一续）

现在来谈一谈如何解决第四方面其余各种不同的矛盾。有盈余工厂的盈余分配，目前呈现下列三种情况：

（1）有利可图，有利可得；

（2）暂时无利可图，也无利可得；（就是第三方面各种不同的矛盾，详第三节）

（3）有利可得，但分不到现金。

兹分别讨论之。

（1）有利可图，有利可得——1954年九百零四户公私合营

企业中，经过调查了解，七百一十六戶有盈余，其中半数以上利润超过30%，八十五戶超过100%，十七戶超过200%，股息红利最高的分到四分五厘。利润高的原因：职工生产积极性提高了，成本降低了；受到国家的照顾，原料按调拨价格收进，产品按市价出售。今后处理的意见是：利润太高者，应多提公积金，因受国家照顾而获得超额利润者，超额利润似应归公；一般的按四马分肥的原则分配。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按："有利可图，有利可得——1954年九百零四户公私合营企业中……" 据我们了解，1954年的合营企业是九百零五户。只是盈余分析中调查了九百零四户。）

（2）暂时无利可图，也无利可得。他们只能维持现状，或在很苦的水平上维持现状。属于这一类者，只有七、八种工业（决不是一切行业）。例如：(一)机械工业和电机工业；(二）制药工业中之针剂、片剂、以及医疗器材工业，发展太快，生产过剩，任务不足；(三）针织工业，几年来也有发展，今年在原料供应上有困难；(四）解放以来就有困难的工业，如面粉、榨油和罐头工业，在抗美援朝时罐头工业有过一定的任务，战事停止后，供过于求了；(五）制革工业和皮件工业，如生产皮球、皮鞋、皮箱等工厂有原料供应不足的困难；(六）金笔铅笔文化工业及印刷工业，它们在解放时戶数不多，因生意好，盲目地大量增加，才有产、销不平衡的现象；(七）缝纫工业，因受布票限制，成衣销路减少而受影响；(八)木材加工业，主要在东北及其他大城市中有困难，原因是木材在产地加工，在国营建筑部门中自行加工，因而减少在私营工业中的加工数量。这八种工业目前只能维持现状。（详第三方面各种不同的矛盾）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按："暂时无利可图，也无利可得" 这段文章所指的是有些行业，暂时有困难。但从盈余分配上来看，据大型工业利润分配情况来看，这些行业1950—1955年资本家拿了这许多钱：

业　别	资方所得	其中股息红利
机器制造（包括电机）	19,721千元	7,948千元
纺织工业	60,125千元	39,244千元
其中：棉纺	20,269千元	14,789千元
棉织	12,332千元	6.705千元
印染	12,832千元	8,182千元
针织品	6,141千元	3,845千元
食品工业	22,414千元	12,582千元
其中：磨粉	3,870千元	2,369千元
食用油脂	2,361千元	1,490千元
烟草制造	3,690千元	2,404千元
制　革	1,358千元	448千元
缝纫工业	1,324千元	769千元
木材加工	4,475千元	2,561千元）

（3）企业有盈余，但分不到现金。这就是工商业所提出的“有利可图，无利可得”的矛盾。分不到现金的原因，就是前面所述的所得税估缴过高，安全设备上化得太多等八项，尤其重要者为八项中的前四项。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按：“企业有盈余，但分不到现金”这一段里说，无利可得是由于198页的八项。但这八项是说企业“流动资金枯竭”，其中最后二项是说“分掉了一些股息和红利”（七项），“有些工商业抽逃资金”（八项）。这里还说明了工商界还分到了一些。至于所得税是否高的问题，前已提供了参考资料。公债问题，我们历来对私营工商业认购公债的政策是，企业盈余分配之后，资本家拿一部分股息红利来认购公债，资本家在认购公债后，应给予一部分现金，掌握的原则，大体是各半左右，其余部分，由企业以剩余资金来购买。事实上1955年以前企业认购的公债占了绝大比重，以股息、红利来购公债的并不多，1956年以定息购买公债的比重是增加了。）

（三）矛盾的解决方法（一续）

（一）如所得税估征过高，查帐征收的（不是民主评定的），在汇算清交时可以退还。但不应列支的费用，当然不能列支；（二）对于增加固定资产（如设备），有关方面应照顾到资方可能的程度。有些企业，一面分红，一面动员投资，股东拿不到钱。这样作法很不合理，应按四马分肥的原则分配股息红利；资方应得部分，由其自由处置，投资须根据自愿的原则；（三）买公债，应根

据资方实际的可能，不能勉强；(四）资方应改善经营管理，应按质交货；同时应照四马分肥的原则，资方分得的部分，应该有现金，也应该有公债。

第五方面的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之间的矛盾

第五方面的矛盾第一点——表现在批发商方面，目前一般情况是：留不下来，转不出去，包不下来。

第五方面的矛盾第二点——表现在零售商方面：一般人事臃肿，戶数过剩，营业差，利润小，收入少，开支大，收支不能平衡，有人说：(指代销，经销、批销)“这是‘社会主义经营，资本主义开支’”。

以上两个问题的讨论，移至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章，本章专讨论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故不赘。

第五方面的矛盾第三点：

（一）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之间的矛盾：

表现在中小工业方面。中小工业一般是设备差，开支大，技术低，资金少，分散落后，今年任务不足，有的沒有任务，改造有困难，维持也有困难。

（二）实际的情况

北京中小工业的产值占全市私营工业的60%，戶数占全市三分之一左右，但大部分与国营无加工订货关系，未能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它们的设备较简陋，技术落后，希望政府把它们组织起来，进行加工订货。派员驻厂监督指挥，一方面可以对企业进行监督，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另一方面可使干部了解企业情况，为培养公股代表进行幷厂合营创造条件。如皮革针织皮毛业组织起来，对原料、销路、提高技术方面都有好处，国家幷可更多地控制成品。目前不可能一下子把中小工厂全部纳入公私合

营，要先巩固加工订货工作。在中小工厂的工人中不要太强调公私合营的优越性，要多强调企业为加工订货而生产亦是为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其在改善经营管理方面，在按时按量按质交货方面有一定成绩的，应用吃葡萄的办法（中、小工厂合营的意思）把它们纳入公私合营中。对生产任务减得很多的企业，希望能同意解雇一部分，对沒有生产任务而实在难以维持的，应同意其歇业，给以安排。

依照以上的建议，私私合并是必需的第一着步骤，就是把未合营的工厂，按其生产类同，或连续性生产的情况进行合并。这样，有三个好处:(一）增加生产,(二）人力物力集中,(三）减少干部。譬如广州制药厂过去原料依靠进口，规模很小，技术人材缺乏；联起来后，人力集中，有些可采用本国原料生产。私私合并困难是多的，但对生产有利，并能为公私合营创造条件。大城市如上海、天津、沈阳等中、小企业很多，如何造成条件合营，是个问题。必要经过联营并厂才能走到合营，或由公私合营的工厂用以大带小的办法，逐步吸收，例如南通大生纱厂带一个嘉定的小厂，就是一个好例子。政府要有领导地帮助中小企业创造合营的条件。对中、小企业可分别情况进行排队，譬如以供产销平衡的为第一类，原料供应不足，但产销不成问题的为第二类，供产销不好的为第三类。这样根据情况加以排队，分别缓急先后进行合营。但要把所有好好坏坏一起包下来，是不合理的。其条件实在太差者，必须淘汰。

又如上海私营机器业有一千五百多户，产品复杂,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经营管理不善，一方面生产脱节，另一方面潜力很大。目前生产上困难很多，不少厂欠税欠工资，甚至有的伙食也开不出来。但一般机器厂资方及工人都有技术，如加以掌握利用，可以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一些作用。关于这些中小机器厂的前途，机器业中有人提出八点建议：

（1）并入其他大厂，作为修配间，或保全部；

（2）上海本埠公私合营厂可吸收一些需要的中小厂；

（3）外埠国营厂需要的，可以迁厂合并；

（4）生产品种相似或者可以协作的厂，地区也相近，可先联营，再逐步走向公私合营；

（5）连机器带上工人，有技术的资方可以参加国营企业厂矿基本建设工作；

（6）五个工人以下小厂，如资方参加劳动的，可参加生产合作社；

（7）有条件的工厂，可在政府领导下，试制新产品，从改进生产上解决其困难；

（8）十分困难，无法维持，又无法用以上办法解决的，应允许停业，工人及资方按需要由政府分配工作。

上海工业有二万多戶，而十人以上的工厂有一万多戶，说明大多数是中小厂，如棉纱工厂，大厂大都已合营，留下二三千锭子的纱厂应考虑如何并厂。这些中小工厂问题很多，成本高，品质差，调整工缴后，大厂可能有盈余，中小厂难维持，故如何推动中小厂进行合并的问题很重要。但也有人说理应合并，不过合并后，可能发生人事安排的困难，和机构臃肿的问题。此外还有设法迁厂。有些地方有原料有销路的，如果要设厂，是否可以联系其他地方推动迁厂。

有人说：有的私营工业任务不足，而国营还在修建新厂，致有人认为“限制有余，利用不足”。如上海有一家植物油厂，它的生产能力可打一千五百吨棉籽，但经常只有二、三百吨的任务，天津有一厂已很困难，资方和工人到河边做搬运工作，每天工资五角，然而石家庄、郑州、新疆都在建厂，如把天津的厂搬去，就可解决工人的困难。漆布工业也是如此，上海已停工，广州开半班，但西南都在建厂，说大有前途。

（三）矛盾的解决方法

利用、控制和管理现有工业，并减少新建或扩建（譬如原拟

五年计划增加二百七十万纱锭，可减少一些)。国营工业，地方工业，公私合营，合作社工业和私营工业都须管理，把这个责任交给中央各部。但虽然这样做，一部分工厂，仍会被淘汰，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是不可设想的，必须加以改组，有的小并大（这就是大厂带小厂以减少小单位，这对降低成本，合理管理和提高品质等方面均有好处)，有的要搬家，有的要淘汰。政府要奖励先进，照顾落后，但落后的必须努力提高，不能长期照顾。此外有先行私私合并，如对连续性生产的中小型工厂和对生产类同的工厂先进行私私合并，先创造些例子，再逐步推广，以后再看情况准备合营。有的已失掉作用的，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吸收其从业人员，淘汰其企业。

但迁厂合营和私私合并，必须根据主观客观条件量力而行，如果不从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出发，而只强调一个地区的有无，则必然使计划冒进，不能实现。如安徽原拟从上海迁去合营的两户热水瓶厂，虽已列入计划，因客观条件缺乏（安徽无煤气设备，热水瓶即不能生产)，迄未实现，应引为教训。又如上海1954年合营的金笔厂，即因挂钩不牢，合营后生产任务不足，今后应力求防止。

第六方面的矛盾——在计划与步骤方面的矛盾

第六方面的矛盾（在计划与步骤方面的矛盾）第一点：

（一）矛盾——有人主张慢慢过渡，不要太快，但碰到具体困难的业户，要求快快改造，或者急切希望干脆批准歇业，不要拖。一般有条件走上公私合营的户，都要求快快公私合营，主要是为了解决困难，放下包袱。

（二）实际的情况

很多人反映私营工厂的生产关系不改变，要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很困难。所以希望放宽公私合营、国家资本主义的面。国营企业参加同业公会，若仅停留在介绍国营先进经验是不够

的，应推动整个行业的改造工作，把整个中小工厂组织起来，使其发挥生产能力，充分利用原有设备。现在中小工厂要求公私合营的情绪很急躁，但又不可能一下子全合营。其申请公私合营而沒有批准的企业，看到其他企业批准，而使自己企业又受到影响时，渐由急躁情绪转变为埋怨政府。1954年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企业有905家，生产一般提高，经营管理得到改善，劳资问题已不复存在，这是由于社会主义成分在企业內部居于领导地位，工人劳动态度改变，积极性提高了。至于低级形式的加工订货，也很重要，也可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但社会主义成分在企业外面，对企业与人的改造，不能象合营这样做得彻底，因此私营工厂的合营要求是对的。有些私营工厂，积极爭取合营，合营后积极工作，政府很欢迎这些人起桥梁带头作用。但也有态度不正确的：有的存着“丢包袱”的思想，急于要求合营，但自己又不积极创造条件，因此不可能一下子把他们都纳入合营。有的竟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消极怠工、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用经济主义腐蚀职工，大部分摇摆不定。

推动整个行业的改造，把分散落后的整个行业组织起来，充分利用原有设备，以发挥生产潜力。民建与工商联，于工商业有困难时，固愿意帮助解决，但对违法，不能同情，二者不能混淆。对违法分子，必须进行批评。天津现有一半批发商还未转业，看到国家要包下来，有的乘机抽资、有的躺倒，这种情况应向政府反映。对这些坏分子一定要进行批判，而进行批判不是打击，正是为了爱护。缺点继续存在，批评必须继续进行，因为不爱国守法，要做社会主义公民，在条件上就有困难。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主要內容为爱国守法，一面要鼓励，一面要揭发、批评，以提高认识，明确困难不是政府的错误所造成的。工商界的学习应加强，面应放宽，如浦东有六千八百多戶工商戶，参加共同纲领学习的只有四百多人，学习总路线的只有一百多人，许多不学习的人，连什么是总路线还不知道。

（三）矛盾的解决方法

对进步的私营工厂与中间的私营工厂，固须团结、教育、改造与使用，对落后的亦不能放弃，应争取改造他们，加以使用；对破坏者则应提高警惕，必要时依法予以处理。

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最后是要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民。目前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要以爱国守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接受社会主义成分的领导为基础。

第六方面的矛盾（在计划与步骤方面的矛盾）第二点：

（一）矛盾——有人认为对工业应该先吃苹果，也有人认为应该先吃葡萄，不然葡萄就会烂了，对商业应该逐行逐业改造，不应该逐戶逐店拣好的吃。北京有几家商业合营后，同业很有意见，如北京同仁堂合营后，南京同仁堂的营业额也被带动提高。

（二）实际的情况

过去公私合营的原则是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与资本家的自愿。有的地区做得好，有的地区有缺点，沒有事先排排队，协商酝酿。今后政府希望工商联与民建会多协助政府进行调查研究联系沟通的工作，充分协商后再合营。

1954年的合营采取“摘苹果”的方式，不采取“吃葡萄”的方式，意思就是大企业一个一个的合营，这样做影响了中小企业的业务，中小企业很有意见。北京市由于瑞蚨祥、稻香春、同仁堂的被批准公私合营，三业的同业俱遭受很大的影响。如北京的同仁堂被批准合营，南京的同仁堂的生意（非合营性质的）也好起来了。其余药铺的生意受了影响。北京市有许多机关、团体、企业原与各私营国药店订立医药供应合同，但自国营医药公司向国药业同业公会索取已与该业订立供应合同的机关、团体和企业的名单，然后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拉走，使他们与私营解除合同，以致造成公营药店拥挤不堪，需领牌子排队，而私营药店门前可罗雀，发生困难不能维持。同时公营店少，病者也不便。

这几年来，广大群众的觉悟提高，同样的价格，同样的货物，

都愿到国营去买，以支持总路线。现在政府照顾到全面，采取了措施，但消费者仍不一定会上门，所以有必要对私营国药业的改造采取“串葡萄”方式的公私合营办法，在全市分区分段的排排队，先择条件较好的药店公私合营，而后再进一步吸收附近的同业参加合营。国药店的性质属于半工半商，一般都有些秘方和宝方，情况特殊，不能仿一般商业“经销”“代销”的办法来吸收。公私合营，于私很方便，于公亦有利。

（三）矛盾的解决方法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原则——就是工商业的改造，应采取逐行逐业的方式，不采逐店逐戶的方式。根据这个原则，我们要通盘打算，合营大的，照顾中小。中小之中，有的合营；有的以大带小；有的先行私私合并，先创造些例子，逐步推广，再看情况准备合营。

总　结

既要有所不同，又要在一些方面一视同仁。

以上我们讨论工商界人士提出的六个方面的矛盾，我们也提供了解决这些矛盾的各种方法。这些方法，看起来，是个别的，分散的，但在他们之上笼罩了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既要有所不同，又要在一些方面一视同仁”。让我来说明一番。

以上海来说，私营工业绝大部分已走上各种中级形式。这种中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由于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在企业外部已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加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地位，限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作用，但企业仍为资本家所有，企业生产仍由资本家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仍是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因此公私间的矛盾，劳资间的矛盾，仍不能获得解决，而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的个人改造仍受了限制，非把业企由中级形式发展为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不可。但工商界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问题，认为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不一定要经过公私合营，认为加工订货，已纳入国家计划轨道。这种思想的根源是在（一）从私有观念出发，（二）认为加工订货一切都不比合营差，是很不正确的，因为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是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不在外部）进行合作，是社会主义成分居于领导地位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这就便于按照社会主义的经营方针和管理原则来改造原有企业，也便于对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来进行个人改造。因此由中级形式的在企业外部的公私合作，通过高级形式的在企业内部的公私合作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对资方来说是一条光明大道，不能不走，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例如1954年合营者有905家，生产一般提高，一般发动了职工群众，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和产品质量，并在工作中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了团结、教育和改造。其次对原有的企业进行了整顿工作，树立和加强了社会主义成分的领导，并对公私关系进行了适当处理，使私股的合法权益获得了适当的保证。

因此在合营企业中，公方居于领导地位，私方接受公方的领导，是确定不移的原则，而这个原则的正确性已由事实证明。我们要首先明确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私方主动接受领导，就是主动接受改造。私方代表中在经营思想上还存在着许多陈旧观点，而公方代表则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导企业的经营管理，要把一向依照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经营的旧企业，逐步改造为依照社会主义经营方式经营的新企业。在改造进程中，公私双方基于立场观点的不同，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而这些不同的意见，可以在合营企业的董事会中反映出来。董事来自公私两个不同的方面，代表着公私两种不同的利益；要解决这两种不同利益的矛盾，应该采取“协商”的方式。但“协商”不是无原则的讨价还价，而是有领导有标准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国家的政策，而政策是基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要求合于国家政策的是对的，不合于国家政策的是错误的。公股代表的职责是正确地掌握国家的

政策，私股代表就必须正确地体会国家的政策。是非取决于政策，协商自能得到圆满的结果。

或者对于公私两种不同的利益，尚缺乏正确的认识。合营企业是在国营经济直接领导之下经营的，所以所谓两种不同的利益，不是平分秋色，等量齐观，乃是以全民利益为主，个人私益不能破坏全民利益，这是一个合理的社会主义铁则，因此二者之间“要有所不同”。到了社会主义，也承认个人利益；但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民的个人利益是基于“各尽其能，按劳取酬”的原则的，与全民利益相配合的，而今日私人资本家的个人利益，是从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而来的，与剩余价值的剝削分不开的。因此这两种个人利益，名同而实质不同。明乎此理，合营企业的私方，不致先后倒置，轻重不分。要晓得“由于我国经济现在还很落后，社会主义工商业还不能很快地代替现有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所以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它们的积极性，借以增加工业产品的供应”。因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暂时容许剩余价值的剝削，允许私方从企业盈余中分得一定的在限制范围以內的利润。而且在全民所有制未完全代替资本家所有制之前，这些利润是“依法保护”的。他们有困难，国家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任务不足，国营企业可以让出一部分，分给他们。今后要把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私营都划归一个主管机关管理，以便通盘筹划。工商业的改造，采逐行逐业的方式，不采逐店逐戶的方式。凡此，就是“在一些方面一视同仁”。因此，对资本家来说，是一条光明的道路。在企业改造的过程中，同时也进行个人的改造；接受公方代表的领导，就是接受改造，这就是“有所不同”的眞意义。企业改造与个人改造一定要结合在一起，以便最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

自1954年下半年以来，公私合营的资本家抗拒改造的手段，日益趋向于隐蔽和合法，这种斗爭，将随着改造事业的日益开展而更加尖锐复杂。在合营过程中的斗爭焦点，主要集中在领导权

和财产权两个方面。但无论如何，"社会主义成分居于领导地位"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

如果资本家不接受公方代表的领导而公方代表对资本家亦表示迁就，结果一定不能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而反促进了资产阶级又用糖衣炮弹对人民疯狂地进攻，或竟对革命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投降，他们也会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时代里又复为非作歹，实行行贿，实行偷税漏税，实行盗窃国家资财，实行偷工减料，实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了。他们会使中国不走向社会主义而走向资本主义，实际上是要回到殖民地与半殖民地。

因此，公方在企业中居于领导地位，这是坚定不移的原则；这是"有所不同"的眞正意义，但原则大家会讲，等到接触到实际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关于利润问题的时候，却会产生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因为在合营企业的內部有两种不同的经济成分，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利益，国家资本所代表的全民利益和私人资本所代表的私人利益。代表全民利益的"公"与代表私人利益的"私"是有差异的，故二者之间不可能沒有矛盾，有矛盾就有斗爭，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产生不同的斗爭，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同时也不断地减少和统一。关键在于相互了解和协商——而协商不是无原则的讨价还价，而是有领导有标准的。矛盾虽不能根本解决，但得到适当的，合理的安排和处理，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不少合营企业中，也已用事实证明其可能了。

但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并不等于说"合营企业搞得好不好，是完全决定于公方代表个人能力的强弱"(如上海有好多人在"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的学习中所提到的)。这样看法是不全面的。当然公方代表个人能力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工作的推进，但我们不能就此而得出结论说：公方代表个人能力强弱是决定合营企业能否搞好的唯一因素，因为这里不是单纯的一个个人能力问题。在广大私营工商业者中间，能力强的不乏其人，但为什么他们所经营的企业，终究不如合营企业呢？理

由很简单，因为推动企业生产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企业生产关系的改变，而不完全是哪个个人的能力强弱问题。因此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改变生产关系。

以上不全面不很正确的看法，还表现在忽略了私方代表在合营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企业合营后，我们对私方的要求更高。对私方来说，合营不是万事大吉，不是私方责任可以减轻，一切都可以推在公方代表身上，恰恰相反，私方应当更积极地负起责任，主动地接受改造。况“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第十一条明白规定公私双方代表在企业行政职务上，都应当“有职有权，守职尽责”,决不能把合营企业搞得好不好的因素归结到公方代表个人的能力问题上去了。

从过去经验中得来的教训八则：

（一）任何经济成分的工业，无论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和私营，在发展中，一定要加以管理。(过去我们只看到发展的一面，沒有想到发展后结果的一面，才造成困难。)（第一方面）

（二）以后的管理机关，不按经济成分来分，应按行业性质来分，一个部或一个局要把全行业的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和私营一起管理起来，作为全面安排，逐步做到有一个统一的平衡的计划。(第一方面)

政府现在就要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领导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和私营的机械、电机工业。这些工业数量很大，对国家建设有很大作用，但尙无统一领导机构，以致其发展和改造都发生了一些偏向。根据统计，全国大型私营机械、电机工业共有三千八百七十多戶，生产潜力有，设备和经营管理落后，所以要求社会主义改造（改变生产关系）和技术改造(发展生产力)甚为迫切。

（三）公私合营企业的改造和资方个人的改造，一定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第二方面)

（四）从地区方面看，地区不能单独解决供、产、销的平衡问题，必须要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来安排。（第三方面）（这与以上第二则相同）

（五）为发展生产，并为满足人民的需要，一定要调查研究国内各地的消费习惯和供销规律。（第三方面）

（六）中级形式的加工订货，也可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但必须依据下列二个具体条件：（1）私营全部原料或绝大部分原料要由国家掌握，（2）私营全部产品或绝大部分产品要由国家统销。（第一方面）（此可归纳或包含在第二则之内）

（七）经验证明，在中级形式的加工订货中，社会主义成分在企业外面，对企业和人的改造，不能象合营这样做得彻底。（第六方面）

（八）工商业的改造，应采取逐行逐业的方式，不应采取逐店逐戶的方式（第六方面）

（原载一九五七年第三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

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计划是建筑在按比例发展规律之上的（同时也利用价值规律），依据按比例发展规律并且可以作出一个全面的综合平衡工作。虽然在过渡时期因计划经验不足，调查不够深入，研究不够深刻，所作的平衡工作未必是全面的。但那是暂时的现象，日后经验积累一多，这些缺点不难逐步纠正。

我这篇文章是企图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由于计划经济包括了许多部门和许多环节，我研究的方法，是挑选几个主要环节，而后再一个接着一个地全面地综合地说清楚各个环节间的平衡关系，以物价政策开始，最后仍以物价政策终结。换句话说，我是用团团转的方法来说明全部平衡理论的。

一　稳定物价和物价政策

首先，计划经济一定要建筑在稳定的物价基础之上；沒有稳定的物价，综合平衡无从着手。我们还要利用价值规律来进行经济核算，不可想象我们可以不用各种产品的客观价格来进行核算，也决不能用不切实际的核算来编制经济计划。因此我首先要谈一谈恢复时期的稳定工作和现在的物价政策。

解放初期，我国经过十二年的战争和长期的通货膨胀，人民日夜面临着物价波动的痛苦，不但人民生活不能安定，就是生产也无法恢复和发展。要发展生产，首先必须使各种动荡不定的物价在当时水平上稳定下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作某些必

要的调整。1950年3月物价开始趋于稳定。1952年以后，经济基本上恢复了，物价就稳定下来了。这个稳定为今日的计划经济（全面安排）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但要发展生产，必须首先发展农业，尤其必须合理地调整粮食、棉花、烤烟、甘蔗等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因为这些农产品的商品量大约占农产品商品总量二百亿元左右的70%。如果这些农产品的价格规定得适当，就容易刺激农民发展农业生产。

在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相互间的比价基本上适当地规定之后，再把工农产品比价的差额逐步缩小。以1955年二十四个省区一百一十八个县城以下市场一百零七种产品的材料计算，工农产品比价的差额同1950年比较，缩小了17.25%。同时为反对私商的囤积居奇，逐步缩小了以至最后完全取消了季节差价，而这个差价是在全年最高价格或者接近全年最高价格的基础上取消的，这就在实际上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这就是说，农民除从土地改革、高利贷剥削的消灭，私商的少尺、短秤、掺假、掺杂等等的取消，获得许多利益之外，还从缩小工农产品比价的差价上、取消季节差价上获得不少利益。

我们不但在农业方面采取了上述措施，同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也缩小了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限制资本主义商业过多的不适当的利润，使批发商不能进行远地经营，大零售商不能过多地取得利润。结果，一方面全国物价更趋于稳定了，另方面也促使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就为实行计划经济铺平道路。

现在，我国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大中型的工业建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生产和流通增加了，交通和运输迅速发展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到来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在这种新的情况下，若干原来合理的价格和各种差价，现在不能适应实际情况的要求了。举生猪的收购价格为例：解放以来，猪价是逐年提高的，猪

和粮食的比价一般高于战前10%左右。但在粮食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过去个体农民养猪，是利用半劳动力和空闲时间，利用剩余食品等作部分饲料的，那时米糠价钱也低，农民养猪是有利的。但是农业合作化以后，养猪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不论合作社养猪，或者农民自己养猪，人工和饲料都比较严格地计算成本，米糠价钱也涨了，社员养猪也要同参加集体劳动按劳取酬的条件作比较，这样原来合理的收购价格变为不合理了。此外部分地区的花生、芝麻、茶叶和蚕茧的收购价格也有偏低的情况，目前这些产品的产量许多许多沒有达到战前的水平。至于桐油、菜油的收购价格同粮食价格比较，仍然低于战前的水平；油菜籽的收购价格，虽然大体上相当于战前同粮食的比价，但是几年来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得更多，而菜籽的单位面积产量除个别地区以外，不但沒有提高反而低于战前，农民种菜籽不如种粮棉有利。这不仅影响了经济作物的生产，而且影响了出口贸易和外汇，也间接地影响外国生产资料的进口和国內工业建设的发展。因此这些产品的收购价格同猪一样非提高不可。但我们觉得满意的是七年来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是正确的，需要调整的只是一部分。

在地区差价方面，虽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作了一些调整（缩小），但在新的情况下，这些调整，显得不够合理。有些地区如西南、西北，由于交通不便，各项资源不能充分加以利用。据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同志在“八大”发言，四川省边远山区农、畜产品的价格是愈远愈偏低，工业品的价格是愈远愈偏高，影响着山区和兄弟民族地区人民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现在铁路修通了，条件改变了，过去的地区差额仍然显得不合理，因而从边区运输出来的某些产品，国家要给以运输费的补贴。在畜牧业和渔业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形。牲畜的收购价格过低，使农民觉得养牲畜无利可图。有些群众甚至反映说：“活牛不如死牛值钱。”压等、压秤、压价的现象很严重。但为什么牲畜的价格这么

低呢？主要原因，就是收购、推销、宰杀部门的流转环节太多，费用太大。毛利虽达100%以上而纯利只达16%，税率也比较高些。因此要发展畜牧业，还必须解决牲畜的收购价格和税率问题。至于渔业，我国水产在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是1936年的一百五十万吨，至1955年已经达到二百五十万吨。过去水产部门往往偏重发展国营渔业，忽视占生产量91%以上的群众渔业；他们偏重海洋生产，忽视淡水渔业；对渔业的供销、价格和税收，也有过很多的缺点和错误。供销工作人员有单纯的赢利观点，购销计划虽不能完成，却超额完成了利润计划。一般的情况，是鱼货收购价格偏低，而渔民生产资料的供应价格却偏高。在税收方面，有些地区还保存不合理的渔税，凡此对渔民的生产积极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鱼货的收购价格也应提高，税率也应减低。

二　经济和财政的平衡

总的说来，无论是一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远道运输费的补贴，工业品销售价格的减少，税率和利润的降低，都是导致农民收入的增加（经济）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财政）。因为一方面是要国家多花钱（如提高农产品、畜产品等等的收购价格，发给远道运输费），另一方面是要国家少收钱（如降低税率、减少利润、减低若干工业品销售价格）。多花钱，少收钱，做法不同，结果则一——这就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据财政部长李先念先生的估计，每年少则减少十亿元，多则要达到二十亿元。但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亦可以促进农业畜牧业等等生产的发展。国民经济收入的增加，和财政收入的减少，其间必须有一个平衡，就是经济和财政的平衡。财政收入减少得太多，势必影响国家在工业建设上的投资；太少，亦必影响农业畜牧业等等生产的发展。

在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如何利用物价政策（价值规律）来为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虽然我们在收购粮食棉花等几种大量的农产品的时候，我们大大地缩小了它们的自由买卖的市场，从而也大大地限制了价值规律的作用；但仍然要利用价值规律来进行计划经济。我们提高了粮食、棉花、油类等等的收购价格，调整了农业品和工业品的比价关系，为的是要提高农民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发展生产，增加工业用的资料并为国家积累资金。但是，财政收入减少了，财政支出亦必相应地减少，以求得财政收支平衡。

三 财政收支平衡

财政收入减少了，财政支出也必须相应地减少。这惟有出于减少支出的一途。但问题是哪些支出可以减少。我国1956年的预算保证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提高，用在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支出，占1956年预算支出总数的64.96%，其中经济支出为一百六十亿多元，占预算支出的52.22%，比1955年经济建设支出决算数增长17.04%。社会文教事业支出为三十九亿多元，占预算支出的12.74%，同1955年比较增长18.36%。可知我国的预算以三分之二的收入用于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建设事业，为的是要保证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继续提高。因此这两项的支出是不能减少的，要减少就只能从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两项来打主意。1956年国家预算规定国防费支出为六十一亿四千一百三十九万一千元，比上年国防费决算数减少了5.52%。我国的国防费在1956年国家支出预算中所占的比重为19.98%，比1955年国防费在支出决算中所占的比重还下降了2.17%。1956年国家预算规定行政经费支出和公安、司法、检察经费支出共为二十四亿一千零九十三万五千元，只占本年预算支出的7.84%。周恩来先生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有必要和可能适当地降低国家预算中的国防和行政费用的比重。……第一个五年国防和行政的费用，约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左

右，第二个五年应该争取降低到百分之二十左右。这样，经济和文化教育支出所占的比重，就有可能由第一个五年的百分之五十六左右，提高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不过我国的领土台湾还没有解放，我们还受着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不能草率地把国防费用削减得很多。因此，一面固要节约财政开支，一面还要克勤克俭，努力建设。正如李先念先生在“八大”所说：“财政收入减少了，财政支出也必须相应地减少。根据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除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之外，别的出路是不多的。这就必然要在工业同农业、重工业同轻工业、国家建设同人民消费之间的比例上引来若干影响。国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在这一方面的钱用多了，农民的收入增加了，购买力提高了，除开供应生产资料、引导农民扩大生产之外，需要有更多的消费资料来供应农民提高了的消费需要。这样，也就不能不增加一些轻工业投资的比例，适当改变一些重工业投资的比例和其它方面支出的比例。在保证我国工业较高的发展速度的条件下，适应情况的变化，作一些必要的调整。”李先念先生在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中又说：“在1956年内，国民经济各部门增加的新工人将达到八十四万人，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提高14.5%。”全国职工的购买力也加大了，更需要使他们能够买到更多的价廉物美的东西。这就是农民的收入和职工的工资都增加了，不能不增加一些轻工业投资比例的道理。俟轻工业更加发展之后，转过头来，又会促进农业的发展。因为轻工业既能满足农民对轻工业产品的需要，当然可以及时换回农民的粮食和农业经济作物，这样就会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整个国民经济益加协调，人民生活益加改善，工农联盟益加巩固，国家积累愈益增加，最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愈益加快。

四 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平衡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1956年的国家预算用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为一百六十亿多元，占预算支出的52.22%。现在要把轻工业

投资比例提高一些，则重工业投资比例必须降低一些，这就需要一个新的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平衡。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为88.8%比11.2%，约等于八比一。现在在1956年的预算中就改为87.5%比12.5%，约等于七比一。这样一个新平衡，好象对于重工业不利，其实不然。因为轻工业的特点是投资少，建设易，获利多而且快，可以更有效地积累资金，用来更多更快地发展重工业，据纺织工业部钱之光先生在"八大"的发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纺织工业为国家积累了将近一百亿元（包括工业利润和税收），相当于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总额的38%左右。现在新建一个十万纱绽、三千五百台布机的棉纺织厂，共需投资三千五百万元。在正式投入生产以后，只要一年的时间，就可收回全部投资（包括工业、商业利润和税收）。印染、毛纺织厂等，收回的时间还要快一些。因此这个重工业和轻工业间七比一的新平衡，正如刘少奇先生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不仅不会影响重工业的建设，而且有利于重工业的发展。等到重工业发展以后，又回过头来帮助发展轻工业。因为轻工业也有不少原材料须依靠重工业供应，特别是高级染料、塑料、人造皮革、马口铁等，以及一些数量少产值小的零星原材料，如制医疗器械的合金钢、不绣钢、制钟表的弹簧钢等等。至于轻工业所需之各式各样的机器和设备有待于重工业的源源供应，是尤为显著的事。

由此观之，虽然我们的建设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虽然重工业的比重应大于轻工业的比重，但为了满足工农和国家不断增长的需要，必须同时积极发展轻工业，使轻重工业之间的距离不致相差过大，以免形成脱节。不然的话，轻工业品的生产必落后于人民购买力的增长，不仅影响工农联盟，亦且妨碍资金的积累。因此，在资金、原料足够的条件下，把轻重工业间的比重稍为改变，适当地发展轻工业（而不是盲目地、片面地发展轻工业），不仅可以适应人民购买力的增长，而且可以帮助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但是提高轻工业的比重，必须在资金和原料足够的条件下进行。因此在这里有必要谈一谈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

五 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

轻工业的原材料绝大部分来自农业，如棉、丝、蚕茧、麦子、麻、大豆、甘蔗等等，都是轻工业的原材料。以纺织工业为例：纺织工业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农业发展速度的快慢，而且原料质量的好坏，也关系到纺织品质量的高低，例如1953年是工业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加31.7%，主要的原因是1952年的农业获得丰收，给1953年的工业带来了足够的原料。又如1955年是工业增长速度最慢的一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只增加了8%，但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仍增加了17%，而消费资料的生产只增加了1%。主要原因是1953年、1954年两年的农业生产遇到歉收，1954年的棉花产量比1952年还少18.3%，这样就使得工业因农业供应的原料不够，不能够按预定速度前进。1955年棉花丰收，1956年国家预算有关纺织工业投资金额即较1955年增加了132.14%。这说明了要发展轻工业，必须先解决原料问题。如果原料充裕，国家对人民生活需要的轻工业和纺织工业，就增加投资扩大生产。由此可见，为了提高轻工业的比重，必须积极地发展农业，使工农业之间有个新平衡。

我国有不少地区的气候和土壤都适宜种植棉花。按照国家计划，我国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1967年，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按照各地情况，由1955年的三十五斤（全国平均数）分别增加到六十斤、八十斤、一百斤。因此，我们必须逐步地扩建和新建纺织工厂，以适应棉纺织工业的需要，以求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同时，有关部门还应该扩建和新建印染厂和大力培养纺织、印染和国际贸易等各方面的人材，以求配合纺织工业的发展。这样有计划的发展，将来可以年有价值一、二十亿元的纱布，向外交换我国需要进口的物资，来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岂

不大大地增加国家财富吗？

六　为什么在轻重工业间、工农业间要保持正确的平衡

综上所述，为了正确地保持工农业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工农业的共同高涨，我们必须加强对计划经济的全面领导。为此，就必须使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保持正确的比例。过去某些部门的领导者对于这一点，在道理上都有所了解，但在实际工作中却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因而常常是心中无数。有些经济部门，1955年中央提出节约的时候，曾片面地强调了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作用，而产生了右的保守主义的偏向。相反，1956年上半年，当中央提出了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之后，有些部门的领导者又曾片面地强调了各个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促进的作用，沒有注意到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发展比例，而且也沒有注意到这个比例包含着局部和整体、中央和地方、城市和乡村、近海地区和內地等一系列的复杂关系，以致在工业生产中，特别是在基本建设工作中，又产生了盲目冒进的偏向。结果上下左右四邻之间形成了人为的紧张状态，终于不得不在中途变更计划。中央各部门由此感到在生产建设事业中，为了避免时而保守时而冒进两种偏向，必须在全国范围和地方范围內都根据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来加强计划工作。

七　工农业和商业的平衡

由于轻工业的原材料大部分来自农业，所以工业品与农产品之间一定有一个交换的过程，经过交换，二者之间的矛盾就可以暴露出来。过去若干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不合理为什么沒有及时暴露出来？现在要讲清楚。

李先念先生把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归纳为三种情况：（一）主要商品的价格过去是适当的，现在看来还是适当的；（二）一部分商品的价格过去是适当的，现在不适当了；（三）少数商品

的价格，过去就是不适当的，现在还沒有调整。这些不适当的，或者已经不适当了的价格，所以沒有能够及时发现和调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一般地沒有来自其它方面的价格竞爭，使得问题不容易暴露。这是因为在实施市场管理办法以后，农产品、农副产品实际上成为由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采购，沒有其它采购单位的竞爭，而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沒有随着市场情况的变化灵活地掌握物价政策，及时地调整某些不合理的收购价格，以致直接影响到农产品、农副产品的生产，并影响到人民的消費和国家的积累。我们今日要提高收购价格，就是为此。这些缺点，在自由市场存在的条件下，是会很敏感地反映到商品流通过程中来的。

在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之后，农民的收入增加了；职工的工资增加之后，职工的收入也增加了。但仅仅增加收入还不行，还必须使他们能够买到价廉物美并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这固然要依靠轻工业比重的提高，尤其需要依靠商业工作做得好，使工农业和商业趋于协调。近几年来我们的商业工作虽在主要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和分配方面，尚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保证物价的稳定，使人民对商业部门觉得满意；但是，在一般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中，仍有某些缺点存在着。正如商业部长曾山先生所说："有部分产品的品种减少，若干产品的质量下降、质次价高；某些产品供应不及时，花色品种不对路，这里积压，那里脱销，不能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这方面，人民对我们提出了不少的意见和批评。这是商业工作中一个严重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主要原因是在过去几年中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之后，结果产生了一部分工厂不象自销时候那样关心产品在市场上的销路，因而也不热心于提高产品质量和不断提高适应人民需要的新的花色品种。另外，国营批发公司上下之间，大部分实行自上而下的派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向工厂定货的工作集中于少数批发公司，基层商店不能根

据消费者的需要，直接向工厂进货，批发公司不了解人民的实际需要，向工厂所定货物的品种规格减少了。这样，发到各地的商品的品种和数量，就难免发生一些不合当地需要的情况，因而造成这里积压、那里脱销的现象。这样一来，原来多色多种的花色品种，由于加工包销而简单化了，变成大路货，不能适应城乡人民各种不同的需要。

但话又要说回来。当解放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我国占绝对优势的时候，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有极大的好处。一方面使国家掌握了全部工业商品的货源，一方面把资本主义工业的原料和产品销售两头切断。从另一角度看，这种措施又可以割断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村之间的联系，割断它们和自由市场的联系，从而也就把资本主义工商间的业务联系割断，使资本主义商业只能向国营商业进货，只能根据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这样就可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切活动包括生产和经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这就给它们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奠定了对它们全面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在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同时，实行自上而下的派货和严格的市场管理办法，进一步限制了和堵塞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投机捣把、扰乱市场的破坏作用，同时使我们的物价亦能经常保持稳定。这许多措施，在当时是适合时宜的，也是完全必要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统一社会主义市场已经形成，继续实行严格的市场管理办法，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会发生副作用，影响商品流转，使物资交流不能更加活跃。事实也已经证明：市场上的“分疆割据”，造成了物资交流的堵塞现象。不但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反而造成产品的脱销和积压，工业和商业脱节，物资不能调剂，生产也会受到阻碍。群众对这种情况意见很多。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迅速地加以改变的时候了。

现在对于有关国计民生和规格简单的产品，如棉纱、棉布、

煤炭、食糖等等，依然需要实行统购统销。以便保证供应，稳定市场。但对品种繁多的日用百货，可以逐步停止统购包销，而改用选购办法。凡属选购的商品，商业部门有权优先选购，没有选购或选剩的商品可以由工厂自销或委托商业部门代销。商业部门供工厂原料的时候，不能采取好坏搭配的办法，除某些供不应求的原料可由国家分配以外，其它原料由工厂自由选购（由加工定货改为工厂购进原料，销售产品以后，工业品中收价低了的部分，也将得到调整）。过去，上级批发公司自上而下分配商品，常常使基层单位不能根据人民需要来组织货源，限制了他们的积极性，因而商品调剂不及时，花色品种不对路。现在规定上级批发公司不准向下级派货，下级商店可以向全国任何批发机构自由选购，也可以向工厂直接选购。这样做，可以使工厂关心产品的销路而提高质量，也可以使商品适应顾客的需要，增加商品的花色品种。这种选购办法，同样适合于许多手工业产品。实行优质优价、次质次价的原则，可以鼓励生产者提高产品质量。应该明白，质量下降是变相的涨价。本来应当使用十年的手表，如果因为质量不好而只能使用五年，实际上它的价格就涨了一倍。

现在还要在国营商业统一领导下，建立起新型的农村初级市场，活跃农民间互通有无的贸易，允许县城里的公私合营商业人员和小商小贩下乡进行又购又销的商业活动，对一部分小土产允许自由收购，自由贩运，改变了地区间的封锁现象，取消了硬性搭配商品的作法，打破供销合作社分割和独占农村市场的局面；有步骤地实行由下而上的选购和要货制度，允许县营企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对于自己的产品，除开商业部门收购的以外都有自销的权利；在不提高出售价的前提下，适当提高某些农产品的收购价，贯彻了按质论价的原则，如优质得不到优价，不能鼓励产品质量的提高，只能助长产品质量的下降，但可适当降低某些质量较差的产品的价格。以上种种措施，受到了城乡群众的热烈欢迎，初步扭转了过去国营、合作社营商业“只此一家，别无分

店”的“官字号“作风，以及过去商业人员只注意为完成上级所给的卖钱额和收购量的任务，而不注意调查市场和人民需要的主观主义作风。自从实行这种商业体制改革以来，农副产品上市的品种和小商贩经营的品种都增加了，商品流转扩大了。城乡各种商业的经营额都迅速地增长了，国家的利润和税收也随着增加了。而最重要的收获，还在于这样做既满足了城乡群众的需要，又有效地促进着县营工业、手工业和农副业的发展，使生产者的积极性大大地提高，既为人民增加收入，又为国家积累资金。

当然这样的转变，不可能没有一点波动。但这个自由市场的性质和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完全不同。它是在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它的商品流转额只等于全国全年商品流转总额的四分之一，允许自由采购自由贩运的小土产的全部产值不过四十亿元，采取选购办法的日用百货不过四十亿元，手工业品的选购和自销部分也不过四十亿元。所有这一百二十亿元左右的商品不过占今年全国商品零售总额四百六十亿元的四分之一强，几乎四分之三的重要商品掌握在国家手里，由国家收购和销售。况且，在自由市场上买卖的商品，不过是一些品种复杂的零星的日用百货和一部分小土产，决不会出什么乱子。这些小土产和日用百货，在1954年前极大部分是由私商经营的。这些手工业产品直到1956年春季手工业合作化以前，历来是由手工业自由销售的。1954年前就已经能够稳定物价，不出乱子了，难道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手工业和小商贩绝大部分实行了合作化，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大大加强以后，反而不能稳定物价吗？

但是，自由市场开放后的确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例如，某些供不应求的农副产品价格的暴涨，市价高于牌价，部分农民不愿把产品卖给国家，甚至推翻原订的预购订购合同，退还预购款等等。农民经商的现象，也已出现。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有关部门对已经开放的自由市场缺乏领导，宣传工作落后于实际工作的发展，许多干部和群众不了解开放自由市场的意义和范围。

只要迅速地改变目前对自由市场放任自流的状态，广泛地宣传政策，划清界限，市场状况定会逐渐上轨道的。

八　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平衡

社会主义商业分国内和国外两部，因此，讨论商业时，不能不连带讨论国外贸易。目前，我国出口物资主要是农副产品，就是出口的许多轻工业品也需要用农产品作原料。大家知道，由于我国化学工业特别是有机化学工业还不发达，轻工业的原料，大约有90%以上要依靠农业。农业的丰收或歉收不仅对轻工业有很大的影响，对进出口贸易，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进口多少物资，不能孤立地只从工业建设的需要来考虑，还应该看出口货源供应情况如何而定，而按照国家建设需要、进口可能和外汇情况等各方面因素，权衡轻重缓急加以综合平衡来考虑，也是重要的问题。所谓国家建设需要是指各项建设首先是重工业建设所必需的成套设备和各种重要物资的进口来说的。但要进口多少重工业物资，得先看出口多少农业和轻工业物资，因此进出口贸易，是和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有密切的关系的。国家计划机构在编制年度和长期计划时，应当将各项生产建设的进口需要、出口货源的供应和国内市场的需要尽可能结合起来，全国地、切实地予以综合平衡。出口货源不能盲目地出口得过多，也不能出口得太少。如果出口得太多，就会引起国内市场上某些重要商品的供应发生困难，不能满足群众的眼前需要，就会引起物价的波动，从而影响到国家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工农联盟的巩固，以及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反之，如果出口得太少，就不能保证重工业建设物资的进口需要，那就会影响到国家工业化的进度，从而损害了群众的长远利益，削弱了今后工农联盟进一步的巩固。由此推知，如因国内需要很紧张，出口货源必须减少一些，则进口物资亦必减少一些，以保证外汇收支平衡。以生猪为例，由于人民购买力的提高而增加了肉类的需要量，出现了猪肉供应量的紧张情

况，商业部门就采取减少猪肉出口的办法来和缓目前城乡肉类供应的紧张程度。由此可见，随着情况的变化，进出口间必须经常求得一个适当的平衡。例如，到1967年，全国棉花的总产量将比1955年的产量增加两倍。那时，我们可以年有价值一、二十亿元的纱布出口。在十二年內，全国粮食总产量要达到目前总产量的一倍半以上，其中一部分或者可以出口去向外国交换工业建设物资，那时的进出口贸易之间又会出现一个新平衡。我们研究平衡理论，必须从发展的观点出发。我们实际的生活正是在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中发展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从发展的观点，采取积极的措施，不断地发现新的薄弱环节，不断地克服新的不平衡，使整个国民经济一步一步地走向新的较高的水平。

九 积累和消费的平衡

我们在前节说，出口物资主要的还是农副产品和轻工业品。这些物资输出国外去交换生产资料来发展我国的重工业，它们当然就是变形的资金积累。

我们要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艰巨任务，就必须要有和它相适应的资金积累。而实现资金积累的道路，由于我国社会制度所决定，只能依靠国內积累。积累的多少和快慢，不仅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人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改善的程度。但积累的来源除出口物资外，还有轻工业、重工业、商业和农业。轻工业是能为重工业积累资金的，但重工业本身也未尝不可以积累资金。鞍钢所提供的利润就大大超过了国家建设鞍钢的全部资金。但很大一部分的资金毕竟是从农业和商业中得来的。因为农民是我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粮食和原料的供应来源，我们要积累资金，首先要依靠农业的发展。随着农业合作化迅速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提高，农民的收入增多了，购买力提高了，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如化学肥料、拖拉机、播种机、抽水机、胶轮运输工具等等，生活资料如各色各样的布

匹、自行车、钢笔、电筒、书籍等等，共数量之大，难以估计，而这个数字随着工农业的发展而逐步增加，如果我们能以继续不断增长的工业品去交换农民的继续不断增长的农产品，那么，我们就能满足农民的物质需要，进一步地巩固工农联盟，保持物价的稳定，同时又能为国家增加税收和取得利润，而这也等于为国家积累不少的资金。

大家知道，积累和消费二者加起来也等于国民收入，而国民收入就是工业、农业、建筑业、服务于生产的运输业、商业工作者所创造的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也就是常说的总产值。除去用来补偿已消耗的生产资料的那一部分外，剩下的另一部分社会产品的价值，也就是常说的净产值。这个净产值，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就是全部的国民收入，都归劳动人民自己所有。劳动人民把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用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就是说用作消费；另一部分用于国家经济建设，也就是说用作资金积累。在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的时候，必须使消费部分和积累部分保持适当的比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工业、商业、主要从农业方面取得一定的资金积累，是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为了给农民和所有劳动人民创造更大的福利，这是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是积累的速度不能太快。太快了，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不能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甚至反而降低了，那就会引起农民的不满，妨碍工农联盟，也会妨碍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前进。当然也不能太慢，太慢了，就会妨碍国家工业化，也同样会妨碍工农联盟。所以积累和消费之间，一定要有一个准确的平衡。我们的物价政策、税收政策、工资政策和合作社收益的分配政策，应当既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积累，又能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因此，我们必须使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得到一个适当的处理。所以，党和政府在合作社产品分配方面采取了“少扣多分”的方针，就是要“既保证集体生产需要，又照顾社员生活需要”的方针。中央指示：要把合作社总

收入的60%到70%分配给社员，争取90%的社员能够增加收入，这是当前实现这条方针的具体的政策界限。经过1956年夏收分配的实践，证明中央的指示是正确的。这个指示合理地解决了农民收入的分配问题。对于国民收入（包括各业的收入），也是与农业社的收入一样，要合理地解决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根据计划委员会对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各项指标的初步计算，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国民收入，经过分配和再分配后，最终用于积累的部分约占22%，用于消费的部分约占78%；同苏联几个五年计划相比，我国积累基金所占的比例较苏联低（苏联大约为25%左右），而消费基金所占的比例则比苏联高（苏联大约为75%左右）。为什么要这样呢？李富春先生认为，这是因为考虑到我国人多、生产不发达等因素，积累基金的比例只能稍低一些。而按照这一比例，既可以保证国家建设的需要，也可以使人民的生活得到适当的改善了。至于其他五年计划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薄一波先生认为，在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情况之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要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不要低于30%，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要低于40%，或者略高一点。他觉得这些比例是比较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的，是比较稳妥可靠的。但他不说这些比例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妥当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进一步的节减，积累是可以适当地提高的。

在苏联，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为二十五比七十五，而我国，则为二十二比七十八。而依薄一波先生的意见应为二十比八十，或者稍高一些，这当然大致是由于我国人多、生产不发达所致。如果我们要力步苏联的后尘，把比例提高到二十五比七十五，我们就必须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即电气化和机械化，使农民富裕起来。但如果沒有重工业的发达，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进我们的农业技术，就不可能达到农业现代化。农业不现代化，农业的生

产力不容易大大地提高，农业生产力既不能大大地提高，则消费品工业亦不必前进且无法前进。因为如果单独前进而农业跟不上，不能满足工业对于粮食、原料、资金积累的需要；工业即已前进，亦必被迫后退。进一步说，农业生产力既不能大大地提高，农民亦不能很快地富裕起来，其购买力亦不能增大，如消费品工业孤独地前进，不免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故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不能提高到苏联的水平（二十五比七十五）。谁都知道，我们目前还不可能有大批的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不可能大规模地垦荒来扩大耕田面积，因为这些都取决于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钢铁生产的多寡，是衡量国家工业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虽在过去几年中，我国钢铁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但从我国工业建设角度来看，则觉得现在工业建设所需要的钢铁是惊人的。一亿元建筑安装工作量平均需要钢材二点二到二点五万吨；一千公里的铁路需要钢轨和钢材十八到十九万吨。我国要建设强大的机械化工业，也必须要有足够材料，首先是钢铁。根据过去几年来的实际资料，机械工业每提高一亿元的生产总值，平均需要钢材一点五万吨左右。因为这个缘故，在短期内，我们还不可能有大批的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不可能大规模地来垦荒，即使可能，运输能力也跟不上。因此，我们目前增加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只能在现有的土地上采取各种增产措施来扩大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在可能条件下，尽可能开垦一些荒地以扩大耕田面积。这就是当前农业增产的基本方向。我们有优厚的自然条件，充沛的人力资源，精耕细作的传统经验，正可以来充分地挖掘现有土地的巨大的潜在力量。我们已经采用了行之有效的各种增产措施，如：（一）兴修水利；（二）防止水患；（三）发掘肥源；（四）改良土壤；（五）选用良种；（六）推广新式农具；（七）防除病虫害；（八）改进耕作技术；（九）改变耕作制度等等。此后，我们只要用大力进行这些措施，一定能够在现有土地上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达到农业增产

的目的。

十 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掌握

薄一波先生认为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要低于40%，或者略高一些，是适合于当前经济情况的。1956年基本建设支出占国家预算支出的46.7%，其目的在于想更多地搞一些工业建设，使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能够得到更快的发展；但结果，反而“欲速则不达”，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后果，使积累和消费之间发生脱节的现象。这是由于沒有好好地掌握按比例发展规律的缘故。所谓不良的后果是什么呢？第一个不良的后果是建筑材料和设备的供应跟不上。以钢铁为例，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在过去几年是相当快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我国钢的产量要从1952年的一百三十四点九万吨，提高到1957年的四百一十二万吨，每年平均增长25%。但执行的结果，到1957年预计可以达到五百五十万吨，每年平均增长32.5%。高速度发展钢铁工业的方针是对的，条件也是具备的，问题是在于生铁、焦炭和耐火材料的供应跟不上。炼钢平炉的利用率提高得很快，但是它前面的炼铁跟不上，后面的轧钢跟不上，这也就妨碍了炼钢能力更迅速的提高。这是由于缺乏综合的研究和综合的平衡，以致发生各个环节不能衔接所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如生铁、焦炭、耐火材料供不应求，它们的价格一定自动地上涨，上涨之后，生产自然增加，价值规律在此自动地起其调剂作用。但在我们这里，这些东西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有权可以支配，只要切实依照按比例发展规律进行，用不着价值规律来代劳。国家可以利用这个规律来达到预定的目的，它不能自动地起其作用。在我们这里的问题，乃在于平衡工作做得全面不全面的问题。这个例子，明显地指出支配这个平衡工作，不是价值规律（无非利用价值规律作为一个补助），而是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不过工作沒有全面地按这个规律安排而已。这大抵是由于我们尙

在过渡时期，经验不足，预见性不够所致。第二个不良的后果是运输力量跟不上。原因在于运量的急剧增长，如铁路、营业汽车和民用航空，1956年预计完成的货运量将接近或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的水平，又加以新增的运输线路和设备跟不上运量上涨的速度。同时，各种运输工具的综合利用组织得还不够好，重复、对流、过运、迂回等不合理运输的现象仍然存在，这就更增加了运输的紧张程度。按照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必须在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同时，相应地发展运输业。若只顾基本工业建设而不顾运输业，则大建设由于沒有相适应的交通运输条件，建设就不能顺利进行。例如在货运方面，如北京至郑州、石家庄至太原和陇海线西段的通过能力的利用已达饱和点，所以常常发生货车积压、车站堵塞，甚至有完不成运输任务的情况。在客运方面，则常常发生旅客买不到票，上车找不到座位等现象。在这里起作用的也不是价値法则，乃是按比例发展规律。由此可以看出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重要，我们的建设工作必须按此规律进行。要作好这一工作，第一必须以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为依据，使重点和全面相结合，忽视重点或削弱重点的平均主义思想，或只顾重点不顾其它的孤立主义思想，和过分强调一个方面、一个地区的局部思想，都是同党的方针政策相违背的，对国民经济按比例的发展也是有害的。

我们要知道，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是一个有机地结合着的整体，其中一定有一个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我们要透彻地研究这个规律，要全面地了解经济情况，要预见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发展趋势，才能对各种经济成分在确定计划指标时，做出一个好的统筹安排工作，把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各地区联系在一个国家计划之內。这个工作异常艰巨细致，可谓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若对实际经济情况了解得不够而要定出适当的指标，是很难的，势必在计划执行的过程中，产生一些前松后紧、时松时紧的不均衡现象。但要注意，虽然我们要正确地掌握国民经济按比

例发展的规律，但是所定的比例，并不是呆板的公式，在不同的经济情况下，必然有程度不同的比例关系；只有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进行反复的平衡计算，才能比较恰当地规定出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而且要在实践中加以修正补充。

在这一节中有下列突出两点，要再加以研究：

（甲）这个物资供应“跟不上”的毛病，有无补救的方法？

（乙）在我们这里，支配我们计划工作的是按比例发展规律，并不是价值规律，但是我们却要利用价值规律来达到供销平衡的目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它。

现在分两段加以说明。

（甲）物资供应和物资储备的平衡

这个“跟不上”的毛病，一部分可以用物资储备的方法来补救。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尤其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如上所说的建筑材料和设备的供应跟不上的现象，当然会时常发生的。这是由于沒有全面地按照比例发展规律安排所致。因此，在基本建设方面，对于勘察、设计、供应设备和材料等各个环节的衔接注意得不够，因而在某些工地上经常发生停工待图、停工待料、赶工窝工等浪费现象。在计划执行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前松后紧、时松时紧的不均衡现象。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进行，并且还可以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下列三个例子可以说清楚这一点。第一是煤炭工业。在计算煤炭需要量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到其它工业超计划发展的可能性大于煤炭工业超计划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在规定煤炭工业的生产水平时，必须要保有一定的后备生产能力，并建立国家对煤炭的储备制度。在考虑到煤炭工业的建设规模时，必须使建设规模和对煤炭工业生产水平的要求相适应。同时，由于矿井的建设时期长，想在年度计划中用追加项目的办法，来解决已经形成的煤炭供不应求的极度紧张情况是不可

能的。第二个例子是钢材、水泥、生铁等几种物资的生产。在过去，有些部门的平衡工作做得不够好，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思想还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完全贯彻执行。即使平衡工作当时做得比较好，也可能由于难以预料的因素，又产生了新的不平衡。例如1954年农业的减产影响了某些工业生产，削减了基本建设，因而1955年的钢材、水泥、生铁等几种物资有些剩余，生产部门要求对外贸易部把这些剩余物资出口，以免积压并支持生产。今年初，社会主义高潮到来后，这几种物资又因需要激增而感到不够（感到跟不上），又要求对外贸易部把已经定了的出口计划中途变更。结果就可能影响对外合同的执行和国家对外的信誉，同时也影响基本工业建设进口计划的完成。假若当初把一时虚假现象的剩余物资留作物资后备，就不致有“跟不上”这样的现象发生。第三个例子是基本建设。几年来，在基本建设方面，已培养出了一支比较强大的建筑队伍，到1956年第一季度，全国建筑安装方面的职工总数已经达到一百四十一万人。他们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掌握一些新的技术。过去许多只能适合于一般民用建筑的综合性的建筑公司，已成了各种专业的工程公司。因此，建筑施工部门出现了很多先进经验，建筑安装的速度不断地加快，工期就不断地缩短，劳动生产率大大地提高了。比如在电站建设方面，过去安装两台二万五千瓩的发电设备，从开工到第一台机组投入生产的时间是二十五个月；现在建设一个同样规模的电站，时间只用十六到十八个月。在煤矿建设方面，建设一个大型立井，在改进了施工方法之后，工期可以缩短半年到一年，但是设计工作、建筑材料和机器设备的生产，不能以同样的速度齐头并进，不能适应建筑施工的工期不断缩短的要求，这样就形成了许多基本建设计划中很不协调的情况，就是“跟不上”的情况。因而在某些工地上经常发生停工待图、停工待料、赶工窝工等浪费现象，甚至造成某些工程不能按期竣工的现象。这说明了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是一件非常艰巨细致的工作。在初期缺乏经验的情况下，缺点是很难

避免的。以后经验越来越丰富，研究越来越深刻，计划工作必定越来越准确。这是无可怀疑的。在目前可以用后备力量来弥补这些缺点。因此冶金工业部今年在提出正式建设工程项目的同时，又提出了一批后备工程项目。目的是为了在原计划中某些工程不能按计划进行的时候，可以用后备工程去代替它。对于有些由于设计和设备的原因，确实不能按原计划的时间进行建设的工程项目，准备加以削减或推迟，而把那些条件具备的后备工程项目，转入正式计划。这样就可能减少材料、设备、设计和施工之间不相协调的困难，并可使基本建设比较顺利地进行，同时又保证完成1956年基本建设总的工作量。

（乙）商品生产和商品分配的平衡（供销平衡）

在这里让我来谈谈我们如何利用价值规律来达到供销平衡的目的。近来，各地干部和职工纷纷向财政部去信，问为什么不采取每年普遍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方针，而采取基本稳定工业品价格的方针？主要原因是在于普遍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条件，客观上还不存在。因为我们化学工业尤其是有机化学工业还不发达，轻工业品不能不受着农业原料的限制。除了极少数工业品以外，不是供过于求，乃是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普遍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方针，势必发生严重的脱销现象，其结果不是被迫重新提高价格，便是人民买不到东西，出现黑市，破坏物价制度；或者国家被迫增加消费部分资金的比例，减少积累部分资金的比例，这样做势必妨碍重工业建设的速度，打破积累与消费的平衡。归根到底，降价是一句空话。1953年曾一度降价出售，结果许多商品发生脱销，不得不重新提高价格。这是我们宝贵的教训。

刺激生产来改善人民的生活确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各地干部和职工同志所提出的降价多销；另一种是增加职工工资和适当地提高某些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采用哪一种方法，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原料足，设备够，可以保证生产充分的商品，则采

用第一种方法是应该的。反之，如果原料不足，设备一时难以扩大，不能保证供应充分的商品，只能采用第二种方法。若不顾一切条件，盲目地降低物价，结果不是降价多销，乃是降价脱销。几年来，我国人民的购买力提高了，市场上商品的供应还能大体上适应市场的需要，工业品市场基本上沒有黑市，除了个别供不应求的副食品以外，基本上沒有抢购的现象。这充分地说明了政府所采取的基本稳定工业品价格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也充分地说明了商品的生产和商品的分配，在稳定的商品价格之下，是平衡的。在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如何利用价值规律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里的降价抬价是人为的，并非象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价格自动的升降来支配生产的增减；在我们这里不但价格不能支配生产的增减，而价格自己反受人的支配，我们无非利用价格来维持商品生产和商品分配的平衡而已。谁都知道，我们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所生产出来的各种消费品，必须经过买卖方式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有买卖，必有货币；有货币，必有物价。而人定的物价定得合理不合理，可以决定买卖的成立不成立，生产与分配平衡不平衡，同时也可以决定商品的积压还是脱销。

十一 结 尾

我在上一节中已说过，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各个地区，是一个有机地结合着的整体。我们要做好计划工作，必须首先掌握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而后按此规律，使重点和全面相结合。只顾重点，忽视其它的孤立主义思想是错误的；强调若干方面、若干地区，忽视其它方面、其它地区也是错误的，是违反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我在这篇论文中，因限于篇幅，只谈到几个环节，沒有谈到每个环节中的各方面。例如工业是一个环节，这个环节中的各方面也应该谈到，才得称为全面综合平衡理论。工业除重工业和轻工业一个方面之外，还有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间的平衡、原有工业和新建工业间的平衡、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间的

平衡、建设规模和地质资源间的平衡、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间的平衡、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间的平衡、国营工业和公私合营工业间的平衡等等，因限于篇幅，在这里不谈了，拟另作一文加以详细讨论。

（原载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

（一九五七年五月）

在我的上篇论文的结尾中，我曾说，我在这篇论文中，因限于篇幅，只谈到几个环节，沒有谈到每个环节中的各方面。例如：工业是一个环节，这个环节中的各方面也应该谈谈，才得称为全面综合平衡理论。工业除重工业和轻工业一个方面之外，还有原有工业和新建工业间的平衡，沿海工业和內地工业间的平衡，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间的平衡，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间的平衡，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间的平衡等等，因限于篇幅，在这里不谈了，拟另作一文加以详细讨论。兹为完成任务，仍用团团转的方法，写成下篇如下：

一　重工业和轻工业间的平衡

我在上篇已经讲过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平衡，在这里，我只把上篇沒有谈过的而和这篇有密切关系的一点提出来谈一谈。随着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每年需要的钢铁数量种类是庞大的和繁多的，必须保证满足这种需要，才能使我国工业顺利发展，我们是否可以依靠从国外进口钢材来发展我国的工业呢？显然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因为主要依靠从外国进口钢铁，不仅不能建设起独立的强大工业，而且大量进口钢材也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可以用以下的事实证明：1955年美国生产了一亿零六百多万吨钢，国内消费了95％，仅有５％钢材出口（不包括机器的出口）；英国生产了二千万吨钢，出口的只有10％左右，而且主要是输往英属地、英国资本统治的国家以及英国享有优惠待遇的石油开采

国家；西德输出钢材的数量也不多。再看社会主义阵营，1955年社会主义各国总共生产了六千多万吨钢，其中苏联生产四千五百万吨。但不管苏联也好，其他兄弟国家也好，都感到钢铁不敷需要。由此可见，要想依靠从国外进口大量钢铁来解决我国工业化的需要是有困难的。民主国家和苏联，虽然愿意对我们作兄弟般和善意的热情帮助，但他们正在忙于建设他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加多了他们的钢铁输出量，就会推迟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度，这对加强整个社会主义民主阵营力量的意义来讲是沒有好处的，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采用这个办法，并只限于少数的优质钢材和特种钢材。我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为了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更加繁荣，为了使社会主义阵营拥有更多的金属，我们就必须坚决执行中央所提出的大力发展钢铁工业的方针，迅速提高我国钢铁工业的生产水平。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中，采取了“集中较大的财力和人力来建设钢铁工业，以求能够用较短的时间建立起我国工业化的基础”的方针。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仍然采取大力发展钢铁工业的方针。在钢铁工业的基础上，还要很快地建立起自己必要的机器制造工业、冶金工业以及其他有关的重工业，不然的话，我们用什么东西去装备轻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和农业呢？我们就将得不到必要的各种机器，得不到必要的钢材和水泥，得不到必要的电力和燃料，我们的国民经济就将长时期陷于落后的境地。很明显，我们决不能那样做。因此，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方针是正确的。所以今年（1957）基本建设的规模仍然很大。基本建设投资要占今年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几百个限额以上的巨大工程，象武汉、包头、鞍山三个钢铁工业基地，吉林化学肥料厂、抚顺东露天煤矿、兰州炼油厂、富拉尔基和太原的重型机器厂等等，将要继续施工。如果完成这个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內的基本建设任务，就将超额完成。

但我们亦不能片面地强调发展重工业而降低轻工业和其他经

济部门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应了解，人民对于消费品的需要既然日益增长，如果不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就很可能出现商品特别缺乏的情况，就将影响物价和市场的稳定。特别是在农村中，如果沒有足够数量的工业产品以稳定的合理的价格去交换农产品，就可能妨碍工农联盟的巩固，并且就可能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

至于轻重工业如何达到平衡，它们的比例按八比一规定呢？还是按七比一规定呢？我在上篇论文中已讲得很多，兹不赘。上篇论文也谈到轻工业如何以赚来的资金来供给重工业。

二 原有工业和新建工业的平衡

（甲）在轻工业方面

原有工业和新建工业的正确关系，应该是在增加生产适应社会需要的时候，首先考虑发挥原有工业的生产潜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轻工业生产大约有90%是依靠原有工业的，而在全国轻工业的产值中，属于原私营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大约占60%以上。现在绝大部分私营工业已经实现了公私合营，手工业已经实现了合作化。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必要的生产改组、企业改革和技术改造，那就一定能够发挥出巨大的生产潜力。发挥原有工业的生产潜力，不仅要加强生产管理和平衡设备工作，而且也要包括必要和可能的改建、扩建在內，因为对原有工业进行改建、扩建，比起新建来，毕竟是投资少，建设快，收效大，还可以节约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就是新建工业，也需要原有工业的支援。因此，任何忽视原有工业的思想都是错误的。苏联经济建设中的经验，就是很好的证明。苏联在实行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方面虽然动用新的生产能力的计划，并沒有完成，但是由于发挥原有企业的生产潜力的结果，主要工业部门的生产计划都是超额完成的，苏联第六个五年计划期內，重要工业产品产量的增长额中，依靠原有企业发挥生产潜力，而增产部分的比例为：钢、

精铜、锌、挖土机、电机车等产品占40%以上，镍烧碱、水轮机、金属切削机床、汽车、拖拉机、窗用玻璃、纸张、糖等产品则分别占到50%到60%以上。由此可见，原有工业企业在国家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即使对那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比较落后的我国原有企业，也不能采取消极态度。但这不是说，我们重视原有工业就可以忽视新建工业，因为当原有工业的生产潜力已经得到充分发挥而仍然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时候，那就必须进行新建。

据纺织工业部负责人的报告，这里的老工厂的设备利用率已经相当紧张，再沒有什么潜力可以发挥，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对纺织、造纸、制糖、制药等工业，已经进行了一部分新建，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轻工业的基本建设任务，将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加重很多，轻工业的投资占工业投资的比重，也应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2%左右有所提高。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应该适当地增加毛、麻、丝等纺织工业的比重。人造纤维工业是一个新兴的纺织工业部分，世界各国都发展很快，在某些纺织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人造纤维约占它们各种纤维总产量的30%至35%，但目前在我国还在试验阶段，必须努力赶上。我国木浆产量虽然不多，但棉绒资源是很丰富的，这是发展人造纤维工业的有利条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当为发展人造纤维工业打下基础。

（乙）在重工业方面

在重工业方面，问题稍有不同，轻工业所需的是新厂的建设，而重工业所亟迫需要的是旧厂的改建。数年来钢铁工业在采用新技术方面，由于学习先进经验的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56年有些技术经济指标如高炉已接近苏联1955年的水平。新建的钢铁企业都是采用了最新的技术装备，这将为生产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但新建新的钢铁基地，虽然是一种基本

的办法，但是由于建设时间长，投资大，而且不能立时生效，所以不能用来救急，而是一种长远的计划。虽然今年武汉、包头、鞍山三个钢铁工业基地仍然继续施工，但欲达到投资少，建设快，可以立时见效即可以立时用来救急的目的，只有就旧厂来发掘潜力，故今日的问题在于改建还沒有经过技术改造的旧厂，这些旧厂设备简陋陈旧，厂房狭小，运输和劳动条件差。几年来政府对旧厂已花了相当数量的投资，但大部分用于扩大个别生产设备的能力。对于系统改造、投资分配也缺少系统的规划，因此，旧厂的设备仍然很落后，生产条件很差，产品的质量和新技术的采用受了很大的限制。新厂和旧厂之间显然有不平衡的现象。有的旧钢铁厂，仍以煤为加热燃料，以致钢锭钢材加热不匀，溫度比用电力或煤气难于控制，影响产品质量。计量和生产过程控制的仪表都很缺少，机械化的程度很差，更谈不到操作的自动化。有的旧钢厂沒有称钢液重量的磅称，凭工人爬上盛钢桶用钢条来睬测钢液面的高低。在采用氧气炼钢，眞空浇注等新技术，则缺乏大型的氧气机和眞空泵。厂房的布置和劳动条件很差，说明现在旧厂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增添设备，为采用新技术创造条件，使新旧厂得以比较地平衡发展。但这只可以说是一种救急的办法，用这种办法来挖掘潜力，到底有限，不能得到大量的增产。因此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新建大规模的钢铁企业，因此政府决定武汉、包头、鞍山三个钢铁（详第八节）工业基地今年将继续施工的做法是正确的。

三　沿海工业和內地工业的平衡

（甲）工业重点逐步移向內地

我国原有的轻工业虽有一部分分散在內地，但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如何看待这些沿海工业成为争论最多的问题。这是反映了旧中国工业分布的不合理，是一种畸形的现象，致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不能得到平衡的发展。国民经济不能得到平衡的发展，则综合平衡理论亦无从谈起。我国原有工业的分布状况反映

了我国过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据1952年的统计，沿海七省三市的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3%；在重工业方面，以钢铁工业为例，大约有80%以上的生产能力分布在沿海，主要是在鞍钢，而在资源非常丰富而尚未勘探开发的內蒙古、西北、西南、华中等地却几乎沒有什么钢铁工业。在轻工业方面，以纺织工业为例，也有80%的纱锭和90%的布机分布在沿海，而在广大的产棉区和內地却很少纺织工厂。其他轻重工业的分布情况，大致也是如此。为了改变这种旧中国所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分布状况，为了建立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就需要集中主要力量来在內地建设新的工业基地，以便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来合理地分布工业生产力。这就成为有计划地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把工业重点逐步移向內地，使工业企业接近自然资源，使工业的布局适合于资源和国防的条件，在內蒙古等地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工业基地，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四年中，新工业城市的建设进展很快，许多古老的都市变得年青而繁荣，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状况正在改观。我国第一个钢铁基地鞍山，已经发展成为远东最大的钢铁城市之一。我国內地的太原、西安、兰州、包头、洛阳、汉口等地，正在建成新的工业城市。在这些过去几乎沒有工业或工业不多的地方，新的钢铁联合企业，巨大的炼油厂，重型机械厂和发电站，以及纺织和制糖等工厂，有的已经建成，有的正在建设。这些城市的人口增加了很多，工业生产也在不断上升。

（乙）同时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工业

周恩来同志在他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进行华中和內蒙古两地区以钢铁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基地的建设，积极进行西南、西北和三门峡周围等地区以钢铁工业和大型水电站为中心的新工业基地的建

设，继续进行新疆地区石油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的建设，并且加强西藏地区的地质工作，为发展西藏的工业准备条件。”但这决不是说可以否认或者忽视沿海各省的工业的作用。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地发展那里的工业，以帮助內地工业的发展，加速全国的工业化。这不但是为了适应国家和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也正是为了在內地建立更强大的工业基地。因此，周恩来同志又在报告中建议：“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继续加强东北的工业基地，充分利用和适当加强华东、华北、华南各地区近海城市的工业，以发挥它们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辽宁、上海、天津等地已经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如上海过去几年来输送了大量技术人员、熟练工人支援各地建设，亦培养了一定数量的技工，今后当然还要发挥它的作用。可是为了向科学进军，城市青年已经大部就学，培养人才的来源感到缺乏。政府过去为了防止影响农业生产，曾作出了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在新形势之下，为了培养技工的需要，似应有计划地招收农村青年，加以培养，使得城市既可以输送干部支援国家建设，又可以补充新的力量，满足生产上的需要。同时，几年来，象上海的技术人员抽得很多，补得太少，大专毕业学生分配到上海的寥寥可数（特别是电机、机械方面），这对发挥沿海工业基地的作用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有人说：“中央有的部门，对老厂、老地区要得多，给得少，对技术人员抽得多，大中学生补得少。”这种做法不是在适当增强和积极发展的基础上来利用它，而是实际上削弱它。今后，在技术力量的培训调配工作上，在內地新厂进行基本建设的同时，可以先将配给內地新厂的大部分干部和技术人员，放到同类型的沿海老厂中去实习，在內地新厂建成时，需要的干部和工人就可以大部分在沿海老厂中统一调配。采取这种做法，有利于內地新厂尽速投入生产。上海的工业界领袖们切盼中央主管部门能够对此事加以注意。在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上，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中提到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将要大量培养熟练工人，1956年十七个部的计划就将达到七十一万人，这是十分令人兴奋的事。沿海工业不仅每年输送出去大量的技术人员，为内地新工厂培养熟练工人，而且也为内地新工厂积累资金。以上海为例。目前上海供应了全国纱布需要量的三分之一，和日用百货的60%，在新产品、新技术方面也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并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由此可见，发挥沿海地区的工业潜力，不仅和发展内地工业不相矛盾，而且还会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当然沿海工业中的某些行业，由于集中程度较大，远离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是存在着某些不合理因素的。要改变这种情况，不能简单地用“限产”的办法，一般地也不能用“迁厂”的办法，而应该随着生产的发展，在充分地合理地发挥了沿海地区工业的生产潜力以后，如果还需要新建工厂的时候，除少数必须建在沿海地区外，一般应该建在内地，以减少原料和产品的相向运输。在对沿海工厂进行改建扩建的时候，也需要考虑到不要造成新的不合理。这是发挥沿海和内地积极因素的正确办法。

（丙）改建和扩建沿海各省的工业

以上所谓不要造成新的不合理，就是要避免盲目性，这种盲目性往往表现在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时候。就是改建那些有必要也有可能改建的企业，而不是改建一切原有企业。在工业企业已经比较多的城市，一般应该少建新的企业。新建和改建的企业，必须注意到原料的来源，产品的销售，生产的技术和运输等条件，并且注意同其他地区的合理分工。

在基本建设方面，在沿海地区有不少的重工业或轻工业企业，可以结合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改组，来进行适当的改建。这种改建，不仅不会妨碍全国范围内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而且可以支持、配合新工业基地的建设和补充内地新工业建设的不足。因为在这些地区，进行适当的改

建，一般地都具有下列几个有利条件：（一）在技术力量和技术经验方面，比较有基础；（二）在运输、电力供应以及和各方面的协作上都比较方便；（三）有原有城市的直接支持和帮助。因此，在这些地区进行改建，投资上比较节省，见效也比较迅速，又可以及时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迫切需要。以上海的情况为例，第一机械工业部和计划委员会在1956年春季共同组织的工作组去上海研究后，建议改建二十二个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的机电工厂。改建这二十二个工厂，初步核算只需要投资四千二百多万元，而改建完成后每年的产值则可达到二亿二千万元，差不多一年就可以将全部投资收回。收回投资后，即可为新企业积累资金。列入工作组改建工厂方案中的上海中华铁工厂，按照目前的厂房和设备，每年可以制造日产量为五十吨的造纸机两套，经过投资五百万元扩建后，每年就可以制造日产量为五十吨的造纸机八套。这种造纸机，价格比国外进口的便宜，既解决了国家的需要，又节省了外汇。象这样的例子，在其他行业，其他沿海城市都有。但过去由于对充分合理地利用沿海原有的工业基础这点认识不足，顾虑较多，同內地建设的结合不够，因之，就还沒有更积极地去加以规划和利用。在今后一两年內，这方面还要进行研究，采取措施，使沿海的改建和內地的建设更合理地结合起来，适当安排，而要安排得好，就要注意在地区、规模、品种、数量、时间等各方面都要使沿海和內地相平衡，这样才能避免盲目发展。下一节要举出几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原有沿海工业的重要作用，不仅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存在的，就是在今后长期计划期间也是存在的。因为不论在任何时候，新的內地工业建设都得依靠原有沿海企业更好地发挥生产潜力，为建设內地新企业供给技术人才，积累资金和供应设备。

四　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之间的平衡

以上说明原有工业基础的沿海城市，必须充分利用，以发掘

其生产潜力，而且还应当结合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改组，进行不少企业的适当的改建。这样，沿海工业改建的具体方针，关系着城市本身规划的性质。因为对沿海工业生产企业进行利用、发掘和改建，则同它密切相关的城市建设（城市公用事业），也必然要进行相应的利用、发掘和改建。周恩来同志在他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也说："随着工业生产力的合理分布，我们将要建设许多新的城市和扩建许多原有的城市，为此，应该加强城市的规划工作和建设工作，求得同工业建设相配合"。这个配合工作一般地来说，做得很好，我们在第三节甲项中已经说过：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四年中，新工业城市的建设进展很快，许多古老的都市变得年青而繁荣，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状况正在改观云云。但这是在全国范围内一般的情形。若以个别城市的情形来讲，尚有不能令人十分满意的地方。上海、大连等沿海城市的情形比较严重，但吉林的情形更为严重。现在先以上海的城市公用事业为例。由于解放前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血腥统治，它们为了满足掠夺剥削和荒淫享乐的需要，多少建立了一些基础，但那是一个混乱的割裂的畸形的残旧的不平衡的基础，是一个极不合理的基础。城市的建立和改建主要是为了发展工业生产，同时也为劳动人民供给良好的居住、劳动、教育、交通和文娱游乐条件。那就是社会主义城市的市政建设，应采取首先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但一看若干城市今日的情况，不能不令人格外注意的，至少有三件事：（1）职工住宅严重缺乏；（2）环境卫生尚待改进；（3）交通非常拥挤。

以职工住宅来说，以旅大市为例。旅大市不仅是一个沿海工业城市，也是一个国防前哨。工业主要集中在甘井子、沙河口两个区。房屋及其他公共设施大部分是敌伪统治时期修建的。城市建设的布局，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定型。各种公共设施具有一定程度的现代化规模，但多集中在日本人曾经居住的地区，很少分布到

中国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在敌伪统治时期，中国职工长年住在破漏潮湿阴暗的小房里，拥挤不堪，并且有许多职工住处离工厂很远，有的住处与工厂相距数十里，往返不便。旅大解放后，先后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住宅调整工作，将居住条件极端恶劣的居民搬进了居住条件较好的房屋。但由于解放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很快，城市人口逐年增加，特别是甘井子工业区的发展更为迅速，因而住宅的需求与供应之间的矛盾，仍然有增无减。截至1956年3月底统计，尚有一万一千余戶职工无房居住。他们中间，有些人把家属安置在旅馆、招待所、工厂、办公室里，有许多同妻子分居，分别住在集体宿舍或亲友家里，老少三辈或两三戶挤居在一个房间的也不少，住在仓库、澡塘、地下室、厨房等处终年不见阳光的则更多。至于因准备结婚或想接来家眷而申请用房的更是逐年增加。许多职工住处离工厂过远，有些工人甚至往返需要三小时。这样不是使职工留厂时间缩短，影响职工学习文化技术和参加必要的会议，就势必使职工难以保持足够的休息时间而影响健康。据不完全统计，有一万五千余戶尚有待于继续调整迁移。其中离市中心十几公里的甘井子工业区职工，需调整迁至甘井子区附近居住的即有三千七百余戶。市区的边沿地方还有六千余戶职工与居民住在破漏的木板房里，也必须逐步地把他们迁至别处。近几年每年都从房地产租金收入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整修房屋，并挤出一部分资金，新建一些职工宿舍。但在全市范围内要彻底解决缺房的问题，还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积聚相当多的一笔资金才能办到。当地政府推算到1967年大连建成区，人口将由1955年底六十六万七千人增加到七十二万人。在这期间，总计需要投资一亿二千余万元。这样多的资金，单纯依靠地方的房地产租金收入显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大部分还有赖于中央和省在投资上给予援助。似应快快把中央与地方财政职权划清，以便地方积极努力筹集资金，争取提早解决住宅的需要和供应之间的矛盾。大连还是沿海城市，至于内地城市，则工业建设

和城市建设间的脱节现象更为严重。

以环境卫生安全秩序来说，最近四年来国家共拨出了十亿多元资金来建设城市公用事业。全国总共建设了三十八个自来水厂，铺设了二千多公里长的自来水管线。十一个从前沒有自来水的城市，现在有了自来水。全国用自来水的人数增加了八百多万。我国的历史名城西安，自古以来食用的苦水已经被自来水代替。黄河之畔的古城兰州，世世代代都是食用混浊的黄河河水，现在有了临时的自来水了。在过去的四年內，全国修建的下水道，共有二千公里长，十五个原无下水道的城市修建了下水道。这些建设结果，使我国的城市卫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个别城市和不少地区的环境卫生仍然很差。

以城市的交通事业来说，城市的公共交通事业，近四年来也有很大发展。全国现在五十二个城市有公共汽车和电车，共增加了一千五百多辆汽车，二百多辆电车。兰州等城市还修建了环行铁路。许多城市开拓了新路，修整了旧路。只是修建的柏油路、石子路或混凝土路就有三千六百多公里。北京等城市还改善了郊区农民和小巷內居民的交通条件。这是在全国范围內城市交通发展一般的情况。但以个别主要城市来说，则与城市居民的要求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以上这些例子足以证明一个要点——就是工业改建和扩建一定要和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同时进行，以求得二者平衡发展。一个现代化工业城市，应该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在现代化交通运输工具沒有代替落后交通工具以前，落后交通工具终究比“两脚走路”“两肩挑担”先进得多。

五　工业企业和运输企业间的平衡

我们举上海为例，那里交通运输拥挤的情形，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而上海港的阻塞且影响到许多地区的物资供应和进出口贸易，不仅影响到上海一市的居民生活而已。入川物资积压，

使四川各地市场脱销，影响着四川人民的生活。目前全国不少地区已经出现了物资积压，港口、车站阻塞的现象。这和过去局部的季节性的运输紧张情况有所不同，而是带有普遍性与连续性的。1956年下半年，沿海、长江和河北、山东内河即有二百七十万吨货物无力承运，全国运输缺少大量汽车。这个运输阻塞已经影响到政治、经济、人民生活各个方面。例如克拉玛依和柴达木油区，许多急需的物资运不进去，威胁着勘探工作的进行；鞍钢和包头等钢铁工业基地，由于矿砂和器材供应不及时，影响到钢铁生产和基本建设。

运输阻塞的原因，大半是由于运量增长的快和运力增长的慢，造成发展上不平衡所致。如以1956年同1952年比较：海运货物周转量增长151%，船舶吨位仅增加22%；长江货物周转量增长258%，船舶吨位增加157%。汽车货物周转量1955年比1952年增长270%，而运力（汽车总吨数）仅增加33.9%。足见交通建设远远落后于客观实际需要，仅仅依靠发挥各种运输工具和设备的潜力，不能解决运输阻塞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固然要充分发挥现有运输设备潜力，最大限度的完成运输任务；一方面还要加速交通建设，增加运输设备，保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的比例。在发挥潜力方面，全国广大农民在农业合作化后修建了很多简易公路。在航务工程中，我们修建了厦门海堤，扩建了黄浦港与连云港，提前修建使用了塘沽新港。川江航道已经初步进行了整治，建设了新式航标，有名的川江天险已经实行夜航。在交通新建方面，广大军民职工积极参加了交通建设工作，前后恢复和新建十万公里公路，加上解放初期全国七万五千公里，共有通车里程十八万公里。其中主要的有通往西藏的两条具有巨大政治、经济意义的康藏、青藏公路，和福建、海南岛等公路。完全近代化的湛江港和长江下游的裕溪口港目前正在建设中，今年夏季可以完工。这样在汽车运输和船舶港口工作效力方面已经大大提高，1955年汽车的运输效率较1952年提高了

127%,成本降低了27%；1955年的海船运输效率比1952年提高了37.8%，长江拖轮提高了244.7%,海港装卸效率提高了71%，水运成本降低40%，运价降低30%。这样虽然公路、水运事业均有了一些发展，但与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速度比较起来，仍然是不相适应的。

但政府对于水运是十分注意的，水运是最经济的运输，成本低，运量大，节约钢材，所以政府建设了湛江商港。这个商港建设是一项大工程，技术复杂，在中国历史上以自己的技术力量建筑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海港还是第一次。这个海港的第一期工程任务完成以后，按照设计任务，吞吐能力将达到一百六十万吨；可使吃水八点九公尺的万吨远洋海轮进港，基本上用机械进行货物装卸作业。大家知道湛江商港是我国南部海岸的一个良好的深水港口，对于发展国际贸易特别是对发展东南亚各国贸易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为很多的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所接受，国际局势趋于和缓，估计到今后对外贸易更加频繁，为国家积累资金，幷输入生产资料（详上篇进出口贸易平衡一节），因此大大地发挥湛江商港效用的政策是正确的。交通部计划今后按照四百六十万吨要求继续进行建设。

六　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的平衡

以上各节所谈的各种工业企业，无论在沿海各省或在内地，无论是改造的旧厂或新建的新厂（无论是工业企业或运输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实现和巩固国家的统一，都集中到中央行政管理职权之內，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近几年来，中央管理的事务有些过多。刘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中央有些部门把过多的事务抓到自己手里，对地方限制得过多过死，忽视地方的特殊情况和特殊条件，既不利于地方的工作，也分散了中央的精力，发展了官僚主义云云。又如我们在第五节中所讲的，交通运输事业具有复杂、多样、分散的特点，

中央和地方、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分工问题也比较多，应该很好地分级管理事业和企业。巨大的交通运输计划的进行，固然有赖于国家力量的支持和领导，尤其要依靠地方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全国广大农民修建了简易公路；山东沿海渔民把大型的木帆船加上马达改为机帆船，提高了载重量和速度；上海港在地方主持下，初步调整了各部门在港区的仓库，对解除上海港的阻塞起了很大作用）。这样才能使未来的远景很快地成为现实。中国各地经济状况不一样，国家领导建设既应争取集中，又须因地制宜，发挥地方灵活性。妥善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分工，就是改进国家体制问题。过去中国历史上从来沒有解决过这个问题，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解决的。国务院召开的体制会议，要改进现行的计划体制，财务体制，使上面集中精力，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下面也能根据既定的方针政策全力进行工作。但现在的情况不和这个原则相符合。

过去，由于中央对计划指标的掌握有过多过繁的地方，这就多少束缚了地方的主动性。有时，在国家计划下达以后，由于实际情况发生变化，有些计划指标，如工业计划、商业计划中的分经济类型指标和分季指标需要调整时，地方机关不能自行调整，必须报请国务院批准，这样就影响了有些经济问题的及时解决，给地方机关的工作带来了困难。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方面，我国国民经济情况比较复杂，特别是在过渡时期中，由于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各种经济成分的比重的变化是很快的；另一方面，我国的幅员广阔，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和资源情况，都有很大的不同，中央还不可能对各个地区的情况掌握得很准确，因此，国家也不可能对各项计划指标不分主次地都采取严格控制的办法，而必须允许地方在国家统一的计划的指导下，保持必要的灵活性。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地方积极性和主动性，保证国家计划的完成。例如，以粮食生产计划来说，中央只掌握了根据全国平衡所确定的总产量指标。地

方为了完成这一指标，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来保证总产量指标的完成。这样既发挥了地方的积极性，也保证了国家计划的统一性。若不分主次地把种种计划都掌握在国家手里，实际上，不但不能加强计划的指导作用，而且削弱了计划的指导作用。

（甲）应划归地方行政职权内的各项事业

刘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不可能设想：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中，中央能够把国家的各种事务都包揽起来，而且样样办好。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分给地方，是完全必要的。国家的很多工作，例如农业、小型和中型的工业、地方的运输事业、地方的商业、中小学教育、地方的卫生事业和地方的财政等等，中央只应当提出一般的方针政策和大体的规划，具体工作应当交由地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去部署办理，并且应当把中央机关的干部分一部分到地方去工作。”例如1957年地方的基本建设，有许多是为供应中央各工业部门必需的物资而建设的。比如小煤窑、土铁厂、小的肥料厂等等，都要依靠地方去兴建，特别是有一部分投资同增加农业生产有重大关系的（如水利建设等）更需要由地方兴办。因此虽然地方投资已经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比例，1957年在这方面仍然将保持同去年差不多的投资额。现在中央正在同地方共同研究和拟定具体方案，准备逐步加以实行。在这个具体方案中，计划体制的分级管理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因为，为了保证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相结合的原则的贯彻执行，必须对国家当前的事业体制、计划体制和财政体制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乙）计划体制上的分级管理

在计划体制上依李富春同志的意见，就需要实行分级管理。

分级管理的原则是既要照顾到集中统一，又要照顾到因地制宜。凡需要全国统一平衡的各项重要指标，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综合平衡，并报国务院批准后列入国家计划，由国务院统一下达。地方性的局部性的属于地区平衡或者各部门自行平衡的各项指标，则由各省（市）、自治区或各部门因事因地制宜地自行平衡和安排，同时应报国务院备案，以便经过综合，纳入国家计划。其他许多次要的，种类繁多而情况又不易掌握，因而无法一一纳入国家计划的指标，则由地方或者各基层单位自行安排，国家只从大的方面加以筹划，并从价格政策供销关系上加以调节。凡纳入国家计划中的各项指标，可以分为三种，即指令性的指标、可以调整的指标和参考性的指标。各地区和各部门如要修改指令性的指标，必须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调整的指标，则可以在国务院规定的一定范围，一定幅度內自由调整。适应上述办法，计划和统计工作的制度、程序和表格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当的规定，应该尽快地研究修改。

七　大型和中小型工业的平衡

上节提及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把大型工业仍归中央办理，把小型和中型工业交由地方因地因时制宜地去部署办理，并且把中央机关的干部分一部分到地方去工作。因此在这里有讨论大型和中小型工业的平衡问题之必要。大型企业是我国工业体系的骨干，这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为了配合大型企业的建设和生产，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加强工业的协作，增加产品的品种，为了便于充分利用资源，充分利用原有企业，特别是公私合营企业，必须在建设大型企业的同时有计划地新建改建和利用中小型企业。因此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开工建设，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将要开工建设的许多规模巨大的工业企业，这就是组成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骨干，同时辅以许许多多中小型企业，其好处是在于在较短的时间內，能够增产更多的工业品，满

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我们现在来详细讨论一下：

（甲）关于企业规模大小的争论

关于大型和中小型工业有两种不同的相反的意见，有的认为建设大型工业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比较合理，因此主张多建大型企业，少建中小型企业。又有的因为建设中小型企业需要的时间较短，发挥投资的效果较快，主张多建中小型企业，少建大型企业。周恩来同志在他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他认为，某些工业部门和在某种条件下，建设大型企业是合理的，而另一些工业部门和在另一种条件下建设中小型企业就比较合理。在每一类企业中，一般地说都应该有一些大型的企业作为骨干，又应该有许多中小型企业来配合。在进行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建设的时候，为了达到既能于近期内迅速发挥投资效果，又能于远期内在经济上、技术上更为合理的配合，凡是有必要也有可能分期建设的大型企业，可以考虑分期进行建设；凡是资源有余，并且有其他条件的中小型企业，可以进行全面规划，为以后的发展预做准备。同时在规划中小型企业同大型企业相配合的时候，应该首先利用国营和公私合营的原有中小型企业和手工业，以发挥他们的生产潜力。

（乙）中小型工业有利的方面

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公私合营工厂中有一部分是应该合并和集中生产的，但是就全国来说，大部分必须按照原来的状况或加以必要的调整后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绝大多数公私合营工厂是制造日用消费品的工厂，人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要是多样的，经常变化的。如果把许多小工厂合并成为大工厂，就它们适应市场需要来说，不会有小工厂分散生产的时候那样灵活。以染色布为例，据陈云副总理的意见，在小的机器染厂里，一个品种可以只染五、六十

匹布，因此随时可以改变花色品种，适应人民需要。但是大型机器染厂改变生产程序的工程大，因此每个品种至少要染三百至五百匹布。如果我国的小工厂统统并成大工厂，那就决不能适应人民消费方面的多种多样和经常变化的需要。应该看到，解放以前，我国消费品的花色品种，不比现在少，但是制造这些消费品的工厂，绝大部分是小工厂。有些同志认为，把小工厂合并成为大工厂，产量就会提高，因此他们一心一意地合并工厂。我们需要一定数量的大工厂，因为许多最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必须大规模生产的。然而许多日用消费品工厂，并厂以后产量所以提高，主要的原因是商品品种规格减少，产品单纯的结果。这种“合理化”不能适应人民消费的需要，因此我们不应当鼓励这种错误的合并。且合并后有些公私合营企业不适当地打乱了原有的产销关系。有些修理业服务业，在改组时沒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它们的特点和总结它们的丰富经验，不适当地加以集中、合并或者改为只制造，不修理，这样就使得市民的日用家具和许多机关学校的汽车、科学仪器、医疗器械等等，沒有地方修理，缺少零件也沒有地方配，一些临时的零星订货也找不到工厂承做。现在的关键是要很好地保存和吸收它们中间一切有用的技术遗产来充分发挥它们的潜力。我们绝不能以工厂的大小来衡量它们的重要与否。例如长春华丰仪器制造厂，以制造滤过漏斗闻名。1951年，这个厂还是私营的，1956年初改为公私合营。以后这个厂注意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产品成本，滤过漏斗很快成为畅销的供不应求的好产品。1956年的产量等于1955年的三倍半，但是仍然满足不了要求。为什么“华丰牌”滤过漏斗受到这样的欢迎呢？原因很简单，质量好，价钱便宜，吉林省有两个工厂的化验室指出，它们曾经把华丰牌和进口的同样产品比较，过滤的效果是一样的，在价钱上进口的滤过漏斗贵得多。但生产这种驰名的“华丰牌”滤过漏斗的工厂，不是一个设备优良的现代化大工厂，它是一个规模很小的设备简陋的小工厂。全厂只有二十三个人，直接生产的

工人只有十七人，厂长有时还参加生产。厂里沒有勤务人员，所有清扫烧水等工作都是由工人自己分担的。全厂最贵重的设备，就是一架两尺多高的小机器——一台震筛机，价值也不过七百元。全部生产，几乎都是手工操作的，所以在这里看不到一架大机器，这个工厂的工人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出了质量良好的滤过漏斗，为需用滤过漏斗的大工厂所欢迎。

另外一个例子是无锡公私合营华钟梭子厂。虽然它是一个规模小，设备落后，只有五十八个职工的小厂，但是它对国家建设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的产品——梭子却是织布厂必不可少的生产工具。江苏省纺织厂用的梭子有70%以上都是靠这个厂供应的。显然，这个厂的生产，直接关系着许多个纺织厂的生产，也直接关系着江苏省纺织工业生产计划的完成。因此我们绝不能以大小来衡量工厂企业的重要与否。俗语说："胡椒虽小辣人心，秤锤虽小墜千斤"。在某些情况下，事物虽小，却有着它的特殊作用。

八　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平衡

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存在着两种不平衡的现象：（一）加工工业有余而原材料不足；（二）原材料有余而加工工业不足。现在来分别加以讨论。

（甲）加工工业有余而原料不足

几年来，我国煤的生产是不断增长的，但因为工业发展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煤的供应还是不很充裕。如果以1949年全国煤的总产量和需要量为100，那末1956年产量为357，而需要量则为378。通过商业部门供应市场的煤，1952年占总产量的37%，1956年就占45%。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煤炭生产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左右。象这样的发展速度，在我国历史上是从来沒有的，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但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

的需要却发展得更快。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生产用煤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7%左右，超过了煤炭生产的发展速度。在生产用煤增加之外还有生活用煤亦在增加，使煤炭的供应益加紧张。解放以前，城市居民只能烧到很少的煤炭，并且经常遭受煤荒和煤价暴涨的威胁。大部地区的广大农村则几乎常年烧不到煤炭。解放以后，人民生活用煤的供应情况起了根本变化。1956年供应城市居民生活用煤二千三百三十二万吨，比1952年增加一千一百四十六万吨，因而稳定了煤炭市场。在农村中，农业合作化以后，畜力和肥料的需要增长，农业经济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用作燃料的柴草，现在大部分拿来作饲料和肥田用，所以农民烧煤的比重，还要逐渐增加。我国煤的蕴藏量虽然很丰富，但是建设煤井需要技术、投资和比较长的时间，要在短时期内充分满足生产和生活的用煤需要，是有很大困难的。党和政府除了积极建设现代化煤井和中小型的煤窑以外，要求每一个机关、学校、团体、企业和家庭，都想尽一切办法来节省煤。

其次，谈谈一般的工厂。它们的情形亦大致相同。比如湖南的工人和全国所有的工人一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涌现出了大批的新人新事。但是，在当前的生产中，普遍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原材料供应不上，特别是钢板和钢材缺乏，以致使有些工矿引起了严重的待料情况。有些厂矿甚至因为沒有材料，造成计划不能按时完成，质量提不高的恶果。有时应该交货了，但是材料呢？还不晓得来自那里。有的工人甚至因为沒有料子，继续几天不能开工。有时厂里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拨借，好容易等到材料搞来了，可是计划又快脱期了。怎么办呢？为了争取时间只有赶吧！于是下面的干部，下面的辅助工都轰起来赶任务，日夜加班加点。这样带来的后果是质量不高，工人疲劳过度，容易发生安全事故。但这个问题不是个别单位的问题，而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第三，是生产钢材的工厂不够，所以钢材供应量跟不上社会

的需要。依黑色冶金专家孙德和先生的意见，我国在今后若干年内须建成不少个巨型钢铁基地来生产钢材，但由于我国过去的科学与工业基础的薄弱，存在着相当巨大的困难。最关键的困难是大量的复杂与高度现代化的重型冶金设备的取得。一个完整的一百五十万吨产量钢铁联合企业钢铁厂，本身便需要十多万吨的设备，另外还有相关的矿山、热电站、交通运输起卸的设备等等，数量也不少。重大的复杂的设备大部分要依靠国外供应，次要的问题是许多原料资源的勘探与调查研究需要相当长久的时间。此外厂址的选择，城市的规划，以及施工力量与物质的集结均需要相当长久的时间。一般的说，大致需要一个半五年计划的时间。这眞是一个使人“望穿秋水”的时间。

依孙德和先生的意见，为了更多地更快地加速我国钢的产量，除建设巨型钢铁联合企业外，还可以在我国建设数目较多的中型钢铁联合企业。这些企业将尽量利用典型设计，尽量使用我国机械工业可能生产的设备，广泛地更好地组织我国的机械工业来供应设备，将这些钢铁企业的基础放在国内供应的基础上来赢取时间，换取更多的钢材。

这里所指的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是指的年产约七十万吨左右的中型联合企业。根据几年来的工作经验，这些钢铁联合企业的设备是有可能在国内生产与制造的（除去极端少数的设备或零件需个别向国外订货)。在设计方面国内也是可以承担的，绝大部分利用重复设计与典型设计。这样可以节约设计的时间与力量，使一个厂的设计的绝大部分在好多厂的建设中同时重复利用，也创造了设备制造简化的条件，可以使用机械制造厂成批生产的优点，提高设备制造的效率与速度，减低制造成本。如果经过详细研究之后证明这是可行的，则在几年之内（大约三、四年),可以成批地多建设好多个类似的钢铁企业。他想中国幅员这样大，分批在不同地区根据不同条件建上十个八个这样的厂是不算多的。这些厂适宜于利用当地天然储藏量较小的资源，接近于使用戶，可以

减少国家长距离的运输负担，对于大厂来说，也可以进行生产品种和花色的分工。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于我国是需要的，但中型联合企业，根据不同的资源情况和地区情况，想起来也是需要的，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况。

因为这类厂的规模较小，设备供应上困难可能少一些，在资源调查研究方面简单一些，厂址选择也比较容易，同时大量使用典型及复用设计，进度上易于加快，可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加强国防的力量，因为这类企业已经达到相当可观的规模，有着本身的经济合理性。整个的生产过程也是可以尽量使用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在钢材的质量上和巨型的钢铁联合企业的产品沒有逊色的。此外由于采用氧气吹风炼还可以利用氮气与节余焦炉煤气供化工肥料或其他合成产品的利用。如果矿源的含磷高也可附产磷肥供农业增产之用。

在轻工业方面，我们也觉得原料供应不足，大家知道，轻工业的原料绝大部分取之于农业和农副业。例如我们的纱布是原料极有限制的一种产品，我们的粮食供应也不能说十分富裕，所以在农业生产方面，必须尽可能地增产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和生猪来满足人民生活和出口需要，1957年 2 月17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也说："棉纺织业、油脂工业、食品工业和其他日用品工业的生产，除少数行业以外，也因为原料供应不足而不能大量增产。"足见农产品增产的重要性。

（乙）原材料有余而加工工业不足

上面几个例子说明加工工业有余而原料供应不足的问题。亦有原材料供应有余而加工工业不足，不能尽量利用造成浪费的场合。据一位专家林文彪先生的意见，很多工厂在生产过程中，除主要产品外所产生出来的物质虽然知道可以用来再生产其他产品，但是由于运输不方便，而本单位又无能力用以制造其他产品时，常常作为废物抛弃，而不加以利用。如硫酸錏厂以焦炭为原

料，排出大量二氧化碳气体，而这种气体正是制造化学药品的原料，因为沒有连续使用，不得不丢弃。又如许多冶炼厂将大量二氧化硫排出而沒有利用，纸厂的废料可再经过发酵制酒精，现在也沒有得到很好的使用。化学工业用的苯，现在多是当作燃料用，而沒有用以制造其他有机化合物。类似这样的浪费情况是很多的，每个企业或多或少都有的。另外，有许多东西常常是本企业的废物，甚至是有害物，然而对另外一个企业又是需要量大而不可缺少的主要原料。例如煤矿中的沼气是一种在矿井中容易发生爆炸、影响工人安全的危险物质，然而它对制造国防橡胶工业上所大量需要的炭黑，却是一种宝贵不可少的原料。因此在瓦斯量大的矿山附近即应建立炭黑制造厂，以达充分加工利用国家资源的目的。

九 结 论

在这篇论文中，我仍用团团转的方法，把工业中有代表性的八个环节，一个接着一个写出来，以重工业中的钢铁生产开始，最后仍以钢铁生产结束，首尾合在一起，指出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钢铁工业的重要性比较突出。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整体系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有缺点。李富春同志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民经济各个大的比例关系（即平衡关系）基本上是适当的。第一个五年前四年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是很丰富的。但这并不是说年度计划的安排沒有缺点和错误，安排得更好些，年度间的波动可能小点，比如1956年在社会主义高潮的推动下，国民经济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成绩很大。但是基本建设规模偏大，人员招收多了一些，学生也招多了，工资基金和事业费用也就必须多增加，结果，国家财政多支了一些，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供应都紧张。1957年的计划，在去年大发展的基础上，必须根据财力、物力的可能放慢一步，这不是冒退，而是转向正常的发展。

我写这两篇论文的目的，当然要帮助青年读者理解政治经济学中最主要的两个原则——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规律。我们的计划经济就建筑在这两个原则之上的。沒有计划经济，要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主会义国家，是不可能的。过去几年中，青年读者对这两个原则不甚了解，因而有的甚至不承认有这些原则的存在，这是由于讲的时候沒有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所致。教本所引证的例子绝大部分是生搬硬套的外国例子。听起来似乎生疏而不亲切，所以觉得枯燥无味。因为枯燥无味，有的甚至不听，不上课，因而得出一个结论，只要重业务学习，政治学习可以丢在一边，这是大错而特错了。你将来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做事，在你的脑筋中如有这些原则性的东西存在，你就觉得你的工作是整个体系中的一部分，你本身是在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工程师，何等光荣，做起事来，一定更起劲，更有兴趣，更有意义，这是关系你的一生，不可不好好地考虑考虑。

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辩证唯物论所说的宇宙中的事物都有內在的联系，我们不能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察去看世界，因此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各个地区，是一个有机地结合着的整体。宇宙中的事物既有內在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用团团转的方法来写这篇文章，把首尾两个环节联系起来，不然的话，联系是不可能的。这篇文章是本这个信心写出来的。虽然毛病一定很多，有待国内学者的指教，但基本上是成功的。经过这样的“实践”以后，我的信心更坚定。因此我不同意朱熹的说法——“理在事外”，却同意王船山的说法——“理在事中”。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十二日）

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

（一九五七年五月）

现在我们人民内部矛盾很多，党与非党之间有矛盾，群众与领导有矛盾，群众与群众之间有矛盾，政府各部门之间也有矛盾，连我们小小的北京大学矛盾也是很多。这些矛盾我都不谈，我只谈今日中国的大矛盾。这就是生产力落后。这是一个主要矛盾，这个矛盾解决了，别的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不过要解决这个矛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需要长期努力才行

这里，我要着重谈谈中国人口问题。这个矛盾与前面讲的那个主要矛盾关系很大。我们解决主要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发展生产力，高速度地工业化。要高速度工业化就需要大量资金。资金从何而来？资金主要从国民收入中积累而来。但是，我国人口太多，本来有限的国民收入，被六亿多人口吃掉了一大半，以致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因此，中国人口如继续这样无限制发展下去，就一定要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

我们只要研究一下中国人口的增长情况就会感到人口问题十分严重。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才知道我国人口已超过六万万，四年来又至少增加了五千万。我大概算了一下，如以净增加率 2 ％计算，十五年后将达八万万，五十年后将达十六万万；如以 3 ％计算，十五年后将达九万万三千万，五十年后将达二十六万万。到那时候，超过今日世界的人口。我说的 3 ％的净增加率，估计并不算高，可能还保守一点。我的理由是：第一，几年来一般职业稳定了，年轻人一有职业就考虑结婚；第二，孕妇、产妇、儿童有许多优待，乡村都有新法接生，小孩死的少了；第三，生活逐

步提高，医疗卫生大有进步，一般死亡率降低了；第四，人的寿命不断增长，苏联人的寿命三十多年来已提高一倍，平均达到六十几岁；我国有句古话：“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后恐怕是“人生七十多来兮”了；第五，全国解放后，和平统一了，不打仗，要少死许多人；第六，社会根本变了，尼姑、和尚也结婚了，妓女也沒有了，多了许多生孩子的人。农村合作化后，生活好转，父母要为儿女成亲。因此，我敢说，我估计3％的凈增加率还是保守。这个数字，说明我国人口问题将愈来愈严重，一定要实行计划生育，非计划生育不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內，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毛主席说得对：“一切要从六亿人口出发”。而且还要有人口动态统计，否则人口统计不正确，所定的计划一定会被打乱，结果计划一定会落空，久而久之，就会出问题。

还有，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一个人就可以做了，请问其余九百九十九人怎么办？因此，我们考虑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自动化，我们现在不能多搞最大的工厂，要多搞中、小型工厂，就是因为中小型工厂可以安插好多人。但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就应当多搞大工业，列宁也说过，沒有大工业就沒有社会主义（列宁文集第七册第151页）。然而我们过多的人口，却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有人说，机械化自动化以后，人人可以减少劳动时间，每天可以劳动四小时甚至二小时，其余的时间用来学文化，求知识。这种想法是好的，但试问几万万人学文化，纸在哪里？校舍在哪里？教师在哪里？又有人说，我们还有十五亿亩荒地可以开垦。这是事实。但是好多荒地缺少水源，有何用处？而且农业部所说的荒地据北大生物学专家李继侗教授的意见，全是少数民族世世代代借以为生的草原地，绝大部分是不应开垦的。即能开垦，也

需要拖拉机，拖拉机哪里来？有了拖拉机，汽油怎么办？就算有拖拉机和汽油，又怎样去？今日的铁路已很拥挤，如何运去？运去之后要筑公路，要有不知多少大卡车，谁去开荒？我们江浙人口稠密，可以去，但是不能一个人去，若带家眷去，开荒的地方就要先造好多房子，开商店，办学校，办医院，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大量开荒。要造大卡车，造房子，开商店，办学校，开医院，就需要大量钢材、木材、水泥，而这些物资，又是我国现在缺乏的东西。所以除非科学家能快快制造合成的食品，我们就不能摆脱耕地的束缚。

总之，唯一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怎样实行计划生育，最重要的是普遍推行避孕。人工流产我是不赞成的，一则因为这是杀生；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三则会冲淡避孕的意义；四则会增加医生的负担，造成很大浪费。如果允许人工流产，年轻的夫妇们就会把希望寄托在人工流产上，不去避孕。

关于提倡晚婚问题，我希望青年们不要视结婚为完全私人的事，我们正在养成集体生活的习惯，难道结婚不是集体生活的一部分吗？

每对夫妇生几个最合适？有人主张生三个。我认为两个就够了，男孩代替父亲，女孩代替母亲。我还主张两个有奖，三个有税，以税作奖，不会加重国家负担。

今年增加的一千三百万人口，能在工业中安插的不过一百万人（据李富春同志第二个五年计划说明），其余的一千二百万人要下乡，但今日农民每人每年为国家所创造的财富包括农业税、公益金、公积金等在内，至多不过四五十元，而工厂中的工人因有新式的技术装备，每年至少可以为国家创造七八百元，若把一百万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农民合并计算，则每人平均劳动生产率一定很低，问题是在如何提高这一千二百万下乡的人民的生产力。若要提高，非把农业电气化、机械化不可，非增加化学肥料不

可。但资金在哪里？积累在哪里？去年我们的国民收入将近九百亿元，其中消费占79%，积累只占21%，即等于一百八十多亿元，这笔资金要分摊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包括林牧渔）、运输业、建筑业、商业（包括对外贸易）这许多单位之中，当然不能大踏步地前进。资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快，要解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间的矛盾”不亦难矣哉？因此我们非控制人口别无良图。

农民对于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总想多留一点；近来他们对于生活逐渐要向城市居民看齐，他们要多吃油，所以油的紧张超过粮食。他们要多穿，所以布不够；布不够，所以布票要折半使用。布票折半，老百姓相信共产党，沒有意见。但是，这样的事不能多做，多做了不好。因此，把每年增殖出来的一千几百万人放在农村是出于不得已的办法，以后的情形还要严重。若不早为之图，难免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

（原载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大公报》）

新　人　口　论

——一九五七年七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由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和正确的领导，人口的控制已有了办法。1957年10月26日发表的《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九条第三项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我深信有了这一项规定，五亿农民中多子多孙的思想，一定可以很快地扭转过来。

我国农村过去长期存在着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这个矛盾经过了解放战争胜利和土地改革完成，已经解决了。土改之后，农村中发生了新矛盾，这就是个体农民走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矛盾。经过了几年来的斗争和艰苦工作，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中国农民肯定地走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基本上解决了这个两条道路的矛盾。那么现在还有沒有矛盾呢？矛盾是有的，除了毛主席所说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外，我认为人口多，资金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矛盾。过去的矛盾是阶级矛盾，现在的矛盾主要的是生产矛盾。

一　我国人口增殖太快

1953年的普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查，普查结果表明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一共有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这是一个静态的纪录，如果五三年以后每年都有人口统计数

字，这样就成为动态的人口纪录。可惜的是这些数字现在沒有，今后必须建立生命统计，登记各个区域人口出生、死亡、结婚、离婚、迁入、迁出的人数，这样才有正确的人口统计。现在一般估计中国人口大概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三百万，增殖率20‰，如果这样估计下去，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增殖率20‰是怎样得来的呢？1953年政府在二十九个大中城市、宁夏全省、共余各省每省选十个县进行普查，另有三十五个县只查一区、两镇、五十八个乡、九个村、共有人口三千零一十八万人，出生率37‰、死亡率17‰，因此人口增殖率为20‰，并且说城市的增殖率高于乡村；上海一地的增殖率是39‰，城乡平均起来每年增加20‰。我很怀疑四年来增殖率是否仍旧是20‰呢？普查的数字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拿20‰来解释以后四年的情况（自1953至1957），恐怕有出入。由于以下七方面的考虑，我认为增殖率或超过20‰：（一）结婚人数增加，在解放以前青年人毕业即失业；现在毕业以后，国家分配工作，经济情况改善就具备了组成家庭的条件。社会上大家都有职业，对于父兄、亲友的接济少了，负担減轻，也促使结婚人数增加，并且政府照顾已婚夫妇，原则上分配在一个城市內工作，生育的机会也就增加了。（二）政府对于孕妇产妇和婴儿的福利照顾，产妇产前产后有五十六天的休假，这在解放前是沒有的。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乡村中产婆接生已为正规接生所代替，婴儿死亡率下降，托儿机构普遍建立，可替多子女的家庭，进行一部分教养儿童工作，子女入学可以享受公费待遇。(三)老年人死亡率减少了，以往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是人生七十多来兮。对孤寡老人政府有照顾，退休有养老金，眞是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四）以往几乎年年有內战，人民遭受兵燹、水旱灾害，流离失所，大量死亡。现在国內秩序空前安定，內战消灭，盗匪绝迹，凶杀案件减少，人民死于非命的减少。（五）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尼姑与和尙大半还俗结婚，将来和尙和尼姑的人

数也不会多。在资本主义国家不能解决的娼妓问题，我们也彻底解决，大家都知道妓女因丈夫太多，是不能生育的。（六）农业合作化以后，人民生活改善，老年人尚有旧思想的残余，希望多福多寿，什么五世其昌，儿孙满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种种格言，到处传播。只要经济上许可，就忙着替儿子娶媳妇，成家立业。（七）政府对于一胎多婴的家庭，除了奖励以外，还有经济上的补助。诸如此类，都是增加出生率，减少死亡率的因素。因此，我认为近四年来人口增殖率很可能在20‰以上。

二　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

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说：“国家建设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我们可能积累多少资金和如何分配资金。我们的资金积累较多，分配得当，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就会较快，国民经济各部门就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国民收入是全国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物质财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全部国民收入都归劳动人民自己所有。劳动人民把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用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部分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用作积累。在分配和再分配国民收入的时候，必须使消费部分和积累部分保持适当的比例。消费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妨碍人民生活的改善；积累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降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这两种情况都是对人民不利的。”

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定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一定要增加积累；要增加积累，一定要增加国民收入。我国的国民收入在1956年将近九百亿元，其中消费部分约为79%，积累部分约为21%。因人口大，所以消费大，积累小，而这点积累又要分摊在这许多生产部门之中，觉得更小了。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就可以

把资金多积累一些。

三　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

我到浙江视察三次，旧时代的浙江，分成十一个府，我到了十个府。令人注目的是这些地方儿童特别多，因此引起了我的注意。每到一个村必定向社里的负责干部和老农了解近年来村里出生的人口有多少，死亡的有多少，生死相抵以后，净增加有多少。各地人口增殖的情况虽不一样，我的印象是顶少的也增殖了22‰以上；到上海视察时，感觉到增殖率更高。1955年视察返京以后，就视察所得准备好关于人口问题的发言稿，内容是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打算在1955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提出以前先在浙江小组进行讨论，小组会上除少数人外，其余的代表们好多不表示意见，好多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认为我所说的是马尔萨斯的一套，也有的认为说话虽与马尔萨斯不同，但思想体系是马尔萨斯的。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我认为都是出于善意，故我自动地把这篇发言稿收回，静待时机成熟再在大会上提出来。今年二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中明确地提到人口问题，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我就把旧发言稿在扩大最高国务会议上简略地讲了一遍。现在就把这篇稿子加以补充，提出来请各位代表指教。

四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

大家都知道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学说是反动的，马尔萨斯说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即由一增加到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而食物是按算术级数增加如一、二、三、四、五、六、七……，过了几代，人口增加太多，粮食不够吃了，因此产生疾病、瘟疫，甚至战争，人民大批死亡，人口锐减，至此人口数量才能与粮食供应相平衡。这样世界经常处于恶性循环中，人类的前途非常黯淡。马尔萨斯《人口论》于1798年出版，

当时正值工业革命以后，社会经济发生根本性的变动，工人们大量失业，普遍贫穷，时有暴动，人民对于资产阶级政府感到很大的不满。马尔萨斯写人口论的本意，就在于从理论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政府，掩盖英国政府的错误措施。他的人口理论无异乎告诉工人们说，工人们的普遍贫困，不是政府之过，主要是由于人口增加太快，而粮食增加太慢引起的。这种论调是他“人口论”的出发点，也就在这一点上他根本错误了。当时法国拿破仑在欧洲挑起了大战，人民死得很多，粮食不足的情况好转了一些，因而大家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很正确。但是拿破仑战争以后，他的学说应用到德国的情况上，就不符合实际了。由于当时德国科学研究的发展，粮食也按几何级数增加，比人口增长的速度还要快，他的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的理论基础就此破产。马尔萨斯沒有想到以后的科学研究能够飞跃地发展，使得粮食也按几何级数增加，并且比人口增加得更快。应该了解，土地和劳动力这些自然条件，虽是农业生产最根本的条件，但它们在发展生产上是有一定限制的，而科学的发展则是无止境的。科学愈发达，人民的文化水平也愈加提高。知识增加，一方面促使劳动生产率增长，另一方面促使生殖率减低，例如社会上层分子和脑力劳动者，娱乐的方式较多，如打球、划船、骑马、打猎等多方面的活动，减低了他们的性欲。在法国上层分子的生殖率停滞不变，他们把生儿育女看做包袱。又如约翰雷指出，夏威夷群岛的土地非常肥沃，食品有大量的增加，但人口并不跟着增加，主要是因为该处的居民并不是喜欢多子多孙的，这又有力地反驳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因此他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的理论也就此破了产。

五　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

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措施出发，我则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让我用中国的实际情形来说明这个不同之点。

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机械化仓库最近正式投入生产。这座仓库高达三十五公尺，有二十四个圆仓和十二个星形粮仓，能够储放七万吨粮食。粮仓的一端，有一个六十公尺高的工作塔，粮食用火车运来后，卸车、运送、滤尘、筛选、计量、测温等都是用工作塔里机械操作，自动电铲只用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把一车厢粮食卸完。粮仓里设有电阻温度计，化验工人在地下工作室里就能通过自动测温仪表箱准确地测量每个粮仓里的温度。发现仓里温度高，把电钮打开，在六天内就能把七万吨粮食全部进行一次通风。如果用人工翻晒这些粮食，需要三百个劳动力连续晒一年半才能晒完。这座机械化仓库是为石家庄食品制造工业储藏原料建设的，对保证产品质量有很大作用（根据1957年 5 月10日《大公报》）。关于粮仓问题我曾与粮食部的负责人谈过，知道粮食集中在政府手中者今年约有一千亿斤左右（包括农业税和征购之数），此外尚须加上二百亿斤从上年留下来的，约共一千二百亿斤。一亿斤等于五万吨，共等于六千万吨。若这个数量的粮食，皆用机械化仓库来储藏，共需建筑八百五十七座，每座建设费约在三百万元左右，共需二十五亿五千万元。但实际上每座粮仓的利用率不过60—70%，因为年岁有丰歉之别，丰收时，收集的粮食可以堆满仓库，但歉收时，或只能利用60—70%。因此我们要建设可以容纳一亿吨粮食的仓库一千四百二十八座，共需投资四十二亿八千万元，试问资金在哪里？有了资金，钢铁、水泥、木材在哪里？

假定每座仓库需用三百个劳动力（旧式仓库的一个保管员只管五十万斤），共需用四十二万八千四百人，尚且要花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晒完。而现在每座只需十五个技工在六天内就能把七万吨粮食进行一次通风。就是只要原来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就可完成任务了。其余二十分之十九的人是多余的。因为这十五个技工的工作效率高，所以他们的平均工资是八十元；因为工资高，所以购买力大，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可以提高，社会主义的目的可以

达到。但我们要注意的，是那二十分之十九的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用什么方法来提高呢？在目前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压力之下，要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已觉得很吃力，若每年还要生出一千三百万人来，这个问题就日益严重，不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

据上海国棉二厂负责人楼葆华先生的厂矿调查报告（载1957年10月9日《人民日报》），从1953年到1957年7月，上海国棉二厂全厂女工已生了三千零四十九个小孩，差不多等于全厂现有的女工总数。1956年和解放前的1946年相比，生育率几乎增加三倍左右。女工的生育率高了，另一方面婴儿的死亡率却降低了。解放前，儿童死于麻疹、白喉、天花、痢疾、百日咳的很多，而今天，儿童死于这些疾病仅仅是个别的了。由于女职工的生育率太高，就产生了下列几种不良的现象：（1）产生了或扩大了房子不够住、或生活困难的问题，至少是影响了生活的改善。仅以工人住宅的拥挤现象来说，平均每间房子都有五人左右。目前因家庭人口多而申请要房的占全部要房子的人的40%—50%；（2）从1957年1月到6月，全厂因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需要补助的职工有四百一十四人，占被补助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3）因妇科疾病而造成的缺勤率，在1956年有六千八百二十四个工作日，在造成缺勤率的各科疾病中占第一位；（4）有些职工由于生育多，家务操作繁忙，生活不好，营养不良，影响了身体的健康；（5）有些女工因子女多无法学习文化；（6）有的青年女工因生了孩子，忙于家务，降低了政治进取心。

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五十个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处都是二十分之一），请问其余九百五十人怎么办？因此，我就考虑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和自动化。我们现在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业，要多搞中、小型工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小型工业可以安插好多人。但是我国搞社会

主义，就应当多搞大工业，列宁也说过，沒有大工业，就沒有社会主义(《列宁文集》第7册第151页)。然而，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有人称我为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称他们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

今年增加的一千三百万人，能在工业中安插的不过一百万人（据李富春副总理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说明），其余一千二百万人要在乡村中工作，但今日的农民，每人每年为国家所创造的财富，至多不过八十多元，而工厂中的工人因有新式的技术装备，每年可以为国家创造四千多元的财富。二个生产率的对比如一与五十之比（详见说明——本书第163页附表一），二者的生产率相差如此之巨，主要原因是工业生产能利用新式技术装备（有些是最新式的），而农业生产只能利用畜力为主要动力，加以近来有些省份牲畜瘦弱死亡不少，致有用人力拉犁来耕地的现象，更影响到农业生产。且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有二个条件，一是水，二是肥，必须有水，施肥才有用。如果沒有水利设备，遇到旱灾或者水灾，再多肥料也不能希望增产。北方农民缺乏积肥习惯，与水利条件太差是有关系的。我国技术工程落后，对于水旱灾害尚无控制把握，同时因工业落后，国家尚不能供应大量化肥。凡此皆是工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差悬殊的主要原因。我说这些话，工人方面或可能发生一种错觉，误认为他们为国家创造的财富多，他们的功劳大，因而要求增加工资，殊不知很多工业部门的生产资料是由农业部门创造的，它们的货币积累一部分是由其他部门造成的，不过制造的最后阶段落在他们的部门之內，因而最后的结果在他们的部门內体现出来而已。

若进一步把以上所述的一百万工人和在乡村中安插的一千二百万农民合拼计算，则每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一定低得可怜，问题是如何提高这一千二百万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若要提高，非把农业电气化、机械化不可，非大大地增加化学肥料不可。但资金

在哪里？积累在哪里？有了积累，物资如钢材、水泥等在哪里？洪水为患自古已然，于今尤烈，1954年的洪水，可以作证。于是我想到要解除农民被洪水淹没的损失和淹死的危险，最好能在三峡兴建一个能够防御千年一遇的大洪水的水库，从此一劳永逸，可以使农民高枕无忧，明知投资数目不小，工程浩大，长江上游淹没损失也可观，但从国家和农民的长远利益出发，还是合算的，据电力工业部水电总局总工程师陆钦侃先生的估计，三峡工程造价达一百余亿元；为配合这样大的电能，还要建设相应的工厂企业来充分利用。它们的造价（投资）要达五六百亿到一千亿元。哪里来这许多钱？有了钱，哪里来这许多钢材和水泥？况工程浩大，二十年内恐不能完成修建。一旦完成之后，农民不知要得到多少好处。不但水利建设、电力建设会把农村全面改观，即机械、肥料、运输、燃料以及建筑材料等等亦将大量出现于农村，为农业服务，农村将成为重工业的重要市场，不过今日尚须耐心等待一个时期。这个等待，是指象三峡这样的巨大工程而言。但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生产关系变了，生产力正在猛力地向前发展着，对农业小型机械化问题，必须快快有积极的准备。目前农村中的关键问题，是忙闲不匀的问题，如南方推行双季稻，在割早稻后即种晚稻的十五天内，农民实在是忙不过来，所以今后农村富裕增产的关键，在于农忙忙不过来的时候有机械来帮忙。农民所最需要的机械是：（1）割稻机；（2）插秧机；（3）抽水机。

我在上面说过，我们的缺点是消费多、积累少。1956年我们的国民收入将近九百亿元，其中消费占79%，而积累只占21%，亦即等于一百八十多亿元，这笔资金要分摊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包括林业、畜牧业、渔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包括对外贸易业）这许多单位之中，每分单位分到的，为数极微，当然不能大踏步地前进。资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决“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我们不屑

向美国借款，我们亦不能用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的方法来榨取资金，亦不能仿效日本以甲午赔款作为工业化的本钱，我们只得自力更生，依靠自身的积累，但自身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79%与21%之比，可否把消费减少一些，把积累增加一些呢？一看我国实际情况，这是带有危险性的。

我们的国民收入只有这一点，分为积累和消费两部分。积累多了，消费就少了，对于人民的生活，难免照顾得不够。反之，消费多了，积累就少了，就必然推迟工业化的完成，故二者之间必须求得一个平衡。至于如何平衡，要看实际情况。在苏联，消费占75%，而积累占25%，即占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在中国，由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人口较多，消费比重当然要高一些，所以有79%与21%之比。我们不能如苏联一样把积累提高到25%，把消费压低到75%，那就等于说我们只顾工业化，不顾人民了，不免会出乱子。我们现在把每年增殖出来的一千二百万多余人口放在农村，虽然出于不得已，但难免发生副作用。今日的农民对于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总想多留一些，对于生活上的需要要向城市居民看齐。他们要吃油，所以今日油的紧张超过粮食；他们要穿新衣，所以布不够用。这个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但每年还要增殖出来一千三百万人，除在工业部门安置一百万人外，要把其余一千二百万人口安置在农村，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看齐，长此以往，如何得了。所以对于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不免给政府带来很多的困难。因此，我主张要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一面要积累资金，一面要控制人口。不然的话，徒劳无功。

我说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我所指的恩德是：在土改胜利之后，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七亿亩的土地，并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租粮六百亿斤及各种超出任务的剥削，土改后，从1950年到1956年七年中，国家对水利的基本建

设拨款共达三十亿七千多万元，发放救灾救济经费十三亿一千余万元，用于推广优良品种、新式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及防治病虫害的经费十二亿八千余万元。以上三项共五十六亿六千余万元。此外农民在七年中得到国家八十亿元的低利贷款，从此不再受高利贷的剥削。此外，今天即最贫穷的农民亦不致卖男卖女，挨饿受冻，流落街头，沿街乞讨。他们在农业社的照顾下，都能生活下去，此外在农村中还实行了五保制，使老有所恃。我的意思政府对人口问题若不再设法控制，这些恩德不免一变而为失望与不满。

六　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

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的五年计划的次数愈多，生产率也就愈大，而所需的技术装备也就愈精。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一个工人配备的资金，是固定基金一万卢布，流动基金三千卢布，共计一万三千个卢布。至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每个工人配备的资金六倍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所配备的资金，第五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配备的资金即达十二倍。所以苏联生产能力的继续增长，是由于每年技术装备的倍数增加。中国以后的情况也应该这样，因此要提高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就要大力地积累资金，加强每个工人的技术装备，同时还要控制人口，因为如人口增殖任其自流，资金很难迅速地积累。积累资金最快的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工人的收入也当然提高，如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不能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例地提高，二者收入的差别愈来愈大，就影响着工农联盟，因此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

以上已说过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一个工人配备的资金是固定基金一万卢布，流动资金三千卢布。我国自1953年至1955年，国营、地方国营及公私合营工业每个工人装备的生产用

的固定资产为1953年的五千二百七十三元，1954年的六千零七十二元，1955年的六千八百三十五元，一个卢布约等于人民币五角，中苏两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给工人的技术装备大致相等。（附表二，见本书165页）

七　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我们要积累资金，最好发展轻工业，因为轻工业的特点是投资少，建设易、获利多而且快，可以更有效地积累资金，用来更多更快地发展重工业。现在新建一个十万纱锭、三千五百台布机的棉纺织厂，共需投资三千五百万元。在正式投入生产以后，只要一年时间，就可收回全部投资（包括工业、商业利润和税收）。印染、毛纺织厂等收回的时间还要快一些。因此轻工业的扩大，不仅不会影响重工业的建设，而且有利于重工业的发展。

但扩大轻工业的建设，必须在资金和原料足够的条件下进行，因此我们要谈一谈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轻工业的原料绝大部分来自农业，我们要建设棉纺织业，一定要向农业取得棉花；要发展丝纺织业，一定要向农业取得蚕茧；要发展制油厂，一定要取得大豆、花生、芝麻、油菜籽等等；要发展制糖厂，一定要取得甘蔗和甜菜；要发展毛织业，一定要取得羊毛。今日油、糖、布的供应，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它们的紧张情况，超过粮食。要增加这些物品的供应，一定要扩大棉花、蚕桑、大豆、花生、芝麻、甘蔗、甜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这不得不缩小了生产粮食的种植面积，而粮食产量就受到了影响。所以各种经济作物与粮食互争土地，二者之间一定要求得一个适当的平衡。若人口无限增殖，这一适当平衡将更被破坏，因人口增殖，粮食必须增产，经济作物的面积就要缩小，直接影响到轻工业，间接影响到重工业。因此人口的增殖，就是积累的减少，也就是工业化的推迟，故人口不能不加以控制。

现在食糖异常缺少，紧张情况，不亚于食油。若扩大种植甜菜的面积，不啻与粮食争地。吉林省境内的新中国制糖厂和范家屯糖厂的甜菜原料，主要依靠中部地区的榆树、怀德、九台、德惠等县供应。但是这些县份又是吉林省出产粮食和大豆最多的县份。如果在这里大量发展甜菜生产，就会削减粮食和大豆的播种面积。同时，因为土地少，不能进行合理轮作，反而会影响甜菜产量和质量的提高。如1953年甜菜每公顷产量为二万四千斤左右，含糖率平均占14.3%，到1955年每公顷甜菜产量就降低到一万八千斤，含糖率平均只达到11.4%。象这样发展下去，制糖工业只有退缩，不能前进。

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重工业与轻工业间的关系，还不如重工业与农业间的关系之为密切。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如农业不能很快地发展，难望重工业可以大踏阔步地前进。今年紧张情况的解除，共希望悬于秋季之大丰收。

我国各项建设，首先是重工业建设，所必需的成套设备和各种重要物资，好多是从国外输入的，但要进口多少重工业物资，得先看出口多少农业和轻工业物资，而轻工业物资也要用农业物资作原料。由于我国化学工业特别是有机化学工业还不发达，轻工业的原料，大约有90%以上要依靠农业，故农业的扩大或缩小，丰收或歉收，对重工业或工业化有决定性的影响。若人口的增殖听其自流，不加以控制，工业化的进程，未有不受其影响者。

据对外贸易部叶季壮部长的发言（在人大第四次会议上），1957年计划进出口贸易总额99.55亿元，比上年实绩减少8.4%，其中进口47.55亿元，比上年实绩减少10.2%；出口52亿元，比上年实绩减少6.6%。这是因为1956年某些地区农业因灾减产，出口物资供应比较困难。但主要原因是过去几年在我国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约占75%左右，矿产和机械等工业品约占25%。由于目前农业增产的速度受着耕地面积的限制和自然

灾害的影响，同时由于人民对轻工业品的需要逐步提高，若干种商品的出口势非减少不可，以适应国内市场日益增长的需要。但由于增加了矿产品，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各种小土产的出口，今年仍然保持了相当的出口额，能够适当地进口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重要设备。但无论如何，由于进出口贸易的减少，工业化的进程未有不受其影响者。

八 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二十世纪根本的社会变化和卓越的科学技术成就，不是时间上的巧合，它们之间有着內部的必然的联系，因为物质生产的发展是它们的共同基础。航空、无线电技术和遥控技术的出现，尤其是原子能的发现，沒有现代的强大工业是不可能的。不必说别的，就如不锈钢我们自己不能制造，苏联也不多，向其他国家去买也是很困难。我们在四川新建的化肥厂，还不能解决它的不锈钢问题。建设一个化肥厂，从设计、建筑、安装到开工，大体也要五、六年，一般讲来，应该建筑在工业化有了基础的国家，甚至于有高度工业化基础的国家，才能大量发展肥料工厂，因为技术比较高，用的材料也比较高。这个增长了的生产力，乃是深刻的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俟科学发展之后又回过头来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理论与实际结合得好，会使我们的研究水平得到提高。从实践提高到理论，再用理论来进一步指导实践。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是科学工作者的准绳，也是追求科学眞理的唯一途径。中国科学院工作报告草案，向全国人民指出了它的较有基础部分和不足部分的状况。例如得奖的论著主要属于我国目前基础较好的学科；一些新兴的学科，特别是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所急需的几种学科，得奖的论著很少。这正是过去历史情况的眞实反映，可以喚起科学界的注意。“正确地更多地转移力量于急需的薄弱方面。”但同时如果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继续向前推进，自然而然会促进本门內的科学研究，有重点地建立新机构并充实

研究力量。以技术科学的研究工作而论，所谓技术科学的研究工作，就是对实际问题求取理论上的解答，并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考验。现在有许多地方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出一大批有关农业生产技术上的问题，要求农业科学研究机关予以解答，我们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而研究工作者在解答农业生产中不断出现的新的科学技术问题时，找到了新资料。这些新资料是新理论最丰富的源泉。脱离实际来谈技术科学研究，是不能想象的。我们要使中国的科学赶上世界水平，只有在生产发展的条件下才能达到。我们不能把科学研究分成理论和应用两部分，因为所谓理论就是为实际问题求取理论上的解答的理论，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过去苏联科学院曾经作过这样的划分，现在知其不恰当，已把它去掉了。此外，科学研究，一定要在生产要求的压力下，才能加速推进。如我们的生产部门不能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而独要督促研究部门单刀匹马、长驱直入，无异缘木求鱼。周总理在1957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向科学进军一节中亦说："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特点，是科学和生产的密切结合。生产对于科学是基本的推动力量。在国民党时代，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衰落，科学家们虽然也作了些研究工作，但是无法在生产上发挥作用。解放后八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部门向科学研究部门提出了大量的要求，我们科学家在这方面就有了充分的机会来发挥他们的才能，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由此观之，我们必须首先推进产业部门的技术装备，从速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后才能奠定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现在我国科学工作的条件虽然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受现有工业水平和国家财力的限制，还不能完全满足开展研究的要求，欲达到这个目的，唯有加速积累资金，一面努力控制人口，不让人口的增殖拖住科学研究前进的后腿。

此后我国的科学研究力量大部分放在科学院，二百二十七所高等学校和许许多多产业部门，它们不仅集中了大批科学研究人

材，并且它们研究的方面很多，又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这对于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同时为了支援新建的工业地区和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科学文化建设，也需要在这些地区建立新的高等学校和新的科学研究机构，需要一些科学家“离开原来的研究环境”到这些地方去工作。在初到新的研究环境时，研究工作暂时可能受到一些影响，但从长远看来，这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好处是很大的。因为每门科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某门科学愈向前进，就愈需要其它有关科学的配合（近代科学的特点是各门科学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十分密切。国家建设中的重大科学问题，也往往要由许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解决，所以我们现在在科学的许多重要方面进行着研究工作）。例如人造卫星的制造和发射是一件很复杂的综合性的科学工作，牵涉到火箭技术、冶金、机械、天文、数学、物理、化学、气象、地球物理、大地测量、无线电电子学等方面。再以国际地球物理年为例，为什么各国科学家可以自今年（1957年）7月1日起举行国际地球物理年？其中理由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和工程技术上的进步异常迅速，无线电物理和火箭方面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使得人们对高空测量有了很好的工具，他们可以利用这方面的新成就对地球进行观测，从而可知沒有无线电物理和火箭方面的科学研究的配合，对地球进行观测，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求所有有关生产部门都能按平衡原则向前推进。这有待于更多资金的积累和人口的严格控制。

九　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关于人口与粮食的关系，因限于篇幅，不愿在这里多谈，拟另作一文专论之。在这里，我只说我国地少人多，全国六亿四千万人口，每人平均分不到三亩地。虽有人说我国有十五亿亩荒地，但这些荒地有的是石山，有的是沒有水源的，有的是少数民族世世代代借以为生的草原地，根本不能开垦的，到底有多少荒

地可以开垦，迄无确实统计，加以工业落后，财力有限，一时尙不能大规模进行垦荒。虽然在1953年至1956年之间，每年开垦了一千四百多万亩荒地，但由于人口的增加，每人平均分到的耕地，已自1953年的二亩八分降至1955年二亩七分。况自然灾害影响着农业生产，使农民的收入极不稳定。如江苏省在1955年每戶农民平均收入是三百零六元（这是抽查的材料，不能完全代表江苏省全部情况），假定一戶四口，每口不过分到七十六元五角。该省1956年遇到灾害，全省农民平均收入每人下降到四十九元九角。农民收入之不稳定如此，要完全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必需多兴办象三门峡这样的大水利工程，这有待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推行，尤有待于资金的多多积累。故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们准备在几年內，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戶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戶以外，通通变为余粮戶或者自给戶，使农村中沒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主席这些话是从他心中说出来的，这是全国人民之福，倘能把人口控制起来，这个崇高的愿望，不难成为事实。

十　几点建议

（一）1953年举办的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使我们对于全国人口按性别划分，按年龄组别划分，按民族构成划分，和按城镇与乡村划分，都能够明白它们的对比和眞相，这是很好的，但要实施明健的人口政策，和帮助科学家进行研究工作，还必须认眞举办关于人口动态的统计，如出生、死亡、结婚、离婚和迁徙等都应有完整的统计公布。因此我建议在1958年至迟在1963年进行普选时，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使我们可以知道这五年中或这十

年中我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接着认真举办人口动态统计，在这个基础上来确定人口政策，一面把人口增长的数字订入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内，使以后计划的准确性可以逐步提高。

（二）我们在上面已谈到夏威夷群岛的人口并不跟着食品的增加而增加，主要原因是因为该处的居民不是喜欢多子多孙的。但在中国情形适相反，宗嗣继承观念太深，只要生活好一些，便想娶女子，便患无后代，便畏出远门，便安土重迁。加以种种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如“早生贵子”、“儿孙满堂”、“五世同堂”、“五世其昌”、“多福多寿多男子”等等，支配着他们的行动，所以在妇女心理中，以生子为天职，以不育为大耻；在父母心理中，嫌儿媳不生育，重婚纳妾，理所当然。但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使广大农民群众都明知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一面大力宣传早婚的害处，迟婚的好处，大概男子二十五岁、女子二十三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但暂时不考虑修改婚姻法，理由是把结婚年龄提高，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是由于节制生育的宣传教育还做得不够，农村中老少男女还沒有普遍明白节制生育的理由和需要，操之过急不免发生副作用，恐农村中的青年男女怕婚姻法修改后提高结婚年龄，影响他们的结婚，不免发生争先恐后结婚的情况。俟宣传工作收到一定的效果以后，再行修改婚姻法亦未为晚。如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照目前的计算，国家在每个孩子的教育及就业装备上要支出一万元上下。一般人往往不够了解，一个孩子要求家庭的开支，还抵不上要求国家的开支大，因此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况控制人口，为的是要提高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使他们能过更快乐更美满的生活。

（三）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一则因为这是杀生，孩子在

母体里已经成形了，它就有生命权，除非母亲身体不好，一般不能这样做；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我有几个亲戚身体本来很好，刮了子宫后不是生这样病，就生那样病；三则会冲淡避孕的意义，年轻的妇女们就会不关心避孕，把希望寄托在人工流产上；据北京几位名医谈话，有些人刚作过人工流产，很快又怀孕，又跑到医院里去吵闹，主要原因是依赖人工流产，不认真避孕了，尤其是男子，对避孕不负责，不积极，只图自己一时的快乐，不顾女子长期的痛苦，实在太不公平；四则会增加医生的负担，苏联人口只有两亿，而医生有三十五万之多，病床有一百三十五万四千张，我国人口大于苏联三倍以上，而能做人工手术的恐怕不到六万人，医院情况已经很紧张，若再把人工流产的任务加在他们的身上，深恐耽误其他的治疗工作。因此，我诚恳地请卫生部好好地考虑。

说　明

附表一

农民每人每年为国家创造的财富

	1953年	1956年
（一）农民为国家创造的财富：		
1. 按农业总产值计算：		
农业总产值（按1952年不变价格，亿元）	499.1	580.3
每人平均（元）	102.8	112.2
2. 按农业净产值计算：		
农业净产值（按1952年不变价格，亿元）	369.5	426.9
每人平均（元）	76.1	82.5
3. 按农民直接向国家缴纳的部分计算：		
农民直接缴纳部分（农业税及附加、公债，亿元）	27.1	37.3
每人平均（元）	5.6	7.2
（二）农民人口数（万人）	48,546	51,723

〔说明〕

1. 农业总产值和净产值均系用计算国民收入时所用数字，农业总产值比现在预计数约大五千万元是为了和农业净产值口径取得一致。

2. 农民人口数系全年平均人数。这个数字比谭震林同志在《关于我国农民收入情况和生活水平的初步研究》一文（见《人民日报》5月5日第三版）所引五亿二千八

百万人为小。

3．1953年农民直接向国家缴纳的部分只包括农业税一项，1965年除农业税外尚有农业税附加二亿九千九百万元和公债一亿三千八百万元。

工人每人每年为国家创造的财富

指　标	计算单位	1953年	1956年
（一）工业生产的全部价值计算			
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的全部工业）	千元	35,576,744	57,136,410
生产人员数			
全部生产人员	万人	505.28	646.788
生产工人	万人	419.5	459.76
每人平均创造价值			
每一生产人员平均创造价值	元	7,041	8,834
每一生产工人平均创造价值	元	8,481	12,427
（二）工业生产的新创造价值计算			
工业净产值（不包括手工业全部工业）	千元	11,572,291	19,567,090
生产人员数			
全部生产人员	万人	505.28	646.788
生产工人	万人	419.5	459.76
每人平均创造的新价值			
每一生产人员平均创造的新价值	元	2,290	3,025
每一生产工人平均创造的新价值	元	2,759	4,256

〔说明〕

1．工业总产值是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不包括手工业产值。这个总产值数字预计较早，因此小于作1957年计划的预计数和统计公报数，但计算国民收入时却是按这个预计数计算的，所以仍列此数。如果按照1957年计划上的1956年预计数五百七十五亿八千九百六十三万三千元计算，则每一生产人员平均创造价值为八千九百零四元，每一生产工人平均创造价值为一万二千五百二十六元。

2．工业净产值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不包括手工业净产值。但国民收入计算时间较早，其1956年总产值系预计数，小于作1957年计划时的1956年预计数，并且比实际数亦小。

3．生产工人数1953年按国家统计局年报数，其中国营、公私合营，系年平均数，合作社营和私营由于没有统计年平均人数，故采用了年末到达数。1956年按1957年计划时的预计数。

4．全部生产人员1953年按国家统计局研究室的材料，1953年全部工业生产人员年平均人数为五百零五万二千八百一十六人(不包括工业企业附属单位人员)。1956年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人员每人生产的价值按1957年计划上1956年预计数，私营系按照上述经济类型的材料，加以估算而得。

〔注〕表内最后一项数字（每一生产工人平均创造的新价值四千二百五十六元），已经把重复部分扣除后计算出来的。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

现代工业的构成是异常复杂的，每种产品的零件，部件常须经由许多地区，许多

行业，许多工厂，才能拼凑成功。从原料到成品经过逐步加工有无数次的工序，先把原料成为若干中间产品，最后才叫作成品。中间产品具有二重性，就制造它的工厂说是成品，就采用它的厂矿说都是原料。还有更复杂的，例如煤炭，既是煤矿的成品，又是工业的原料，同时又是家庭用的消费资料。因许多产品都有两重性，计算总产值时就发生很大的矛盾。若把中间产品的价值，统计进去，就一定会发生重复，甚至重复至数次以上，以致总产值失去了真实。因此，我们要把中间产品严格地区分开来，不然的话，计算出来的净产值就会偏高，不能真实代表国民所得。

附表二

1953—55年国营、地方国营及公私合营工业每个工人装备的生产用固定资产

单位：元

部门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总计	5,273	6,072	6,835
电力部门	51,197	58,828	58,196
燃料采掘部门	5,021	5,574	6,020
铁矿及锰矿部门	1,887	4,407	4,057
化学矿开采部门	828	939	949
其他非金属矿开采部门	952	1,128	3,599
森林采伐部门	497	1,443	2,931
燃料加工部门	18,307	18,643	16,248
钢铁冶炼部门	10,151	12,385	14,411
有色金属开采及冶炼部门	3,362	5,684	6,480
金属加工部门	5,029	5,528	6,035
化学加工部门	9,066	9,867	11,114
建筑材料部门	2,291	2,531	3,641
玻璃工业部门	4,273	3,431	3,502
陶瓷工业部门	2,456	1,925	1,482
橡胶加工部门	4,714	4,372	10,688
木材加工部门	1,210	1,480	1,945
火柴工业部门	466	440	449
造纸工业部门	8,923	9,856	10,307
纺织工业部门	4,943	5,125	5,107
缝纫部门	943	1,124	1,292
皮革及皮毛部门	1,750	2,080	2,471
油脂、肥皂、香料、化妆品部门	6,000	6,090	6,107
食品工业部门	3,373	3,312	3,566
食盐部门	3,653	3,431	3,307
印刷部门	3,072	3,240	3,256
文化、教育、科学艺术用品部门	1,558	1,755	6,292

自来水部门	49,129	54,743	59,557
其他工业部门	4,530	7,087	8,973

〔注一〕固定资产系指生产设备厂房及一切生产用土地；工人系指直接生产工人和辅助工人（如企业内部的搬运工人、仓库的装卸工人），不包括工程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及其他非生产人员。

1956年由于材料缺乏，还不能计算。

〔注二〕以上两表是请国家经济委员会同志们代制的，特此道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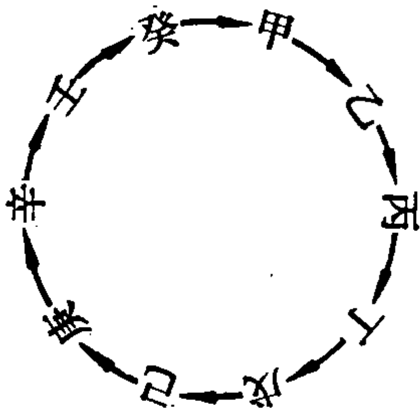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发表作者曾稍作补充。）

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

(一九五八年二月)

此书各篇论文内在联系的说明

我到北京大学之后，学了俄文，读了几本俄文著作，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又读了毛主席的《矛盾论》与《实践论》(中文本)。读了这几本中俄文著作之后，我脑海中出现了两个疑问：(一)斯大林书中和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经济发展规律（如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否在中国已经实现？要研究这个问题，不能专靠俄文的经典著作，必须把国内各方面的社会经济活动，切切实实地研究一番，分析一番，而后方可回答这个问题。（二）唯物辩证法和毛主席的矛盾论告诉我们宇宙内的事事物物都有内在的联系，都不是孤立的。譬如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环节于此，各各之间都有内在联系，故甲与乙、乙与丙、丙与丁、丁与戊、戊与己、己与庚、庚与辛、辛与壬、壬与癸皆有联系，最后癸与甲（第十与第一）也必有联系，结果形成了一个圆圈。



这就是团团转的联系。我心中自问，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个环节能不能这样联系起来，形成

① 是指一九五八年二月财政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所载《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新人口论》、《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各文内在联系而言。

了一个圆圈？若把以上两个疑问并成一个问题，就等于按团团转的比例发展规律，把所有主要环节联系起来综合平衡起来，能不能成功？不妨试一试，再看其结果如何。这就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本质，所以还要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形，否则不切实际，成了空谈。1955年初，我的脑海中充满着这种想法，但这种想法对与不对，非以实际情形来证明不可。我就下一个决心来试写一篇或两篇平衡论，命题为“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成功与否虽无把握，然信其有成功之可能，苟不然者中国的计划经济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也。但正在写作中遇到了三个障碍：（一）工商业于1955年尚未全行全业实行公私合营；许许多多私营工厂尚停留在加工订货阶段；公方尚站在私营企业之外；企业与个人的改造虽难贯彻但一定要贯彻；资产所有权仍在私人手中；私营工厂对交货期限、货品的数量和质量，往往不照合同执行，对于计划经济造成很大的困难，此其一。（二）农业合作社于1955年初，可说全是初级社，不仅基础不巩固，而发展中的变动亦很大，应不断地加以观察和研究，如果农业合作化中的统购统销一部分办得不好，计划经济就要受到挫折，此其二。（三）计划经济的目的在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提高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但中国人口如此之多，而生殖率又如此之快，要加速工业化，不甚容易，如何是好？此其三。因此要写平衡论一定非把这三个问题搞好不可，非把四个有联系的问题（一）平衡论、（二）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农业合作化、（四）人口论同时抓起来不可。《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开始于1955年1月，完成于1955年4月底，当时我预见到党和政府本一贯的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迟早一定采取和平改造的方式，而且一定采取逐行逐业改造的方式，把工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改为公有制。事情演变至1956年春，我所主张的全行全业合营，果然完全做到，我的预见变为现实。但这篇1955年的文章因我的朋友说我有庇护资方之

嫌，竟搁置两年多，始于1957年 8 月终发表。

《农业合作化》一书，于1956年带助手一同到杭州住了几个月写了八章初稿，还有八章至十二章因农村经济情况变动很快；在变动的情况下，很难写出一本有固定性的、长期适用的专书。但我深信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培育之下，代表着新的生产力的农业合作社，只要有正确的领导，一定能够不断地成长发展，故拟待至明春（1958年春）下乡继续写下去，期于1959年初出版。同时1956年在杭州写作时，抽出了一些时间，把平衡论的初稿加以修改补充，写成第一篇，于1956年12月28日、29日两天的《人民日报》发表。回京以后即着手赶写第二篇，于1957年 5 月11日、12日两天的《人民日报》发表。

1955年《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文完成后，即着手准备人口问题的发言稿，打算在1955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但在浙江小组会上讨论时，好多代表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认为我所说的是马尔萨斯的一套。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都是出于善意（那时会上空气不适于提出这样的问题），故我自动地把发言稿收回。今年（1957年）时机成熟，遂把发言稿在人代大会上提了出来。全文登载于1957年 7 月 5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后，接到各地人民来信四十余封，几无一不赞成我的主张。我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学派完全不同，他们主张以瘟疫、疾病、战争等残酷的手段把人口削减，而中国的马尔萨斯者竟主张把中国人口削减至两亿左右，我则不但不主张削减而且要提高劳动人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只主张把还没有生出来的人口，用避孕的方法控制起来而已。

以上是关于经济理论方面的。但比这方面更重要的是哲学思想方面。宋明程朱一派哲学家所讲的“理”似乎是指自然规律而言，虽然他们的“理”也含有道德原则的意义。程朱派认为“理”可以离事物而独立存在，故说“理在事先”或“理在事外”，这是唯心的说法。我在这里所说的“理”如综合平衡的“理”，按

比例发展的“理”也是指自然规律而言，但是这个“理”不能离开事物而独立存在。“理”即在事物之中，离开了事物无所谓“理”，故说“理”在事中，这是唯物的说法，而且这个“理”是团团转的，因为宇宙中所有事物都有內在的联系，都不是孤立的。在第一篇平衡论结尾中，我把团团转的意思说得很明白，在第二篇平衡论的结论中，我把“理在事中”的意思表达出来了。

但这两篇平衡论中团团转的“理”无非在平面上转动而已，就如孔子所说的“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年年如此，看不出有发展的意思。但是我们的经济是发展的，从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自下而上的。年年增产，国民收入增加；积累愈多，生产再生产的范围愈广，国家愈富，团团转的平衡和按比例的发展，就从低水平达到高水平，则渗透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理”亦必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由此推论，这个团团转动的“理”不是单在平面上转动而已，乃是时时刻刻向上再向上地转动。它的转动必是螺旋式的，不是平面式的。反过来说，因为“理”的转动是螺旋式的，所以社会的发展也是螺旋式的。螺旋式者就是后一转动是前一转动的继续，不过比较高一级而已。

为了更详尽地讨论这个问题，特写了《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文，作为此书的主文，在文内，我把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说了一说，并从发展的观点重谈平衡理论和哲学思想，这就是把螺旋式地——团团转的意思说得更详尽更切近实际一些。同时把英国经济学者凯恩斯氏的一般理论也批评了一番，因为他的一般理论很明显地是从“营救资本主义”的角度写出来的。我们认为把两种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理论这样排列起来，容易使读者看得出，我们的经济制度正在蓬勃生长，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在垂死挣扎，一是代表发展和生长，一是代表衰退和沒落。这样，我国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得很突出。

螺旋式转动的意思在这里不妨再说一说。上列的图中有十个环节，我们决不能说这十个环节同时达到了平衡。有的是前进一

步，有的是落后一步，是不平衡的（比如，1957年我国原材料工业的发展赶不上加工制造工业发展的需要，农业生产的发展赶不上轻、重工业发展的需要，等等），假定十个环节之中有两个由于种种原因却落后了、停滞了，八个是前进的，正在走着上坡路，欣欣向荣地向前发展。无论何种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总不免产生比较先进和比较落后的两大类，这是极普通的现象，也是正常的现象。我们可以设想，千千万万的人不会是整齐划一的，总是有先进的，有中间的，有落后的。落后的人不觉得自己走慢了，反而要批评别人走快了。1956年7月到1957年5月，在农村中“好、多、快、省”不大讲了，“四十条”不大灵了，为什么呢？就是有些人拼命喊：“你们快了”，而跑在前面的人，有的也有些腿软了。劲头不足，这是一种右倾思想。因此各级党委都在批判右倾思想，劲头又起来了。加上农村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机关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出现了政治高潮和生产高潮，所以劲头来的大，脚步更踏实，力量更加雄厚。如果我们把这股劲坚持下去，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连续奋斗五年，中国就要出现更大的奇迹，因为落后的都跟上来了。领导得当，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既然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那末，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按照平衡规律和按比例发展规律推动和帮助落后的赶上先进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又会出现新的比较先进的和新的比较落后的。接着又推动和帮助落后的前进，这样社会就可以不断向前发展。因此社会总是无时无刻不在动态中，我们不能以静态的眼光来看动态的事物。先进与落后总是会有的，不过在各个阶段中它们的含义是不同的，今日的落后环节不会永远是落后。问题是要看领导机关（计划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用什么方法来推动它们。平衡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要看我们的这两个领导机构如何去应用它。它们制订的计划如能完全反映这两个规律，就是正确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经验还不

足，统计资料还不够完备，所以制订出来的计划难免有时冒进些有时保守些，不能完全反映这两个规律的要求。斯大林说得好："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规律，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以完备的知识去应用它，必须制订出能完全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的计划。不能说，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都完全反映出这个经济规律的要求"。[①] 所以要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就是帮助社会螺旋式地团团转，是领导机构重要责任之一。

程朱学派似乎把道德原则亦包括在"理"之中，我们的"理"当然也包括了道德，就是共产主义的道德，虽然共产主义的道德的含义与程朱派不同。因此我们的经济活动或经济转动是螺旋式地上升的转动，我们的道德也一定是螺旋式地上升的道德。这可以从我的任何一个附属问题中看出来。譬如从《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中，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工业合营以后有先进的一面，有落后的一面。先进的一面是公私合营以后生产一般提高了30%以上，产品质量有很大改进，职工情绪高涨，劳资纠纷减少，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得到发挥，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也有所改进，绝大多数工厂在合营后改进了劳动条件和职工福利，有条件的工厂实行了劳动保险，有些工厂实行了劳保合同。此外，还提拔了工人干部，安排了私方人员，广大职工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后，思想觉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以上是公私合营企业光明的一面。其黑暗的一面或落后的一面是：比如，在许多上海合营行业中都有些中小型合营企业的私方人员私自开设"自发工厂"。他们虽然参加了公私合营，但并没有很好的改造自己，至今仍留恋资本主义的道路，甚至不惜损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至7页。

害合营企业以满足私利。这些私设“自发工厂”的私方人员往往用隐蔽的方式用自己的亲属朋友出面经营。他们的产品质量低劣，售价也高，利润最高达十多倍。他们甚至采取贪污盗窃等违法手段来获得资金、设备和原料，不惜搞垮公私合营企业。例如旋转电机，石油机械，针织等行业发现部分私方人员私设“自发工厂”的机器设备，是他们在企业裁并改组的时候，故意隐匿下来的。私设“自发工厂”大都以高额工资拉拢部分在业工人，利用晚上来生产自己的产品，有的甚至要工人通宵干活。因此，有些合营厂出现了工人迟到、早退、旷工等劳动纪律松弛和劳动生产率、成品率下降的现象。有的合营厂私方人员甚至把私人接受的订货混在合营企业的订货中，交给工人生产，非法剥削工人劳动。这些“自发工厂”现在已由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勒令停业，司法机关也依法逮捕了一些犯有严重违法行为的私方人员。以上是公私合营企业黑暗的一面，落后的一面，主要原因是政治思想教育做得还不够，好在这些企业是中小型企业，而且为数亦不很多，主管部门必须采取措施，处理这批“自发工厂”，并且赶快推动和帮助落后的赶上先进的。

这个从公私合营企业中抽出来的例子，足以证明一个道理，就是思想进步，立场稳定，一心一意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人民服务的人，其经济活动是比较高一级的，其道德观念也是比较高一级的。反之有些人思想落后，立场摇摆，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三心二意的，对资本主义还留恋不忘，专心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甚至不惜盗窃资财拒绝改造。这些人的行为卑鄙，其道德观念一定是很薄弱的。由此可知行为与道德是一物的两面，二者是相互依存的。从此可以断定道德也在“事之中”，决不是如程朱派所说的在事物之先，或在事物之外。我们相信离开了事物看不见道德。这个道德，如事物一样，亦必须螺旋式地向上发展。如不吾信，再看苏联。苏联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的四十年间，已胜利地完成了五个五年计划，现在正在顺利地执行第六个五年计

划。这些计划的执行，已经使苏联能向着共产主义迈进。在四十年中它的生产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如按人口平均计算，1956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已比1913年增长了十二倍，其中用于消费的占四分之三，积累占四分之一（中国消费占五分之四积累只占五分之一），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是被少数剥削阶级攫为己有的。在这里已可以看出两种社会制度下道德观念之不同。由于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实行了完善的医疗保健制度，苏联居民的平均寿命已经比革命前整整延长一倍。

从维持世界和平和提高人民福利的角度看，苏联建成世界上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世界上最大的同步稳相加速器，第一架喷气式客机，第一枚洲际弹道火箭和第一个、第二个人造地球卫星。这一切都是为企图消灭残酷的战争，维持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利，打开人类知识的新领域，开辟科学发展的新纪元而努力的结果。人类征服大自然的无可限量的智慧，已由苏联人民作出了一个又一个光辉的榜样。这说明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世界上最关心于把科学技术成就应用在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这一切都是崇高道德的表现，所以道德是与社会主义建设分不开的，如影之随形，一丝不差的，离开了实际，道德是不存在的，而道德的向上发展，与经济活动是一致的。

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新出现的主要矛盾，是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赶不上生产资料生产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赶不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在生产资料的发展方面，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又赶不上加工制造工业发展的需要。这样，在我国国民收入的积累同消费之间，也就出现了新的矛盾，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较慢，所增加的国民收入大部分只能用于积累。此后应该贯彻执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并举的方针，加速农业的发展，积极地发展原材料工业。要发展农业必须增加投资，拟把国家的投资（包括发展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农业放款，农业事业费开支）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本身的投资结合起来考虑，实行统一规划，适当安排，才能更好地发挥投资的效果。农业生产合作社本身的投资，在发展生产和社员生活逐步改善的基础上，在不断地增加。如何使这笔资金用得妥当，也是需要很好地研究的问题。而投资的对象在（一）开荒，（二）兴修水利，（三）排涝，（四）化学肥料。我认为大规模的开荒问题一时谈不到，现在应该首先把重点放在土壤肥沃、收获量高以及交通方便，接近工业基地的农业地区。这样不仅投资的经济效果很大，垦荒工作也容易进行，而且便于把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的发展结合起来。至于水利与排涝可并为一项，化学肥料虽可以独成一项，但可以与水利并为一谈，因为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至少有二个条件，一是水，二是肥。必须有水施肥才有用。河南省孟县缑村农业社实行“五水三肥”，亩产小麦一千一百二十五斤。只要给它喝五次水，上三次肥料，它就给你产一千一百二十五斤小麦。全国小麦平均亩产一百多斤，与此相比

差十倍。如果水利问题解决了，小麦就能增产十倍，农业增产的潜力是很大的。反之，如果沒有水利设备，遇到旱灾或者水灾，再多肥料也不能希望增产。北方农民缺乏积肥习惯，与水利条件太差对产量不易提高是有关系的。我国工程技术落后，对于水旱灾害尚无控制把握；同时因工业落后，国家尚不能供应大量化学肥料，凡此皆农业生产比较落后之主要原因。因此我把水利与化学肥料幷为一谈。

一 要加速农业发展必须认识水利与肥料的重要性

要加速农业发展，只有增加农业单位面积产量，这就要加速发展化学肥料厂和兴修水利。现在先来谈谈兴修水利与排涝。为了解除长江洪涝灾害，有人建议要早日建设四川三峡这样巨大的工程，以此来防御长江的千年一遇的非常洪水。这个工程完工后，不仅可以控制长江洪水的主要来源，还可以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超巨型水电站，幷使万吨海轮直通重庆。但所需的物力财力非常巨大（建设水库发电站以及四周围的企业工厂至少需花六七百亿到一千亿以上的资金），非我国近期财政力量所能负担；不仅投资数目太大，而所需的时间亦太长；据估计至少要经过五年设计十年施工才能把三峡工程建设完成。在此十五年的过程中，自然不能专靠三峡水库来解决长江的洪涝问题。长江的洪涝灾害是很频繁的，大约平均五六年內就可能发生一次比较大的洪水。为解除这些洪涝灾害，若专靠象三峡这样的大水库是很不现实的。我们目前只能按照长江水利委员会在1954年提出的方案，来利用沿江堤防与湖泊洼地。虽然这是过渡时期的临时措施，但这个过渡时期要延长到至少二十年。在二十年內，堤防和湖泊洼地的利用，是最重要的防洪排涝措施。我们决不应专期待着遥远的三峡水库而忽视了现有的堤防和湖泊。在过去的几千年中，我国的劳动人民与洪水作斗争时，就利用堤防湖泊为防洪排涝的工具。只要花费为数不多的投资加以整理和巩固，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灌溉面积和水浇地的面积由1952年的三点一亿亩增加到1957年的五点二亿亩，而在1955年冬季和1956年春季兴修水利高潮中，就扩大灌溉面积一亿亩；这不但是我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成绩，也是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同时，由于积极提高工程质量，加强灌溉管理，开展排水除涝工作，使原有三亿多亩灌溉水田的抗旱能力和部分低洼耕地的防涝能力在不同程度上都提高了。这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改变农村经济面貌，起了显著作用。但是，我国现有的灌溉面积还不到耕地的三分之一，根据水源和地形条件，水利发展的潜力还很大。迄至1957年10月，全国还有一亿亩左右易受水涝灾害的耕地亟待治理，还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面积，特别是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严重地区，亟须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因此，兴修农田水利，发展灌溉，防治水旱灾害，仍然是今后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首要任务。依照1958年经济建设计划的编制，在水利工作方面，决定以排涝与灌溉为主，这是很对的。1958年我国将增加灌溉面积四千多万亩，还要在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在四千多万亩低洼地区的土地上兴修防水排涝工程。这样把防洪、排涝、灌溉及水土保持等工作结合起来，而不孤立进行，也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水利工作，应该着重中、小型水利建设，如打井、修渠、修塘、排涝等等，这对于扩大灌溉面积，减少水害，促进农业增产有很大的作用。至于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因为牵涉问题很广，要十分慎重，以便统一规划，做到综合利用。什么叫综合利用？就是要全面地考察和分析一切有关的问题。既要看到支流，也要看到干流；既要看到防洪、排涝和灌溉，也要看到发电、航运以及城市和工业用水；既要看到水库，也要看到堤防和洼地蓄洪；既要看到水电站，也要看到火电站；既要看到自流渠灌溉，也要看到扬水灌溉和掘井筑塘；既要看到河流开发的效益，也要看到国家投资和水库淹没的代价；既要看

到近期的要求，也要看到远景的发展。这样才能做到既能满足各有关方面近期的要求，又能满足国民经济远景发展的要求；才能做到以最少的投资修建水工建筑物，消除水旱灾害和利用天然资源使国民经济获得最大的效益。

过去有些工程的兴建，单从某一方面着眼，沒有考虑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的要求。例如官厅、大伙房、佛子岭、梅山诸水库工程都是在开工以后，边施工边修改。已完成的淮河石漫滩、板桥、白沙、薄山等防洪水库，也都准备加高壩身，扩大库容，兼顾灌溉的要求。这些更改都是必要的。但是在施工中途更改设计，或在完工以后再行改建，都要或多或少地给国家造成损失。这些经验教训教育了水利、水电专家们，使他们重视了河流的综合利用。

又如修建以上所说的四川三峡水库要花费六七百亿到一千亿资金。这样大的惊人数字，是否我国现在的财力物力所能胜任固然是一个问题，且水库的造成将淹沒宜昌以上沿长江二十四个城市，特别是重庆市大部分要被淹沒，还要淹沒农田一百六十万亩。这样大的损失是否合理更是一个问题。在近几个五年计划期内，有沒有必要来兴建这样大的电站也是一个问题。凡此皆是河流的综合利用所必需考虑的重要问题。

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兴修农田水利，应以群众性小型水利为主，以中型水利为辅，根据需要和可能，适当举办大型工程。中型和大型工程，数量虽少，但投资较大，技术性较高，涉及的方面较多，所以必须慎重进行勘测设计，充分研究综合利用的方法。群众性的小型水利，是普遍的，大量的，在全国现有灌溉面积中，小型水利占80%以上，绝大部分地区都有条件兴修。小型水利虽然也需要一定的技术，但是要求不高，而且花钱少，收效快，可以依靠群众力量举办，一般在当年或一二年内就能发挥作用。农田水利工程，不论大小，应该充分依靠群众力量，注意克服单纯依赖国家投资的思想。基建工程的土方部分及小型附属建筑物，也要根据可能条件，由受益群众自办，专依靠国家是不行

的。根据经验，靠国家拿钱是不能完全办好水利的。怎么办呢？可能的办法就是国家少花钱，依靠群众，靠群众就必须搞小型农田水利，以小型农田水利为主。因为群众不能办大、中型的工程。搞水土保持要植树，过去有的地方由国家发给树苗，给以补助，但年年植树年年不成林，成活率只有20％到30％；而有的地方国家并不给钱，由群众自己栽，最高成活率反达到90％。这个事例就说明依靠群众为主，国家辅助，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必要和可能时兴修大型工程的方针是正确的。

二　其次谈谈肥料问题

肥料可以大别为两类：第一类是取之于土壤者还之于土壤，所有一切农村肥料都属于这一类，是由动物植物所生成的，如人粪尿、厩肥、堆肥、绿肥和油饼等，称为有机质肥料。其肥效比较持久，可以改良土壤，所以一般宜用作基肥。第二类是取之于空气或矿藏者施之于土壤，所有绝大部分的化学肥料和矿物质肥料，如硫酸铵，过磷酸钙，磷矿粉等都属于这一类，称为无机质肥料。大多数无机质肥料肥效很快，所以一般宜用作追肥。我们能够积聚农村肥料以还之于土壤，对农作物当然会发生显著的效果。但还之于土壤的肥料，绝不能达到取之于土壤的百分之百，所以土壤中的肥分，总是逐年减少的（就全面说）。譬如人畜的排泄物，都是把食品饲料中的养分取了一部分来供给人畜的需要后剩下来的，所以排泄物的肥分是比食品饲料原有的肥分少，即是还之于土壤者比取之于土壤者少。而且排泄物发酵期间，氮气要损失一部分；在保存中的肥料受到风日雨水的侵蚀，肥分又要损失一部分。土壤本身的肥分，又逐年随水土的流失而流失。城市每年涨水的初期，可以看到河流的水变成污黑色，随江河而流入大海，这也是未能还之于土壤的部分肥料。各大城市，往往有逐渐欧化的趋向，提倡抽水马桶，这也是肥料的很大损失。就上述各种例子看来，仅靠第一类肥料（农村肥料）来争取普遍的单

位面积和复种面积大量地、继续不断地增加生产，是有困难的。但我们要动员全国人民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刻不容缓的，所以争取农业大量增产也是刻不容缓的。我们只有建议政府，把工业部门的化学肥料工业，优先发展起来，同时创造优先发展的条件，把取之于空气与取之于矿藏的各种肥料来支援农村，使土壤的肥分大量增加，则农产品可以保证大量增加，工业亦可相应地得到更快的发展。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化学肥料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它的优点是：含的养分浓厚，容易在水里溶化，肥效快，劲头大，便于搬运，宜用作追肥。它的缺点是：大多偏含某一种养分，不含有机质，如果长期单独施用，容易使土壤板结，得不到效果，应该认识化学肥料，只能补充自然肥料施用的不足，决不能代替自然肥料。

国家如制造出大量的化学肥料来交换农民的余粮，不但农民乐于接受，并且农民还可以借此扩大再生产来支援工业。余粮是必须交换来供给城市的，如国家无大量肥料做交换品而以不适合农民需要的工业品来说服农民交换，不但会影响农民的情绪，而且会妨害农村的扩大再生产，也就妨害了工业、教育和其他一切。

农业与重工业轻工业的关系非常密切。重工业的资金来自轻工业，而轻工业的原材料大部分取之于农业，三者的关系既如此重要，所以对化学肥料问题人人非常关心。现在农民纷纷改单季稻为双季稻，改旱地为水田，但比此更重要的是化学肥料的供应，可不可以多搞一些化学肥料厂，已搞的化学肥料厂可不可以提前完成。这个问题，经济委员会过去也讨论过，且经常提出去过，中共中央也有这样的意见，国务院对于这个问题也经常发出过指示，所以我们可以说多搞一些化学肥料厂的意见各方面是一致的，且是完全正确的，在今天来搞也很及时，以农民的急迫需要来说，应该推进得快一些，但因为制造化学肥料受一定条件的限制，要推进得很快似有困难。我们开国以来，党和政府一向重

视化学肥料问题，从以下事实可以证明：1949年全国还沒有生产合成氨的工厂，国民党遗留给我们的财产中沒有这一项。此外，在1949年氮肥厂的年产量不过二万六千九百一十六吨，到1952年经济恢复时期，合成氨产量已达三万八千吨，硫铵已达十九万吨；1957年合成氨产量已上升到十四万七千吨，硫铵六十三万八千吨。这说明了我们的进展不能算慢，但因基础太小，底子太薄，不能更快一些，这是一个情况。

三 从化学肥料的重要性到化学肥料厂的设计

另一个情况是，除去地方上还有一些小的化学肥料厂沒有统计在内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新建比较大的化学肥料厂有三个：一个是吉林的合成氨厂，一个是兰州的化学肥料厂，一个是四川的化学肥料厂。吉林厂1954年开始建设，1957年完成后，即可以全部投入生产；兰州的化学肥料厂，从1956年开始建设，爭取1959年全部投入生产；四川金堂化学肥料厂，1957年已开始施工，准备1960年完成。这三个厂完成后，仅硫酸铵一项可以年产六十五万吨。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政府正在考虑究竟要搞多少，大致在三百万吨至四百万吨，这样一个数目大致很接近标准，但国家计划委员会还在考虑，能不能爭取达到五百万吨。这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想达到的数目，故1958年的经济建设计划，仍以农村肥料为主要肥料，同时积极发展化学肥料工业。现在已经采取了一切有效措施，保证了吉林肥料厂提前在1957年国庆节前后全部投入生产，它的产量将比过去增加四倍。它的产品——硝酸铵，质量很好，成本又低，它的主要原料，是取于用之不尽的水、空气以及劣质煤。现在要解释的是象这样的一个厂，政府和人民一样，总想多建一些，以适应农业发展的要求。自毛主席提出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三者的关系之后，大家的研究精力集中于化学肥料厂问题，因为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农业生产的丰歉，多少直接影响了轻工业，间接影响了重工业，而欲

使农业增产，不外两途：一是开荒，一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大量的开荒问题是复杂的，短时间尚不能收较大成效，而在现阶段比较可以迅速收效的，还是设法把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这就需要考虑化学肥料厂问题，不仅要资金，而且要钢材。象吉林这样一个年产若干万吨的厂子需投资二亿二千万元到二亿六千万元，需用钢材三万八千吨，机械设备二万吨，不仅受钱的限制，还要受材料的限制。

四　从化学肥料厂的设计到奥妙的学得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总算跑得快的。在这个时期中，我们自己的专家单独设计不了这样大的厂子，因为从来沒有设计过。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的技术人员和设计人员已学会了设计象吉林化学肥料厂同样规模的大厂，而且用不了那样多的建设资金，约略估计，可以节省三分之一，约七八千万元。当外国专家帮助我们设计的时候，我们的人员懂得了他们设计的奥妙在什么地方，先懂而后学，到今天不仅化学肥料厂，即其他的工厂也一样能设计。比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1956年2月份大家有了一个决定，要把量具翻板，到四川再搞一个，后来就在四川盖了一个和哈尔滨厂一样的厂子，只要化一亿四千万元就差不多了。这件事在报纸上也是表扬过的。这个厂的办公房每平方米造价只花七八块钱，已尽节约之能事；我们的人员懂得了外国专家的奥妙以后，就能设计这样一个成都量具刃具厂，确是值得骄傲的。1956年年底这个厂的第一车间已经投入生产了。

五　从奥妙的学得到试制的成功

建氮肥厂，化学肥料厂，必需有特殊的设备，如高压设备，包括高压的合成氨筒子，叫高压合成筒，包括比较大的、在二千匹马力以上的压缩机。这些必须有高等技术方能制造，因为我们过去还沒有这样的高等技术所以过去统统不能自制。有些是苏联

帮助的，有些是捷克帮助的。他们帮助我们解决技术问题。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的技术人员也学会了。我国南京的永利厂和大连的几个工厂的技术人员竟把一百二十三个大气压的高压合成筒试制成功了。技术人员中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学生，他在美国学习的时候，人家总不给他看，但是他很耐心又肯用心，终于带了一个本子回来，就按图索骥七凑八拼地搞成功了。现在责成第二机械工业部开始制造这个高压合成筒。

我们知道，旧中国的机械工业基本上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修配性质的工业，一般工厂只能做一些零件，或者只能做装配工作，不能制造完整的机器。设备陈旧而且残缺不全，生产任务杂乱，沒有固定的专业，来什么就做什么，沒有正规的产品图纸，沒有一定的质量标准，单凭工人各自的手艺做出来的零件，如果不合适，就锉锉刮刮、敲敲打打，凑合起来装配上去。这样的生产质量当然很坏，效率很低，成本很高，而且做不出完整或成套的产品。因此，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不正规的修配性的机械工业改造成为正规的制造工业。开始制造的时候，我们沒有设计产品的能力，所以必须从仿造入手。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派来的专家给予我们不少技术援助，供给了新型设备，产品图纸和技术资料等，使我们有了技术上的根据。这些优越条件，使我们能够迅速仿造很多新机器。至此，我们只能仿造，还不能自行设计，所以第二步我们必须从仿造外国机器向自行设计的方向进展。

几年来，通过仿造兄弟国家的先进产品，机械工业的制造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但是在我国国民经济不断高涨的情况下，好多问题，光靠仿造是解决不了的。不少机器必须根据本国资源自然特点及使用的具体条件等进行设计。如设计农业机械，要适应我国地形、土壤、气候、经济能力和耕作等特点。比如农业机械动力的大小也要因地而异，南方水稻地区要求轻巧灵便的水田作业轮式的或手扶的拖拉机，马力要小；东北及西北的垦荒地多，就必须解决大马力的履带式的拖拉机，华北则主要是需要中等马力

的。过去进口和仿造的拖拉机和农具，专用的多，万能的少。棉花播种机只能种棉花；搖臂收割机只能割麦子；谷物脱粒机只能打麦、豆；玉米脱粒机只能剥玉米。胶轮拖拉机无其他轮子（铁轮、半履带）更换，就不能在干旱地和潮湿地两用。拖拉机大部分底盘距地面的距离和轮距都是死的，就不便于中耕。进口拖拉机和仿造的拖拉机适应性很差。设备品种要很多，每一个作业，就要一种机器，不能通用，所以机械的利用率很低。这与我们农业积累少，人工便宜，机器贵的特点矛盾很大。山东农民批评拖拉机说：这个“铁牛”，不如我那头牛好，“铁牛”只能耕地，我那头牛叫它干什么活能干什么活。有些农业社使用了万能轮式拖拉机，不但能下地耕种、上路运输，而且可作打水、铡草等作业，每年使用到十个月以上，利用率很高。河南省的水利部门提出，要求设计一种煤气机（因石油缺少），能够用来打水、铡草、脱谷、加工，甚至配上底盘还能配一个双骅犁耕地或做运输工具用。这指出了我们自己设计的方向。需要的品种越来越多，不可能全靠仿造来解决。沒有自行设计的本领，不可能在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这方面，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已经设计成功一些比较重大的产品，取得了初步的经验。我可以说，我国基本上已能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厂矿设计。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依靠国外设计进行建设的局面目前已可改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兴建的工程中，虽然大部分项目是我国自己设计的，但是作为我国工业骨干的“一五六”项和其他一些限额以上的工程就依靠苏联的援助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目前现代化的中型和某些大型的冶金、煤炭、石油、电力、机械、纺织、造纸、制糖等厂矿，我国基本上能够设计。铁道和公路交通已全部能够设计。如包括从采矿、选矿、炼铁、炼钢全部生产过程年产一百五十万吨钢的大型联合企业，也可以设计出来。火电站设计，在1952年我国还不能作，现在每台一万二千千瓦容量的透平发电机的电站设备，全部都可以自己供给。在1952年我国只能作三千千瓦的小水电站

设备，现在一万五千千瓦以下的全都可以制造。石油设备，1952年什么也不会作，现在采油设备基本上可以制造，炼油设备明年也可以制造了。

又如长江大桥是我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有史以来，中国沒有用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建成过一座近代化的大型桥梁。拿钢梁来说，泺口黄河桥是德国孟阿恩公司造的，闸口、钱塘江桥是英国的道门朗公司造的，武汉长江大桥却是我国自己的工厂造的，而且在某些方面为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及。例如我们用管柱钻孔法修筑深水基础，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沒有的。沒有苏联专家提出的管柱钻孔法，大桥是不可能这样快、这样好、这样省地建设成功的，并且苏联的援助使我们学会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新的建桥技术。再从培养技术力量来说，解放前几十年间，我们还沒有一支起码的技术力量，在武汉大桥施工期间，却先后训练出大批的桥梁技术干部，到今天已足敷十个桥梁工地之用，奠定了今后桥梁技术上的人力基础。有了这样技术上的人力物力，我国今后的桥梁事业，就能充分发展。

六　从试制的成功到成本的大大减低

薄一波主任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草案）和李先念部长提出的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似乎有一个互相矛盾之点，就是薄主任的报告(草案)说，中央十二个工业部五年来生产成本降低了27.2%，而李部长的报告（草案）讲到某些产品还提高了价格，二者不相适应。既然五年来成本降低了27.2%，则物价不但不应该提高，而应该相应地降低27.2%，才算正确。看起来经济委员会与财政部似乎在打架，因此，我们有把这个问题讲讲明白的必要。这十二个工业部是怎样分工呢？具体地讲，十二个部之中有九个部是搞重工业的，三个部是搞轻工业的。重工业是生产生产资料，轻工业是生产食品、布匹、纸烟、丝绸等等生活资料。这里就有加以分析的

必要。生产生产资料的几个工业部，五年来生产成本降低了32.1%，其中机械工业部门降低了53.6%。它们为什么能降低这么多成本呢？它们的工作秘诀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回答是这几年在新产品的试制方面（如以上所讲的高压合成筒试制成功），技术的提高方面，都是有显著成绩的，因此机械工业的成本可以降低53.6%。平均生产生产资料部门的成本降低了32.1%。反过来说，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即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和食品工业部，降低成本不如重工业部这样快。一般说来，这三个部五年来只降低了15.3%，就是说1956年的成本，比1952年只低了15.3%。但在这里面，如果把1953年棉花降价因素和纺织机械降价因素剔除的话，它本身沒有什么降低，就是说纺织工业的成本并沒有降低。以轻工业品作例子，大概现在二十支纱的售价按我们的成本来计算，1956年比1952年降低了4.8%，如果扣除1953年棉花降价因素和机械降价因素的话，它的成本是增加了。所以要解决中央十二个工业部五年来生产成本降低了27.2%，而轻工业消费品中某些还要涨价的矛盾，我们必需摸一摸底，必需要有象以上这样一个分析。又如食盐，也是轻工业里面比较重要的产品。1956年它的成本比1952年还大，因为制盐要靠天气，1956年多雨，工人机器都在那里等候，闲着无事，而盐沒有晒出来，这样成本就提高了。又如糖和纸烟，这两三年来成本也沒有什么降低，纸烟成本沒有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好多人不抽纸烟，抽烟的人太少了，制烟厂只开工20%到30%，机器停顿，人也窝工。

那么国家采取的政策是不是根据这些原因，把这些价格相应地调整过了呢？是的，调整过而且调整得很合理。生产资料的成本既然降低了32%，价格降落的幅度也很大。在1956年以前，降落的幅度不够大，各部门感觉不愉快，于是在1956年大家下了决心，作了一次大减价，减了十五亿六千万元，比如钢材，过去库存的钢材以二十五公厘的元钢计算，每吨价格，1953年是五百三十元，1956年减至三百八十五元。就是减了27.4%，比如以上所

说的中央十二个工业部门降低的成本是大体上相等的。优质钢材也是以二十五公厘的炭素结构钢来计算，每吨价格，1953年是八百九十五元，1956年减至七百五十元，减了25.1%。电动机每一台的价格，1953年是四百四十八元，1956年减至二百四十五元，减了45.3%。又如车床，如平均计算，每台价格，1953年是一万二千三百元，1956年减至六千八百元，减了44.7%。我们举了这么些材料，是一般的，当然个别的还有增加的。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生产资料，减价多少，消费资料，减价多少，都是按照各种不同的幅度，不同的情况规定出来的。总起来说，生产资料因为成本降低得快，降低得多，所以它的价格特别在1956年，作了比较猛烈的调整。消费资料则不然，它的成本降低得不多，再加上这几年工资的增长，不能调整得很多，所以在这方面，就采取稳健政策，保持了物价。一般看来，消费品的价格，如纱布、食糖、纸烟等，是比较稳定的。我们在这里还要补充一句，就是价格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要彻底解决，必须把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如进口物资的因素，保护国内幼稚工业的因素，奢侈品的因素，交通运输的因素等等都应该考虑到的，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

七　在生产成本的降低中遇到了若干限制

以上所谈的成本降低是由于自己设计和试制的成功，但在若干方面，我国经济的进展受到不少限制，其中最大的有三种：

（一）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下，我们还沒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控制自然，根本消灭自然灾害，这就使我们无法充分保证农业计划产量的完全精确（譬如棉花），并充分保证纺织工厂所需原棉的供应，因而与人民生活发生重大关系的棉布供应不足的问题，也就不是短期间内可以解决的。

如果我们能控制自然，每年有足够的棉花来供应纺织工厂，实在是一件一本万利的事业，不仅人民生活所需的棉布可以多多

供应，即国家亦可多积累些资金。大家知道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在我国当前经济建设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建设棉纺织厂的特点，是投资少而收效快。例如建设一座拥有十万纱锭，三千五百台织布机的纺织厂，只需三千五百万元的投资，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从基本建设到收回全部投资，只需要二年零一个月。此后每年可以为国家积累三千五百万元的资金。这就说明，发展棉纺织工业不但可以生产大量纺织品，来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而且可以为国家迅速地积累资金，用于国家经济的其他建设。可是，发展棉纺织业，是需要大量棉花的。例如一个拥有十万纱锭和三千五百台织布机的棉纺织厂，以每天三班生产计算，一年就需要四十万担皮棉。沒有足够的棉花，机器就不能充分利用。1956年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棉花减产，加上统购偏松，国家少收了皮棉。棉纺织厂因原料不足，曾经部分地减少班次，停工待料。这就使得今年棉布供应紧张起来，以致不得不降低布的供应定额（1957年9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我们国家按人口平均耕地面积很少。为了保证粮食的需要，就不能过多地扩大棉花种植面积。为了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也不可能使用大量外汇进口外棉来增加棉布供应。况且因为1957年棉花种植面积减少，更不得不减少棉布的供应，但减少数目并不多。国家供应给全国人民每人的平均棉布定量，一般为十六尺，比上一年度的二十点六五尺，减少四尺多。

又因为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农业的丰收或歉收，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影响，因为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摆脱自然条件的限制，农业收成好坏还不能预测，只有到秋收后，才能比较可靠地确定下来，才能计算财政收入，按照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确定本年度基本建设的投资，这样自然会影响年度的工作。在上半年不免要窝工，在下半年不免要赶工，甚至突击，影响工作的质量和工作的安全。

（二）我国原材料的生产不够，尙不能满足加工制造、工业、

建筑业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如生铁、如煤炭）。

（三）各种优质钢材（如不锈钢），我国尚不能自制。

现在就以上三个问题，分别加以讨论。

1. 棉花不足可不可以多进口一些的问题

我们国家既缺少棉花，可不可以多进口一些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加以讨论。这几年来，国家种植棉花的面积大概是九千万亩左右，一般说，不能超过这个数目，超过了就要影响粮田的种植面积。以每亩产三十斤皮棉计算，九千万亩棉田可产二千七百万担，如果有的棉田每亩可产三十几斤，就可向上加些，大体上不出三千万担。所以1958年棉花播种面积以稳定在九千万亩为宜，如再缩小，就会影响棉布的供应。我们要提高棉花的商品率，在1957年至1958年度，棉花的收购量要争取达到二千二百万担以上。将来肥料问题解决之后，当然可以再向上增加，那是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的事，这二三年来，还增加不上去。

但如棉区农民大家少留自用棉，对于国家是有利的。我国棉农近二亿人，每人少留一斤棉花，国家就可以多买到近二亿斤皮棉。这对于纺织业的生产和国家经济建设，无疑地都是很大的贡献。产棉区的农业合作社和棉农们多卖棉花给国家，得到价款，不但可以投入农业生产，提高明年棉田的单位面积产量，并且可以适当地改善生活，这对于农业社和棉农们也都十分有利。有些棉农因为想多留一些棉花来发展土纺土织，增加收入，就不愿意多卖棉花给国家。这种情形应当尽量改善。土纺土织在某些地区是棉农增加收入的来源之一，而且历史上也有这种习惯。但是应该看到，土纺土织同机器纺织比较，浪费棉花是很多的。一斤棉花用于土纺土织，一般只能织布十二平方尺；而用机器织布就能织三十多平方尺，这就说明了远不如机器纺织合算。棉农们应该尽可能地压缩土纺土织，把节余下来的棉花用来支持机器纺织工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有人问：我们现在纺纱的能力有多大呢？大约有七百万枚锭子，还可以再

制造，现在制造的速度也很快，所以纺纱厂的建筑也比较快。现在正常的生产能力，大致一年可以生产棉纱五百六十万件，而棉花的供应，除去农民自用的棉花和充其他各种用途的棉花之外，尚足以每年生产四百万到四百五十万件棉纱。但生产的能力，可以达到五百六十万件，若加一点班，突击一下，也可以达到五百八十万件。这样一来，棉花的供应是不够的，加以棉产忽而丰收（如1955年）忽而歉收（如1956年）更容易使供产失调，因此，发生了棉花进口的问题。但进口外棉，要受外汇的限制。我们的意见，不如依照1957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办法，一面发动棉农把全部棉花采摘干净，争取好坏棉花全部还家。如果把散失落地的棉花都拣起来，依每亩平均多采摘二斤多皮棉计算，全国八九千万亩棉田，可以增加一百七十万担以上的皮棉。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一面合理地压缩棉产区留用棉花的数量，对于完成棉花统购任务有极大的关系。只要农业社在分配留用棉的时候，对于社员不同的需要进行适当的调剂，例如在留棉标准范围内，组织农民自报实际需要量，属于节约的部分给钱，属于实际需要的部分给棉，这样国家规定的留棉标准，完全可以保证棉农的需要。如能保证1957年规定的留棉标准不被突破，全国就会在1956年的基础上合理压缩一百几十万担棉花留用量。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加以1957年棉花收成不错，估计可比1956年增产二、三百万担。据各地反映，1957年收购的棉花品质比上一年好，多为三、四级棉，上一年多为四级棉或五、六级棉。棉花纤维一般要比上一年长十六分之一到十六分之二英寸。棉花的含水量一般也比上一年减少 3 %左右。棉花的衣分率在许多地方平均比上一年增加10%左右。

把以上的三个数目加起来，可以达到五、六百万担，可以使国家的棉花库存适当地增加，以便在歉收年景平衡工业和市场的需要，实行以丰补歉。这样棉产忽而丰收，忽而歉收，使供产失调的现象可以免除。

至于前面谈到的进口外棉的问题，进口外棉，还是正确的政策。就历年的进口数来说，1953年有两万吨；1954年有五万三千六百吨；1955年有九万二千四百吨；1956年有四万七千八百吨，这一年进口少主要原因是1955年的大丰收；1957年只进口三万四千八百吨，比1956年更少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在外汇。1957年外汇相当紧张，我们不能放手做去，因此布票要折半使用。我们还应该考虑以外汇买外棉，卖给我们的，一个是埃及，一个是巴基斯坦，埃及棉花的价格，大概是每吨一千多块美元，巴基斯坦的是每吨八百多块美元，均相当贵。埃及的高级棉纺成纱，织成布，在我们的国内用不起，只得拿去出口，这是一个限制。因为资本主义国际市场棉布总输出量大约每年五十亿平方码左右。日本、印度、英、美等大约要输出三十亿平方码，日、印二国今年准备增加输出，其他国家的棉织品也要投入国际市场，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我国的棉布主要市场是在东南亚各国，但他们的纺织业亦正在发展，所以希望不大。但以外棉纺成纱，织成布和内衣，运输出口，是有利的事业。前几年进口外棉，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今后还是值得研究的，在可能条件下可以逐步向这方面努力。但要大量进口，要看外汇的多少以为断，就是要受外汇的限制。这是第一个限制。

2、 棉花不足可不可以用别种纤维补充

棉花供应不够，已如上述。如能以别种原料替代，亦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酈云鹤代表（女）是对化工很有研究的专家，曾留学德国，回国后，也管理过工厂，富有经验。在她的1956年上半年视察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议，用苧麻纱代替棉纱结制渔网的意见。水产部于1957年5月24日作了答复（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6年上半年视察工作报告处理简报第26号）。说水产企业几年来曾经多次试验用苧麻纱代替棉纱与马尼刺麻结制渔网和绳子，但效果并不很好。如旅大水产公司用苧麻制绳试用后，发现拉力差，易打滑的缺点，而且苧麻原料目前国

内供应极端不够，所以这个用替代品问题还应该继续加以研究试验。在南方几省群众生产中有部分渔民使用苧麻制的渔网和绳子。但苧麻原料非常缺乏，还不宜广泛推行以代替棉纱。此外，从长远利益来讲，棉线网，苧麻网都不是发展的方向，最理想的是使用尼龙结网，它的好处是使用年限长，轻便并且成本低；但由于我国目前尙未生产，进口又缺少外汇，因此尙不能应用这种网具。水产部计划在1958年进口一部分试用，以逐步代替棉纱网。

侯德榜先生在他的发言中（在1957年3月政协会议上）亦说："要解决穿的问题而又不影响粮食的生产（因不与粮食争地），就需要发展人造纤维的工业，补充棉花的不足，如尼龙、卡普隆、爱兰德、丽绚、维尼隆、聚丙烯氰、聚氯乙烯、忒尔里林等等。这些人造纤维的质量轻而耐穿，一尺人造纤维至少可抵五尺棉布用。一双合成纤维袜子的穿用时间，一般可比五双棉线袜，而且它有耐热、耐光、不生霉和不为虫蛀等优点。解决了人民的衣食问题后，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解决其他问题，保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生活"。据纺织部蒋光鼐部长在195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纺织部已恢复并改建了上海安乐和东北安东二个人造纤维厂，并正在筹建北京合成人造纤维厂和保定人造纤维厂，北京厂已于1957年8月25日动工兴建，是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按照世界第一流水平帮助我国设计的，机械设备也是他们供给的。1959年投入生产后，每年可产三百八十多吨合成纤维，将在培养技术力量，积累经验等方面，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人造纤维工业打下基础。吉林肥料厂1957年投入生产后，1958年还要扩建，扩建后还可以用硝酸，合成氨和其他产品，来生产卡普隆等类的人造纤维。

吉林肥料厂、吉林染料厂和吉林电石厂三大工程，已提前完成投入生产了。肥料厂每年生产的肥料，可以增产粮食十四亿多斤，染料厂将供应我国缺乏的许多染料中间体和高级染料，电石厂投入生产后，将为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发展打下一个基础；在

这个基础上，将生产多种多样的有机产品。农业和合成纤维进一步的发展，就可以使我国人民在吃饭和穿衣两方面能有更多的改善。

但要建设大规模的人造纤维工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棉花不能很早地得到替代品，棉布就不能很早地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在目前用储备制度以丰补歉是最适当的办法。

3. 原材料供应不足，可不可以多生产一些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让我来举二个例子来说明：（一）是一般工业的原材料问题——煤，（二）特殊工业的材料问题——电子管厂的材料。

（甲）一般工业的原材料问题——煤

煤的供应相当紧张，让我来谈谈煤炭的生产。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原煤产量为一亿一千二百九十九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为二亿一千万吨，初步暂订第三个五年计划为四亿零六百万吨。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费广泰、张子富（两位都是抚顺的煤矿工作者）二位同志1956年冬季和1957年春季两次视察四个矿务局的实际情况后作出的全国原煤产量的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957年指标，不但可以胜利完成而且还可以超额完成，因为1957年国家所布置的计划任务是一亿一千七百二十七万吨，已经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超额四百二十八万吨。两位代表所视察的四个矿务局，包括江西的萍乡，安徽的淮南，山东的淄博和辽宁的抚顺，都是富有代表性的。现在各矿所订的超额计划，实际是在以上这个超额指标的基础上而又超额了。据费张二位代表的初步估计，1957年完成一亿二千万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个可能性是根据确实可靠的实际生产情况计算出来的。解放后全国煤矿职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煤炭产量迅速上升，劳动生产率也显著提高。以萍乡矿务局所属高坑、安源、青山及王家源等四个矿为例，1949年全局全年原煤产量不过八万三千吨，劳动生产率平均为零点零六六吨；1957年原煤计划产量为

一百七十七万吨，是1949年的二十一点五倍，劳动生产率平均为一点零一四吨，是1949年的十五点五倍。

就1955年世界统计资料来看，全世界人口为二十五亿二千八百三十万人，同年煤的产量为二十亿吨，按全世界人口平均分配计算，每人约为零点八吨，也就是国际产煤水平约为零点八吨。我国人口为六亿，要达到世界水平。每年应产煤四亿八千万吨。我国到1967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才能出产四亿零六百万吨，因此必须超额完成百分之二十，方能达到世界水平。所以全国的煤矿工作者还要继续不断地作最大的努力。只要艰苦奋斗，勤俭挖掘，一定能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最近使我们欢欣鼓舞的是我国1956年工业发展速度占世界第一位。1949年解放时，由于反动派的破坏，年产量仅达到三千零九十八万吨；解放以后，根本改变了煤炭工业的面貌，据王德滋代表（一位煤炭工业技术工作者）的估计："原煤产量已由1949年的三千零九十八万吨增加到1956年的一亿零九百万吨，1957年预料可以生产一亿二千万吨，超过以往七十年发展的速度。"解放前中国煤矿工业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战前最高年产量为1942年的六千一百八十八万吨，较大的煤矿几乎全部掌握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手中。解放以后，在第一个五年期间，"我们每年增产一千万吨左右，这个数字相当于英、法二国1951年至1955年煤炭产量增长的总和。"而且现在我们已经初步学会了大型煤炭矿井的设计和施工技术，掌握了一些特殊施工的经验，康拜因、割煤机、绞车等很多大型设备，我们已经可以自己制造或正在试制。基本建设队伍发展的亦很快。1952年我们只有六万五千零七十七人，而1956年我们已拥有二十六万一千三百四十五人的一支建设大军，从地质勘探、设计、施工各方面建立了专业的队伍。目前地质勘探方面，每年可完成一百二十万公尺的钻探任务，获得四十亿吨煤炭资源。设计方面，每年可担负三千万吨能力的矿井设计。施工方面，每年可以完成建筑安装工程四点七亿元以上，保证数百处矿井同时施

工。这支大军是解放以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有了这样的优良条件，我可以肯定地说：1967年我们一定能够赶上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乙）特殊工业的材料问题——电子管厂的材料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从资源的寻找，厂矿地址的选择，设计资料的搜集，设计直到建筑，机械安装和投入生产等各个环节，也得一些外国专家的指导。但许多新建企业，在投入生产以后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材料供应与生产相适应？如需要从国外进口，则在外汇、订货、品种、数量和供应时间各方面都沒有完全可靠的保证，就不免中途被迫停产。并且使企业的生产长期处于被动。在建设初期，向国外订货，固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但不是久远之计，拟应一面向国外进口，一面即在国内积极开辟材料的来源。以北京电子管厂为例。我们在国外订货中，直接用于电子管的材料有二百一十三项，目前有九十六项国内已经能供应，有一百一十二项已经试制成功，或正在试制中，两项合计二百零八项，占二百一十三项的97.6%。这些国内材料的采用，保证了正常生产，降低了成本，节约了大量外汇，降低了储备，节约了流动资金。1958年可以比1957年减少外汇57.5%，节约流动资金17%。如果再接再励，继续努力，到1959年便可以在国内基本上组成电眞空材料供应体系。

但组成电眞空材料的供应体系，不是一帆风顺的。1956年第三季度，当接近开工之际，技术资料已经到达，生产用料尙无着落，外汇很少，订货困难，深恐开工后就会被迫停工。欲解决有了现代化的电眞空企业而沒有与其相适应的电眞空材料供应体系的矛盾，非在国内积极开辟材料来源不可。但新材料试制工作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工作，它牵联到许多工业部门，又牵联到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和原料问题。因此，不能单靠一个厂去组织或督促试制工作。如果单独行动，虽然也能取得一些成绩，但是费力

大，时间长，效果小，不得不取得有关工业部和兄弟厂的支援，进行材料试制工作。北京电子管厂曾邀请中央八个工业部的负责同志和有关兄弟厂的负责同志、工程技术人员到电子管厂参观。经过参观，他们了解了电子管厂的困难和需要，都愿意予以援助。这样就为顺利开展新材料试制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现在已经有十二个省、二十八个城市、六十八个企业正在为电子管厂试制新材料。直接用于电子管的二百一十三项国外材料，除五项尚沒有找到试制单位以外，其余全部找到了试制单位。因为试制和代用的项目很多，不能用分散的办法，一个时期抓一个关键材料就可以，而是同在一个时期，要找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关键材料，其中沒有哪一个就不行，所以需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去进行工作。俟国产材料试制出来以后，要在生产中应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职工群众顾虑很多，怕产品质量沒有保证，必需发动群众，利用各种会议，反复地向职工说明材料问题的严重性和积极采用国产材料的重要性。此外还须指定专门技术干部帮助车间解决采用国产材料中发生的问题等等。现在采用国产材料的工作已顺利地展开了。

以上二个例子足以说明只要遵照党和政府增产节约的指示再接再励继续努力，原料问题一定可以逐步解决。

4. 各种优质钢材，我国尚不能自制，可不可以进口一些的问题

在帝国主义国家实行所谓封锁禁运的情形下，有些商品即使高价求购，也难买到。例如各种优质钢材，但其中有一种是我们一时无法解决的，这就是不锈钢，苏联产得亦不多，从其他国家也买不到。四川金堂化肥厂可以作些事，是很有希望的，但不锈钢始终沒有得到。建设一个化肥厂，从设计、建筑、安装到开工，大体要化五、六年的时间，一般说来，这种厂应设在工业化有了基础的国家中，甚至可以说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才能大量发展肥料工厂，因为需要的技术比较高，用的材料比较细致。政府有鉴于

此，就设法争取把化学工业搞得好一些，快一些，所以1956年把重工业部分成三个部，其中一个是化学工业部，这是第三个限制。

但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得很快，许多高级和特殊钢种自己已能生产。钢种方面，象航空工业用的高耐热合金钢，高级合金结构钢，电机工业用的特殊物理性能钢，各种不锈钢，以及其他许多解放以前不能冶炼的钢种，现在都可以生产，不过数量还不够多。钢材方面，已经能够生产多种大型钢材、合金无缝钢管、造船钢板、汽车钢板、不锈钢版、解放以前根本不能制造的生产飞机用的耐热钢板、钢丝绳等产品，现在也都能够生产了。

八 在这些限制克服中，自然会更进一步地改变社会主义建设的面貌

我在《此书各篇论文内在联系的说明》一文中首先把宇宙内事事物物按团团转的比例发展规律联系起来的理论建立起来了。第二在哲学思想方面，宋明程朱一派哲学家认为“理”可以离开事物而独立存在，故说“理在事先”，或“理在事外”，我则谓这个团团转的“理”（如综合平衡的“理”，按比例发展的“理”）不能离开事物而独立存在，“理”即在事物之中，离开了事物无所谓“理”，故说“理在事中”。我在第一篇平衡论结尾中，把团团转的意思说得很明白，在第二篇平衡论的结论中把“理在事中”的见解也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个团团转的“理”，不是单在平面上转动而已，乃是时时刻刻向上再向上地转动，它的转动必是螺旋式的，决不是平面式的。螺旋式的发展，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是我企图在这篇论文中建立起来的。

1．从发展的观点谈平衡理论

（1）在确定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时候，就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适当地增加对中、小型工业企业投资的比重，贯彻执行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的方针，使我在第二篇平衡理论第七节

中所说的大型和中小型企业间的平衡更提高一步。以水利工程来说，中国现在出现了象漭河流域和天津专区这样由于兴修水利而使得整个流域、整个专区大大增产的典型。这些典型事例，都说明了我国农业合作制度有巨大的优越性。从这两处的经验来看，有几点十分值得重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大部分水利工程是小型的，效益却是巨大的。天津专区已由缺粮区变为余粮区；在河南漭河流域，济源县的粮产量由1952年的九千八百多万斤增加到1956年的一亿九千七百万多斤。能够取得这些成就，主要是因为发动群众普遍兴修了小型水利工程。小型水利工程，不仅可以广泛举办，而且收效快，大大节省了国家投资。漭河的治理只用了四年时间，国家投资只二十五万元；天津专区的洼地改造只用了三年时间，国家对每亩地的直接投资仅两角八分。小型水利工程有不少好处：（一）技术不很复杂；（二）设计比较简单；（三）地址容易选择；（四）不必废弃耕地，迁移居民；（五）同群众的当前生产也容易密切结合；（六）因此这种水利工程容易发动群众兴修，能够多、快、好、省。大型工程则与此相反：（一）国家投资大；（二）技术性高；（三）地址选择较难；（四）施工期间长；（五）生效慢，不容易与当前生产相结合；（六）因此，就不可能多和快。中央规定的关于水利建设的方针是："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兴修大型工程"。这个方针符合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当然小型水利也有它的短处，大型水利也有它的长处，所以有些同志认为特大洪水到来的时候，小型水利无济于事。当然，无可否认，小型工程有它的局限性，但能抵抗普通水旱灾害，对整个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能起重大的作用。对于特大洪水的危害，当然在可能条件下有兴修大型工程的必要，这点是不能忽视的。但要兴建一个能够防御千年一遇大洪水的水库，象四川三峡水库那样的设计，据著名工程师陆钦侃先生的估计，要花一百余亿元；为配合这样大的电能，还要在广大的周围建立相应的工厂企业来充分利用。它们的造价（投

资）要达五六百亿到一千亿元。哪里来这许多钱？有了钱，哪里来这许多钢材和水泥？况工程浩大，二十年内恐不能完全建成。投资数目这样大，兴建时间又那样长，以长远利益来说，方针与政策是对的，无可批评的，但以目前人力、物力、财力来说，以与人民当前生产相结合一点来说，是不现实的。因此在国内目前的情况下，在目前的人力、物力、财力下，如何来搭配中、小型和大型水利，使成一体系并使之达到最适合于目前环境的平衡，是关系我国经济建设的一项重大工作。这样的平衡是比过去要恰当得多了，可以称为高一级的平衡。这一点留第九节中再详加讨论。

（2）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我们也将增加对地方工业投资的比重。除此之外，还要使地方不仅能考虑地方投资的合理性，而且也可能考虑当地中央所管的企业和事业单位投资的合理性，使中央的同地方的建设事业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样，中央与地方的工业管理系统不致因互不通声气，各搞一套，造成某些不必要的浪费。这样就能使我们在第二篇平衡理论第六节中所说的“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间的平衡”又提高一步。我们认为在严格执行国家计划的条件下，予地方以一定程度的机动权，以鼓励其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会使中央与地方职权达到较高的平衡。任何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决不会丝毫没有变动，因此我们必须及时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及时发现可能产生的不协调和不平衡现象，以便计划部门及时采取措施来迅速予以解决。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中央工业必须与地方工业相结合，才能取得更大的收获。我国幅员广阔，有着无数分散的资源。中央工业只能利用大而集中的资源，只是注意生产关键性的产品，那末，利用各地分散的资源，满足各地多种多样需要的责任，就必需由地方工业承担起来。且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相结合，可以免除建设力量重复浪费的现象。例如在某些地区，中央与地方先后兴建了一些糖厂，但由于原料不足，以致均不能发挥设备力量，或需

将某些厂另行迁移；又如某些地区的当地机修力量本已有余，但在该地新建中央企业，仍要自建机修车间。这是“万事不求人”的单干思想，是落后的自由经济时代的思想反映。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工业与中央工业间及各省市地方工业间缺乏密切的联系，也产生过一些盲目发展的现象，如某些省市的建筑五金材料及水暖器材已有剩余，而另一省市又进行新建、扩建。我们要知道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共同形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一个整体，它们必须相互结合，相互密切协作，方能达到更恰当的平衡，把平衡的水平更提高一级。一辆汽车是由三千多个部件和零件装配起来的，长春汽车厂需要的许多零件，是由地方机械工厂供应的。某些大钢铁厂需要的铁矿石、生铁也有一部分是地方工业企业供应的。因此，我们必须加强产品平衡工作，使产品的供、产、销和企业的新建、扩建计划，都能纳入平衡计划，以保证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彼此衔接，使中央和地方各企业生产能力的有余和不足之间能相互调剂。地方与地方之间，也要防止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盲目性，必需各把自己的发展置于全国平衡的基础之上，以避免因自己的发展而使其他省、市出现生产萎缩或设备不能合理利用的现象。这样才能使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达到更高一级的平衡。

（3）我们也将增加对新工业建设投资的比重，使我在第二篇平衡理论第二节中所说的“原有工业和新工业之间的平衡”更推进一步。

（4）此外，对于新的工业企业的建设，要同现有的工业企业、手工业、农业密切结合，使我在第一篇平衡论第五节中所说的“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又升高一级。

（5）我们在第一篇平衡理论第七节中说过：过去“有部分产品品种减少，若干产品的质量下降，质次价高；某些产品供应不及时，花色品种不对路，这里积压，那里脱销，不能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且过去商业经营环节有的地方多得惊人，如土

纸从收到卖，有的地区多到六七道环节。说是为国家积累资金，实际上因为流转环节过多，眞正获利无几，所以有的干部对环节过多不满地说："一统、二转、三关、四过手，手手要榨油，眞正的油水幷不多。"最好收购包销的产品要采取"产销直线结合"方式，即产地生产单位，将产品直接卖给主要销地进货商业单位；包销而属于出口部分产品，应该直接销于出口贸易部门，不必经过内销商业部门之手。每年事先作好平衡、分配、安排、挂钩，互订合同工作。不少收购包销产品如土纸，均有一定销售渠道，某地某种产品主要销区及数量，均有一定基础，如江西瑞金玉扣纸出口一向直运广州，宁都毛边纸一向直走上海，做起来幷不费事。也可以选点试办，逐渐推广；因为事先平衡了，安排了，也不会发生争购，更不影响包销，同时可以大大地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和节省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幷且在不影响国家资金积累和社会销售价的情况下，可以适当调整偏低的收购价或工缴费，以保证生产者应得的劳动收入，进一步发挥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里，要规定今后在建设新企业审查设计的时候，如果在供、产、销之间沒有取得经济而又合理的协作关系，即不应当批准该项建设项目。这样就可以使第一篇平衡论第七节中所说的"工农业与商业的平衡"和供、产、销关系益加恰当和密切。

（6）上海重工业的产值比重已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跃居第一位。因各重工业单位无非利用原有基础进行改建和扩建，所以发展速度比较快，而几年来的投资放在重工业方面的占82%；放在轻工业和纺织工业方面的仅占18%；原来以纺织工业为工业主体的上海,现在已经开始形成为一个重、轻、纺织工业合理发展的综合性工业城市。同时新工业中心正在陕西形成。1957年在陕西的工业建设面积，超过前四年总和的一倍，这样，就改变了过去工业分布偏在沿海的形势，使第二篇平衡论第三节中所说的"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平衡"更提高一层。况冶金工业部决定在十

八个省市和自治区内设十八个中小型钢铁厂，则沿海与内地的平衡可以更提高一层是肯定的。

（7）发展原材料工业，目的有三：1.集中力量，发展化肥、煤炭等工业以促进农业；2.发展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石油、盐碱等工业，以满足制造工业、运输机械工业以及化学工业发展的需要；3.扩大出口贸易，增加煤炭、生铁、食盐、有色金属和非金属产品的生产，以便适当地增加矿产量的出口比重，缩小农产品的出口比重。所有出口的矿产品，都要尽可能地在国内经过加工，再行出口，以充分发挥我国工业生产能力。这样就更容易使第一篇平衡论第八节所讲的“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平衡”上升到较高的水平。

（8）我国耕地少人口多，农业比重大，在人民生活水平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建设中、小型工业企业，可以扩大社会就业面（详以下十、十一、十二等节）。这可解决一部分地少人多的矛盾。但处理人多地少的根本办法，还不外乎一面增产物资一面设法控制人口。人口的增殖，从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可以看出我国人口问题的重要性。（见1957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负责人说：“我国人口众多，并且增加很快，人民生活虽然比解放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生活水平仍然不高，这都迫切要求农业的发展。我国的人口以每年增加一千三百万计算，加上全国每人每年的粮食和棉布的消费水平提高2％，就需要大约一百三十亿斤粮食和六十万担棉花。可见，如果农业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由于人口的增加，人民生活不但不能提高，而且还有降低的危险”。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意见与我在《新人口论》一文中所发表的意见相符合。其令我最感欣慰愉快者，党政领袖们都注意这个问题。现在广大农村正值大鸣大放的时候，普遍地展开讨论，一定会取得不少的收获。有一位研究印度尼西亚人口问题的外国专家对我说：“你们的优点，是党政领袖们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

重性，不然的话，只靠学者们口说笔写，效果很小。”他又说：“印度尼西亚的人口问题比你们的严重得多，但政府对此漠不关心，足见你们共产党政府的伟大。祝贺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政府。”我听了他的话之后，觉得他的话就是我心中要说的话。现在我对于这个问题不是象过去那样焦灼了，因为由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和正确的领导，人口的控制，已有了办法。1957年10月26日发表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九条中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我深信有了这样一项规定，人口的控制问题，就有了解决的办法了。并且这个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在农村中已取得了不少收获。比如四川省内江县双井农业生产合作社最近就节制生育问题展开了大辩论，许多社员都认为今后应该有计划地生育子女。这次辩论是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引起的。社里粮食年年增产，可是有些社员粮食消费水平却沒有相应提高。社员在讨论中发现原来是人口增加太快，全社去年一年就增加五十二人，需要消费粮食三万一千多斤，要平均每亩多增产二十七斤才够吃。但这里有早婚多生子的风气，这个问题过去并未引起大家注意。近几年，生活有了改善，这种风气更有了发展，许多人认为“早栽秧，早打谷，早生儿子早享福。”老年人鼓励儿女早婚，青年人也是刚满规定年龄就急忙结婚。政府宣传节制生育时，不少人思想有抵触。在大鸣大放中，有人还提出意见说：“政府连我们生多少娃娃也要管”，表示很不满意。后来这个社专门召开了节制生育问题的辩论会，辩论“节制生育到底好不好。”参加的人很踊跃。有人发言说：“娃娃多了，顾吃顾不到穿。前年入社，去年多分了四百多斤粮食，可是添个娃娃就用得精光，现在还欠三十多元债。娃娃多了，生活提不高，老婆和我吵过好多架。”在会上，大家都算起人口增加的细帐来，算到后来都很吃惊。大家感到这样下去，一年要

增产多少粮食才够吃？哪还有多少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设？接着，全场你一句，我一句议论起孩子过多的害处来。生过六个孩子的一个人说："娃娃一多，照顾娃娃就照顾不了生产。有时做活回来，娃娃沒人照应跌得头破血流。去年我只做二百多个工分，娃娃少的人却做了一千多个工分。"在会场上有些人还批评了"早生子早享福"的思想，理由是有了合作社，勤劳动就能改善生活，把合作社办好，比啥都可靠。（意思就是不必一定要靠儿子。）全场的人都认为政府提倡节育正是关心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不过有些社员嫌避孕麻烦。经过争论，大家感到有点小麻烦，还是比生产过多带来大麻烦好。有些社员还建议在农村加强节育的宣传，改进避孕药物的供应工作；并希望医院能想出更简便更经济的避孕办法。

（9）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中，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国民收入一定随着增加。这些收入要在积累与消费之间作合理分配，但增加部分的大部分只能用于积累。依照国民经济长远利益的要求，这笔用于积累的资金，最有效地用在发展原材料工业和农业中去，因为这两个部门是我国目前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这样，不仅能够增加出口物资，且能够增加消费品，这对于解决积累和消费间的矛盾，能起更大的作用。能使第一篇平衡论第九节中所说的"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平衡"上升一级。

回忆1956年好多地方农业社的夏收预分结果，一部分的社不能达到保证90%的社员增加收入的要求，如河南全省农业社约有40%多的社有这样的结果，主要原因是由于绝大多数农业社都忽视了发展多种经济的工作，而这个忽视是首先由于部分干部对发展多种经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错误地认为发展多种经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的怕搞副业，影响了农业生产任务的完成。在社员当中，除了怕搞家庭副业被扣"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帽子以外，还怕社内不给时间和赚了钱被强迫投资。此外在各级领导上，对农业增产指标和基本建设的要求的过高过急，也影响了农业社

在经营方针上产生了单一化的倾向（专重粮棉）。湖北黄陂县的星火社甚至动员喂猪户赶快把猪卖掉，把钱投到社里，在此社的第五生产队里，队长看见一个队员的猪糟蹋庄稼，把它打得四天沒有吃食。有的社员因为家庭副业已经停顿几个月了，看不到一点现款收入，于是向社里支借油盐钱、零用钱的人越来越多。天一亮，会计室里就挤满了人，支借戶从几十戶增加到一百多戶。

在这样情形中，中央才提出少扣多分多劳多得的分配政策，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的情形不同了，要反其道而行，不取少扣多分，应取多扣少分的方针。政治觉悟高的人说：在合作社建设初期，为了稳定社员的情绪，实行少扣多分的分配方法，较多地照顾社员改善生活的要求，这是正确的。现在多数社员的生活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1956年农民食用和储备的粮食比1949年增加了一千一百多亿斤，1956年国家供应给农民的布匹比1950年增加了二倍。从许多调查材料来看，除去少数富裕中农以外，原来的中农贫农雇农的收入，一般都比抗战前有显著的增加。现在农村里，眞是人人吃饱饭，个个有新衣。1956年全国已有80%的社和75%的社员增产增收。1957年是中等年景，粮食和各种农作物比去年都有增加，棉花比1956年增加三百九十万担，猪增加三千多万头。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分别达到四百斤、五百斤和八百斤指标的，全国已经有六十五个县(市)，亩产 100 斤皮棉以上的棉田有 418.6 万亩。据山东、山西、浙江、陕西、江西、河北、广东、辽宁、湖北、吉林、黑龙江、福建等省不完全的统计，有20%左右，或30%左右的农业社，已经赶上或者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甘肃张掖专区全区平均的生产水平已经赶上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已经有70%的社员的收入水平赶上或者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收入水平。敦煌县全县平均每个农戶收入1,577元（全县共9,904戶农戶），每人平均277.6元（全县农村人口共53,744人）。这就说明多扣少分增加农业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不但是应该的，而且是可以办到的。

现在合作社的多数成员是原来的贫农和下中农，家底本来很薄，若要赶上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必须先把"家底"尽快地建立起来，不应该把全部收入分配掉了。在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基础上，合作社适当地多留一些，对生产有莫大的帮助；社员适当地少分配一些，对生活不会发生严重的影响。应该教育全体社员从大处着眼，积极支持这种作法。至于许多社员把生产的结果浪费在吃喝、婚丧、迷信、赌博等等方面，而不用作积累和储蓄，这种恶劣现象，必须快快纠正。

有些人往往强调本地区的特殊情况，说什么丰产地区可以这样办，由合作社多扣一些社员少分一些，贫瘠的地区就有困难；平原地区也可以这样办，山区就有困难；别的地区向有集资筹料的习惯可以这样办，多扣少分，本地区一贯是由国家投资办水利，马上改变方式就有困难……这种种说法都是不对的。甘肃省武山县是一个贫苦山区，今年一年发展了十一万多亩水地，其中给补助的每亩也不过一角七分钱。我们是世界的主人，是生活的主人，是我们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要永远满怀着信心，面对着未来，不要老是在一个地方兜圈子，而不能起螺旋式上升的作用。现在不能再说"有困难"这类的话了。两年前"有困难"，经过两年的实践，为什么还会"有困难"呢？自己有困难，在别的地方不是已经作出许多榜样了吗？也不要再说"条件不好"一类的泄气话了。许多自然条件很不好的地区，不是也走到最前列了吗？别人做到了的，为什么我做不到呢？

在全国范围内，正在轰轰烈烈地、热火朝天地开展冬季生产三大运动，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转业军人、下放的男女干部和回乡军官家属，正在新的岗位上和农民群众肩并肩地向改造大自然进军。人流在山间布满，车辆在公路上奔驰，船只在河流中急驶，农村沸腾了，新的生产高潮掀起来了，人们到处在学习和辩论农业发展纲要，若要达到纲要所规定的任务，照老步子走去肯定是不行的，决不能在十年之内达到纲要所规定的指标，

也不能在十五年后赶上英国。又有些人说：过去省吃俭用，是为了买田置地传后代，现在土地归了合作社，老了可以要求“五保”，病了可以要求补助，荒年可以要求救济，一切有合作社在。所以有些人一心讲究吃穿，分红后就滥吃滥用。这种只顾眼前，只顾个人利益的想法和作法显然是不对的。全国有六亿四千万人口，如果每个人一年多用一块钱去买粮食，国家就需要六十亿斤粮食的供应，每个人一年多用一块钱买布，国家就需要增加两千万匹棉布的供应。每个人多花一块钱是小事，但是国家和合作社就要增加大量的物资供应。如果六亿四千万人口都不考虑增加积累，扩大再生产，把现在生产出来的东西，全部或大部吃光用光，则国家还有增加积累的可能吗？还能为农民增产化学肥料多制农业机械建筑大型水库吗？过去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积累二十或二十一比消费八十或七十九，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似应把积累的比例提高至二十三、四，消费比例降低到七十六、七，积累多了，可以再扩大生产。

条件比较不好的山区人民那股排山倒海的劲头，已经冲破了不知多少古老的风俗习惯，不只迅速改变着山区的自然面貌，也改变着山区人民的精神面貌。倘然我们仍以陈旧不堪好吃懒做的坏习惯、坏看法和坏作法束缚着我们那股排山倒海的劲头，使一些可以办，现在又能办的事情，推迟下来，很少人去做，甚至很少人去想，试问我们还会有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勇气吗？我们要在十五年后争取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或超过英国，使我国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光荣又伟大又艰巨的任务，现在已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农业合作社社员们是我国六亿四千万人所组成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军中的一支最强大最重要，最勤劳最勇敢的方面军。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争取在今后十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四十条规定的目标。已经达到纲要指标的，也不能算已经跑到最终点。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是沒有终

点的。达到了指标是光荣的，提前达到了指标更是光荣的。可是，创造日益美好的新世界的长途中，这是新的起点。只在一个两个项目上达到了指标的，没有理由认为已经不需要拿出更大的力量来。“四十条”条条要实现，实现了“四十条”，还要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创造性，定出“五十条”、“八十条”、“一百条”来，攀登一个又一个长满着奇花异草的新高峰。这就是螺旋式的上升，许多先行者已经悬起了更高的目标，勇敢地坚决地踏实地走上了新的行程，我们应该紧紧地追赶上去。

我们认为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应与国家的积累相结合。农业合作社所行的是集体所有制，它为了增加一些基本建设，就必须付出一定的劳力和资金，这些资金主要依靠农业社自己去解决，因此兴修小型水利是农业社自己的任务。国家企业所行的是全民所有制，它的利润是上缴给国家，作为积累列入国家预算收入的，国家增加基本建设（如兴修大型水利）所需要的投资，当然要由国家积累拨付。如果行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合作社增加基本建设（如兴修小型水利）所需要的投资也要从国家积累拨付，显然非国家财力所能负担的，必须依靠农业社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国家当然要尽力予以必要的援助。这不仅是因为国家的财力有限，而且是因为以小型工程为主的农田水利，它本身就是一种群众性的建设事业，如果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办，就不可能达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目的。过去的经验证明，凡是依靠群众兴修的工程质量合格，花费时间短，国家花不了很多补助费。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群众性的水利建设高潮已经形成，但是在有些地区，还在伸手向国家要钱，他们看不见农民的力量由滴水汇成江河，各地干部和群众也取得了不少大兴水利的经验，只要我们善于领导，小型水利工程，甚至某些中型水利工程，是群众自己办得到的。

兴修水利包括三个方面：（一）防洪保堤；（二）除涝保收；（三）灌溉增产。以治淮来说，在最初两年，把主要力量放

在“防洪保堤”上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治好淮河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仅仅“防洪保堤”是不能达到根治淮河的目的的，因为它不能解决內涝问题。我们治水不应该单纯着眼于保堤而应重视保收。堤虽然能够保证不破。如果內涝得不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则仍可使农业受到严重的损失，这就沒有达到“保收”的基本目的。对于这种只重视大型工程防洪，忽视小型工程排涝的思想，经过几年来的思想斗争和现实的教训，已经基本上扭转过来，但是又可能发生另一种偏向，即重视排涝而忽视关键性的防洪工程。譬如淮委提出的大型控制工程。对于承受河南来的大量容水，是非常必需的，但阜阳某些干部就不同意这些措施，他们认为淹地太多了，不合算。其实不牺牲小块，就不能保证大块，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所以必须把排涝和防洪的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必须把农业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和国家的积累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进一步扩大保收的面积。

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北方平原地带需要多打井，山区地形复杂，水利工程的形式就应该多种多样，南方的丘陵地带需要修水库，也需要挖塘、筑壩等等。单靠少数的大中型工程，怎么能解决全部水利问题？况小型水利的特点是花钱少收效快，每乡每社都可以兴修。五亿多农民同时动手兴修小型水利，其效果当然比集中兴修的少数大型水利工程快得多，大得多。因此群众性的小型水利工程，决不是少数大中型水利工程可以代替得了的。当然，大型水利工程技术性强，需钱多，费时长，群众自己难以举办，只好依靠国家。解放以来国家大量投资治理大江大河，许多中型工程各地也都在举办。正因为大中型工程需要依靠国家投资，所以只能由中央和地方根据必要和可能的条件，统一筹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兴修。

我们在兴修小型水利中，十分重视培养典型，而后把典型的先进经验推广到别处。如山西大泉山的水土保持是一个典型，其余各地充分利用和推广了它的好经验。山西省雁北专区经过一年多

的努力，已经出现了二百零七个“大泉山”,1958年春季又可达到五百个“大泉山”，这就是我们不在一个地方兜圈子，乃要把一个圈子愈推愈广。目前在党的领导下，各方面的力量已紧密地配合起来来支援水利建设。从中央到地方不论工业部门、商业部门，运输部门，宣传部门，财经部门以至于部队、学校都以巨大热情，给予大力支援。各地商业部门正在千方百计找寻货源，满足水利建设各项物资器材的需要。甘肃、江西等省的驻军也纷纷组织力量帮助农民兴修水利。这样农业的逐年增产是不成问题的。农业繁荣了，轻工业就有发展的潜力，一面满足人民的日常需要，一面为重工业积累资金，而重工业的产品如农业机械，化学肥料等等的市场亦即在农村。这样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是三位一体，鼎足而立的，互相制约，互相推进，结果造成多种多样的本国产品的出口，换来多种多样的外国的生产资料和设备的进口，把生产圈子越推越广，把综合平衡水平越提越高，中国人民在文化和物质生活上攀登一个又一个的新高峰。

综合以上所述九个结合可以预测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我在第二篇平衡论中所讨论的各种对立物，一定可以在较高的水平上平衡起来，这就是进步，就是辩证的发展，就是螺旋式的团团转。

2. 从发展的观点谈哲学思想

这篇论文主要内容是属于经济方面的，但我的哲学思想也渗透在里面。我在第二篇平衡论中讲到宋明程朱一派哲学家所讲的“理”。他们所讲的“理”似乎是指自然规律而言，虽然他们的“理”也含有道德原则的意义在内。他们认为“理”可以离事物而独立存在，故说“理在事先”或“理在事外”，这是唯心的说法。我在两篇平衡论中所说的“理”如“综合平衡的理”，“按比例发展的理”，也是指自然规律而言，但是这个“理”不能离开事物而独立存在。“理”即在事物之中，离开了事物无所谓“理”，故说“理在事中，”这是唯物的说法，而且这个“理”

是团团转的，因为宇宙中所有事物都有内在的联系，都不是孤立的。在第一篇平衡论的结尾中，我把团团转的意思说得很明白，在第二篇平衡论的结论中，我把"理在事中"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但在两篇平衡论中团团转的"理"无非在平面上转动而已，犹如孔子所说的"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年年如此，看不出有发展的意义。但实际上我们的经济是发展的，从低级发展到高级，从少到多，从穷到富。那么指导经济活动团团转的"理"可以断定它亦必从低的水平达到高的水平，它不是仅仅在平面上转动而已，乃是时时刻刻向上再向上地转动。所以它的转动必是螺旋式的。不但如此，程朱派似乎把道德原则也包括在"理"之中，则道德亦必由低级发展到高级，它的发展也必是螺旋式的。这个意思，我在"此书各篇论文内在联系的说明"一文的末段，说得很多，在这里，我只要补充几句。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当社会生活的各部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广大群众的思想变革就更进一步涉及到道德、风俗、习惯、心理以及人生观等各个方面。例如，从前公众认为剥削是荣耀的，是使人羡慕的事情，现在公众则认为是卑鄙的，是令人可耻的事情。从前公众认为劳动是下贱的，令人可耻的事情，现在公众则认为是光荣的，是使人尊敬的事情。这说明了由于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不能不引起人们道德的根本变革，而道德的根本变革也推动和促进了经济的根本变革。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生活资料分配方面，还残留着不平等。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是各尽其能，按劳取酬，既然是按劳取酬，那就有不平等。劳动力强的，收入就多一些；劳动力弱的，收入就少一些。一个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每人收入就少一些；反之，人口少，劳动力多，每人收入就多一些。虽然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对于收入太少的人有种种帮助和救济的办法，但是这种生活收入方面的不平等，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只有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按照需要来分配生活资料，这

些生活收入上的差别才会消灭。这说明了道德的原则，随着经济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同经济生产力同一步骤地螺旋式地上升，从而可知道德原则亦在“事物之中”，决不能如程朱派所说在事物之先，或在事物之外。离开了事物，看不见道德。

以上只讲到道德。其实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广大群众的思想变革不但涉及到道德，而且更进一步涉及到心理和人生观，广大群众看见了他们的光明前途和他们的奋斗目标。以我国山区人民为例，我国国土面积，据旧说法，是三山六海一分田，但实际上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开发占国土十分之八的山区，就是我国今后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主要方向，而蕴藏着丰富矿产的我国深山，更是我国发展工业的宝库。但有些人不了解山区，不相信山区有前途，不知道山区人民心理和人生观的改变，对山区建设缺乏信心，缺乏热情，所以很多人仍然不愿意到山区去。有人说山区苦，那就要看他怎样去理解。陕西商雒专区建设山区的模范乡商县龙王庙乡，七星农业社第三队的女社员们，在修梯田运动中，为了在一块半亩大的石滩上搬走所有的石头，她们大的抬、小的担、碎的拾，把手磨烂了，肩抬肿了，在平原上的人看来，这是一件苦事，但她们不这样看。她们加快速度，男队员炸石头赶不上她们搬运的时候，她们多么高兴。当她们为了完成任务付出了巨大的义务劳动的时候，她们多么骄傲。当她们看到那块石滩变成梯田，每亩收麦三百七八十斤，比周围麦地多收一百一二十斤的时候，她们真乐得心花怒放了。这说明了山区人民在新环境下的心理和人生观。

近一、二年来山区人民的新人生观决定着他们的苦乐观。革命者的最大快乐，是为革命的理想而奋斗，是革命理想的实现。同自然界的斗争，象革命斗争一样能够使斗争者在种种困苦中求得人生最大的快乐，能够使他们在吃苦中尝到真正的甜。

山区真的苦吗？有些人喜欢拿山区同平原和城市来比较，这样来看山区苦。但是为什么不拿今天的 山 区 和 过去的山区来比

呢？解放前，龙王庙乡的山区人民被地主恶霸“剥开肉皮抽干油，肥山变成瘦骨头”，人民过着“吃饭照影影，睡觉看星星”的劳苦生活。经过解放后，特别是最近短短两年的努力，辛勤的劳动结了丰硕的果实，贫瘠的山地变成水浇的梯田，缺粮乡变成余粮乡，人人有新衣，破草房绝了迹，暖水瓶、手电筒、胶鞋、自来水笔成了普遍的日用品，全乡每户的平均收入达到了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你说山区人民生活苦，他们说：只有从旧社会地狱里煎熬过的人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这是山区人民看问题的方法。所以要了解山区人民新的心理和新的人生观，也得要从他们和自然界进行的斗争中看出来，离开了斗争，看不见新的人生观。

民间歌谣最能表达民间的新旧心理和新旧人生观。在下面我抄了两段民间歌谣以便读者对比一下：

（1）山里佬，真苦恼，火炉当棉袄，松明当灯照，苦菜吃到老。

（2）办社好，办社好，穿上新棉袄，山上百样草，样样变成宝。

以下让我来补充地谈一谈宋明程朱一派哲学家怎么会作出“理在事先”的错误结论来！

3．宋明程朱派作出“理在事先”错误结论的根源

上面我们说过程朱派的说法是唯心的，我们的说法是唯物的，二者的区别如何产生的呢？这篇文章是本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写出来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它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这就是一切意识形态都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世界及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它认为世界是处于永恒运动着，变化着和发展着的状态，而这种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内在矛盾对立的斗争与对立力量的相互作用。唯心主义哲学则恰相反，一切唯心主义者断言精神、意识是第一性的东西，而客观世界不过是精神、意识的体现。这样唯心主义

就是从主观引向客观，以自己主观的想法去硬套在客观物质世界之上，这就不能不达到歪曲客观实际的结论。唯心主义哲学也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但是，是客观世界歪曲的反映，所以列宁主张把唯心主义作为片面的世界观来加以批判。原来人们的认识过程是非常复杂而又充满了矛盾的辩证过程。“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从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眞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法道路。”① 认识是由实践产生的。人类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性的，不是单纯地适应环境，更重要的是要改变环境。这样就要求人能认识周围的环境，不仅要求认识其现象，还要求掌握其本质，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否则人就无法进行有目的性地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通过实践而发现眞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眞理和发展眞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內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② 这就是螺旋式的前进。

认识包含了感觉、知觉、表象（观念）、概念、判断和推理等等形式。感觉、知觉、表象属于感性认识阶段，到概念以后，才进入了理性认识阶段。概念已不是对个别事物的表面的反映，而是对一般事物的本质的反映。任何事物都是个别和一般的统一，即个性和共性的统一。无论如何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是我们认识的惟一来源，由于它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我们就有了感觉，感觉就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映象，正如人的照片是人的映象一样。在具体的映象的基础上形成的抽象概念，也是现实的反映，不过它是现实的间接反映。不论是直接反映，或是间接反映，它都是以客观事物的存在为前提的。首先有人，才能有人的映象。人是个别和一般的统一，即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例如个别的人都

①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85页。

有一定的性别（男性或女性），一定的年龄，一定的面貌，一定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等个别属性；但各个个别的人又都具有共同的属性，即能劳动，能说话，能思维等等，这些共同的属性，就构成人的一般的概念。这就是一般和个别的密切联系的辩证的统一。概念和抽象思维（判断、推理）间接反映现实，所以它们离现实世界更远些；但概念和抽象思维又比感性和知觉更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所以它们也离现实世界更近些。为什么说离现实世界更近些呢？因为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不能一下子达到完全的认识，所以在实践中首先接触到的是各个事物的片面，认识了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就是认识了事物的现象，这是积累感性材料的过程。在实践中，感性材料愈积愈丰富，我们通过思考（概念，判断，推理）把这些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眞，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改造的工夫，就能使我们发现各个事物之间的內部联系，从而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事物的本质。这样，认识就由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达到了完全的认识。然后以之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并在实践活动中再检验和修正补充我们的理论。

在认识的过程中，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推移也不是直线的，常常是经过无数次的反复的。列宁说得好，他说：正因为"人的认识并不是直线（也不是循着直线进行的），而是那无限地近似于一系列的圆形，近似于螺旋形的曲线。这曲线底任何一个断片、截片、小片，都可以转化（片面地转化）为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一直线（如果只看见树木而不看见森林）就会导引到泥坑，导引到僧侣主义……。"①

一般说来，在这个认识论问题上有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夸张人的认识的特殊性。这类哲学家看到人类认识当中有理性的因素，于是就把认识看成先天具有的理性的作用，或是

①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19页。

看作超自然的神所赐给的力量。这样就把认识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并且神秘化起来，结果就给宗教打开了道路。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的最大的代表柏拉图说："有各式各样的人，你认为这个人美，另外一个人说这个人不美；在这个年龄这个人美，到另外一个年龄这个人又不美了。"因此他说："物的感觉性是变化的、不固定的、暂时的，所以物的世界是虚幻的；美的理念是完美的、不变的、永恒的，所以只有'理念的世界'才是真实存在的。"于是他认为"理念的世界"是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物的世界是"理念的世界"所派生的，是"理念的世界"的阴影，是第二性的。他认为到处存在着理念。例如他认为具体的房屋、动物、植物等等，都是房屋、动物、植物等等概念的产物。由此可见，柏拉图不懂得反映事物的概念本身是要随事物的发展而变化的，所以"美"的理念也不是不变的、永恒的，他不懂得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他把概念僵化了，认为是永恒不变的，进而又把一般和个别割裂开，把概念和具体的事物割裂开，片面地夸大了概念的地位，使之变成了独立的主体，变成了万物的本源，从而堕入了唯心主义。柏拉图最后更认为高级的理念就是神，于是他的唯心主义又进入了宗教的殿堂。

我国宋明道学在开始说"理"的时候，是想以唯物主义的武器来拒绝佛学底唯心主义思想。张载认为物是"气之聚"，他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但世界的万物若都是"气之聚"，何以各各不同？对此张载未作解答，但程、朱一派给了一个解答。他们认为万物固是"气之聚"，但仅仅气尚不足以说明万物何以各各不同，所以他们认为于气之外还有个"理"，理是主，气是从，这个"理"与辩证唯物论中的规律相仿佛，按照这一种规律而聚的是这一种东西，按照那种规律而聚的是那一种东西，这样他们解答了张载所没有解答的问题。程朱一派也是反对佛教的，他们也认为客观世界是独立存在的，客观世界的规律，也是客观存在的。至此为止，他们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但他们认为他们所谓

的“理”是可以先于具体的事物而存在，所以说“理在事先”。这样他们离开了唯物主义的领域，走向唯心主义了。他们犯了与柏拉图同样的错误，把一般和个别割裂开，把概念和具体的事物割裂开，片面地夸大了概念的地位，使之变成了万物的本源。他们不懂得理与事物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也就是规律与事物的关系。我们认为理是一般，是一类事物的规律和本质，事物是这一类中的个别事物；一般（规律和本质）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决不能离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只能说“理在事中”，不能说“理在事先”、或“理在事外”。

程朱派哲学，还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的，至于主观唯心主义则其理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荒谬绝伦的。他们把世界了解为精神的表现，他们所知道的物质就是他们对颜色、形状、大小以及硬度等等的感觉，把世界上一切现象都归结为感觉的表现，所以教师向学生讲学，只是向“感觉”讲学，士兵与敌人作战只是与感觉作战。他们认为世界上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东西和现象都是神创造神安排的，一切都服从神的意旨，人是无能为力的。这也是一种世界观，但这种世界观只能为剥削阶级服务，它要劳动人民毫无怨言地忍受被剥削的贫困生活，把这说成是神的安排，说成是命定的，人力无法改变。因此剥削阶级常把世界说成是一成不变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企图使人民认为剥削制度是天经地义，不可更变的。它欺骗人民说任何旨在推翻剥削制度的革命都是不可能成功的。中苏两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地推翻了这种胡说。

九　这个新面貌将很明显地反映在对外贸易上

第八节所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必使我国的工业化大大地加速，使我国工业品出口的比例逐步上升，使农副产品出口的比例逐步下落，其结果将很明显地反映在对外贸易上，因为对外贸易最能反映国家的经济情况。我这样的判断，不是没有历史

根据的。1860年清廷被英法帝国主义的联军打败，被迫签订北京条约，把天津辟为商港。从那时起，外国商船一艘艘地开到天津来，外国银行、贸易行、轮船公司、代理行、油库、仓栈以及商品检验公司等等相继设立起来了，他们贪婪地吸吮中国人民的血液膏脂。据天津海关保有的从1861年开关到1948年解放前夕为止的全部历史年册记载，这八十八年间，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天津港从中国农村掠夺去的棉、麻、花生、羊毛、猪鬃、皮张、蛋品、煤炭、食盐、花边、地毯等珍贵的农畜、矿产品和手工艺品达六万多船。如果把这么多船只首尾相连地排起来，可以从天津一直排到香港。帝国主义国家从我国掠夺去的大量价格极为低廉的原料，加工后再运来我国销售，大获其利，再加上大批毒物——鸦片的输入，使天津港的对外贸易形成连年入超。八十八年间入超总数达十二亿多美元，大量的走私尚未计入。这八十八年间中国沦为殖民地的经济状况完全反映在天津海关的全部历史年册上。这八十八年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61年到1920年满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各帝国主义统治时期。这六十年所有海关年册的进口货表上，最前面的第一栏总是鸦片。第二个时期从1921年到1948年，主要是蒋介石、汪精卫和日、美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在这时期内鸦片以走私方式进口，公开进口的主要商品是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这种殖民地的经济情况在天津解放后的第一年——1949年就根本改变了。自1949年革命胜利以来，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期，各种各样的生产资料、建设物资占了最主要的地位。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进口了为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电机工业、石油工业、煤炭工业、基本化学工业等所必需的成套设备。这些东西对我们工业生产能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反映在天津市对外贸易局进口商品分类表上。

此外我国的对外贸易不但能反映我国的经济面貌和生产状况，且能反映群众的意见。群众说肉不够吃，为什么不少出口一些呢？政府就接受群众的意见，把出口的猪肉和生猪比去年减

少，从十六万吨减到五万吨；群众说油不够吃，就把油的出口量从三十二万吨减到二十二万吨，现在看来，恐二十二万吨还出口不了。为照顾到人民当前的生活需要，把几种主要物资的出口数量压下去。如粮食比去年减少了五十四万吨（我们因橡胶不够用向锡兰以大米换橡胶），棉纱减少了一万二千多件，这就大大地影响了外汇，削弱了外棉进口的可能性。但我们这几年来在工业生产上有了进步。我国是农业国，过去的出口，以农业方面的产品为主，工业方面的少些。这几年努力的结果，工业产品和矿产品开始多起来了，慢慢地上升到50%以上，农业产品就慢慢降落到50%以下，这于外汇有利。仅以上海工业品的出口发展情况来说，1956年仅仅中国杂品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一家，经营出口的工业品，其外汇总值可以换回一百万吨以上的钢材。对资本主义市场出口部分，1956年大约是1954年出口实绩的十二倍。如果以整个上海口岸的出口来说，去年工业品的出口要占上海出口总值的50%，这些工业品行销到五十三个国家和地区，遍及世界的五大洲。这个情况反映什么问题呢？（一）它说明是由于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高涨，反应到对外贸易上的也是工业品出口迅速的扩大与发展。（二）它说明了我国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地增长，反应出我国出口商品起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我国传统以农副产品出口为主的，现在工业品已逐渐成为出口的主要商品了。以棉布为例，1956年出口的数量虽约为历史上出口最高年的八倍，但仅占全国内销量的5%左右。我们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出口商品。许多过去依靠进口的机器如起重机、各种医疗器械、电影放映机等，现在均已能够供应出口了。去年我国还供应了缅甸两万纱锭的纺织工厂成套设备。仅1956年出口的手工艺品就换回约一亿卢布。可见工业品出口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这些难道是人们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时期所能梦想得到的吗？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的标志之一吗？所以尽管美帝国主义从1950年以来就对我国实行所谓封锁禁

运，丝毫不能阻止我们对外贸易的发展。

另外我们还设法增加了于人民生活影响不大的水产品、手工业品、小土产特产品和矿产品的出口。增加矿产品出口的比重，可以缩小农产品的出口比重。但所有出口的矿产品，都要尽可能地在国内经过加工，再行出口，以充分发展我国的生产能力。

随着第八节所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必然加速，我国工业品的出口比重，更会逐渐增加，其理由很简单，列之如下：

在原材料工业的采掘和加工方面我们把全国力量集中起来来发展我国的工业和农业：（一）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相结合。（二）国家开采和群众开采相结合。（三）中央部管企业和地方企业相结合。（四）新企业同老企业相结合。（五）最新技术同一般技术相结合。（六）机械化、半机械化同手工操作相结合。（七）提倡有关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同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副业）相结合来开小煤矿、小铁矿、小有色金属矿、小非金属矿、小盐场或小碱场等等以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充足的条件来发展我国的资源。（八）贯彻执行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同时并举的方针，提高农林水利投资的比重，增加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工业的投资（如化学肥料）以加速农业的发展。各级党和政府的农业、林业、水利、畜牧等部门都要安排自己的工作；来彻底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机械制造部门、化学肥料部门、商业供销部门、银行信贷部门、医药卫生部门、气象部门和农业科学研究部门都要想一想怎样为发展农业出一份力量。怎样把农民的劲头发动起来让他们看到光明的前途，看到增产的潜力，看到各种有利的因素。（九）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把防洪、排涝、灌溉、水土保持等工作结合起来，决定不孤立进行。（十）整风运动及反右派斗争同增产节约运动也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的。整风运动是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这不但不会影响增产节约运动，而且对它有莫大的推动作用。（十一）机械化开采与手工业

并采相结合。（十二）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与国家的积累相结合。有以上所述十二个力量的结合，还怕增产不会向前大大地推进吗？还怕我国的丰富资源不被利用吗？况过去几年在工业化方面我们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预计到1957年底为止，我国限额以上的厂矿建设单位将达八百二十五个，其中属于中央各部管理的有七百个，属于地方管理的有一百二十五个；竣工的单位将达四百四十八个，其中属于中央各部管理的有三百七十七个，属于地方管理的有七十一个。大家知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限额以下的厂矿建设单位还有两千三百个左右，其中属于地方管理的有一千四百个左右。这些建设单位绝大多数都已竣工投入生产。因此预计中央所管理的工业企业产值，1957年将比1952年增长一点七倍，地方所管理的工业企业的产值将增加二点二四倍。可见我国工业建设的成就是非常巨大的，并且也是人所共见的。在这样一个工业化基础之上，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加上以上所述的十二种结合的力量，还有不能大步推进的道理吗？所以我说第八节所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将很明显地反映在对外贸易上，把我国一向以农副产品出口的局面改变为工业品出口的局面，而这个改变将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在各个方面都益加提高和巩固。这就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步推进。

第八节所说的新面貌，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1．一方面向来的入超将永远变为出超或出入平衡

过去我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外国银行、贸易行、轮船代理行、油库、仓栈以及各种工厂都相继设立起来，他们贪婪地吸吮中国人民的血液脂膏。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十多个商埠从我国农村掠夺去的棉、麻、丝、茶、花生、羊毛、猪鬃、皮张、蛋品、桐油、大豆、煤炭、食盐、花边、地毯以及铁砂等农畜产品、矿产品和手工艺品，不知凡几。它们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所掠夺去的原料，经过加工后再运来我国以高价售给我国人民，再加上大批毒物——鸦片的输入，使我国的对外贸易形成连年入

超。况在不平等条约之下，海关大权操于外人之手，外货进口一律行值百抽五之税，我国过去的政府无权单独提高海关进口税阻止它们进来，而在华外人需用的许多奢侈品如香水、首饰、皮鞋、雪茄、香烟等还一律免税。这种情况使入超形势益加严重。总起来说，出口的是低价，收进的钱少；进口的是高价，付出的钱多，当然形成入超，故百多年来中国几乎无年不居于入超地位，吃大亏者是老百姓，获大利者是洋商与买办。这种情况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后才根本改变。现在对外贸易逆势已转到顺势，我们要问怎样转过来的？过去，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是按照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实行把国内外价格分开的办法，所以进口和出口商品的国外价格按外汇比率折合成人民币以后，同国内价格比较，一般的都有一定的差额，表现为出口有亏损，进口有盈余。但是我们在国内收购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品，则是按照国内价格购买的，所以农民和工业生产单位并没有负担出口的亏损。进口商品中有的按照代理进口的办法，按进口成本加百分之二、三手续费拨交订货部门，有的按照对外贸易部同商业部协议价格拨交商业部门。进出口商品的国内外价格差额是由国家统盘核算的，用进口商品的国内外价格差额（盈余）抵补出口商品的国内外价格的差额（亏损），所以两不吃亏，把入超消灭了。在旧中国时代吃亏者为中国农民，赚钱者为洋商和买办，因进口商品有钱可赚，所以进货踊跃年年有入超，因为农民被迫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向外国商人或其代理人出售自己的产品，所以一年穷一年。

我国组织各种物资的出口，一方面促进了这些物资生产的发展，一方面解决国家外汇来源，外汇就是以进出口相抵后剩余下来的数目。就这个意义讲，我们已由入超国转变为出超国或出入平衡（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输出同输入是平衡的）。我们主张发展各国间的平衡贸易，因为只有彼此进出口平衡，才能避免一方支付的困难，才能使贸易得到正常的发展，并使其得到巩固。中

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都是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的。这表现在各方面：由于贸易是按以货易货的方式来进行，就免除了双方支付的困难，特别是资本主义各国在和美国或他们之间进行贸易时所遭遇到的因“美元缺少”所引起的不可免的和严重的支付困难。交换的商品都是为双方所需要的，而不是一方向另一方倾销商品。价格是公平合理的，而非不等价交换，因此，这种贸易的进行就有助于参与贸易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我们要以出口商品与外国交换我们自己不能造的机器和自己沒有的原材料（如优级钢材）及科学仪器和图书杂志。今后由于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出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一定加速地增加。我们发展原材料工业的主要目的在于：一方面满足我国建设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增加出口的需要，应该积极地提高矿产品和机械工业产品出口的比重。在矿产方面主要是增加煤炭、生铁、食盐、有色金属和非金属产品的生产，各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在数量上和品种规格上满足出口的要求。但所有出口的矿产品，都应尽可能在国内经过加工再行出口借以获得相当数量的出口外汇。对外贸易部门还要根据国内机械工业生产的可能，积极地组织出口，扩大国外市场。要大力增加次要商品出口的比重。在这方面各地方的潜力是很大的，特别是对于一些有出口传统的零星分散的物资，各地应该大力组织生产、收购和出口、逐步地降低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出口的比重，以满足国内人民的需要。但大豆是我国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抗日战争前每年出口约二百万吨，1929年出口数量曾达到二百五十万吨，现在每年只出口一百万吨左右。为了换回进口所需外汇，在目前仍然维持适当数量的大豆出口是有必要的。在进口方面因为我们要实行保护政策，要尽可能地减少需要不大的或自能制造的物资的进口。在这里有谈谈保护政策之必要，因为第八节所讲的新面貌，也反映在保护政策方面。

2. 保护政策

旧中国时代在不平等条约重重压迫之下，关税不自主，我国不能单独提高进口税率来阻挠外货的进口，来保护我国的幼稚工业。况外国资本家可以在国内自由设厂，我国民族资本家无法与之竞争，要保护亦无从保护。今日情形不同了，不但外国资本家不能在中国国内自由设厂，而且我们要尽量压缩机器设备的进口。凡是国内可以生产的机器设备，就是质量比进口的低或价格比进口的高，也应该不进口或少进口，而由国内生产供应。若从外国进口质量比我国好的商品，价格比我国低的机器设备，我们的幼稚工业就会被它压倒，怎么还会生长起来呢？所以我们要用保护政策来保护它们，使它们生长起来。俟它们生长起来后，它们的质量可能比外国的好，成本可能比外国的低，但第一步一定要予它们以生长的机会，故有保护必要。此外我们也一定要从外国进口国内暂时还不能生产和生产不敷应用的各种机械设备，如我国第一座制造合成纤维（即尼龙）的工厂，已在1957年8月25日在北京动土兴建，这个工厂的机械设备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供给的，工厂也是它帮助设计的。这样我们可以集中力量来发展精密的东西。凡是社会上暂时不需要的产品应尽量压缩生产，凡是社会上需要的产品，应积极生产，并且努力进行新种类产品的试制和生产，以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要的机械设备绝大部分由国内自行解决。

有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提到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是不是过高的问题，由于我们进口所需外汇主要是用出口物资换来的。如上述按照现行汇率，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一般都有亏损，因此在确定进口商品国内市场价格时，除了计算税收和经营费用以外，还应当平衡出口方面的亏损。更重要的是进口商品在国内的售价必须适当地照顾国内同样商品的生产成本，以保护国内的生产。因此，目前进口商品在国内的售价高于进口成本是合理的。当然有些进口商品的国内售价确实是偏高些，有关部门正在注意研究并加以适当调整。

但高价不尽是为执行保护政策。我们在第六节末已说过价格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除保护因素外，还有奢侈品的因素，交通运输等因素都应考虑在內。手表之所以卖得贵，原因固然很多，然有些买者有显富之意，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好多人对于贱价的表反而看不起，以为表总是愈贵愈好，故把表价提高迎合他们的心理亦是合理的。在人大常委会讨论的时候，好几位委员对表价提得太高不以为然，我则执反对意见，我以为买表者，一般说购买力比较高，有些买表者又有虚荣心，因此，国家可以向他们多提取一些积累，横竖这部分积累是用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此外物价之所以高因受长途运输的影响。举一个例，根据四川省的检查，在1952年到1954年中央所管理的大型煤矿，在好些地区不适当地挤掉了很大数量的地方小煤窑。仅四川江津一个专区，即从解放前一千多个减为九十六个，以致在1956年煤炭供应不足时，又给地方带来很大的困难。在食盐生产的安排上，对小盐井也不适当地采取了“裁废”的办法。从1952年以来，裁废了十五个小盐井，和半废了八个小盐井，一方面国家拨付了约二万二千余职工的转业费，另一方面在自流井投资四百万元进行大盐井的扩建，并以平炉盐代替群众所欢迎的巴盐和大化盐，这样以新挤旧，以大型挤小型，以中央挤地方，把生产集中起来，结果造成长途运输，提高售价以及群众不乐于购买等不合理现象，因而库存积压达二百万担，还需要新建仓库保存。这样的“裁废”在资本主义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事，垄断资本家的势力是这样形成的。但在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无计划的以大挤小以新挤旧的作法是不应有的事，理应设法纠正。这就是我们要建立十二个结合的大原因。此后新旧结合，大小结合，中央与地方结合，不致再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但问题不止于此。大盐井把小盐井挤掉了。要转业的二万二千多职工虽得到了转业费，但好多人对新业不感兴趣，不愿接受，这是不是算失业？值得研究。

十　失业问题——（1）甘愿失业（2）不甘愿失业和救济问题

与以上二万二千多职工性质相同的还有一批为数不少的失业和无业人员，他们也有要求过高的倾向，他们向劳动机关要求只在本地不去外地，只愿作固定工作不愿作临时工作，只愿从事脑力劳动不愿从事体力劳动，只愿作轻活不愿作重活，只愿作干净活不愿作脏活，只愿作待遇高的工作不愿作待遇较低的工作。有的人百般挑剔，长期无法分配他的工作。北京市甚至有人被分配过十三次之多仍不接受工作。显然这种情况是从多方面解决劳动失业问题的重大障碍。虽然公民应该享受劳动的权利，政府也有责任安置失业无业人员就业，但每个失业无业人员更有责任接受政府的分配，协助国家解决失业问题。要知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分工的不同，各种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受到尊重，沒有高低贵贱的区别。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是多方面的，有些人可以在本城本市就业，有些人需要到外地就业，有些需作工人，有些需作农民，有些人需从事文教卫生工作。只讲个人主义不讲集体主义，是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品德不相符的。因此我们应该向群众讲清楚，凡被政府分配过工作而自己不愿接受的人，不能当失业人看待，只能当作甘愿失业者，而甘愿失业者不是眞正的失业者。这样失业问题不知要简化多少倍。此其一。

此外还有人说："叫技工作壮工活是浪费"，这要看实际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若是放着技工活不让技工作，反让他去作壮工活，这显然是浪费，应该批评。若是一时沒有技工活只有壮工活，而技工闲着，暂时调技工去作壮工活，这是合理的，有什么可以批评的呢？比如在基本建设工程方面，有时技工活多，如兴修铁道时遇到高山，要筑隧道，需要大批技工（开山工），遇到河流要架桥梁，需要大批技工（机械工）。但一旦隧道筑好了，桥梁架起了，铁路在平地上施工，土石方工程增多，又需要大批

的壮工。在这个时候开山工、机械工又沒有技工活可作，但工程上却很需要壮工的时候，调一些无活可作的技工去作壮工活，非但不是浪费，而且是完全合理的。若是让技工闲着，另外再去雇壮工，那倒是眞正的浪费了。可是在技工方面有两种感想：(一)是以技工作壮工活是“大材小用”，“有骨气”的人情愿不干。这完全是思想问题。我们在上面已说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种劳动都是光荣的，无高低贵贱的区别，何来“大材小用”，凡是国家需要的都是大用，都受到尊重。北京市决定抽调三万干部到工厂、车间、商店、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去，将要较长期地参加生产和基层工作，使大家在劳动中受到锻炼。如果按照有些技工的说法，不是更要变成“大材小用”了吗？

（二）技工的另一个感想是壮工工资比技工工资低，特别是技工刚调去作壮工活，操作不熟练，常常达不到定额，担心收入降低。这倒是一个值得领导上考虑的问题，总不要使技工收入降低而开小差。但这个问题是內部调整问题，似不必当就业问题来处理。此其二。

目前劳动部门登记要求就业的，有一部分人实际上并不是失业人员，其中一种人是根本沒有就业条件的。据上海市去年12月的调查，身体残废和年老体弱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占16.9%。对于沒有劳动能力而又无生活来源的人，不是就业问题，而是救济问题，似应由当地民政部门进行救济。此其三。

此外劳动部门登记就业的，有一部分是从事主要家务劳动的妇女，她们要带孩子、作饭，有的还喂猪、喂鸡鸭，生活的计划与粮食的进出都要经过她们的手，因此在节约粮食方面她们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她们节约得好，粮食就大可节约，应该动员她们勤俭持家，节约粮食，并教养好子女，把家务管好生活过好，以使自己的亲人安心工作，不必自己另找工作。此其四。

现在有一些高中毕业生把升学当作唯一的出路。他们报考高等学校未被录取，即使愿就业也是挑剔得很厉害。他们表示愿意

去工矿、企业、机关，不愿去农村。他们以为有物理、化学、三角、几何、生物等科学知识，如果派到农村去岂不是“大材小用”了吗？他们不了解今天需人的地方是农村，而在工矿企业等没有进一步发展以前人员并不缺少，我们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要搞好农业合作社的管理工作，并逐步地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农业技术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改良土壤、合理施肥、改良品种、改良生产工具、防治病虫害等，都需要丰富的科学知识，高中毕业生初步掌握了物理、化学、三角、几何、生物等基本知识，下乡后，一边实践一边继续学习，将来就可成为农业战线上的水稻专家、棉花专家或养猪专家，他们的前途是无限的。只要向他们讲清楚，他们有理智，一定能够服从分配。此其五。

其具有劳动条件又无职业的人，就是不甘愿失业的人，才能够算作眞正的失业人员，对他们劳动部门应迅速予以介绍并给以适当照顾。此其六。

由此观之，由于失业人员登记不够切实，分析不够清楚，便造成了我国失业人员过多的假现象。眞正的失业人员，决不致如一般人想象中那样多，故各地对失业登记人员作一次清理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经济落后，自1958年开始我们要建立十二个大结合，目的在加速发展工业和农业，并扩大就业面，因此一面控制人口，一面加速发展工农业，就业问题的解决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况我国的失业问题不是完全依靠政府来解决，我国的社会人士可以借出资金，借出物资，或帮助修理，或给以技术帮助，尽量使失业的人从事某一项劳动，或利用晚上时间帮助失业人员组织生产合作社，这样就能帮助他们解决自己的生活出路问题。比如重庆市在1957年第一季度安置的一万七千六百人中，由国家介绍就业的不到千分之四，其余都是在各方面的热心人士帮助下获得出路的。

我们在这里把失业分为甘愿失业与不甘愿失业，好象与凱恩

斯在他的就业理论中的分析相同。我在这里要郑重地声明一句，我的分析与凯恩斯的分析词同而性质不同，兹在下节说明之。

十一 凯恩斯从“营救资本主义”观点出发写出一般理论

我们讲理论是从发展的观点出发，凡我们所谈到的地方，都富有生命力，处处使人民看见光明的前途，知道了奋斗的目标。而凯恩斯则反是，他是从“营救资本主义”的观点出发的，他为营救资本主义而开出的方子，眞如医生临床治疗时开出的方子一样，到处呈现着阴暗的光景，读者阅了第八节之后所得到的感想，以比阅了第十一节和第十一节以后各节所得到的感想，不能不觉得二种理论的差别。一种是生气勃勃，因为它所描述的社会制度正在生长，一种是死气沉沉，因为它所描述的社会制度正在衰落。以下让我来谈谈凯恩斯的一般理论。

凯恩斯对失业的分析与我的分析词同而含义不同，原因如下：

英国古典派以充分就业为立论的基础，据舍伊氏（Say）的说法，供求自趋于平衡。比如甲乙二人，甲产布乙产米，甲的供就是布，乙的供就是米，甲以布供乙，乙以米供甲，无异甲以布换乙的米，乙以米换甲的布，故两方之供求必趋于平衡，决无失业之理。所以古典派的学说即假定充分就业为前提。新古典派的领袖马夏尔氏（Prof.marshall）对于古典派的学说有所修正，故世人称他的学派为新古典派，然在若干方面仍继承古典派的余绪，充分就业之说，就是其中之一。不料马夏尔氏的门生凯恩斯异军突起，对于古典派充分就业的假定猛予攻击，不遗余力，以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以不充分就业为常态，以充分就业为例外，供求两方势力未必常能相等，因社会上不甘愿失业者几乎是无时不存在的。因此，他要解决的是不甘愿失业的问题。一旦把不甘愿失业的问题解决了，充分就业就达到了，至于甘愿失业则

咎由自取，不在他的讨论范围之內。凯恩斯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于1936年出版。在这本书中他所注意的是不甘愿的失业，因为在他在世的时候，不甘愿失业的人太多的缘故。为什么有这许多不甘愿失业的人？他分析了产生的原因，提供了他的意见，在这里我们只能约略地说一说。

第一，他以为投资应等于储蓄，但二者不易相等，所以在生产上出了毛病，人民之所得来自生产（先是实物所得），能生产实物才有所得。所谓生产，在资本主义国家是由于劳力、资本、土地与企业四种要素合作而成，结果得到实物。若以此结果直接分配于参加生产的四种人，即成此四种人之实物收入。此项实物一部分供消费，一部分供投资。例如农民生产粮食，除供今年度食用外，酌留一部分作明年的种子（投资）。惟实际上的分配，常借货币为媒介，参加生产者之所得为货币，所得之处理不外两端：（一）支用，（二）储蓄。支用是为消费，储蓄是为投资，如下图所示：

一、实物所得　　　　**二、货币所得**





第二图之货币所得，就等于第一图之实物所得。假定参加生产者支用货币所得五分之四以购买实物，则他们的货币所得减少了五分之四，社会的实物亦必比例地消费了五分之四；不过就货币言，称之为支用（Expenditure），就实物言，称之为消费（Con-

sumption），二者在表面上是两桩事，实则一也。其余的五分之一的货币所得作为储蓄（我们谓之积累），则投资者所投之资也必使之等于这个所储蓄之货币——五分之一。换言之，实物上的五分之一要使之等于货币上的五分之一。如投资少于五分之一，则剩余下来的实物等于废物，陷于生产过剩，成货弃于地的状态，物价必跌，从事生产实物之企业家不免亏本，以致引起工厂减少产量，歇业或倒闭，则工人之不甘愿失业者更多，故问题的关键在使投资等于储蓄。但在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达的国家，欲使投资等于储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投资者与储蓄者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他们的心理未必是一致的。投资为经济活动的推动力，但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因为投资者与储蓄者不是同一个人，储蓄者未必能投资，即未必能经营企业，而投资者或能经营企业者未必有储蓄，即有也或不足，且二人之目的并不一致。储蓄者的目的，在固定的利息，在养老育幼，投资者的目的在利润。储蓄者只要得到利息，对于投资者有无利润可得，不甚关心。投资者（即企业家）自己的储蓄如不足够，势必设法募资，即利用储蓄者的储蓄。

第二，但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主动权操在投资者（资本家）之手，投资者愿不愿投资，要看（1）利润的高低，（2）资本的边际效能如何以为断。凯恩斯原著第十一章专讲资本的边际效能。何谓资本的边际效能？比如美国的铁路建设是归私人承担，至今日止，可谓铁路网已布满全国，若再兴建铁路，要看铁路完成之后有无获利的希望以为断。因为兴筑铁路，非期以三五年之岁月不为功，届时幸而有利可获固好，不幸而无利可获，甚至亏折，则所投资金尽成浪费。此种投资成效之大小，称为资本的边际效能。投资越向前推进，资本的边际效能当然越小。因此企业家在铁路兴建上愿否投资，要看投资于铁路的资本的边际效能大小而定。他可以发行债券，筹集资本，其利率如低于预期的边际效能尚属合算，否则不合算。美国的凯恩斯学派，甚至说美

国的经济发展已达饱和点，投资的门路已绝，足见资本的边际效能很低，凡比较有利的事业皆已投资殆尽，故欲推进投资，必须另有办法。

第三，除上述的利率和资本的边际效能两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叫做边际消费倾向。大凡参加生产者之所得愈多，其消费率将愈小。月得百元者用去八十元，储蓄二十元（省二成）；月得千元者未必用去八百元，或只用去七百元，储蓄三百元（省三成），月得万元者或只用去六千元，储蓄四千元（省四成）。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所得愈多，支用之数虽仍增加，而其对所得额的比例则有减少的倾向。换言之，支用之绝对数虽与所得同方向地增加，而其相对数则逐步减少。此种趋势，凯恩斯称之为边际消费倾向。故所得多者，消费倾向降低，储蓄数额则比例的上升。结果社会愈富，消费有相对地减少之趋势，储蓄有相对增加之趋势，愈使储蓄与投资不易接近。不过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以上所述颇合乎资本家的情况，对于劳动者的所得未必恰当，因为劳动者的所得中，在失业严重的时候，用去的成分必然很高，储蓄的成分必然很低，甚至等于零，不能与资本家相提并论。假定全国的消费倾向为二分之一（即用一半省一半），则资本家的消费小于一半，劳动者的消费大于一半。1929年—1933年世界经济大恐慌的前夕，美国富家收入太多，有钱没处用，消费倾向一定很低，所储蓄的钱，如何投资，确成问题。

第四，先把技术水平提高（即边际效能提高）。资本之边际效能既低，势必将利率降低（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方可促进投资，且必须使利率降至边际效能之下，方有利可图。如投资的边际效能与利率相等，投资即不能推进，此为投资的关口，凯恩斯称之为瓶口（Bottle neck）（一般理论300—301页），犹水已装满至瓶口，无法再加。故欲推进投资，只有两种办法，非将技术水准提高（边际效能提高），即将利率降低，俾投资勇于推进。但发明了效能高的新机器而须把效能低的旧机器撤换，技术水准

固提高了，然资本家遭受的损失亦不可轻视，他们是否愿意以新换旧，却成问题。斯大林说得好："当新技术向资本主义预示着最大利润的时候，资本主义就拥护新技术。当新技术不再预示着最大利润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反对新技术，主张转而采用手工劳动。"[1] 新技术既不采用，技术水准就无法提高。

在我国情形完全不同。我国的生产发展赶不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仍然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的国家底子很穷，需要举办的事情很多，应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远远谈不到什么投资的饱和点，更不必考虑投资的边际效能太低。我们在以后几个五年计划期内，必须把一部分主要力量（人力、财力、物力）用到各地中小型生产建设上面去。我们只怕积累不够，不患有资无处可投。我们有的是丰富的人力，如何利用这个丰富的资源，成了今日的急迫问题。正如毛主席所说："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因此我们的问题是一面节制生育，一面把工业生产的面铺开，在各地开辟中小型工业，以便利用丰富的人力来为国家创造财富。这样就可以充分照顾到人口众多带给我们的困难。四川省今年新建了大批中小型厂矿，并且已经陆续投入生产，预计到1957年年底，全省将有一千三百多个小煤窑，能生产煤四十多万吨。另外，组织群众小型开采的黄金、铜、石棉、云母等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的总产值，将达一千六百多万元。这样，四川省贯彻了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的方针，与我的第二篇平衡论中所说的"大型与中、小型企业的平衡"的道理相符合。四川省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就是从省属工业基本建设的投资中，调出将近三分之一的款项，用来发展中、小型原材料工业。又如广西省是我国主要产金省份之一。最近经过普遍调查，证明黄金资源丰富，而且品质高，矿藏分布在三、四十个县。1958年广西省将开采六、七

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5页。

万两黄金，比去年全省黄金产量增长近三倍半。这些具体例子，都足以说明我国资金虽尚缺少而劳力很丰富，正可大大地利用这个资源来为国家创造物质财富；迨这资源尽量利用之后，方可逐渐提高有机构成的成分，故此时尚谈不到“投资达到饱和点”的问题。

以上所讲的是关于厂矿，至于农业增产，则由于积累少，石油产量不足，加以可开恳的荒地也不多，大规模的恳荒一时谈不到，因此在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期内，我们的主要力量必须放在单位面积产量上。中国农业的特点和苏联美国不同，它们是人少地广的国家，由于农业的劳动力缺乏，为提高劳动的生产率，不得不用机械化来替代人力，增产效果是显著的，积累也是快的。但我国不能从畜力农具立刻过渡到高度机械化，我国国土虽然很大，但耕地少，人口多，不能很快采用苏联、美国农业生产高度机械化的办法。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除以上所谈的肥料和水利二项外，还必须采取精耕细作等比较复杂的途径。以机械化代替人力畜力，主要目的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在人多地少的地区，在耕种和收获上来推行机械化，不仅会把人力排挤出去，而且会浪费很多的资金，对于增产不会有好处。因此，在我国地少人多情形下，应用机械化的步骤，一般说来必须是缓慢的。但亦不能一概而论。在有些地区，在特别农忙的时期，人力畜力都感到不足的时候，仍需要使用机械化来解除困难。例如浙江省的稻田占总耕地面积的76%强，扩种连作稻后，劳动力紧张的困难，就不容易解决。扩种连作稻除了水利肥料两项以外，最主要的条件是劳力充足。浙江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只有1.7亩耕地，劳力一般是足用的；但是连作稻的季节性很强，连作晚稻要在立秋前插上秧，越早产量越高，晚了则减产很大，过晚则颗粒无收。从大暑割早稻起（早稻因地区、品种不同、成熟期也不同，有的是大暑前十天成熟的），半个月内要进行割稻、打稻、担稻草、松土、车水、拔秧、插秧、耘田、追肥等项农活。这时就出

现劳力不足的情形。农民形容农忙时节说简直是“要粮不要命”。在浙江平均每亩要工四个到五个。每个整劳动力只能负担四亩左右。1956年因为沒有经验，有的地方种多了，以致连作晚稻有九十二万亩沒有插下秧，有一百三十万亩在立秋后插秧严重减产。早稻抢收，损失也很大。在这个农忙时期，人力畜力都出现了严重不足的情况，障碍着各种增产措施的推行。农民说要把双季稻种好，最好能做到“早黄晚青”（即上午割早稻，晚上插上晚稻秧）。要解决季节性的劳力紧张问题，除了搭配好品种，合理组织和安排劳力以外，还必须从改进农具着眼。种连作稻劳力最大的是插秧、割稻、车水。插六寸见方的秧一亩，需要劳动力一工，割稻也需要一工。现在南京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试制的插秧机，每天可插三十亩，现有的马拉收割机每天可割六亩。这些农具虽然还有一些技术问题沒有解决，但是基本上已经试验成功了。目前主要的问题是这些农具的重要性还未引起领导方面足够的重视。因此对于这些新式农具的改进和推广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地加强。所以在这个特别繁忙的半个月时期，农民所最迫切需要的是极简单的机械化，如割稻机、插秧机和抽水机（代替水车）。只要运用得当，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也比畜力农具的效果高，因为耕得深，插得匀，动作快，能够抢农时，如果经营得好，成本也可以比人畜力低廉。因此这几种机械是符合投资少、收效快、增产多、经济效益高四项原则的。

在华北也有同样的情形。例如在华北平原，要把一熟改双熟，一年最忙的时间集中在二十天（从割麦到种秋二十天）和四十天（从秋收到种麦四十天）。在这个时候，又收又种，还要灌溉，加上牲口缺乏，人力还要代替畜力，人力就更不够了。所以今后农村富裕增产的关键，就在于农忙忙不过来的时候，有机械来帮忙，使农民忙得过来；闲的时候，有副业可作，使他们闲不下去，这样才能把农民从忙闲不均的苦闷中解放出来，使各种增产的措施能够顺利地推行，农村的劳动生产率方能更快地增长上

去。

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经济方面，人工贱，农产品贱，农业积累少，而钢铁贵，机械贵，因此农村购买机器的能力有限。此外，农民还缺乏使用机器的经验，农村也缺乏一套为机械工具修配和服务的机构。这样农业机械化只能逐步发展，逐步提高，在新旧交替过程中，必须使人力、畜力与机力，机械化农具与旧式农具结合使用，因此，现在谈不到凯恩斯的学说如“资本的边际效能太低”，或“投资已达到饱和点”等等。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敬同志说：“据初步调查，每个农民每年的积累平均约四元左右，假设其中一半用来购置设备，那每人每年二元，全国农民对机械设备的购买力每年约在十亿元左右”。这样的购买力，在数量上虽然不少，但在全国范围来说是很不够的。从而可知农业投资刚刚开始，距离“饱和点”太远了。

第五，凯恩斯推进投资的两个方法，一个是提高资本的边际效能，一个是把利率降低。把利率降低就是实行通货膨胀。我们要知道凯恩斯是站在资本家方面的，他以为总要使资本家继续投资方能维持社会的生产事业，但要资本家继续投资，必先使之有利可获。最直捷了当的办法是减低工人的工资，但恐激起工人的愤怒，引起工人的罢工，故此法不能行。势必用一个间接的办法，一面把现行工资冻结起来，同时把利率降低，实行通货膨胀，使物价高涨，工人的真实工资减低，这样才不致激起工人的反对和罢工。其效果与直接减低工资相等，且不冒罢工的风险，而因物价高涨资本家仍有利可获，可以使生产事业维持下去。一言以蔽之，凯恩斯的主张不外乎吸吮工人的血液脂膏来填补资本家的欲壑。在我们看来这是十分反动的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如工人不愿意继续工作，他有退出工厂的“自由”；退出之后，他失业了，但他的失业在资本家看来，是“咎由自取”；因此谓之“甘愿失业”，而甘愿失业据凯恩斯的意见，不应看作失业。所以凯恩斯的“甘愿失业”比诸我们的甘愿失业名同而实质不

同。我们的是为帮助无业的人民就业而人民有所挑剔的甘愿失业。他的是为讨好资本家压低工人的实际工资使原有职业的工人不得不“甘愿失业”，何等反动！何等苛刻！但酿成的恶果，尚不止此。既然要膨胀通货，势必导至赤字预算。解放以前，国内的经济学者中崇拜凯恩斯的不乏其人，他们（包括陈振汉在內）恨不得把凯恩斯的全部理论囫囵吞枣地搬到中国来应用。在这里篇幅不允许我从长讨论，我只说上面所说的两点——资本的边际效能太低和利率政策——已足以断定凯恩斯的学说不适用于中国。我们的问题是农产品收购价格高些低些的问题，不是利率稍高稍低的问题。我国的金融事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获得巨大发展。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拥有二万个分支机构，加上农村中的十万个信用合作社，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金融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银行发放农业贷款总数达六十八亿元。按全国农戶总数计算，平均每戶贷款五十六元多。农民得到这笔贷款，比私人借贷要少付利息十七亿四千万元。为了支持农业合作化，国家银行在1956年就发放了贷款三十一亿元，其中发放的贫农合作基金贷款，帮助四千多万戶贫农和下中农缴纳了入社股份基金。另外发放给农业社的十亿四千万元基本建设和生产费用贷款，帮助农业社兴建了水利工程，购买了生产资料，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所要求的每乡一个信用合作社的任务，已经提前一年在1956年实现。1956年全国农村已有十万个信用合作社，入社农戶达九千六百一十八万戶。这个为资本主义国家所沒有的群众性的金融组织基本上消灭了农村中的高利贷剥削，成为国家银行在农村的有力助手。为了动员群众资金，使之有利于国计民生事业，国家银行广泛开展了储蓄业务。1957年6月底，城市人民储蓄在银行的款项达到二十四亿八千多万元，比1957年底增加二倍多。国家银行还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组织和调剂货币流通，使货币的投放和回笼有利于国民经

济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每年适应季节性的需要，上半年组织货币回笼以稳定市场；下半年投放货币，支持国家收购。因此，从以上各方面看来，在我国农村中利率的高低已不成为一个问题。

现在成为问题正在设法解决的是若干农产品收购价格问题。这个问题，正如1957年中共浙江省委给中共中央报告中所说，是农、商关系中最尖锐的问题。收购价格规定得恰当就能够推动生产的发展，规定得不恰当就会引起生产的破坏。随便举几个例子：浙江是茶油产区之一，有油茶林一百二十万亩，战前茶籽最高年产量（1937年），曾经达到六十一万七千担，战争时期油茶林大量荒芜，加以解放以后茶籽价格偏低，某些收购人员又在压级压价，农民培育亏本，因而恢复很慢。1955年浙江省委采取积极发展的措施，二年之內荒芜的油茶林已经大部垦复，新造油茶林约有二百四十万亩。又如晒烟，1950年和1951年连续提高价格，1952年产量达到二十四万担；1952年下半年每担价格由三十二元六角下降到二十四元，产量锐减，最近二年价格稳定在每担二十九元左右，仍然偏低，产量维持在十五万担左右，不能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主要农产品的价格过去是中央商业系统规定的，虽然留有一定幅度给地方机动调整，但是仍然不能适应各种不同地区的生产情况，调整权下放后情况可能改变。据李先念副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扩大）上报告，1956年全国猪的产量是九千八百万头，1957年政府把猪的收购价格提高13.4%，把销售价相应提高6%，同时把猪税下降5%（从13%降到8%），猪的产量就增加了二千万头（自1956年的九千八百万头上升到1957年的一万一千八百万头）。菜油的收购价提高了29.8%，油的供应量就从1952——1953年的一百八十万吨提高到1957年的二百二十八万吨。

中共辽宁省委农村工作部派人在昌图、盖平、凤城等地的农业社作典型访问，农民的意见主要的是在农副产品的收购上压级压价的现象很严重。农民反映说："工业品是明码实价，农产品

是嘴巴说话”（就是凭采购员说几等就是几等，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昌图县民主第三社，用筛豆机把大豆筛得很匀净，但也验不上一等，都是二、三等。许多农民说：“过去沒有筛豆机筛也能卖上一等，可是现在用筛机筛完了，反倒卖不上价钱”。凤城是烤烟、柞蚕的特产区，在收购上也有问题，不是压级压价，就是收购不适时，烤烟过早收购（八月初），柞蚕过晚收购（年底），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产品质量，当然也影响了收购价格而且也影响了收购任务的完成。盖平棉产区有的农民为了能够按合理等级出卖棉花，背着棉花走好几十里路，对采购站的意见很大。此外，农村商业工作者对收不上来的东西百般迁就，登门收购，对上市数量较多的东西则挑肥拣瘦。

浙江省委的报告指出：“粮价也很值得研究。由于粮价一般偏低，更多的人对生产商品粮食的积极性是不高的。他们即使在种植面积上执行了国家的计划，在加工、施肥方面，却将人力、物力首先放在产值高的作物上面，这样就必然会对提高粮食产量不利。但是由于粮价牵动的面很大，提高粮价，在当前是不利的。目前只能通过思想工作和经济工作使粮价维持现状，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农业合作化以后，价值规律在农业生产中仍然有很大的作用，要增加大量的商品粮食，对粮食价格政策应该作进一步的研究”。

以上所述已足以证明我们的问题不是如凯恩斯所说的利率问题，乃是目前急迫需要解决的收购价格问题，故凯恩斯的学说于中国是不适用的。

十二 赤字预算

我在第十节末说过我国地少人多经济落后，自明年始我们要建立十二个大结合加速工农业的同时发展并扩大就业面，我们不必象美国那样降低利率、膨胀通货、提高物价借以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来解决失业问题。因为降低利率、膨胀通货一定要导致赤

字预算。但1957年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有人问我："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有赤字预算，现在我国也有赤字预算，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现在我来作一个解答。

在极端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不景气的时候，人人视投资为畏途，人力物力皆无出路，不得不由政府出面来救济，举办各项公共工程，以待工商业景气逐步恢复。但到工商业已到活跃时期，这些公共工程必须延缓，以待工商业渐趋萎缩时再行举办。美国前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策是用政府的力量与信用发行公债，投资于公共工程，使国民所得增加，国家经济繁荣。公债的作用在吸收社会的储蓄，用之于生产事业，而这种事业自有清偿之能力，公债自易收回，故美国政府以财政的力量推动经济事业，若办理得当，尚属利多害少。但今日美国政府采用的政策与此全不相同。他们利用凯恩斯所倡导的有调节的资本主义，就是把国家机构置于资本主义的垄断组织之下，由它来干涉经济，如实行经济的军事化，国家可以用公债或用膨胀通货的办法向垄断组织订购军火、装备和给养，以保证垄断资本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润。这些军火装备或给养自已沒有清偿的能力，发出的公债或通货自无收回之可能。1957年7月1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把通货膨胀称谓"大骗局"，并说"这个骗局打击了每一个人的收入和储蓄，它是变相的捐税，最恶毒的捐税"。那么形成这种祸害的原因在哪里？上述一期美国新闻周刊答道："因为政府希望花钱，大部分花在军备方面，在多数的情况下是津贴式奉献给一些有势力的派系"。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的数字，在1932年财政年度美国人民对军费的负担平均每人为五美元，而在1958年度的平均负担已达二百六十三美元。这就是说美国目前的军费开支已达到1932年的五十二倍。这种沉重的军费负担，虽高额赋税也无法应付，结果就是通货膨胀更见恶化了。此即美国赤字预算的眞相。凯恩斯的就业理论给国民经济军事化以理论根据。当人人视投资为畏途，人力物力皆无出路的时候，他主张用国民经济军事化的

方法来刺激生产资料的需求和价格。否则就造成生产过剩，货弃于地，经济恐慌一触即发以至于不可收拾。但导致经济军事化的赤字预算这样继续下去，不知伊于胡底，确实是美国的隐忧。

至于我国1956年度预计有八亿多元的赤字，稍有知识的人莫不知其与美国的赤字预算不同其性质。根据历年的情况，我国每年预算执行的结果，都是当年收入大于当年支出。国家将每年的结余拨给银行，或存入银行，以加强银行的信贷资金。当1956年初编制预算的时候，由于社会主义高潮下的新情况估计不足，仍然根据过去的经验，在预算收入中列了一笔上年结余。这样一开始就把预算的底子打大了一些，而在预算执行当中，又由于农业生产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等等，先后增加了一些支出，以致执行的结果，收入虽然有所超过，但支出超过更多，不仅动用了原列的上年结余，而出现了赤字，要从银行动用财政的历年结余存款和从银行透支，从1956年的当年收入和当年支出的数字来看，支出大于收入十八亿三千万元，但从预算本身的收支数字来看，赤字只八亿一千九百万（因为有上年的结余），只占整个预算支出的2.68%，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仅仅这个数字并不算大，比诸美国的赤字，真是小巫见大巫。我们不应该忘记1956年的建设事业的巨大发展是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进行的。国家为了领导人民战胜灾荒，先后拨款五亿七千六百万元（包括有关防汛、抢险、堵口、复堤、救济和修复等费用），发放救济贷款二亿八千万元，并且从全国各地向灾区调集了大量的粮食，使灾区粮食供应未断，粮食的价格未涨，以视解放前几次大灾荒中，各灾区所呈现的生产停顿，物价狂涨，千千万万的灾民流离失所，饿莩载道，而如虎如狠的剥削者囤积居奇，乘机发财的景况，其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也。

十三　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管理下贯彻执行统购统销政策

我们在上节说明我国1956年度出现了八亿多元的赤字，是由

于1956年农业生产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达到了高潮，同时是由于我们遭受很严重的自然灾害，可以说这个赤字大部分是为了农业的发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篇首已说过“我国的农业生产的发展，赶不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此后应该贯彻执行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并重的方针”，这样我们把首尾两端衔接起来了，此文以农业始，仍以农业终，仍是一个团团转的方法。我们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一定要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所以要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用集体力量发展生产，增产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另一方面，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粮食产量还不能充分满足各方面需要以前，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分配办法，保证供应各种必不可少的需要，保证我国六万万城乡人口在生产不断发展的条件下都有饭吃。这样做，我们战胜了1954年和1956年的大灾荒，粮价一直稳定未涨。如果沒有统购统销政策，谁能保证粮商不在市场上兴风作浪呢？

但现在农村中出现了一种错误想法，有些干部、农民主张国家对粮食少购多留。我在《新人口论》一文第五节中曾说：“今日的农民对于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总想多留一些，对于生活上的需要要向城市居民看齐。他们要吃油，所以油的紧张超过粮食；他们要穿新衣，所以布不够用。这个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但每年还要增殖出来一千三百万新人，除在工业部门安置一百万人外，要把其余一千二百万人安置在农村，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看齐，长此以往，如何得了。所以对于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① 因此我建议政府一面加速积累，促进工业化，一面快快控制人口。这是因为（一）我国原有经济基础十分落后，目前生产水平还不高，因此企业事业单位吸收人员的容量受到一定的限制；（二）我国是六亿多人口的大国，人口自然增殖率很高。据估计，仅中等以上城市每年进入就业年龄的青年就有

① 见本书183页。

一百万人左右，加上其余的一千二百万和社会上原来还剩下一部分失业无业人员，若要在最短时间内，全部归国家安置，显然是不能的；若进一步把这些人安置在城市和工矿区，那就更加办不到了。不得已只得放在农村。但放在农村也难免发生副作用，就是农民要求能不能把留粮标准提高一些？我们的答复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巨大发展，留粮标准将来一定要继续提高，但是现在还没有这种可能。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正在埋头建设，如城市和工矿区的居民，经济作物区的农民，缺粮农民，灾区农民，盐民渔民，以及军队学生都必需给以口粮。农民的留粮标准如果继续提高，则这些人的口粮就不能保证，工业就发展不起来。这篇文章中所讲的工业化的任务就不能实现，一切都落了一个空。不仅拖拉机厂要停工窝工，即水利建设亦将停止，化学肥料亦要减产，直接间接都影响着农业。

但从各处的报道看来，个别农民的个人利益思想还是很浓厚，集体利益的思想还觉得不够。属于国家计划收购的粮食、棉花、油料和属于国家统一收购的物资如猪肉、茶叶、山羊毛、麻、土布、土丝、中药材等二十几种大量流入自由市场，已经成为一个严重违反国家统购统销政策和统一收购法令的问题，其非法流入上海的大量统购物资竟引起城乡投机商贩大肆活跃，上海市有的黄牛掮客甚至下乡勾引农民大量贩运；油料、土丝、皮革等流入了“自发工厂”。据畜产公司调查，由于山羊毛的流入，经营山羊毛加工整理的自发作坊一度发展到一百多家。自发的制糖厂和自发的炒房为数更多。在上海自由市场上甚至发现以农业社名义出售大量油料、蚕豆的现象。浙江省平湖县人民委员会也曾经出证明给这个县供销合作社，以高出国家统购价一倍以上的价格，在上海出售花生仁。从这些具体例子看来，有些农民、合作社甚至个别的县政府对于国家法令是不够遵重的，实质上起了破坏统购制度的作用，因此在农村中有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必要，帮助广大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进一步地了解当

前国家所实行的各项根本政策的正确性，提高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这样我们可以完成国家购粮的任务，保证本文所讨论的整个国家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同时在全国城、镇粮食的销量必须严格控制，今后几年城市居民的口粮不能再提高，供应水平较高的城市，还要适当地加以压缩。这样控制，尚感不足，必需同时规定凡归国家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及其他物资绝对不准进入自由市场。非由国家指定担任收购任务的企业、机关、和团体，都不准进行收购。对于违反这一规定的企业、机关、和团体，当地人民委员会当给以严格的处分。

我们这样做目的在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非有一个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党——中国共产党和一个有力量的政府——人民政府不为功。我的思想体系如此，则各党派轮流执政的主张不能容纳在这个体系之内。我们要有一个稳定的局面，才能把几个五年计划坚决地贯彻执行。轮流执政最恰当的例子莫善于法国。从二次大战后短短的十多年，法国政府变更了二十三次，这可说是轮流执政的大乘了。但是“轮”来“轮”去，未曾“轮”出一个象样的东西来。你来过了，我又来，几个资产阶级政党象走马灯一样，都轮过几遍了。结果如何，尽人皆知，法国还有可以取法的吗？

结　论

我在上面已说过这篇论文是根据辩证唯物论的理论写出来的，其中有几个要点要请阅者们注意的：

（1）辩证法认为世界上各个对象、现象不是彼此孤立的，隔绝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所以这篇论文仍用平衡论中所用一个环节接着一个环节，首尾两端相衔接的方法写成的，就是用团团转的方法写成的，因为依据辩证法，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一个整体，其中各部门各环节都有内在的联系，故无论从何端出发，到最后仍然回到原处。

（2）辩证法也告诉我们事物是在不断的运动中，在不断的

变化发展中，世界上陆续出现着新事物，这些新事物不断生长，旧事物不断消灭。所以这篇论文的第八节从发展的观点来重谈平衡理论，就是说这里面所谈的平衡理论，比较在两篇平衡论中所谈的平衡理论，前进了一步，就是旧平衡已经或将要发展到高一级的平衡。这个高一级的平衡是一个新平衡，因为这不是在平面上团团转的平衡，乃是螺旋式地团团转的平衡。

（3）我们所谓的“理”就是辩证唯物论中的规律，规律在具体事物之中，即一般在特殊之中，故说“理在事中”，但宋明程、朱一派哲学家乃作出“理在事先”的结论，才陷入唯心主义的范围。他们把概念从具体特殊事物割裂开来，这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在第八节中指出他们的错误如何产生。

（4）程、朱一派哲学家所讲的“理”不仅指自然法则与规律而言，似乎也含有道德原则的意义在内。我们在这篇论文里特别指出就是道德亦是随着事物的发展而发展，亦循着事物前进的道路而前进，换句话说，道德的前进，也是螺旋式的。尤其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广大群众的思想变革涉及到道德、心理和人生观。今日我国山区人民的心理和人生观的突变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们的生活由痛苦转化为快乐。

（5）与我们的理论对立的是英国经济学者凯恩斯氏的一般理论。我们从发展的观点谈理论，他是从“营救资本主义”的观点谈理论，这很明显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正在蓬勃生长，资本主义经济正在垂死挣扎，殊不知还有丧心病狂的知识分子不顾制度之差异国情之不同，梦想把凯恩斯的一般理论生搬硬套于中国，真不知其居心何在。

（6）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大会上有若干代表问我说，资本主义国家（指美国）有赤字预算，何以社会主义国家（指中国）也有赤字预算呢？这个问题非口头上三言两语所能解答。所以我在第十二节中给了一个彻底的解答。

（原载中国财政出版社《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九五八年二月版）

有计划地生育和文化技术下乡

（一九五八年二月）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我向大会提出“新人口论”，其目的，在一面控制尚未出生之人口，一面提高现有人口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今日的发言是上次提出的“新人口论”之继续。我只谈下列二点，就是：（一）节制生育；（二）文化技术下乡。

一年以来，党和政府在节制生育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农民也开始逐步认识到节育是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的。

关于节制生育，党和政府在过去的一年中，直接地间接地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我所谓直接，是指取消军属多子女补助费一类措施而言。我所谓间接，是指最近热火朝天的兴修农田水利一类措施而言。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一月底，全国每天在水利工程战线上从事劳动的农民，自十月份二、三千万，十一月份的六、七千万，又上升到今年一月份的一亿左右。按每人劳动一百二十天计算，共有一百二十亿个劳动日。以每个劳动日平均工资按六角计算，农民在水利工程上所投入的资金已有七十二亿元。现在人数还在增加，工作尚在进行。当然这七十二亿元所创造的财富当大大地超过此数，而且是无可估计的。这是直接的影响。这笔钱若不投入生产，而留在农民手中，不免用之于吃穿、婚丧、迷信、赌博等等，容易引起无计划的生育。这就是我所谓间接的工作。河南代表赵文甫先生在这次发言中指出，许多男女青年为了实现

水利化，自愿推迟了结婚时间。辽宁省代表丘新野先生在发言中也说，打算在春节结婚的工人，纷纷给女方写信，推迟结婚期。这两位代表的发言，足以证明吾言之不误。所以我说关于节制生育一点，党和政府在过去一年中直接地或间接地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有一位研究东南亚国家人口问题的外国专家一日在和平大会讲演时由陈翰笙先生介绍他与我交谈，他对我说："有的国家的人口问题比你们的严重得多，但政府对此漠不关心，不知将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你们的优点，是党政领袖们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然的话只靠学者们口说笔写效果很小。祝贺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党和这样的一个政府。"我听了他的话之后，觉得他说出了我心中要说的话。不仅党和政府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即地方和全国的人民代表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在今年一月五日、六日举行的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各种控制人口增长办法，如大力提倡节育提倡晚婚等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有李永等八位代表提出修改婚烟法的结婚年龄案，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把这个提案交由常务委员会交法案委员会研究。法案委员会认为："提倡晚婚的精神是好的，应当在群众中加强宣传教育，使群众自愿地推迟结婚年龄。"在群众不了解早婚的害处和迟婚的好处以前，结婚年龄现在可以不改。徒法不能以自行，自古云然，所以，我认为法案委员会的意见是正确的。

党和政府已经着手做了，地方和全国人民代表也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了，试问农民自己对这个问题如何看法？这个问题已经包含在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之中作为第二十九条。这条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自农业发展纲要颁布之后，在农村中已掀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辩论，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已取得了不少的收获。比如四川省内江县

双井农业生产合作社最近就节制生育问题展开了大辩论，许多社员都认为今后应该有计划地生育子女。这次辩论是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引起的。社里粮食年年增产，可是有些社员粮食消费水平却沒有相应提高。社员在讨论中发现原来是人口增加太快，全社去年一年就增加五十二人，需要消费粮食三万一千多斤，要平均每亩多增产二十七斤才能够吃。但这里有早婚多生子的风气，这个问题过去并未引起大家注意。近几年，生活有了改善，这种风气更有了发展，许多人认为"早栽秧，早打谷，早生儿子早享福"。老年人鼓励儿女早婚，青年人也是刚满规定年龄就急忙结婚。政府宣传节制生育时，不少人思想有抵触。在大鸣大放中，有人还提出意见说："政府连我们生多少娃娃也要管。"表示很不满意，后来这个社专门召开了节制生育问题的辩论会，辩论"节制生育到底好不好"。参加的人很踊跃。有人发言说："娃娃多了，顾吃顾不到穿。前年入社，去年多分了四百多斤粮食，可是添个娃娃就用得精光，现在还欠三十多元债。娃娃多了，生活提不高，老婆和我吵过好多架。"在会上，大家都算起人口增加的细帐来，算到后来都很吃惊。大家感到这样下去，一年要增产多少粮食才够吃？那还有多少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设？接着，全场你一句，我一句议论起孩子过多的害处来。生过六个孩子的一个人说："娃娃一多，照顾娃娃就照顾不了生产。有时候做活回来，娃娃沒人照应跌得头破血流。去年我只做二百多个工分，娃娃少的人却做了一千多个工分。"在会场上有些人还批评了"早生子早享福"的思想，理由是有了合作社，勤劳动就能改善生活，把合作社办好，比啥都可靠（意思就是不必一定要靠儿子）。全场的人都认为政府提倡节育正是关心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不过有些社员嫌避孕麻烦。经过争论，大家感到有点小麻烦，还是比生育过多带来大麻烦好。有些社员还建议在农村加强节育的宣传，改进避孕药物的供应工作；并希望医院能想出更简便更经济的避孕方法。

关于第二点"文化和技术下乡"，特提出下列两点意见：

农业生产经验非常丰富，总结这些农民自己创造的经验教育农民，是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最好最快的方法。这是下放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

（甲）以农民几千年来自己创造的经验来教育农民

这就需要调查整理祖国极其丰富的遗产。当前，凡具备体力劳动条件的机关青年和其他知识分子，很多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下乡、上山，到工农群众中去，到劳动中去，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成为具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说，做有文化的劳动者。鄙意以为乘这个全国范围的整风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也可以开始引导农民做有劳动的文化者。据报载有的下放干部不甘落后，在劳动生产上还和社员展开竞赛，有的下放干部刚来不久就以劳动好而在全社全乡知了名。在农民方面也很关心他们的健康，总不肯让他们干重活，劝大家多休息。同时农民却也希望下乡干部，给他们搞一些脑力劳动，拿出一些文化和知识来，帮助他们做些扫盲工作，研究生产技术，讲解四十条纲要，编写简报，整理材料和调查研究。在知识分子方面，除劳动生产外，当然也应该发挥自己的特长，结合自己原来的业务，贡献出自己的文化和知识。这样就可以使大家更感到大有用武之地，自然也就会了解到在农村中生产工作的乐趣和前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搞好和群众的关系，才能在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这样知识分子就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农民群众也可以很快地成为有劳动的文化者，同时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界线逐步消灭。

为了提高农业科学水平，我们就要向外国的，特别是向苏联的先进农业科学学习。但是，农业是有地方性的，我们应该注意本国的特点。历代以来，我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斗争中，积累了非常辉煌的成就和经验。距今二千二百年前的战国时代，在《吕氏春秋》的“辨土篇”中，对于庄稼的播种，已经作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可惜，战国时代的专门农书，多已失传，现在所保

存者不过一些鳞爪而已。到了距今约二千年的汉朝，农书就有十几种之多，但除《氾胜之书》一书外，余皆失传。就是《氾胜之书》也只保存了一部分原文。此书是氾氏总结群众的经验而加以提高创造的一种成套的农田丰产技术专书，它所说的栽培法中，包括不少宝贵经验。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农书是《齐民要术》。这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六世纪三十年代写成的，距今约一千四百二十多年。《齐民要术》后于《氾胜之书》五百多年，在这五百多年中，我国农业又有了很大的进步，《齐民要术》能比较全面地加以总结。

但古代农书和医书比较，在写作范围上有很大的区别。掌握和不断改进农业技术的是劳动农民，但他们不能著书立说，不象医生那样能说能写。医生人数虽远不如农民之多，但他们写成很多医书，而且这些医书能够师徒相承，继续发展。虽古代医书亦不免有散失，但比较起来，还是少数。至于农书，劳动农民既不能自己动笔，写成农书的任务就落在少数研究农业的人身上。因此一般农书其数量远不及医书之多，何况农书又无师徒相传而得继续发展。此外，农书很少受到一般文人和藏书家的重视，尤易失传。不但汉以前的农书失传，唐朝几种重要农书也都沒有一种保存下来。不特此也，农书的写作者既不是农民自己，则随时随地发生的先进经验亦不能由农民自己总结记录下来。有些农业操作，虽有重要价値，但因语言隔阂，交通阻塞，传播不广，引不起文人的注意。因此农民的宝贵经验，能被总结而记录下来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只是世代流传在农民的实践中。我认为今日下乡的知识分子应广泛而深入地调查研究那些世代相传在农民实践中的经验和在实践中所获得的成就。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任万国鼎先生说："农民实践中的先进经验是说不尽的，但是我们往往习见而不以为奇，而在国际友人看来却很宝贵。例如一九五三年保加利亚科学院植物栽培研究所所长达斯卡洛夫院士来我国考察，看到我国各地不同气候和地下的井窖贮藏，可使甘薯

保持经年不坏。各种不同的井窖在保温通风等方面，都有轻而易举的方法。他认为这是十分可贵的经验”。“又如他在大连后牧村驿看到农民把白菜和韭菜间作防止白菜根腐病，认为这很合乎科学原理。他介绍苏联学者托金的研究，证明洋葱、蒜等根部分泌一种植物杀菌素，有杀菌作用。因此有些国际友人向我们建议，整理总结我国几千年来的农业经验，并且认为，这样必将有助于国际农业科学的进步”。因此总结和推广我们几千年来的农业经验，就今日大规模地发展农业的时候来讲，殊有必要。这是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必修之课。说到这里，我想起几位下乡干部在报上的谈话。他们说：各种菜蔬有各种不同的捆法；挖菜窖时，究竟如何挖法？窖眼该挖在什么地方？什么方向？农民都有一套极其丰富的经验。但是，他们限于文化，不能很好地总结，而《四十条纲要》中明白指示我们“由各省、市、自治区收集当地的丰产经验，编印成书，传播推广”。所以为农民总结经验，是下乡知识分子的分内事，也是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最好最快的方法。这就是以农民几千年来自己创造的经验来教育农民。毛主席曾说过“年老体弱的可以不去农村工厂锻炼”。他大概是指体力劳动而言。写作是一种脑力劳动，年老体弱的知识分子亦可以做，发言人自己就抱有这样的志愿。

沁县解决工农业矛盾的经验说明，应该重视发挥县营工业的积极性，由县因地制宜组织当地群众的力量，使地方工业更好地为农村经济服务。

（乙）帮助农民向大自然进军

就今日科学落后的中国来谈，提高农村中的科学水平是很不现实的。但我们可以先传播在农村中急迫需要的技术知识，并先提高技术水平。至于如何提高，我认为山西沁县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值得介绍和推广。事情是这样：农业生产的发展急切需要工业的支援，但工业所供应的机械和物资非常昂贵，合作社无法筹

措这么多钱。比如说：（一）大规模地普遍兴修农田水利，需要勘测地势的水平仪，筑拦河壩需要地质钻探，水库上需要高压水闸、冲沙闸、起闸机、拦鱼网等等。这些东西价格太高，一个水平仪要四百多元，请钻探机来钻一公尺要二百元左右，而且经常排不上队。高压闸和起闸机等都要一千几百元，农业社很难筹到这笔钱，筹到钱也很难找到承制的单位。（二）农业社所需要的化学肥料不仅数量太少，而且价钱也太贵。（三）农业社为节省人力、畜力所需要的简单机械和新式农具，农民既不会安装，亦不会使用，坏了亦不会修理，急需工业方面来援助，但工厂离得太远，人也少，无法满足这许多农业社的需要。这说明了工业和农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但学过辩证法的人相信在任何矛盾中包含着克服矛盾的因素，因此沁县本此信心找到了解决这个矛盾的途径。

兴修水利钻探地势所需要的水平仪，由沁县联合加工厂（地方国营）根据水平仪的原理，仿效水平仪的模样，用当地能够找到的废铁玻璃等便宜材料，制造了一种简易水平仪，水平仪是由沁县中学校一位理化教员帮助设计的，并且由中学的化验室直接装置了玻璃圆筒。圆铁筒和木架子则是由铁业合作社和木业合作社的人们制造的。这个简易水平仪一部只化十三元，不及大工厂水平仪价格的三十分之一。它当然有些缺点，它不能看得很远，但可以多分几段来勘测，功效尚好，若干县份已经向沁县购买。至于钻探机，联合加工厂也是用当地材料，试制了一种手摇的简单钻探机，一共能钻十公尺深，一次只能钻一公尺，拿出这一截来，看了再往下钻，当然增加了麻烦，但也能搞清楚十公尺内的地质情况，每一公尺的钻探费不过三角八分，不及大钻机钻价的五百分之一。在同一方针下，这个厂自制了四吨重的高压水闸及同样能力的起闸机，价格只及大工厂产品价格的一半左右。

沁县最大的困难是政府和农业社都缺钱，要生产化学肥料，生产各种小型机械和新农具，开办各种小型企业，如发电、磨粉

等站，都需要一定数量的经费。钱从何来？沁县以合营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合营的形式有三种：因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谈一种，其余二种请看今年一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我要谈的就是工厂和农业社合营，用沁县开村一带的泥炭，生产颗粒肥料，一斤能顶一担农家肥料。如全部投资由政府负担，不仅款无从出，且成本亦太高，农民买不起。工厂与农业社合营，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办法是工厂提供设备，农业社提供劳力，生产出来的肥料由各社直接分配使用，推销问题也连带解决了。颗粒肥料原来一斤的价格是七分四，现在只有三分九，有的社还可以根本不花钱，干脆用劳力换肥料。

沁县的工厂过去是个专业的蛋厂，冬天无蛋就无事，一年要停工五个月。现在这问题也解决了。冬天到来，蛋厂停了，大家就来挖硝土，熬硝，做卤水（肥料）；冬天榨油的业务较少，人力就可以转向印刷（年终有换帐簿的活动，所以印刷厂忙）。工业生产所要求的连续性和农村市场的季节性之间原来有矛盾，现在因工厂与农业社合营而解决了。

现在我要在这里特别着重指出的，就是沁县把这个加工厂同时当作技术学校和技术顾问来使用，在这个工厂式的学校带动下，各社已经组织了五十多个小组生产卤水。同时为农业社集中训练工人，若干天一期，外县也可以来学。卤水是沁县人们心目中一种很好的追肥，浇了水再上了卤，就会使土壤松软透风，更好地吸收和保持水分。但工厂的活动不限于在工厂以内，他们也组织各地农业社生产卤水，对各社的生产予以技术指导。各社原来只能生产水而不能产块，也不能提炼火硝，经过工厂技术人员的指导，这两样技能也都学会了。工厂本县营企业必须“面向农村”的指示，还负责为农业社安装和修理各种农业机械和新农具，同时帮助农业社训练使用机械的人，有的订有包教包学的合同。这样工农业间的矛盾解决了，农业社买不起新机械的问题解决了，安装、使用和修理机械的困难也克服了。同时，农民的技

术知识也普遍地传播开来了。我认为这个工农业合营的办法在一定的时期内，可能是广大农村发展经济和文化的一种适当办法，值得各地仿效。

工业与农业脱节，不仅在山西如此，在其他各省，亦有同样的情形。过去襄阳专区许多农业社买了双轮双铧犁，都闲置着沒有用，造成积压，并不是因为双轮双铧犁不好，而是因为技术工作沒有跟上去，沒有教会农民使用，沒有根据地方的特点作适当的修理。当前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是改变地方工业的管理体制，发挥县一级经营工作的积极性。比如河北省的地方工业，虽然很大一部分都设在县里，但都属省或专区一级领导，县里管不着，有劲使不上。因此现在各省应考虑把地方工业下放到县的问题，发展县营工业，由县里根据当地的需要，组织当地群众的力量，使地方工业更好地因地制宜地为农村经济服务。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

再谈我的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

（一九五八年五月）

我阅读4月19日《光明日报》所载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韩佳辰先生对拙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中所说的“团团转”理论有所批评，觉得很高兴。第一，因为批评与辩论，可以打开学术界的沉闷空气，而真理愈辩愈明；第二，因为目前高等学校新老教师之间，还不免有若干隔阂，这是很不好的现象。双反之后，教师们在思想斗争中都有很大的收获。我们理应在这个思想大丰收的基础上来开展一个新老教师彼此帮助互相支援的风气。我校年轻教师直接在教研室里面展开科学研究工作，间接提高教学质量，使青年学子都得益。现在展开学术空气的条件已成熟了，韩先生的文章恰好适应这个已成熟的条件，令年老教师如我抓住这个机会来利用这个条件。第三，我还想进一步提倡集体的科学研究工作。因为我们的人民正在作出惊天动地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社会事物更加错综复杂，要做社会科学范围内的研究工作，决非“单干户”所能胜任的，即能胜任，亦不免犯片面性的错误。我在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中，觉得研究愈深入，发现的问题愈多；若把它们放在一边，置之不理，则论文不够全面，容易受别人的指摘和批评；反过来，若把它们都吸收进来，又觉得时间与精神两不足，待副题研究得像个样子，主题又落在时局的后面了，大有顾此失彼之感。所以我认为在大学教研室里大有开展集体工作的必要；从集体工作中又可产生集体主义的思想，未有工作不集体而思想可以集体的。我自己不久就要下乡，写我预定的农书，自明年下半年起，即与财政部富有实际经

验的工作同志们一起工作，同写一本财政教课书，不仅我个人可以得到许多好处，而理论也可以更接近实际。第四，我的“团团转”的理论虽是无可动摇的，然于拙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中说得不够明白，致引起韩先生的误会，现在看来，似有详加说明的必要。我现在写出下列几段说明，来解除韩先生的误会。

一

韩先生所想到的大概是宇宙内全部事物的团团转，而我所研究的只限于计划经济，从计划经济中亦不过抽出几个重要环节，不能弄得很复杂，这是做研究工作的人应该首先注意的。化学家在实验室里做研究，亦不能弄得太复杂，非把若干有关的项目隔离开来不可。在我的研究中若把政治、法律、伦理、宗教、艺术等等一起加进去，问题太复杂了，不仅使研究者无从着手，也容易使阅读者头痛脑胀。我以为俟主题搞清楚之后，一切与主题有间接关系的问题也可以一个接着一个地加进去(如何加法详后)。韩先生的第二个误会是甲与乙、乙与丙、丙与丁、丁与戊、戊与己一直到癸，癸与甲又有联系首尾相衔接的，循环的圆圈。他说：“社会上各事物之间的联系是错综复杂的，并非单一的简单的循环。忽视了甲与丙、甲与丁、甲与……之间的联系”。以上单一的一条线式的联系无非是一个比喻不要把它神秘化起来。在我的第一篇平衡论中，我从稳定物价和物价政策开始（甲），转到经济和财政的平衡（乙），转到财政收支平衡（丙），转到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平衡（丁），转到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戊），转到工农业和商业的平衡（己），转到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平衡（庚），转到积累和消费的平衡（辛）——直至最后仍归到（甲）稳定物价和物价政策，首尾相衔接为止。现在让我们换一个次序，不是从甲到乙，乃是从戊倒过头来到丁。戊是指轻工业与农业间的联系。假定轻工业纺织厂需增加出品，要求农业多供应

棉花（戊），农业要增产棉花，一定要多施肥料，向重工业要肥料；重工业要增产肥料，一定要多建肥料厂，向轻工业要资金（因为轻工业是最赚钱的），所以轻工业和农业的联系（戊），至此一变而为重工业和轻工业的联系（丁），所以发展的方向不是沿着直线前进，由戊到己乃是沿着直线倒退，由戊退到丁。但轻工业赚来的钱，一定要上缴到国库，而重工业部因建肥料厂要用的钱，也要向国库支取，财政一收一支状况平衡，不致使财政有赤字预算，故财政收支要力求其平衡，至此重工业与轻工业的联系（丁）一变而为财政收支间的联系（丙），沿着直线由丁倒退到（丙）。万一轻工业所上缴的钱少而重工业要支取的钱多，财政机关一定要想法增加收入，使收支仍归平衡。它们就想法开辟新的财源，看见各处合作社多在建设小型野生杂物纤维厂（有一种可以为棉花替代品），就向合作社征收一些用野生杂物纤维制成的货物税，因此，这个财政收支的联系，一变而为经济与财政的联系（乙）。我们是从戊出发的，轻工业部向农民多买棉花，农民不得不多产棉花，所以要多施肥料，农民以野生杂物纤维制成的货物出卖，获得了收入再以这笔钱向商业部门的供销社去买肥料，至此经济与财政的联系（乙）一变而为农业与商业的联系（己）。但过去中国自产肥料不过六七十万吨，不伙甚巨，于是不得不向外国进口一百多万吨的化肥，结果进口货增加了，一定要想法把出口货同时增加，于是把野生杂物所制成的美观的布匹、食油、淀粉、香料以及治高血压的药剂等小土特产多出口一些，使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仍归于平衡，于是这个联系由农业与商业的平衡（己），转到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平衡（庚），肥料进口之后，交与农民，而农民多产的棉花或代替品交与轻工业部，于是这个联系，由庚又转到戊，变为轻工业与农业的联系（戊），仍归原处，成为一个团团转。在此地要请韩先生注意各环节的联系不是呆板地由甲到乙、由乙到丙，到丁沿着一根直线前进，也可以沿着一根直线后退，也可以后退之后又前进，如以

上的由乙到己，由己到庚。前进之后又可以后退，如由庚退到戊。所以这个团团转是灵活的，不是呆板的、死的，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要这样观察。

二

我现在来谈一谈韩先生的第二点误会。他说："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彼此联系是错综复杂的。例如一棵植物的生长，它不仅同一定的土壤有联系，而且同时与一定的温度、阳光、水分、肥料、空气有联系。就这棵植物来讲，很难找出按照甲、乙、丙、丁……单一的一条线式的首尾相接的，循环的圆圈"。我要请韩先生注意，我所讲的是计划经济，是综合平衡，不是讲植物，这个问题由植物学家来讲，一定能找出其中的联系。不要说植物，就是说第一个五年的计划经济，我们亦不过说到需要由全国统一平衡的各项重要指标而已。这些指标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综合平衡；至于地方性的局部性的属于地区平衡或者各部门自行平衡的各项指标，则由省（市）、自治区或各部门因事因地制宜地自行平衡和安排，同时应报国务院备案，以便经过综合，纳入国家计划。其他许多次要的，种类繁多而情况又不易掌握，因而无法一一纳入国家计划的指标，则由地方或者各基层单位自行安排，国家只从价格政策供销关系上加以调节而已。许多经济指标尚且放不进去，则植物在我的计划经济平衡论中，更无法放进去了，因此植物在平衡论中只能作为一个小小环节，如林牧之类。我在平衡论中只提出农，沒有把林牧包括在内，以免问题搞得过于复杂。林牧虽然沒有放进去，但与农亦有密切的联系。我们现在大讲水土保持，造防沙林，为的是护农，为的是为农业除害兴利。农业繁荣工业亦随之繁荣，因此韩先生的这棵植物经过对农业的影响，也可以跑到"团团转"的圈子里面来了。据林业部造林局副总工程师程崇德先生的意见，"我国造林一向都习惯造单一树种的纯林，应该说是一个缺点，今后应当把营造混交林做为

一个方向来发展，因为混交造林的好处很多，如不同树种的根在土壤中的分布范围不同，就可以充分吸收土层里的养分和水分。由于树冠的多层和喜光性的不同，树木可以充分利用日光，同时由于林木的组织不同，对于病虫害、风、雪、干旱、水灾的抵抗力，以及对于水源涵养的作用，都比单纯树种的森林要强得多。”①这样不但韩先生的一棵植物跑进来了，连韩先生所提出的种种复杂的因素如土壤、养分、水分、阳光等等经过这些因素对一棵植物的影响都跑进圈子里来了。这些因素归纳在我的团团转里面，看上去似乎很复杂，实际上只要分析得好，可以弄得很简单，把这些东西都归纳在农业的里面。而农业又归纳在我的综合平衡里面，直接地影响了树，间接地影响了农业。这些东西也可以经过商业部跑进来，因为商业部所收购的商品都要求它自己所特有的存在条件，包括温度的高低，湿度的大小，含水分的多少等等。这些条件稍有不适就会使商品霉烂生虫，变味，变质等等。这样温度、湿度水分都跑到大团团转里面来了。

三

让我来谈一谈韩先生的第三点。韩先生又说：“如哲学观点是一切观点的理论基础，它直接影响各种观点（如政治、法律、伦理、艺术、宗教等等），同时政治、法律、伦理、艺术、宗教等等观点之间也相互影响。这就说明社会上各事物之间的联系是错综复杂的、并非单一的简单的循环。”这些因素限于篇幅不能都谈，我只谈宗教。虽然我讲的是经济不是宗教，而且只是经济中的一部分——计划经济，宗教当然不是重点。无论何种科学，若把所有东西都包下来是无法着手的；在计划经济中，综合平衡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最重要的原则，主管机关一定要全面安排，力求其平，则不仅甲与乙间乙与丙间要求其平，即首尾两

① 见“怎样提高造林质量”一文，载1958年4月22日的《人民日报》。

端间也要求其平，因此形成一个团团转。在我的经济平衡论中，宗教只能间接地联系到综合平衡。比如我国灾区人民历年经过生产自救运动，虽然渡过了灾荒，但终因灾害严重，生活越来越困难，思想悲观，生产消极，往复循环的春耕、打堤、防汛、救灾，成为工作规律，广大干部感到沒有出路，因而工作疲沓，情绪厌倦。很多群众认为命由天定，水灾活不了，因而产生靠天吃饭的思想。遇到干旱，求神降雨或迎神赛会，一切听天由命，在大自然面前人人觉得无能为力。根本原因，他们对于自然情况和规律沒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根本不知道自然是可以战胜的。一旦知道了，听天由命的心理，一变而为人定胜天的信心，于是亿万人民如万马奔腾，一日千里，人人鼓起干劲力爭上游。从此大家把“神”扔掉了，抱我就是“神”的态度。他们否定了曾世世代代压在他们头上的“玉皇大帝”和“海龙王”而自豪地说：我就是“玉皇”“治水龙王社员当”，他们深信自己能够使“万水千山听调动”，使自己家乡的粮食增产的水平，迅速地“跨黃河，过长江”。人的信仰与生产的关系有如此之深，所以这个因素（宗教）很容易归纳在团团转的圈子里面，可说它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了人的干劲，而干劲又影响了生产。在欧洲，新教徒和旧教徒都爭着做刽子手，新教徒烧死了赛尔维 Serret，旧教徒烧死了勃鲁诺 BrnHo。在自然领域內，哥白尼完成了他那本伟大的著作。哥白尼在这本著作中踌躇了三十六年之久，然后才在临死以前病床上，不顾任何威胁，和教会的迷信挑战。从此以后，自然科学就根本由宗教解放出来了①。足见宗教直接阻碍了科学的发展，间接妨害了生产的繁荣。

四

现在来说说韩先生的第四点。“事物的联系形式也是多样

① 见郑易里译“自然辩证法”215—217页。

的，如有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必然性联系和偶然性联系等等。因此当我们观察事物，不仅一般地看到事物的联系，而且要区分事物的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区分必然性的联系和偶然性联系等等。”我们不能机械地看事物，因为一物的本质可以因地因时而异。如城市中的垃圾于居民的卫生很有坏处，它与清洁卫生从好的一面看沒有本质上的联系。但移至乡下，坏东西就转化为好东西了，就与农业发生本质上的联系。浙江有一个村，受血吸虫病的袭击，全部居民无论老幼男女都死光，土地亦变为荒地，无人敢进去，因进去必死，故死有必然性。现在南方各省有好几十个县市血吸虫病基本上肃清，因患血吸虫病而死的是偶然的事，故“必然”就转化为“偶然”了。剑阁与秦岭过去阻碍了交通，故有“蜀道难难如上青天”之说，这是不好的。但在日本统治中国时期，幸有这两座山，四川就未受敌人的蹂躏，这两座山就转化为好东西了。所以每样东西在一定条件之下是可以转化的，今天为本质的联系，明天就转化为非本质的联系了，今天为必然的联系，明天就变为偶然的联系了，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就是人自己也可以转化的。我们说某人有用，某人无用，这个有用和无用在一定的条件下，也能够相互转化的，有用变为无用，无用变为有用。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本来有用的人和物也会变为无用的人和物；在社会主义社会，本来是无用的人和物，也会变为有用的人和物。过去和现在人们的思想多少有些僵化，不能辯证地观察事物，看到事物的这一面，看不到事物的那一面，故在研究工作中犯了片面性的错误。

五

我们现在来谈谈韩先生关于道德对经济所起的作用。他说：“道德虽然对于社会、经济能有反作用，但是，并不能起到使‘经济

根本变革'的作用。如果认为道德有这样巨大的作用，那末，只要使人们的道德完善就可以推动社会发展了，就沒有必要进行革命了。”我认为道德能推动和促进经济的根本变革，已成为今日的普遍现象，何必要通过革命再来推动呢？（韩先生所谓革命大概指武装革命而言）今年5月1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所载关于北京东方红农业社的大变化的报道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报道说：“去年这个时候不少社员自私自利的思想相当普遍，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社员们爱护公共财产，在社里已经成了一种风气。去年冬天，社员们自动发起了一次交回公共财产的运动，几天内，全社就交回大小三千多件农具。该社社长说互相支援，彼此帮助，是我们社里的另一个新气象。今春，东管头生产队的秋肥任务重，肥源又缺，别的队知道以后，就主动地送肥上门，支援他们，我们还支援了其他兄弟社。不久以前，社里就挑选七部最好的水车，送给丰台区魏各庄合作社，帮助他们解决抗旱的困难”云云。这就是新道德能起使经济根本改革的作用，东方红农业社的大变化本身就是革命，何必再经过武装革命呢？向来淮南适于水稻，淮北适于旱作物。现在要把旱地改为水稻田，估计可以大大地增加生产量，改革的办法有两种：一种由淮南派遣有高度共产主义道德的人到淮北去传授改种水稻的技术。一种是由淮北派积极分子到淮南去学习，其目的都在改革淮北的耕作制度。这也是新道德可以改革制度的一例。

六

现在我们到了韩先生的最重要的一点了——就是他所说的“循环论”。他说：“事物在发展，变化过程中，是否能够按照团团转的联系，循环发展？即使事物发展形成一个圆圈，是否仍然回到原处？我们认为用团团转的方法表达事物在时间上的联系，很容易陷入循环论。”韩先生在这里的误会是难怪的，因为我在拙著中沒有把团团转回到原处的理论说得很明白。我现在作

一个补充的说明。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人，一定要运用一种假设的东西，否则思维工作不能很好的开展。在统计学中，我们运用平均数来帮助我们进行工作。但平均数未必客观存在。比如在这里有山三座，一座高六百公尺，一座七百公尺，一座八百五十公尺，平均高度是七百十六点六公尺，客观上并沒有这样高的一座山。代表这个平均数的山虽不客观存在，但在我们的统计工作中非用平均数不可。在数学中这种假设更多。太阳照在河上，使河里的水晒干了，或被吸收在空气中。但吸收之时总是很薄很薄地，一层接着一层地吸收上去，决不致一霎时把河水吸光。积微成整，我们的微积分数学就根据这样的情形建设起来的。不过这些很薄很薄一层一层的水分非我们的肉眼所能看得到的。但在我们的思维中一定要假定有这样的事实存在，否则微积分学就很难成立。我们测量某地的高度，说海拔若干公尺，就是从海平线量起一共多少公尺。海平线就是波浪一起一伏的对立面的统一。但海面永远是在动荡中，沒有一霎时的停息。海平线我们从未看到过，但我们在思维中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否则测量学就成问题。在经济学中，我们也假定有一个平衡点，即对立面的统一，在这个一霎时的时间中对立的东西归于统一。列宁在写辩证法问题中写道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暂时的，相对的，互相排斥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他所谓均势就是我们所谓的平衡，是相对的，而不平衡则是绝对的。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平衡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人民只能因势利导无法任意改变。在平衡的或在均势的时候，对立面的斗争停止了，这个时候团团转圈子里面的最后一个环节回到原处。从平衡又到不平衡，再到高一级的新平衡形成螺旋式的上升，决不致陷入循环论的复辙。

七

我现在要谈一谈“团团转”理论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的主要部分就是综合平衡，甲与乙间，

乙与丙间，丙与丁间，丁与戊间都要轧平，即最后的癸与最先的甲之间也要轧平，所有的环节间轧平之后才可称为综合平衡，在这个时候，各对环节间的矛盾都解决了，对立面的矛盾归于统一，我们就到了平衡的一点，列宁叫做“均势”，这是很暂时的，相对的，过此之后又来了对立面的矛盾，矛盾是绝对的，后来又到了一个平衡，不过平衡是高一级的了，形成螺旋式的上升。但这个综合平衡工作是人做的。未必眞正能符合于“按比例发展的规则”，一定要随时调整，使之更加接近，更加切实。所以我们的“五年计划”之上，內部还有一年计划，甚至还有季度计划，时期愈短，调整愈容易，某某项目第一季度不能完成，在第二季度內设法赶上。一年之后大多数是完成的或超额完成的，如钢铁等，也有长期赶不上的，如石油。但无论如何，综合平衡一定要运用“团团转”的理论，不要以为书本上沒有这个东西，便认为是不恰当的。

假定我们第一年有积累三百亿元，要用于各项建设。计划委员会就要把这笔钱分配给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卫生等等，仍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来代表各项建设工程，分配之时要按比例发展规律达到综合平衡；于是在这个很短的时期內，要在甲与乙间求其平衡，就是乙与丙间、丙与丁间、丁与戊间、戊与己间、己与庚间，庚与辛间也要求其平衡，不能此方太多彼方太少，或者彼方太多此方太少。既然如此则最末一项辛与最前一项甲二者之间也同时要求其平衡，故回到原处就是从甲出发最后仍回到甲。在这个时候，我们已到了平衡点，谓之综合平衡或全面平衡。到了第二年，我们的积累不止三百亿了，已增加到三百五十亿了。这笔钱又如前法分拨给各项建设，最后一项与最前一项也同时要与前者一样求得一个平衡，但这个平衡不是旧平衡的重复乃是比旧平衡高一级了。到了第三年，我们的积累已增加到四百二十亿了；又如前法分投于各项建设，又到一个新平衡，这个新平衡又高一级了。以三个平衡联起来看，形成一个

螺旋式的上升，决不致犯循环论的错误。

八

团团转理论的好处不止于此。我们可以从这个理论演绎出好多原则性的东西来，而且使这些东西有理论的根据。让我们作一个最简单的团团转，说工农间的团团转，工业向农业要原料（如棉花），回过头来农业亦向工业要生产资料（肥料），从工到农，又从农到工，形成一个团团转，工要农的支援，农要工的支援。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演出以下各点：（一）工农既有相互联系，他们就起相互推进的作用，只有工业的积极支援农业，才能改变农业的落后状态。农业发展了，农民的生活改善了，农民就会从实际生活的体验中，认识到工农联盟的重要。（二）农民既然认识到工农联盟的重要，工人阶级就可以用先进的思想来教育农民，农民一定愿意接受，这样就可以帮助农民摆脱资本主义的影响，坚定意志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三）农民既决心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但工农联盟益加巩固，而且可以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四）工农联盟既然益加巩固，农业支援工业的热情一定益加深厚，工业要什么生产资料，农民乐于供应，这样才可以使工人们从体验中认识到农业的增产或减产，农民收入的增加或减少，也都直接间接地影响到工人群众的生产情绪和生活状况，也会认识到发展农业和发展工业是国民经济中不可分割的整体。（五）工农群众既然都有高度的认识，我们就可以利用全国、全省或全市的报刊杂志、广播电台等宣传工具和各种宣传方法大力加强对全国、全省或全市的职工和居民进行关于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宣传，鼓励他们积极支援农村建设。（六）城市居民的居住在农村中的家属亦可借此鼓励他们积极从事农业生产，不要盲目地流到城市里来。（七）这样集体主义的思想不期然而然地生了根。

以上这些都是从工农两个环节“团团转的理论中推演出来的

原则性的东西。问题是这些推演出来的原则性的东西能不能归纳在大“团团转”的里面呢？当然是可能的。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垃圾，不再多讲了。除垃圾外还有好多杂肥于农副产与小土特产是最有用的。以上海而论，杂肥的来源很大，即以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皮革工业，水产工业等来说就有一百多种副产品和下脚废料，很容易以这些杂肥来支援农村，送到山上作为农副产和小土特产的肥料，而我国出口食品的原料可以说大半取之于农副产与小土特产，把这些副产特产进行加工制造之后，就可以组织出口，增加外汇，换回工农业设备，这样这些演绎出来的东西就可以归纳在大“团团转”的里面了。

九

以上各节充分地说明了我的“团团转”的理论，我认为这个理论是颠扑不破的，无法动摇的，不然的话，计划经济的综合平衡工作就无从着手。

（原载《光明日报》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

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内　容

全文（附带声明除外）就大跃进的情形，作出一个科学的解释。

一

序　言

二

根据辩证法核心（对立的统一）的普遍规律，用大量的事实证明我的三个理论的正确性(团团转，螺旋式上升和理在事中)。

三

这样处理问题的几个好处：

1． 把“八字宪法”和辩证法的核心熔为一体。

2． 从“八字宪法”得出来的小型“团团转”理论反映了“八字宪法”济世救人的伟大力量。

3． 从辩证法核心得出来的大型“团团转”理论反映了核心，推动大跃进的巨大力量。

（附带说明不低头认错的理由并请求批判者们另立一个学说来替代）

四

1． 为什么在本文中讨论新人口论？

2． 为什么强调人口的质量？

（附带重申对北京大学人口论研究会的请求）

五

附带声明：

1． 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

2． 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

序　　言

我在1956年12月和1957年5月先后写了两篇综合性的平衡论，第一篇登于1956年12月28、29两天的《人民日报》，第二篇登于1957年5月11、12两天的《人民日报》。在国内1957年的报刊杂志对这两篇文章沒有批评的言论发表，1958年1月1日我出版了拙著《我的经济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把两篇平衡论和新人口论作为此书的附录。书中所反复申述的有三个原则性的理论：（一）“团团转”的理论，（二）“螺旋式上升”的理论，（三）“理在事中”的理论。“新人口论”不是勉强地插进去的，从大跃进的角度来看，它就是大跃进的情形作出一个科学解释的必然结果（详篇尾）。此书出版后，就有很多人提出了许多意见（据1958年7月24日和11月29日的《光明日报》估计，不下二百多人，其中有的是大学教授、副教授、讲师、教员和助教，有的是经济杂志的编辑和总编辑），我也写了好多篇长短不一的反驳文章。我对批判者的好意非常感激，但心中所抱的愿望与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篇末所抱的愿望一样，总希望批判者们摆事实、讲道理，要以理说服，万不可以依靠人多的力量来压服，何况以力压服总是压不倒的。总希望他们发表些眞正有价值的批判，使受批判者有所得，千万不要如李达先生所说：“扣名词、扣概念、语义晦涩、內容空洞、带一些八股气。”我

的最后一篇反驳的文章登载于1958年7月24日、29日、30日和31日的《光明日报》，因分段登载，容易散失，而《光明日报》在全国学术机关，亦多不注意保存，故请《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转载于1959年的第1期。那篇文章分两段登出，第一段是破，就是破别人的；第二段是立，就是立自己的。因此，我又写了一篇小型的团团转的综合性平衡论，把批判者所提出的七个缺点一一去掉，并以农业上八项技术措施（水、土、肥、密、种、保、工、管）来代替两篇平衡论中的几个环节。研究结果，还是得出一个团团转和螺旋式的上升的结论。不料文章发表两三个月之后，这八个字举国一致奉为"八字宪法"，凡贯彻执行"八字宪法"的地方，无处不五谷丰登，至此我的"团团转"理论和"螺旋式上升"理论得到了一个有力的证实。

我无日不盼望原来的二百多位批评者仍抱过去的一番热情，并多花点工夫，对这篇小型的团团转平衡论发表些新的意见，不但使我有所得，并可以把这些新的意见归纳于我下一篇的文章中。如今，实足等了八个月之久，尚不见有批评的文章见报，王亚南先生在今年6月出版的《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但也提不出什么新意见，而对于这篇小型的团团转综合性平衡论避而不谈，故我的下一篇文章虽早有准备，但因与那篇小型的团团转的平衡论有承上接下的关系，既沒有批评，仍不便拿去付印。好在这篇文章沒有时间性，展迟三年五年沒有关系。现在既不便拿去付印，只得再写一篇大型的团团转综合性平衡论，形式虽与小型的团团转综合性平衡论相同，但所根据的原则不同，內容亦不同。小型所根据的，是毛泽东主席从吾国农民二三千年来在农业增产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八字宪法"；这篇大型所根据的，乃是辯证法的核心——对立的统一。至于內容，小型只谈农业，大型则包括重工业、轻工业、农业连同林、牧、副、渔、商业、对外贸易、人民公社、建筑业、交通运输、电力网、水力网、手工业、卫生事业等等。我以十二万分的诚意恳请这二百多

位先生们继续给些善意的批评，把这两篇小型的和大型的团团转综合性平衡论一并付诸讨论。为方便起见，我把小型的平衡论包括在大型之中，就是把“八字宪法”包括在“对立的统一”之中，使阅者容易窥其全豹。还希望二百多位先生各立一个或几个新的，更具体的而又更抽象的，更完整的而又更有说服力的学说，给大跃进的情形以一个科学的解释，以便共同负起提高学术水平的责任。真理愈辩愈明。而工作又是穷年累月的工作，徜破而不立，是不够的。我们总要把现在所看到的大跃进现象，以科学的方法作出一个解释，把各式各样的感性认识用思考来提高到一个理性认识。这样，才可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二

根据辩证法核心（对立的统一）的普遍规律用大量的事实证明我的三个理论的正确性（“团团转”，“螺旋式上升”和“理在事中”）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前者解决了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而后者则在两条道路的斗争基本上取得胜利后，领导人们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问题。前者为后者提供前题，而后者则为前者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就是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动员人民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高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因为要以高速度来发展我国社会的生产力，所以党中央提出多、快、好、省的方针。这个方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多和快是一个方面，而好和省又是一个方面，形成两个对立面，但共处于这个方针的统一体中。多和快是在好和省条件下的多快，而好和省又在多和快条件下的好省。至此，党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很快地掌握了群众，亦很快地为群众所掌握，成为伟大的物质力量，而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又是推动落后赶上先进的动力。在多快和好省

两个对立的方面统一方针之下，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间不平衡的状态可以随时得到解决，这意味着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矛盾在进程中会不断地出现，又会不断地获得解决，这就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高速地向前发展。

对立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由于事物本身内在的两个相互矛盾着而又统一着的对立面的斗争展开，也就是说事物发展的动力来自事物本身內部，而绝非来自事物本身之外。换句话说，任何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因为事物间有其內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它幷不是为人们主观意志所臆造。它是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利用这个事物发展规律来谈团团转理论，我们沿着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地顺序进行；在进行中不断暴露矛盾和不断解决矛盾，这就是从平衡到不平衡，又从不平衡再到新平衡的发展过程；我们就依靠这个事物本身的力量来推动事物向前发展。这个力量，是事物存在的必要条件，可以称它为强制性的力量，人们无法阻止它发生作用。毛泽东主席曾有过一段话，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是客观事物运动的规律。所以在济经工作中，我们要及时地发现矛盾，正确的处理矛盾，采取积极平衡的方法，调节不平衡为平衡。这种方法不只是每年每季要用，而且在每个月都要进行。这正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特征。而且经济发展的速度愈高，不平衡出现的就愈频繁。为了消除和防止不协调的状况，除了采取积极的措施，不断地克服薄弱环节以外，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要留有一定的后备。

在我们研究的进程中遇到一系列的困难，或一系列的问题。有困难，有问题，就有矛盾，而矛盾是层出不穷的。沒有矛盾，就沒有发展，沒有进步。因此，社会主义建设能不能向前进展，不取决于困难或问题之有不有，乃取决于困难或问题能不能被找出，以及能不能及时解决。

在写这篇文章的工作中，我们充分地估计到事物的发展。事物是发展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革命者的任务，就是不断地解决矛盾，推动事物向前发展。革命是不停顿的，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不能够走了一步，就不走下一步了。我们做事的人和做研究工作的人，都应该向下棋的人学习，学他能向前看几步棋的本领。他高瞻远瞩，步子看得很多，再把他们紧密地联系起来，联系得愈紧，棋艺也就愈高明。写文章的人又何尝不要学习这样的本领。做事的人和做研究工作的人，都应该抬起头来走路，要看得远，想得开，前步刚刚踏出去，后步就要跟上去，走了第一步就要为下一步甚至下几步作好准备；我们决不能低着头走路，走一步算一步，不为下一步作准备。如果这一步走完了，下一步因为沒有作好准备，弄得手足无所措，那就陷于被动了。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叙述了一系列的矛盾（计共二十个），但其中必定有一个主要的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就是一系列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或是我国建设事业中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钢为纲"带动一切，意味着纲举才能目张，有了钢铁，才能带动整个生产战线的全面跃进，所以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从而使我国的各个生产部门，逐渐转移到现代化大生产的轨道上来，从而也就能加速我国建设的步伐。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当然要遇到各种矛盾，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些矛盾一个接着一个地来解决，使成为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并使建设事业顺利地向前发展和螺旋式地上升。现在让我来谈谈各个矛盾和统一。

第一个对立的统一

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一千二百万吨钢的跃进计划，当前最中心的环节是钢铁的生产。今日钢铁的生产情况是：生铁的生产还不能完全满足炼钢的需要，而洗煤、矿石、焦炭的生产又不能完

全满足炼铁的需要。这是一个事物本身内在的矛盾在这里暴露了。怎样来解决呢？这里钢铁的生产恰恰处于中间环节。现在需要抓中间，带两头，这就是通过抓钢铁的生产，把洗煤、矿石、焦炭等原材料生产带动起来，又促钢材的生产跃上去①。这是第一个矛盾的暴露。如何来解决才能达成对立的统一？

冶金部认为现在仍有一些企业生产的钢铁，不能全部合乎国家建设和机械制造的要求，所以现在要提高钢铁质量，但提高钢铁质量的中心环节是提高生铁的质量，根本问题就是如何降低含硫量，要坚决爭取在短期內作到全部炼焦用煤都经过洗选，因为生铁里面的硫有百分之七、八十来自煤炭，所以加速简易洗煤厂的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在简易洗煤厂未投入生产以前，应立即采用土办法洗煤。其次是提高铁矿石的品位，缩小矿石的粒度，高硫铁矿石和矿粉要进行焙烧和用土法烧结②。

因生铁中含炭量高（1.7%以上），含硫磷等杂质也较多，因此很脆，不能锻造。这就需要炼钢，以便减少生铁中的炭和杂质。炼钢的方法有许多种，现在常见的有低溫炼钢、坩锅、转炉、平炉、电炉等方法。炼钢的方法虽有种种不同，所用设备亦各异，但主要目的是要用氧化的方法把生铁中炭的含量降低，杂质除掉。炭和杂质被氧化后有的成为气体冒出来，有的变成渣子，从铁中分出来，结果炼出了机械性能很好的钢。钢的种类很多，如果按照成分来分，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炭钢和合金钢。炭钢以铁和炭为主要部分。此外还有少数其他成分。如锰、锡、磷等等。把钢中炭的成分改变一下，就能得到容易切削和弯曲但不易折断的软钢，或是非常硬的钢，或是可以切削弯曲但又很硬的钢。如果在钢中掺入锰、锡、铬、镍、钼、钒、钨等元素，就成合金钢。各种合金元素对钢的性质有不同的影响。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

① 《千方百计增产生铁》，1959年3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

② 冶金部：《提高钢铁质量是当前首要任务》，1959年5月14日《人民日报》第1版。

用处及要求配制各种钢号，如结构钢、工具钢、滚珠轴承钢、不锈钢、耐酸钢、高温钢、磁钢、变压器钢等等①。至此我们有了好铁，又有了好钢，第一个矛盾解决了，也就是主要矛盾解决了。造成第一个对立的统一。

第二个对立的统一——一快一慢的统一

有了好铁，又有了好钢，我们还要把它轧成各种类型的钢材，如钢板、钢丝、钢梁、钢管等等，于是需要用锤锻，压轧等方法制成各种钢材。经过锻轧后，钢就更加致密，性质更好。所谓“千锤百炼”，根据就在此。后再把各种钢材交给机械部门，滚珠轴承部门等等。要他们把各种钢材制成机器、机械、钢轨、桥梁、滚珠轴承等等。现在问题就来了。铁已炼成钢，如何把钢轧成各种类型的钢材？我们的轧钢设备远远不能满足轧钢的需要，这不仅要充分发挥现有轧钢的能力，还要创造各种快速轧钢和简易轧钢的办法，就是要赶制大大小小的轧钢机。

不仅轧钢设备要赶上去，其余的重型设备也要赶上去。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之间一定要有一个适当的比例。但这个比例在大跃进中不易保持，很容易打破，因为“机械工业建设比较钢铁工业建设，相对地讲，来得快一些，也比较容易些。钢铁工业的投资大，建设时间长，需要重型设备多，涉及的面广，工程复杂。比如建设一个一百万吨的钢铁厂，从开始勘探设计到建成要五、六年的时间，它不仅有地质勘探工作、矿山、选矿、烧结、耐火材料、焦炭、化工、炼钢铁、炼钢、轧钢等主要生产部门的建设；而且有交通运输、水电、瓦斯、蒸气、机修等辅助服务部门约二十来个单位的建设。而机械工业，却沒有地质矿山等单位，设备安装比较简单。建成一个年产二千台机床的制造厂，只需一年左右；建成一个三万吨重型机械厂也只需要二年左右的时

① 王千一：《从铁矿石到钢材》，1958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第三版。

间……。① 因此一快一慢，把旧平衡打破，平衡变为不平衡。为了保证今年更大跃进的胜利实现，必须首先使关系全局的钢、铁、钢材和煤炭首先迅速地跃上去，力增产量日日上升，旬旬高产，使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

第三个对立的统一

钢铁工业发展了，钢铁的质量也提高了，轧钢设备和其它重要设备也增设了，钢材的产量也多了，促进了机械工业、电气工业、化学工业等等的发展。机电工业的发展，需要有大量的齿轮。齿轮是机器传动装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差不多所有的机器都要有齿轮。由于它在机械工业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人们常常用齿轮的图案作为机电工业的标志。过去，齿轮的生产通常都采用切削加工的方法，用铣床慢慢地铣，生产效率很低。大跃进以来，机电工业的任务加重，要生产更多的机器，就要生产更多的齿轮；要生产更多的齿轮，就需要更多的齿轮加工机床，而目前我国的机床数量远远不能满足这方面的需要。这里就暴露了第三个矛盾。怎样来解决这个矛盾，使达成第三个对立的统一呢？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采用新的技术，以与旧的技术作斗争，用少量的机床，生产大量的产品。旧技术是用切削加工的方法来制造齿轮，新技术（即热轧齿轮）是用压力加工的方法来制造齿轮；以新代旧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十倍至四十倍②，因而能够解决机床不足的困难。用很少的机床生产大批的齿轮，并节约切削工具和动力的消耗。而且，由于齿轮是直接轧出来的，金属纤维没有被切断，表面层较细密，机械性能大大提高，相应地提高了齿轮的使用寿命。此外，由于不需经过切削加工，还可以节约金属材料。

热轧齿轮的试轧方法就是用铸、锻等热加工的方法来代替冷加工（切削加工）的方法，从而缩短生产过程，提高生产效率，

① 《以钢为纲全面跃进》1959年3月6日《人民日报》第7版。

② 《热轧造齿轮功效大十倍》，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第2版。

这是机械工业的发展趋势。这是第三个矛盾的暴露和解决，作成第三个对立的统一。

第四个对立的统一

但是去年在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中，遇到了另一个薄弱环节，这就是铜和铝的产量，远远不能满足机械制造工业和电力工业的需要，所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58年9月25日发出高速度发展铜、铝工业的指示，并指出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必将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仅仅“要满足1959年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的需要，就必需把铜铝的产量提高到几倍于1958年的产量”。所以在大搞钢铁机械的同时，也必须强调铜、铝的生产。这是因为铜、铝都是良好的导电体，具有耐多种化学品的侵蚀和易于加工的特点，可与其他金属构成数以千计的性能优良的合金，因而它们广泛地被应用在各个工业部门。正因为它们的性能导电率高，制造电机电线是离不了铜、铝的。如增加一万瓩电，就需要导电的铜、铝八百吨[①]。在发展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军事机械制造工业，也都需要铜、铝。制造一架飞机所用的金属材料,其中铜、铝及其合金就要占70%到80%[②]；制造各种枪炮和军械也都不能缺少铜、铝。制造一台拖拉机就需要三十一公斤铜、铝，制造一台解放牌汽车就需要二十一公斤铜、铝，其他如制造船只，各种机床设备以及日用器皿等，都要消耗大量的铜和铝。只有钢铁，沒有铜、铝，钢铁还是钢铁，并不能变成发电设备、汽车和拖拉机，更不能把电力输送到需要的地方去。总而言之，沒有铜、铝的生产，就沒有国防工业，根本不能把钢铁变成各种机器和设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铜、铝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在生产大跃进中，遇到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铜、铝不足，如果铜、铝的生产跟不上去，就会严重地影响

① 1958年9月26日《黑龙江日报》社论。
② 欧玉林：《瞧铜铝工业展翅高飞》，《计划经济》1958年第11期。

电力工业和机械工业的顺利发展，钢铁工业的发展也将受到阻碍。因此发展铜、铝的生产，也是当前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在电气工业方面，铝的导电率虽然只及铜的60%，但是比重轻；同重量时，铝制品比铜更粗大，导电量就可增加，可以补偿导电率低的缺点。因此铝电缆可以广泛用在高压线上。此外从资源合理利用上看，也有必要以铝补铜。郑志成先生说："在地壳上铝的贮藏量比铜多745倍"。去年6、7月间浙江省发现了世界罕见的大铜矿，据初步估计，矿区的远景储量达一千多万吨，铝与铜的比例虽然因此要小于745倍，但铝的远景储量达十亿吨左右，况每吨铝矿石含纯铝20%左右，铜矿石每吨含铜仅1%左右，相差约二十倍①。而炼铝工业的矿石开采，运输，初炼等方面比炼铜工业的费用等都少得多。因此在廉价电力条件下，铝的生产成本也低于铜。这说明以铝补铜可以节约贵重稀有的铜矿资源，同时也可以降低产品的成本。这是解决只有钢铁沒有铜铝的矛盾，作成第四个对立的统一。

第五个对立的统一

从上述可知机械工业等的发展不仅要求有大量的钢，而且也要求有大量的铝。但是我国炼铝工业的基础非常薄弱，虽原因不一而足，而技术力量的缺乏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我们在团团转的旅程中暴露了这个困难，但我们不能因为有困难而才裹足不前，必设法使炼铝工业随钢铁工业之后迅速跟上去。

但炼铝工业用什么方法来推进呢？有些人还沒有破除迷信，认为炼铝的技术比炼钢炼铁复杂得多，不炼铝则已，要炼非搞大的洋的不可。大的炼铝厂当然有它的优点，生产量大，设备精巧，技术又高，我国正在建设这样大的工厂。但它也有它的缺点。投资大，时间长，不及等待；而许多现代化的设备也感到缺

① 郑志成：《水力发电与炼铝工业》，《水力发电》杂志，1958年2月号。

乏，不但不能适应目前对铝的急迫需要，而且也非地方财力所能及。北京电解铝厂式的小型炼铝厂的建设，证明用土洋结合的方法来办炼铝厂，也可以救一时之急。这真是一个发展炼铝工业的途径，但亦不无问题。

我们要炼铝，在今日的技术水平上来讲，只有采取电解的方法，电解是很耗电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电源问题。“一个年产两万五千吨铝的炼铝厂需电五万八千瓩”①。当前电力供应十分紧张的时候，如何为我们的炼铝厂寻找充分电源呢？这又是一个薄弱的环节的暴露（第五个）。电力原来是我国重工业中一个比较薄弱环节，电力工业正在努力向前追赶。

为加强这个薄弱环节，就是为解决这个矛盾，水利水电建设总局规划处建议把冶金部正在推广的小型土法炼铝厂和农村中正在普遍兴建的中小型水电站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使制铝工业有可靠的电源得以迅速发展。在电力工业来说，充分利用中小型水电站来解决制铝工业的用电问题可以相当地减轻对大电网供电的压力。

但要发电，在多数场合离不了水利，现在我们从电力踏进了水利的界线。去冬今春，全国共完成中小型水利工程三千余处，如果加以充分利用，可以发电一百万瓩②。但是现在只利用了十万瓩，所以潜力很大。这是第五个矛盾的解决，作成第五个对立的统一。

第六个对立的统一

但在上面为什么要说在廉价电力条件下炼铝的成本低于钢呢？这是因为炼铝工业是大耗电工业之一。大耗电工业是指工业生产过程消耗大量的电能、消耗少量热能的工业。大耗电工业是

---

① 《力争快速发展炼铝工业》，1958年9月26日《人民日报》第2版。

② 水利水电建设总局规划处：《把小铝厂和中小水电站结合起来》，195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第2版。

从旧的工业部门中分化出来的现代化、电气化的工业，这种工业大都采用电炉冶炼或电解过程来制造产品。在黑色冶金方面，主要是各种优质合金钢、铁合金；在有色冶金方面，主要是轻金属系统的铝、镁、钛以及电解钢[①]，在化学工业方面主要是化学肥料和合成纤维。一个十万吨的炼铝厂，大约需要三十万至四十万瓩的廉价电力。这样的大量廉价电力，只有大水电站有供给的能力。因此只有在大量发展成本低廉的水电的条件下，才能促进耗电工业的发展。从铝氧电解中提取金属铝这一过程，是属于电解化学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电力除了作为一般动力需用之外，还大量消耗在电解化学过程中。炼铝工业和电力工业的密切关系，也表现在这一过程中[②]。

因此要生产大量的铝，一定要首先创造或获得三个条件：（一）要供给大量的电力；（二）要供给廉价的电力；（三）要接近原料基地。最理想的条件是炼铝厂的布置既靠近廉价电力基地，又接近铝凡矿地。这样的理想条件在什么地区可以得到呢？我们要大量的铝，但沒有廉价的电，这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呢？若再要把电力基地和铝凡土矿地结合在一起，这个矛盾岂不更大？

我们认为只有在综合利用的水利条件下，可以找到大量的廉价电力。最好的例子是综合利用黄河水利的方针，因为这个方针包括防洪、灌溉、发电、通航、养鱼、栽培经济作物、供给工业用水等等。治黄的最主要目的是防洪，要控制黄河，就是要改变黄河的面貌，不再让它为害于人民，反要利用它造福于人民。

过去黄河沒给人民造福，却一直是人民的祸害，它给两岸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害。人们形容黄河灾害说："千谷万沟输泥沙，滚滚浊流出山峡，上面冲刷下面淤，水患灾害祸万家。"这个来自"天上"的洪流，一到伏汛就横冲直撞泛滥成灾。三千年来在下

① 江英：《水力发电和大耗电工业》，《水力发电》杂志，1958年10月号。
② 郑志成：《水力发电与炼铝工业》。

游发生泛滥决口达一千五百来次，其中重要改道二十六次，平均每二年就决口一次，每次决口不知有多少人的生命财产破洪水吃掉，造成千百万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惨处境。

过去我们的祖先对于为害巨大的黄河，只能凭一次又一次的惨痛教训，作出一些防御工作；如何从根本上控制黄河，我们的祖先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水往低处流”是一个客观规律，黄河在“向低处流”的途中，总是隔若干年要泛滥成一次灾，这是客观的事实。我们的祖先，在这个客观规律和这个客观事实面前，觉得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的，只能伏于它们面前听天由命，任其摆布。他们说：“要想黄河清只有日头从西方出来”，认为治好黄河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他们根本不想凭主观能动性，利用“水往低处流”这个规律来治理黄河。因此黄河流过了多少封建朝代，任凭它逞凶了几千年，可是今天我们能够凭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利用“水向低流”这个规律来控制黄河，要令黄水变清水，要令它伏伏贴贴地顺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人民造福。

“水往低处流”是一个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的意志不能改变它，人们无法“引水倒流”。过去我们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于水利工程上，也不能“引水倒流”，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规律来“引水上山”，这是另一回事。“引水上山”是事实，其所以能成事实，正是因为下游的山坡比上游河床的标高还要低。“引水上山”不仅沒有否定“水往低处流”的这个客观规律，而且恰恰相反，认眞地利用了这个客观规律。因为我们懂得这个规律就能提高水位引水上山，改变山区的干旱面貌，使荒山变为良田。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在这里起了作用，使这个客观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筑堤兴水利，建筑发电站，都是利用这个客观规律，改进人民幸福的最好例子。因此我们不能匍伏于客观规律面前束手无策，我们要凭主观能动性来利用客观规律。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从防洪中所得到的利益，已难以估计，至于发电乃是次要的目的，因此电价可以低廉，且观乎日后发电

能力之大，廉价电力的供应更不成问题。

最近三门峡防洪工程已进入完成阶段，黄河的破坏力已经大大地受到制约，不仅在过去的八九年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水灾，在不久的将来将以水力发电的方式大大造福于人民。在水位不同的各个地方将要建设四十六个大壩，当这些壩完成以后，洪水可以完全控制，灌溉面积将扩大到一亿二千万亩的土地，每年可以发电一一〇〇万瓩，以后还可以获得二亿三百万瓩的电力，加上杨子江的发电潜力有二亿瓩，几乎所有工业地区和人口稠密的地区都将处于水力发电的范围之內了。在“江”与“河”的两岸，由于水运便利和工业用水量充足，势必出现大的工业网，否则无法利用这样大的电力，岂不造成浪费？

我们在上面说过要生产大量的铝，一定要创造或获得三个条件，其中一个是炼铝厂的布置既要靠近廉价的电力基地，又要接近铝凡土矿地。这是最理想的。凑巧在三门峡地区，既有黄河第一期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巨大而廉价的电源，又有一个最大的铝凡土矿，这就是建立炼铝联合企业最理想的地点。但铝凡土矿与动力资源分布往往不在一地。在这种情况下，炼铝工业一般是趋向电力基地。这是由于电力基地的建设比铝凡土矿开采要复杂，投资也大，同时长距离输送炼铝厂需用的大量电力比输送铝氧（加上包装费）的费用要大①。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广阔的高原，我国某些著名河流发源于高到海拔四千到五千公尺的高原上。因此在建立四十六座大壩的各个地方水位的落差比较美国的大河大得多，我国的水力发电潜力的确是非常之大。我参观了三门峡水利工程，也参观了山东境内的位山枢纽工程，这是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中四十六个阶梯中一个重要枢纽工程。所谓阶梯就是在河中修起一道栏河大壩，这个工程是山东省治理和开发黄河的一个关键

① 郑志成：《水力发电与炼铝工业》。

性的大型工程。工程完成以后，还可以恢复南北大运河的航行，使山东省内河道运输四通八达，组成省内交通运输网。运河是我国千多年来沟通南北物资交流的重要航路，它对我国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光辉的历史作用。自黄河改道后，山东境内的一段运河因缺水淤塞而断航，从此中断了南北的水路运输。位山枢纽工程完成后就可使停航六十余年三千余里长的大运河全线重新通航，可使二千吨拖输北京津，南达沪杭，同时并开辟了东西的河道运输，七百吨拖输可从兰州直达渤海，这样东西南北打成一片了。且位山枢纽工程完成后，由于有了足够的水源，还要建设三万八千瓩的水力发电站和其它电站联系起来，组成一个电力网来促进工农业的发展和供应城乡照明用电。这样看来，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散布着象蜘蛛网那样的水利网、电力网、交通运输网和工业网。为了这些网，不知要用多少钢材和铜铝来制造各式各样的机器和设备，虽然这样做贯彻了综合利用河流的方针。但对炼钢厂、炼铜炼铝厂、机器厂和电器设备厂来说：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第七个对立的统一

从上所述，可以推知要为这许多网制造机器和设备，不知要用多少钢材和铜铝，因此要使全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在今后的若干年内是有困难的。象上海这样一个城市机械化的程度尚且不高，根据初步统计在全市工厂企业的九十万工人中，从事机械化操作的仅占27%，半机械化操作的占36%，手工操作的还占37%。在冶金系统机械化操作的只占15%，半机械化操作的占25%，手工操作的占60%①。上海尚且如此，何况农村？因此是有困难的，况要争取更快地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任务，不仅需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有适合我国需要的农业机器，有了

① 柯庆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红旗》杂志，1959年第9期。

这种机器我们才能大量制造，推广和使用，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虽然到今年年底我们将拥有五万五千台拖拉机（折合十五马力的标准台，内有进口数）。十万部机引农具，四千五百台谷物联合收割机，七千五百台机动脱谷机，二百八十万马力排灌机械，二十五万瓩农村电站，一万三千辆载重汽车。虽然到今年年底农业拥有的全部机械动力预计将达五百二十万马力，化学肥料的使用量由1953年的五十九万二千吨增加到1958年的二百七十万八千吨；但是这些农业机械“同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前景比较起来，当然还是很少的”，“大约只能保证耕作上的4%左右的机耕面积，只能保证水利灌溉10%左右机械灌溉面积”①。

因此现在全国虽已开展了小麦亩产千斤运动，需要使用高效率的小麦收割机，但这种收割机还沒有大量生产，又如去年秋季在我国不少地区出现了薯类的大面积丰收，有亩产数万斤的更需要使用效率高质量好的薯类挖掘机来收获薯类，但直到现在合适的收获机还沒有制成。又如去年棉花的丰收是空前的，因农民故意强调劳动力不足，最后一部分棉花沒有收起，遭到损失，也急迫需要一种棉花收获机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但这样的收获机目前还沒有出现。而且，因为我国地区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在地形方面有平原、山区、高原、丘陵、沼泽地；在土地利用方面有水田、旱田、坡地、梯田；在耕作技术方面，有平作、壠作、畦作、套作。农作物种类繁多，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栽培方法。这就规定了我国农业机械型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去年农业大跃进，在耕作技术上总结出了“八字宪法”对农业机械的要求就更高了②。可惜现在的农业机电工业还不能赶上我国农业生产高速发展的需要，而且在每件农业机械大量推广以前一定还要进行切实的鉴定工作，考核它的适应性、经济性和可靠性后方能投入生产，大量制造，不然的话，在推广中容易造成损失。因此实行农业机

① 王光伟：《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持》，《红旗》杂志，1959年第16期。
② 《加强工具改革运动中的科学研究工作》，1959年4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

械化和电气化还需要一些时间，现在需做准备工作，发动全国性的工具改革运动，为日后的机械化电气化打好基础。今年4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要求各地农业机械科学研究机关的研究工作必须与群众性的工具改革运动密切结合就是为此。事实证明技术革命或工具改革，不仅是当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条根本措施，也是逐步地多快好省地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一条根本途径。1959年大抓工具改革正是为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积极准备条件，一定要通过工具改革才能实现半机械化、机械化、电气化。不仅铜铝工业的产量还不能满足机电工业的需要，即在钢铁生产还沒有达到一定水平之前，也就必须大搞工具改革，大搞自然动力，实现农业的半机械化，然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这是我国的具体条件决定的。那些认为工具改革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坐待机械化的看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在已经改革的农具中有很多适合"八字宪法"要求的，为过去所沒有的好农具。例如为了达到深耕目的，创造了电力机力绳索牵引机，机引综合深耕犁，各种绞关深耕犁，各种畜力深耕犁；原来的深耕只有三寸左右，如加深到一尺左右，不仅原来的旧式犁达不到这个要求，就连新式农具中的双轮双铧犁、双轮单铧犁也达不到这个要求，于是就出现了以上各种深耕犁和绳索牵引机。为了大量施肥，创造了积肥制肥施肥的工具和营养钵制造机。为了适时灌溉，创造了內燃水泵水轮泵；为了加速水稻插秧，创造了各种插秧机等等。凡此种种"都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新的型号。特别是绳索牵引机的大量推广，既可综合利用水、风、火、气、机、电各种能源作动力，又可综合利用于耕地插秧，加工和水利施工等各项作业，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找到了一项捷径"①。同时应该发展脚踏手摇和畜力牵引的技术简单的小型农具，这种农具不仅技术简单，使用方便，操作容易，而且取材和制造也都容易，价钱亦便宜，不仅

① 农业部工具改革办公室《工具改革》一文，1959年5月9日《人民日报》。

适合当前农村的技术水平，而且也适合目前农村的经济水平。毫无疑义工具改革保证完成了各项增产措施，提高了产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且为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开辟了道路。这是第七个矛盾的解决，形成第七个对立的统一。

第八个对立的统一——解决农业生产与田间运输工具的矛盾——田间肥料纲

以上所述的一般农具改革，虽已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田间运输工具仍不能满足农业上的需要。在我去年五个月的视察中，在农村田间亲眼看到了毛竹或木板制的轨道和地面运输的车子化，一部分车子也已滚珠轴承化，不过运输中占比重最大的是肥料，一般说来，肩挑、人抬、背负还是运输肥料最普遍的方法。以一亩地施三万斤肥料计算，如果用肩挑、背负的话，就要挑三百次或负三百次，走三百个来回，才能把积好的肥送到田里去。全国有十几亿亩耕地，如果都这样运肥的话，那要耗费多少劳动力啊！但肥料不能不运，农谚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但要运就要花这许多的劳动力，因而就觉得劳动力不够。其实，并非劳动力不够，乃是运输方法太粗陋，劳动生产率太低。这又是一个矛盾的暴露（第八个）。

地方领导者仔细一想，不是劳动力不够，乃是运输方法不对，于是就本敢想敢做的方针，想出就地积肥的办法，可以大大节省劳动力，也可以解决田间运输工具不足的矛盾。积肥、造肥、运肥中所需要的劳动力是不少的，每年要占用40%的劳动力，其中用于运肥的又占了许多。当然，为了节省劳动力，解决运送工具不足的矛盾，最好增产化肥，化肥比农家肥有许多优点。化肥肥分高，肥效化，用量少，而且是用空气、水、煤和硫铁矿、磷灰石等作原料，不象农家肥那样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可以一年到头大量生产。况用大量化肥支援农业已经是农业的迫切要求，因为使用化学肥料不仅可以迅速地帮助农业提高产量，并且可大大

地节省农业劳动力。一般说来，一斤化肥可以增产粮食三斤，因此，有许多地区要求化学肥料比要求农业机械更为迫切。许多地区的资料说明，积肥、造肥、运肥使用的劳动力约为农业劳动力的40%，使用化学肥料就可以大大缓和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并且可腾出一部分劳动力去从事其它农事活动，有利于农、林、牧、副、渔的综合利用。但话又要说回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农家肥料还是我国农业肥料的主要来源，必须发动农民积极积肥，提倡就地取材，就地制，就地使用的方法，如在田头地边挖坑制肥，可以随时割草采青，随时使用。这种肥料的肥力，要比今日所用的土杂肥大二三倍。阴历七、八两月是割青制肥的好时机。俗语说："见青就是肥"。这些东西，在八月里生长旺盛，无论北方、南方、山区、平原、丘陵、湖滨，到处都有。这些植物和氮、磷、钾等营养元素，施在土壤中，既能增加多种有效肥分，还能改善土壤质地，增加土壤保肥、保水、保温的能力。肥不仅数量大而且肥效高。这是因为夏季气温高，雨水多，温度大，肥料容易发酵腐热，因此，俗语说："七月草是金，八月草是银（七月、八月指农历），九月草渐老，十月草不好"。意思就是七月、八月青枝野草，既多又嫩，加上气温高，腐烂快，沤成的肥料，肥效特高[1]。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有些山青、野草也是牲畜的饲料。牲畜不爱吃晒干的饲料，但很爱吃青贮的饲料。拿干玉米稽来说，牛只吃一半；但是青贮的玉米稽，大体可以吃完，同时一般要比晒干的多保10%到15%的养料[2]，而且容易消化，牲畜吃了爱上膘，这样不但增加了有机肥料，而且帮助解决了运输问题，可以尽量以畜力代替肩挑、人抬、背负笨重劳动。

此外，过去由于个体经济受条件限制，人们不得不把人粪积在家里、街上、村旁，要用时就须以肩挑、人抬、背负的方法运

① 《抓紧割青沤肥的好时机》，1959年8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

② 《大搞青贮饲料》，1959年8月9日《人民日报》第7版。

送至田间，现在各省都有田间肥料网[1]，不但节约了好多笨重的劳动，而且还可以改善卫生环境。过去，在家里、街上、村旁积肥，加上管理又不尽合理，一到夏天，蝇蛆孳生，疾病传染。公社化以后，条件变了，全国农村已开始建成医药卫生保健网[2]。直接增进广大农民身体的健康，间接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据卫生部1959年上半年初步统计，每个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医院）一个或几个，生产大队建立了卫生所（保健站）、产院，多数生产队自然村，设有卫生室。与公社化前相比，公社的医院和简易床位增加约三倍，产院增加约八倍，简易产床增加约十倍以上。此外，人民公社还有为数更多的半脱离生产、不脱离生产的保健员、接生员。我国农村以人民公社为中心的卫生工作网已经在田间肥料网建成之后，基本形成，农村的卫生工作面貌大有改观。过去农民有小病很难就医，大病非到城里看不行，常常要走几十里、上百里，或更远的路，既多花钱，又不及时，更耽误了生产时间。现在这些已成过去的了。况公社的医务人员已经不单在医院里进行医疗工作，更多的是走出医院，深入群众，经常进行巡迴医疗，且深入田间，有病看病，无病就在田间劳动，或宣传卫生知识，进行劳动保护工作。这些都是为农民身体健康，消除疾病提供了初步保证。

现在让我们回到肥料上来，地方领导者不仅动员农民建立了人粪肥料网，而且还主张畜圈搬家，实行三圈（牛圈、猪圈、羊圈）到田。过去在积肥、制肥、施肥方面工作实在做得不少，这对于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1959年的夏季大丰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肥料增长的速度还落在农业发展的后面。1959年夏种中无论基肥追肥都比较紧张。主要原因不在于肥料的数量。肥效不高，肥力不大，是普遍的现象。要提高肥力和肥效，应与开展多种经济，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结合起来。养猪、养

① 《陕西建田间肥料网》，1959年2月19日《人民日报》第三版。

② 载1959年3月24日《人民日报》第6版。

羊、养牛马是提高肥力和肥效最基本方法。有的人认为，要发展五业就要增加投资和多花劳动力。但实际上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过去把资金劳力完全用在农业上，显然是不够合理的，理应提出一部分摊在林、牧、副、渔上，何况用在林、牧、副、渔的劳和资的结果也直接间接反映到农业上来。譬如牧业不仅可以供应人民以肉食、蛋品、乳品、皮毛等生活用品，也可以提供大量的畜力和肥料。有畜力就可以节省人力；有猪肥、牛肥、羊肥就可以提供肥效很高的畜肥，还可以使农民和干部懂得，不要再去使用那种耗费了很多的劳动力，但沒有积起很多肥力，甚至减少或损失了肥分的积肥和造肥的方法。无论如何，有了大量的优质肥料，就可以节省很多积肥造肥和运肥的劳动力，这正是农业所迫切需要的。因此贯彻实行公养和私养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经济原则的。

总之，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田头积肥、沤肥和熏肥，大大地提高了积肥、造肥、运肥、施肥的效率，节约了大量的劳动力，解决了运输工具不足的困难。这是第八个矛盾的解决，作成第八个对立的统一。

第九个对立的统一

1. 速度与比例的统一

但积肥、造肥、施肥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要使"八字宪法"中其余七项措施与之相适应。不然的话，就是在田间积了很多的好肥，也不能达到高产。八项措施之间，离开了正确的比例关系而要求高速度发展，必然使经济失调，高速度也因此不能保持。高速度，不能理解为某一项措施（如肥料）孤立地飞快发展，而是整个"八字宪法"的八项措施均衡地高速度发展，这就需要保持八项措施间适当的比例。所以，在安排八项措施比例关系的时候，必须服从高速度的要求，而在某一项措施孤立地高速度发展的时候，也要维持八项措施间的比例关系。

先谈水。必须有足够的水，多施肥才有用。如果沒有足够的水利设备，遇到旱灾，或者水灾，即有更多更好的肥料，亦不能希望增产。现有的土壤里，水的蕴藏量，一般是不足的，瘠薄的土地就更差，从而不能满足农作物高产的需要，因此必须加强保证农作物"喝足"的工作。过去，我们在水利方面做的工作虽不少，但实际上离开全国水利化的目标还很远，不但新的水利工程即须抓起来，即已经兴修起来的水利，有的还缺少渠道，有的还沒有平整土地，所以有了水，仍流不到田里去[1]。但要筑渠道，要平整土地，也非改良工具不可，而且要保证明年夏收作物不受干旱或水涝的威胁。这两项工作要迅速完成才好。此外，沒有水利工程，或水利工程不够的地方，要加紧兴修。

开渠道，平土地固要用改良工具，与旱灾斗争，更非用改良工具不可。但这些工具的数量极其有限。在今年的抗旱斗争中，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提水工具。各地机械工业部门虽然生产了大量的抽水机供应农村，农业部也从沒有旱象的省市抽借一批抽水机支援受旱地区，这无疑对抗旱斗争有很大帮助，但抽调的数量还是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抗旱的需要，而且调运安装这些抽水机械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可能马上发挥作用。因此，要解决抗旱的问题，不得不本着以土为主，以洋为辅，土洋并举的原则，从多方面来解决。湖北江陵县马山人民公社马南生产队原来每天用二十部水车车水，还赶不上需要，后来在水车上安上了滚珠轴承，节省了八部水车，三十六个劳力。灌田效率，却从每天灌溉十二亩，提高到六十亩[2]。此外，我们认为在千军万马上阵进行紧急抢救的情况下，应该注意提高灌溉技术，强调合理用水，采用沟灌、畦灌、隔沟灌、浅水勤灌等节省水量的办法。

关于防治病虫害，我在这里只能说许多灾害常常有着密切联系的，例如旱了容易生虫，涝了易受病虫害。今年很多地方一面

① 邓子恢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② 《把抗旱斗争进行到底》，195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社论。

发生旱灾一面又发生虫灾。最好在抗旱期间，同时注意防治病虫害，不然的话，从旱灾中抢救出来的粮食，又会被虫吃掉。但是，除虫又苦于除虫工具和机械的缺少，又加以化学农药又很少，要消灭各种虫害，固有困难，但是我们有的是土农药和土办法，它们的效率虽不及洋农药和洋办法，然对于一般灾害，亦能奏效。在虫灾严重的地区，如面积很大，密度很稠，当然可以由中央用飞机和机械防治，面积小，密度稀，用其他办法也可以解决问题。土农药和土办法是我们祖先世世代代所采用的，在若干方面一定有它们的优越性，不但可以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使用，也可以节省生产资金。况有些土农药，不仅可以治虫，也可以做肥料①，使用起来比较安全，制造起来比较简单，在现代化农业机械和化学农药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实行土洋结合的办法，不能不认为最适当的办法。

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也是增产措施之一，今年的小麦能够在去年的基础上提高10%到30%，深耕和改良土壤所起的作用很大。但不管土壤的厚薄，一律要深耕到一尺五寸，是沒有科学根据的。遇有土层太薄的地方，非加工培厚不宜深耕。据今年7月2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大约深耕七寸，八寸，和一尺左右是比较合理的。湖南郴州市郊公社的两个生产队，一个把全部旱稻田深翻七至九寸，比1958年深三至四寸，并且全是使用套犁的深耕办法，沒有打乱土层；另一生产队也做到了合理密植，但在深翻方面却做得不够，而且是采用一次犁的办法，打乱了土层，把黄泥底都翻到外面来了。结果只有减产。

关于密植，我所讲的是合理密植，一面要运用主观能动作用，一面也要服从客观规律；如果客观条件不许可，专凭胡思乱想来推行无限度的密植，是注定要失败的。合理密植的用意就是要使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通过根部从土壤中吸收肥分和水分，通过叶

① 《一定能够战胜虫灾》，1959年8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

部从空气中吸收其他养分，并在阳光照射下进行“光合作用”，制成植物性有机物质，才能促进作物的生长。在大地上到处都有空气和阳光，但肥分和水分则蕴藏在土壤里。要尽可能地利用土壤里的肥分水分和空中无穷无尽的空气和阳光，必须在同一面积上种上比较多的植株。如果种植过密，株行距过小，使枝叶不通风，不透光，无法起“光合作用”，根系互相打架，使农作物不能正常生长，因此不能增产，甚至减产。反之，如果种植过稀，植株过少，株行距过大，致使可能利用的肥分、水分、空气和阳光，白白地丢掉，万分可惜。因此过密过稀都是不合理的。

良种关系于增产是人所共知的，但好种不会永远是好种。据浙江一位研究种子有数的土专家的意见，良种劣种经常互相转化，要不断培育，不断淘汰①。因此，我们于选种时要多选几种，以备一种品种，发生退化的时候，不致影响整个产量。“大家知道碧蚂一号是一种优良品种，但近一二年来，在陕西关中地区河南中南部已严重地丧失了它抵抗锈病的能力”，此外，品种多一些，不致使收获期挤在一个时间内。

讲到管，主要是田间管理，而田间管理主要是追肥，沒有足够的优质肥料，就管理不好。副业生产的许多项目和肥料问题有密切关系。猪圈、羊圈、牛圈、鸡圈、鸭棚等等的修建，也要考虑到积肥、造肥、运肥、施肥的方便。总而言之，“八字宪法”中的八项措施，好象奏乐中的锣鼓笙管弦，要用到恰恰合拍，才能奏出一部动人心弦的优美歌曲。水稻什么时候用水，什么时候用肥，用多少肥，用什么肥，什么时候防霜，防病虫害，什么时候锄草等等，都要仔细了解水稻生长情况。

2. 贯彻执行“八字宪法”的结果

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先生在《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②中指出“八个字”（指八字宪法）是毛主席总结了农民群众增产措施的

---

① 杨匡保：《实践是科学之母》，1958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第7版。

② 载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第3版。

经验而提出的“八字宪法”。1958年的实践证明，哪里认眞贯彻执行了这个“宪法”，哪里的农业生产的增长幅度就比较大，哪里贯彻执行这个“宪法”比较差，哪里的增产比较就很小，或者沒有增产；个别的县、乡、或社甚至减了产。当然“八字宪法”的每一个字的具体做法，应该因地制宜，不同的作物和不同的品种也应该有不同的做法，不是千篇一律的。但是做法尽管不同，总的来说，必须认眞执行这个“八字宪法”。今年在继续贯彻执行“八字宪法”的情况下，早稻获得了丰收。加以农业生产与多种经济结合起来，收获量更大了。比如柑桔是经济价值较高的作物，在南方很多地方具备种柑桔的各种条件，群众有种植的习惯和丰富的经验，而粮食生产与柑桔生产在季节上又可以穿插进行，这样在利用“八字宪法”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发展柑桔生产，就可以充分利用有利的自然条件，可以利用群众的生产经验，可以使男女老少四季八节都有农活可做，而且柑桔生产可以为粮食生产提供大量的资金。若再把粮食生产、柑桔生产、畜牧和积肥四者结合起来，则利益更不止于此。在柑桔园里放鹅放鸡，既积了肥，又捉了虫，帮助贯彻执行“八字宪法”中的“肥”“防”（防治病虫害）和“管”。在柑园、菜田里放蜂，既酿了蜜，又传播了花粉，使“柑桔”经济作物之上又产生了新的经济作物。而且既可以在大柑园里放鹅放鸡，在小柑园里套种蔬菜，则何尝不可以在河里养鱼种菱，在河面上攀藤结瓜，在田头旁，坟边河岸种三、五株或七、八株作物。这样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一作间一作、一熟接一熟，收入就十分可观。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浙江省黄岩县澄江人民公社汇江生产队，1958年由于粮食、柑桔、畜牧、副业各项生产获得全面大跃进，眞正做到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管”。每戶社员平均纯收入高达将近九百元之多①。1959年早稻的丰产赶过了1958年，水果的培植情况也比

---

①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浙江日报》社论。

1958年好。在五谷丰登的同时，又出现了六畜兴旺的局面，怎能不令人鼓舞呢！

又如山东五莲县是个贫瘠的山区，在1958年农业大跃进的基础上，1959年又获得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大丰收。获得这样的成绩，主要原因是解决了几个方面的矛盾，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农业生产与多种经济的矛盾，因为多种经济是一项多头多脑千家万户，它和农业生产经常为劳动力和时间发生争执，但一经全面安排，这个矛盾也就很圆满地解决了。解决的方法是把农业生产和多种经济统一起来，使之有机地配合。不同地段有不同的自然条件，有的适于种苹果，有的适于种药材，因此就可以有不同的发展重点，而这些重点又不是挤在一个时候的，只要紧紧掌握它们的季节性，通过小段计划来保证完成，以后再把不同的小段计划联系起来完成一个全年计划，这样县委就能够把劳力和时间安排得很具体。

各项生产分经常性和临时性两种。经常性的生产，如养猪、山林、园艺、窑货等等都有固定的专业队伍去经营；临时的生产，如植树、配种、防疫则全民动员。因此，牲畜饲养有专业队伍，防疫配种则全民动员，林业管理有专业队伍，植树则全民动员。此外，还有一种小宗的生产，很适于家庭经营，如采山药、编织、小家禽畜、拾草等等则划归社员个人经营。全县共有十六万男女整个劳动力，从中抽出四万名整半劳动力和两万名辅助劳动力去专门经营多种经济，但有必要的，可采用突击办法全力以赴，可以根据不同季节，抽机会，抓火候，掌握大忙大干，小忙大干，农闲全力以赴的精神来开展多种经济。这个县以往年年缺粮，1958年已经作到自给，1959年的情况更好，据1959年上半年的统计，多种经济的产值为一千二百八十多元，全县平均每人分得三十一元①。

---

① 虞星文：《农、林、牧、副、渔全面大丰收》，1959年8月7日《人民日报》第3版。作者为中共五莲县委第一书记。

以上两例显明地指出了在首先搞好重点生产（农业）的条件下，可以利用空余时间搞些多种经营。农业当然是重点，但重点不能代表一切。搞些副业，并不要耗费多少劳力，多少时间，多少土地，多少肥料，而且好处很多。水果除柑桔外，有的生产队还有葡萄、枇杷、桃子、梨子、梅子、石榴、蕉、藕等等。

多种经营品类繁多，除了水果、蔬菜、家禽、家畜、水产等大宗以外，还有冬笋、木耳、冬菇、海味等等各式各样的土特产品，这些土特产品的生产受着气候、土壤、水利等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內普遍种植和饲养。因此，不只是在目前仍需要接近城市的农村以多种商品性副食品和经济作物支援城市，并与城市交换日用品工业产品和生产资料，还需要地区之间进行物资交流，就是在将来也缺少不了。

第十个对立的统一——“土”和“洋”

谈论到此，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这就是贯彻执行“八字宪法”的结果，是大量的农产品和各种经济生产品。这样大的产品在那里加工呢？是不是先把全部产品运进城市加工而后又把加工后的成品从城市运回农村呢？现在的运输能力，无论短途或长途，都觉得紧张，若再加一个往返运输，不仅增加运输的困难，而且在经济上亦不合算。这又是一个矛盾。为解决这个矛盾，人民公社可以适当地办些小型的加工轻工业，而轻工业的原料又在人民公社自己的掌握中，大部分的消费又在农村，则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就地消费，岂不合乎经济核算吗？全国五亿农民，一年要穿二十亿双布鞋，要吃三千亿斤粮食，要修制农具，要制造杀虫药剂，要自烧大量的砖瓦，要自建小型的发电站，来做加工工作，要自制大量的食油，把油料加工工业尽量分散在广大农村，不仅有利于用油饼去供应农业。因此人民公社办些轻工业是势所必然，非任何力量所能阻挡。就是要外运的农产品，也可以改大量的外运原料为外运成品和半成品。这样据黑龙江的情况来

说，留在农村加工的土豆运量可以减少五、六倍，甜菜的运量可以减少七、八倍，草、稻的运量更可以大大减少，工省效宏，既节省了运费，又发展了农村工业，增加了公社的收入，三全其美。

“以钢为纲”，“全民办工业”，必须发动农民参加工业建设，沒有农民参加，也就无所谓全民性。但农民办工业，也只能从“小土群”开始，不可一下子就办大洋群或小洋群，离开了“小”和“土”，实际上就不能有农民参加工业的群众运动。有了这个“小土群”的基础，就有可能逐步地加以提高向“小洋群”后来向“大洋群”的方向发展。这种带有广泛群众性的“小土群”和具有一定技术装备城市的“小洋群”，及利用最新科学成就而装备起来的城市现代化大型企业相结合，就构成了我国“土洋并举”，“城乡动手”，大、中、小结合的全民工业的总体。不然的话，要在基础如此薄弱，时间如此短促的情况下，一跃而达到全面“大洋群”，那是肯定不可能的。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由土到洋，由小到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一切“土”的必然向“洋”的方向发展，一切“洋”的都是从“土”的基础上成长的。蒸气时代必然向电气时代发展，而电气是从蒸气的基础上成长的；电气时代必然向原子时代发展，而原子动力是从电气的基础上发展的。在今日电气固然是“洋”，但一旦原子动力普遍应用，原子动力是“洋”，而电气降为“土”的了。所以“土”与“洋”是永远会存在的。我们固不能满足于“小”与“土”，但我们亦不能否定“小”与“土”，因此，“小”与“土”，和“大”与“洋”是永远成为对立的两面。土洋并举是第十个对立的统一。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大”和“洋”。农业一方面用自己的产品扩大本身的生产，另一方面用大量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去供应工业。许多产品是重工业所不能缺少的生产资料，例如工业用布，工业用纸，工业用油、酒精、松节等等，都是重工业生产

离不开的原料，材料。缺少这些原料，材料，重工业生产的活动就发生困难。至于大中型轻工业原料、材料有70%到80%来自农业。纺织工业用的棉花、羊毛、蚕丝，以及麻纤维等等都是农业生产所供应；制糖工业用的甜菜、甘蔗，卷烟工业用的烤烟，酿造工业用的粮食、水果，造纸工业用的木材、竹子、芦苇、稻草等等，无一不是农业生产所供应。至于食品和罐头工业，制革工业等等，其原料亦非依靠农业不可。又如山区，可以发货生产，药材生产和木本油料如茶油、核桃、桐油、花椒等的生产，也可以发展松香、白腊、漆、五倍子等生产。近海沿湖地区，则可大力发展渔业生产。对虾、鱼类、海藻等水产品，不仅是食品工业很好的原料，也是炼油、制胶、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

不仅轻工业所需的原料取之于农业生产，而且可以把农产品来综合利用，使之具有更大的经济价值。例如甘蔗可以制糖，糖蜜可以作酒精，甘蔗渣在制取糖醛、本质素以后，还可以作成纸浆。糖醛、本质素是制造塑料的原料，纸浆是制造人造丝和造纸的原料。棉花可以用于纺织，棉短绒是硝酸纤维和醋酸纤维的原料。棉子可以榨油，可以作油饼，棉子壳可以制取糖醛、酒精、活性炭，棉秆可以作成纸浆。这些经济作用，一经综合利用，就可以身价十倍①。这样一面既可以促进工业的发展，一面又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

以上所述，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大中型工业的发展与农业的发展是结合在一起的；不仅结合在一起，而且相依为命。如各地人民公社很好地发展大中型轻工业所需的原料生产，不仅有利于轻工业，而且有利用人民公社本身和人民公社的社员。他们的收入将大大地增长，而社员的生活水平亦将逐步提高，这不能不影响人民公社的农业和小型工业。不但可以切实帮助公社和生产队解决资金、工具以及工业生产所必需的物资的具体问题，而且

---

① 彭涛：《建立我国的农业化学工业》，《红旗》杂志，一九五九年第3期。

可以由经济部门特别是商业部门及时供应公社以农业生产上必需的农药、肥料、工具及其他物资，并且通过订立合同，上门采购等便利群众和公社出售产品的各种办法按照优质优价的政策进行收购。

认真执行这种办法，受益者不仅轻工业和农业而已，即重工业的资金问题亦容易得到解决。举办轻工业是积累资金最多最快的方法。据建国以来的实际经验，举办一个纺织厂、卷烟厂以及别的轻工业工厂，多则一年二年，少则半年几个月，就可以把资金全部收回，换句话说，轻工业能够为重工业积累大量的资金。而积累资金最快的方法，莫过于对外贸易。此后在照顾到国内外双方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多出口成品，少出口原料，不仅可以多换取外汇，而且可以发挥国内轻工业的生产能力，增加资金积累。例如出口同样多的毛和出口同样多的毛织品相比较，后者比前者可多换取两倍到三倍以上的外汇[①]，出口同样多的皮革和出口同样多的皮革制品相比较，出口同样多的蚕丝和出口同样多的绸缎相比较，后者都可以比前者多换取外汇。单就浙江的丝绸来说，可以取得的外汇是很可观的。据姚顺甫代表在195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出口生丝一吨可以换回钢材九十二吨，从1950年到1954年的五年中全国可出口的丝绸（内销不计在内）可换回当时全国铁路的全部钢轨。以浙江一省来说，解放八年来丝绸产量如果全部出口，可换回钢材二百五十四万吨，可以铺设一百四十八条沪杭铁路。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为什么我国的丝绸销路这样好呢？因为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对丝绸的需要逐年有所增加。以苏联为例，如以1952年为一百，1956年绸缎需要增长为二百〇九，因而目前我国的供应，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且他们都要求真丝绸工厂，当你走进了任何一家，面对着绸架上的光彩夺目，精美绝伦的绸缎，你立刻就会感到彩霞为之失

① 《应当重视轻工业的发展》，一九五九年八月八日《人民日报》第7版。

光，百花为之逊色，你好象站在许多幅动人的图画面前，被美术家的手法带入各种不同的境界。难怪当我国的丝绸在苏联、波兰、捷克、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兄弟国家展出时，曾经被称为“象水一样的轻柔，象诗一样的美妙”。这些丝绸也曾经轰动过巴黎、诱惑过里昂的妇女们。在来比锡举办的一次国际博览会上，浙江丝绸被评为富有高度艺术性的第一流丝织品。这是我国手工业生产（现在已兼用电机）已经达到高度水平的结果。

第十一个对立的统一——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

“土洋并举”，“工农并举”两条腿走路的结果，一定是根本改组我劳动力分配的比例，向来一直务农的农民，亦将变成亦工亦农的人民，从此有效地逐步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工农矛盾，城乡矛盾将来一定可以得到一个解决。这是第十一个对立的统一。

第十二个对立的统一——两放与三统

土洋并举，工农并举，实行人民公社的生产集体化，若让人民公社仅仅进行自给性生产，恐会变成割据性经济，造成各个地方离散的局面。我们所主张的是统一的国民经济，而统一的国民经济与离散的局面是矛盾的。为了克服这样的可能性，就责成人民公社同时进行商品生产。这样农村的财贸管理体制，就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非有一个新办法，不是以适应人民公社发展的形势。这个新办法就是政社合一，“两放、三统、一包”。两放是指下放人员下放资产而言，三统是统一计划，统一政策，统一流动资金而言，一包指包财政而言。但问题是，既要放，何必要统？既要统，何必要放？放与统是相矛盾着的，但也是统一的。国家的基层财贸机构下放以后，一方面成为人民公社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国家财贸部门的基层单位，一方面归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一方面又加强了国家对人民公社的领导，领导人民公社更好

地发动群众，改善管理，改进制度。国家要收购什么，运输什么，销售什么，都可以更顺利的进行。政与社过去是两家，现在是一家了，工作能更密切地配合，困难能更容易地解决。

但国家把人员和资产下放给人民公社并不意味着人民公社可以自由地进行商业活动，可以自由地把下放的流动资金来做买卖，来取得利润增加收入。人民公社要出卖什么，出卖多少，要购买什么，购买多少，都须经过上级商业机构，“不能在公社之间自行交易，也不得到远地进行交易，公社不能从社外购买物资转卖给国家，也不能把从国家商业机购买来的物资转卖给社外，不能转手经营”。如有一些次要产品，和零星产品需要出售，而商业机构不能收购或有一些特殊商品需要购买而商业机构不能供应，可以通过上级商业机构，与其他公社订立合同进行交流。而且公社对于国家规定的价格无权自己变动，如价格确实不合理，也必须按照物价管理体制的规定来加以调整。因此，公社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公社销售从国家批发来的商品，必须执行国家规定来加以调整。因此，公社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公社销售从国家批发来的商品，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零售价格。因此，把权力放下，一定要做到放而不乱，要做到放而不乱；一定要统，以保持国家的计划性，使公社的计划归纳在国家的计划之内来达到全国一盘棋的目的[1]。

但这里所说的统，并不意味着公社沒有一点机动权限。例如三统之中，有一个叫做统一，流动资金，流动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信贷资金。按照规定，公社在贷款总数的范围內，工业、农业、商业贷款各用多少可以自行调剂，这样可以办到统而不死。由此可知，放而不乱，统而不死都是需要的，故放与统是对立的统一。

---

① 李先念：《怎样认识农村财贸管理体制的改进》，《红旗》杂志，1959年第2期。

第十三个对立的统一——供产销矛盾的解决

在前一节我们讲到合同，现在要知道这个合同如何订法，这样看来各个人民公社应当根据自己的特点，充分注意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在国家领导下通过合同，同别的公社和国营企业实行必要的生产分工和商品交换。同时不办那些本地沒有原材料，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取原材料的工业；以免增加成本，浪费劳动力。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经济才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① 而各个公社才能胜利地完成就地加工的任务。

在上面已经说过，人民公社的生产，不外自给生产和商业生产两种。并说明为什么要有商品生产的道理。此外两种公有制的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也是当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存在的原因。但是仅从所有制还不能完全解释这个问题。有人认为除了所有制这个原因外，主要是受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还不能提供高度丰富的产品来实现"按需分配"的原则。既有商品生产，势必预先找好销路，方不致有废弃的危险。而向国家要求供应，亦必须事前安排。为了解决这个供、产、销的矛盾，一定要推行合同制，而且公社本身就要求高度计划性。哪一样事情不列入计划，哪一样就有被挤掉的危险。因此推广合同制把国家计划同公社计划通过合同衔接起来，看来是今后长时期內国家同公社之间商业结合的主要形式。因为人民公社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各地区资源和条件不同，（如南方和北方，山区和平原）它的生产，消费，销售，劳动力，资金等情况也就各有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公社自己能够生产什么，向国家出售什么，需要国家供应什么，供应多少，以及产品质量，交换时间等等，都需要根据当地各种具体情况有计划地进行安排，订在合同之內。而且同时必须贯彻执行工农商并举的方

①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第3节。

针。商业虽然不直接生产商品，但是和生产有极其密切的联系。许多农产品和副产品要靠它收购进来，商品生产出来后，要靠它及时售出去。且在商品生产中，商业部门具有组织生产，促进生产的作用。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工农商协作。

当然公社发展社办工业，首先似应兴办直接为当地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业，如农产品的加工和农具与肥料制造等。但公社生产的农业产品，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在内，除了解决本社的需要以外，还要发展商品性生产，以供应城市和国家出口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贯彻执行合同中所规定的任务，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也只有这样，才能增加人民公社的收入，使它日益巩固和发展起来。总之，有了合同为依据，把生产、出售、供应的内容在合同中规定下来，这样公社才有底，生产才有明确的方向，就可以按照国家和公社的需要放手进行生产。至此，供产销矛盾才得到了一个解决。这是第十三个对立的统一。

第十四个对立的统一——合同的严肃性和灵活性

至此，又有一个问题了。合同一经签订，具有严肃性，任何一方不能随意改变。同时，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地发展，不免有一些特殊情况在合同签订时难以预料到的。因此，在严肃性之外，又要有一个灵活性，以便在情况发生变化时，对合同的某些部分有作适当修改的必要，使之更符合实际。这与任何破坏合同是不同的。合同的严肃性并不排斥灵活性，两者是对立的统一。这是第十四个对立的统一。

第十五个对立的统一——货物与短途运输的矛盾

在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发生了。公社与国家、公社与公社订了合同，一定要遵守合同，问题是公社依照合同向国家或向别的公社出售的东西，怎样运出来，要国家或别的公社供应的东西怎么

运进来？现在运输情况如此紧张，这一矛盾非从速解决不可。我们认为运输问题应分两部分来研究，一是短途运输，一是长途运输。先谈短途运输。它是指县境以内的运输和人民公社的运输。过去农村生产水平不高，物资调运不高，物资调运不多，短途运输并不明显。现在农业生产大为提高，人民公社也办工业，物资调运数量大为增加，问题就显得突出了。过去农村劳动力不太紧张，还可以依靠肩挑人抬背负来疏运物资，如在田间的运输一样。现在农村工作万分繁忙，这种旧有的运输方式已难以满足大量的运输要求。因此短途运输问题就放到日常议程上来了，它同生产和人民生活有最直接的关系。对于长途运输来说，它是物资集散的关口。如果这一关通不过，就沒法把物资集中到铁路、水路和公路干线上来，而近代长途运输工具很难发挥作用。不仅如此，长途干线上运到各地的货物，如果通不过这一关，便沒法接转，向广大农村运输，必然会影响农村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因此我们必须对短途运输作全面安排，使物资集散工作赶上长途干线运输发展的需要。但在目前的条件下，短途运输还是整个运输战线上的薄弱环节。这是因为短途运输量大，面广，干线与支线的交叉点又多，道路与航道仍然不够，质量也需要提高。许多山区农业生产发展了，还缺乏相应的交通条件。“有些同志迫切期望短途运输上更多的使用近代运输工具。这种愿望无疑是好的，但由于物质与技术条件所限，目前还不能有大量的近代运输工具放到这样广大的地区。现有的汽车和轮船只能重点使用，放到主要运输线路上，使它发挥更大的作用”①。

当前短途运输的关键在利用民间运输工具如马车，铁轮车，木帆船以及一些企业货运汽车，数量大，分布广，可以把它们组织起来，投入短途运输不仅适合于县乡和矿区支线上的行驶，而且可以发挥巨大的运输作用。河南省去年完成的公共货运，江苏

① 交通部部长王首道先生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省去年完成的水路货运都是很好的经验。① 别省都可以取法。这是第十五个矛盾的解决，也就是第十五个对立的统一。

第十六个对立的统一——运量和长途运力间的矛盾

短途运输解决了，现在轮到长途运输。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从农村运来的东西，又有矿区或城市运出来的运进去的东西，其中有洗煤，矿石、烟煤、焦炭、耐火材料、水泥、木材、钢锭、钢材各种各样的机器和设备等等，这些东西均离不了长途运输。每个生产单位离了它，社会生产就不能前进一步，所以，安排生产，必须相应地安排长途运输。否则运输和生产脱节，就会发生生产停顿，至少使生产失调，或停工待料。但在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一个矛盾，这就是长途运输运量大和运力小之间的矛盾，所以有许多东西运不出去，呈现流通阻塞的现象，这是又一个矛盾的暴露。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负责机关本“千条河流归大海”的方针，几年来新建了不少铁路，但每一条新铁路都要直接间接同原有铁路连接起来，形成一个铁路网，把大批货物从原有不发达的地区由新建铁路运交原有铁路，这样使全国四方的货物都能畅其流。兰新铁路每一公里的延长增加了陇海铁路的运量，鹰厦铁路、来睦铁路、黔桂铁路的建成，都加重了京广铁路的负担，② 因此京广京沪两条干线在去年下半年我视察的时候，正在铺设复线。但是新建铁路和铺设复线尚不足以解决运输紧张的情形，还要进一步组织合理运输，杜绝对流重复、倒流，以及某些过远的运输。另一方面，负责机关亦在推行各种物资分区产销平衡的制度，把一个分区内的“支线”、干线、城市各个环节的合理运输贯通一气，形成一个网，这样不仅把产运销密切结合在一起，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便于更好地进行计划生产，计划供应和计划运

① 《抓好短途运输》，1959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

② 《黔桂路首次列车开出贵州》，195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

输，使物资供应得到更大的保证，而且缩短了物资的运输距离和周转时间，加速了生产过程，降低了生产成本”。[1]这样一个贯通一气的合理制度不仅可以杜绝甲地向乙地运米，乙地又向甲地运米的对流运输，停止把木材运回林区去的倒流运输，而且也可以促进就地取材，避免从千里以外运货进来的过远运输。如此办理，运输问题虽不能全部解决，然紧张情况已解除了许多。经济委员会和粮食部从事物资调运工作的同志们创造了一个图上作业法，这是一个卓越的数学方法，值得一读。[2]按照这个数学方法“可以得到物资调运中运行的吨公里最少的方案，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运输和资金。例如粮食部应用这个方法修订了1957年的流向，调整了一百五十余万吨粮食的运输路线，按每吨粮食少运十公里计算（这是最低的估计）那末，节约的运输力就大致相当于用一辆运货汽车绕地球运行一百圈。”大力组织合理运输的重要性于此可见。这是第十六个对立的统一。

第十七个对立的统一——元帅货物和一般商品的矛盾

但问题还不是完全解决的。事物普遍联系中的一种形式是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一般服从重点，次要服从主要，后队服从先行，非急需服从急需等等都是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我们在大跃进中提出的“以钢为纲”、“ “三大元帅，两个先行”就是这种关系的描述。在货物运输之中有元帅的货物，有一般的货物；对元帅的货物，一面要“让”一面要“挤”。以商业部门工作为例，在贯彻执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中，商业部门对元帅的物资和一般物资采取不同的做法。就“让”来说，提出“元帅走大道，小路自己行”的做法，让元帅的物资（即钢铁、粮食、机械）走铁道，一般物资用木船运，或是“元帅前面走，后勤后面跟”，采取元帅带后勤的做法。这样办解决了一部分物资运输的紧张问题。但恰恰在

① 《大力组织合理运输》，1959年3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

② 1959年3月30日《人民日报》第7版。

元帅物资运输的时候，就发生了"让"与"挤"的矛盾。"让"是指商业工作要为元帅让路，"挤"是商业工作要挤进中心工作去为工农业生产，为广大消费者服务，并完成商业任务。所以"挤"和"让"是矛盾的，是对立的。在让元帅物资先走的间隙中，就采取见缝插针、有空就补的方法，突击挤运市场急需的物资。这种"让"不是消极的"让"，而是"让中有挤"，这种"挤"不是不适当的"挤"，而是"挤"中有"让"。因此"让"和"挤"虽是矛盾的，相对的。然而是统一的，有"让"必有"挤"，有"挤"必有"让"。光"挤"不"让"，就会妨碍元帅前进，光"让"不"挤"就会影响一般商品的流通，影响市场需要和人民生活，因此，"让"和"挤"是辩证的统一。这是第十七个对立的统一。

第十八个对立的统一——局部和全部

就以上所说的短途运输和长途运输的情况看来"铁路运输越来越紧张，铁路建设缓不济急，这是目前铁路的基本情况"。由于工农业跃进的形势发展得很快，到去年年底"还有大约三四千吨的货物运不出去"。由于运输能力的不足造成了一面矿山大量存煤，一面有些地方缺煤①。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煤炭的运量太大。我国工业建设的方针是"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炼钢要用大量的煤和铁，煤铁的运输主要靠铁路。有煤方有铁，有铁方有钢，要保证钢铁生产，就必须保证煤炭运输。1959年在铁路总运输中，煤炭以及与煤炭生产有关物资的运量约占60%，而煤炭的运量就占总运量的40%以上。除煤炭外，其它十种重要物资运量的比重都不大，只有砖瓦沙石等矿物性建筑材料占10%左右。把煤炭运输安排好了，其他物资的运输比较好办些。今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愈大，速度愈快，煤炭的运输更要增长。所以从

---

① 铁道部吕正操副部长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发展前途看来，非有几十万公里铁路，几万台机车，成百万辆货车是不行的。至此，矛盾又暴露了。这几十万公里的铁路所需的钢轨将从何处来？大建设中各方面都需要钢材，钢材绝不够分配，因此，铁道部计划在短期内建成我国几十万公里铁路所需要的钢轨和钢材只能自制，盖不如此就不能适应我国高速度建设铁路网的需要①。况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全国各省区包括边疆在内，要有铁路通达，对钢轨钢材的需要，更急迫了。

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同志说："铁路运输业是煤炭、钢铁、原材料的大量消费者。在目前铁道部门主要是管运输、修路和造车，所需材料绝大部分依靠其他工业部门供应。今后铁路建设规模越来越大，材料消耗越来越多，不能完全取给于人。铁道部门必须自己制造一部分器材和工业原料，必须以运输为纲在各地统一安排下，自己炼钢炼铁，轧制钢轧钢材，制造机床，制造水泥等，做到部分自给，逐步向运（输）建（筑）冶（炼）修（理）造（制造）的多种经营方向发展"。②这样做钢轧和钢材不够用的矛盾就解决了。中央的方针是以钢为纲，带动一切；铁道部的方针是以运输为纲，带动一切；一个是全部，一个是局部，但二者是统一的。

结论——团团转和螺旋式的上升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由炼钢出发，最后仍回到炼钢，形成一个团团转。中心问题是"以钢为纲，带动一切"，根据事物发展的动力来自事物本身的内部绝非来自事物本身之外"的原则沿着一个环节接着一个环节顺利地波浪式地向前推进。"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就是主流带动所有支流，最后一支支流包括在所有之流之中，当然亦被带动起来，这样最后一支支流与最先的主流

① 吕正操：《我国铁路建设的道路》，《红旗》杂志，1959年第2期。

② 同上书。

的关系，当然与其他支流与主流的关系一样。所谓关系就是內在联系，这足以证明首尾两端亦有內在联系，形成一个团团转，即形成一个整体。不然的话，首尾脱节，失去內在联系，安得称为整体。在推进中不断发现薄弱环节，或暴露矛盾，并不断地解决矛盾，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有些联系还沒有具备，我们的人们就发挥主观能动性，把它建立起来。这篇文章所举的例子，就是这样。铁矿不够，就搞勘探；好的燃料不够，就搞好焦；钢材不够就搞轧钢设备；机器不够，就搞热齿轮；铜太稀少，就找铝补充，电解铝少电，就找廉价的电力等等，把所有欠缺的联系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使工业农业顺利发展，这样就形成无数个对立的统一，这就是从平衡到不平衡，又从不平衡再到新平衡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中来建设社会主义，不平衡的现象当然会经常出现，这是毫不足怪的。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注定的要从平衡到不平衡，又从不平衡到新平衡的，这是对立而又统一的，沒有平衡与不平衡的辯证关系，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无法进展，无法波浪式地前进，也无法最后螺旋式地上升。到今年年底，洋钢要从八百万吨升到一千二百万吨，钢的产量一定是这样上升的，因为"以钢为纲，带动一切"是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好象一条红线贯穿在各个方面，钢跃进一步，其他各方面也跟着跃进一步。反过来，其他各方面发展了，也促进了钢铁生产的大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推动着工业生产不断向前发展。而且不仅数量增加，而钢的质量因含硫量的降低也大大提高了（冶金部正在爭取含硫量的降低）。这不是螺旋式的上升，是什么呢？例如小高炉和转炉是我国钢铁工业战线上的两支新生力量，它们绝大多数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高潮中诞生和成长的。"在今年年初，小高炉和转炉的开炉率和产品质量都不高，成本亦较高。但不到半年工夫，我们就很明显地看出它们的产量和产品质量，都在步步提高，而成本则在逐步下降。拿质量来说，全国转炉钢的平均合格率，今年一月份

还只有67.86%，而六月份已达到了91.03%”[①]。“以钢为纲，带动一切”，钢既然跃进了一步，其他各环节当然也跟着跃进了一步。好煤出好焦（煤经过精洗含硫量去掉了60%到80%），好焦出好铁，好铁产好钢，用好钢可以轧出好钢材，好钢材可以制成好机械产品、好建筑材料和好交通运输工具。反过来，生铁含硫量不合国家规定的要求，就炼不出好钢，就轧不出好钢材；不是报废，就是直接关系着机械工业、建筑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等生产的数量和质量。现在全国的小高炉和转炉的产量和质量既在逐步提高，而成本则在逐步下降，足见整个结构中的各环节都在逐步上升。1958年，我国工农业生产都是飞跃的发展，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6%，农业总产值增长25%。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增长103%，轻工业增长34%[②]。重工业、轻工业、农业这样高的增长速度都是在我国从来未有过的。所以“以钢为纲”，不是如国外反动派所说，挤掉了其他部分，及是恰恰相反，带动了其他部分。这不是螺旋式的上升是什么呢？事物的发展总是沿曲线前进的，不可能一直前进，也不可能笔直上升，总是波浪式地前进，螺旋式地上升。为什么呢？因为每个经济部门，基数小的时候，只要领导有方向，干劲冲天，容易成倍增长；但一旦基数大了，要成倍增长，就比较困难了。而且从时间上观察，往往有今年多增产一些，明年少增产一些的差异，而从空间上看，属于同一经济部门的南北两厂，今年两地可能都增长，明年一地增产，一地不增产或少增产。高潮还要代之以间歇，高速度的运动也还要有节奏，有些经济部门会跑在其他部门前面，某些产品的生产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而主观与客观发生矛盾也会引起事物发展的起伏。但总的说来，仍然是增产的趋势，不过前进的方式是波浪式的，不是一直的。既有波浪式的前进，也只有螺旋式的上升，不可能一面波浪式地前进，一面笔直地上升。因此波浪式的前进，

①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

② 《红旗》杂志，1959年第18期社论。

螺旋式的上升是矛盾运动的表现形式，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必须尊重这一个规律，这决不是说我们只好随波逐流，做客观规律的奴隶。相反的，这个规律不是束缚人民的绳索，而是鼓舞人民发挥创造性的指针。人们在这条规律向前，不是奴隶而是主人。不过，在大跃进中，不是沒有缺点的。在各经济部门內部的某些环节上，某些产品生产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性的比例不协调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已经在生产的发展中逐步克服，或正在克服。

第十九个对立的统一——虛在实中，理在事中

在拙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中，我说明了三个要点：（一）“团团转”的理论，（二）“螺旋式上升”的理论。（一）（二）两点已在前文中透彻地说明了。现在让我来谈一谈第三点——“理在事中”。理在事中，就是虛在实中。1958年在整风运动中，大搞务虛与务实。有的人说：“虛”对于“实”好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实”的各个方面。这根红线，无论在什么时候，是断不得的，因为如果一断，“实”就失去了统帅，失去了灵魂。这篇文章的红线就是事物內部的联系，也就是来自事物本身內部的发展的动力，这根红线自始至终一直沒有断过。有些人只务实不务虛，似实中有虛，虛中有实，应该虛实并举，以虛带实。

1958年全国各高等学校也广泛地讨论了“务虛与务实”的关系问题。务虛中的“虛”字，并不是空空洞洞的意思，亦不是不存在的假东西。它是存在的，不过是眼睛看不见，双手摸不着，但都是千眞万确的东西，决不是假的。本文所务的虛就是一根红线，因而讲了不知多少“对立的统一”，而对立的统一是一个客观规律，也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抽象东西，但不能不承认它的存在和它的眞实性。

这篇文章首先就谈如何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风格，但强调要

"实事求是"，二者不相矛盾的。毛主席解释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內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要我们去研究。"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篇文章所叙述的一切事物都是客观存在的"实事"，我们就这些许许多多的"实事"来"求"它们的"是"，就是来找出它们的內在联系，所谓內在联系就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而这个动力来自事物本身內部的，绝非来自事物本身之外。这样说来，"实事求是"就是"就实论虚"，可知"实事求是"的"是"一定在"实事"之中，则"就实论虚"的"虚"亦必在"实"之中。简言之，就是"虚在实中"。我在拙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第10页中所说的"理在事中"（我的"理"是指客观规律）就是这里的"虚在实中"。"虚"既在实之中，不会离"实"而独立存在；理既在事之中，亦不会离事而独立存在。因此"虚"在"实"中，"理"在"事"中，都是对立的统一，因此我的"理在事中"就是"虚在实中"。

又我们常听人说："看问题要抓本质"、"莫把现象当本质"。什么是本质呢？本质就是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所讲的事物的內在联系，与"虚"和"理"是一样的东西，它是看不见，听不到和摸不着的，只能用思维来想的。这等于说不能直接由感觉器官观察到的；感觉器官所观察到的，只是露在事物表面的现象。但本质并不是在现象之外独立存在的东西，二者间存在着差异的一面，也存在着统一的一面。我们在这篇文章中用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的统一）得出来的"团团转"的理和"螺旋式上升"的理，都在我们所举的大量事实的內部联系之中，离开了这些大量的事实，看不出有什么"理"存在。这样一来，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物都贴贴伏伏地归队于一个系统之中，主次分明，条理井然，所有的联系都是直接的，必然的集合起来，形成一个国民经济的整体，把所有感性认识综合地概括地提高到一个简单明了的理性认识，

而且也把我的经济理论和哲学思想一并统一起来。我就是这样把大跃进的情形作成一个科学的解释。

此外，有了一个“整体”的概念，就可以知道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如何重要，也就可以明白全国各部门间各地方间和各民族间一致行动的如何重要，使每一个人强烈地感觉到他在全国一盘棋的布置下所处的地位决不是独立的、脱离社会的。

三

这样处理问题的几个好处

1．把“八字宪法”和辩证法的核心熔成一体

我在这篇文章中只举了二十个“对立的统一”（连同关于人口论的一个），当然是挂一漏万，实际上决不是这样简单。我的目的，无非把所有主要的环节，结合在一起以示经济机构的整体，并指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新中国正在逐步生长着的意思，认为在这样的结合中，钢铁挂帅，重点非常突出，至少沒有把重点淹沒在非重点之中。虽然重点与非重点还可以结合得更密切些，但已足以使重点把所有的非重点带动起来，使轻重点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而且把重点突出地提出来，也可以唤起人们集中力量猛攻重点，使其他非重点也会被全面抓起来，围绕重点一同前进。我这个意见，在此地因限于篇幅只能约略地提一提，此后还要更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以便再做一番更深入的更细致的工作。

支援轻重点工作的统一体中的一对一对的矛盾和统一，为今后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创造良好的思想准备。懂得了这个关系，就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正确地处理层出不穷的矛盾，因为这篇文章指出了如何揭发矛盾，解决矛盾。

在这里我仍用“团团转”的理论把关于农业的“八字宪法”和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的统一）熔为一体，方法是把小型的团团转的综合性平衡论归纳于这篇大型的团团转的综合性平衡论之內

（见本文第九个对立的统一）。小型的根是毛泽东主席总结出来的“八字宪法”，大型的根是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的统一），这样把两枝根熔为一体，方可以就大跃进的情形，作出一个科学的解释。不然的话，好不容易得出一个象样的结果。苏联康士坦丁诺夫同志在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书中对于毛泽东主席的哲学著作给予很崇高的评价；尤其是《矛盾论》（见第八章第三节——不同矛盾的特点），认为是一篇杰出的不可多得的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卓越的贡献。这当然是很对的。但我认为“八字宪法”对于辩证法的贡献不亚于《矛盾论》，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进一步把《矛盾论》，“八字宪法”和“辩证法核心”三个东西合而为一，因为“对立的统一”含有矛盾，就是两个相互矛盾着而又统一着的对立面的斗争的结果。

但批判我的两篇“平衡论”的人说：所安排的各个环节形成了一条单一的僵死的直线，其间的联系，是“表面的，偶然的凑合”，是“七拼八凑”“东扯西拉”，“是一个杂货摊”，“不成系统的”。说：“团团转”理论是“循环论”是“违反辩证法的”，是“庸俗经济学”，甚至说这种理论是“一枝毒草要连根拔掉”，现在这些批评都不能成立了。因为我在两篇大小型团团转的综合性平衡论的文章中，所根据的原则，一个是“八字宪法”，一个是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的统一）。后一枝根告诉我们，事物发展的动力，来自事物本身内部，绝非来自事物本身之外，所有的联系都是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都不是我的主观意志所臆造，我无法去“七拼八凑”，“东拉西扯”，决不致成为一个杂货摊。

大型平衡论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本文中已经说得很多，兹不赘。兹把小型平衡论的内在联系再补充地说一说。

据1958年7月24日和11月29日两天的《光明日报》的估计，批评我的平衡论和新人口论的人不下二百多人，其中有一位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讲师，他不仅要推翻我的平衡论，而且不信“水、土、肥、密、种、保、工、管”八个字能做出什么奇迹来。在那

个时候，这八个字还沒有成“八字宪法”，他也梦想不到三四个月之后会成“八字宪法”，所以他批评我的小型的团团转综合性平衡论说：“水、土、肥、密、种、保、工、管”八个字不足以解释农业大丰收的原因，并且说丰收的原因很多很多，而且很复杂，复杂得好象一个蜘蛛网（见1958年8月5日《光明日报》）。还有科学院某经济杂志的总编辑更变本加厉地说，原因复杂得不只象一个蜘蛛网，好象几个蜘蛛网（见1958年10月号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版的《经济研究》载《评马寅初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庸俗经济学观点》一文）。不料于三个月之后，这八字被举国一致认为是“八字宪法”，凡贯彻执行这“八字宪法”的地方，莫不五谷丰登，足见这二位自以为是辯证法通的人，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是很不够的。他们还批判我的一篇小型文章说：“各环节间找不出內在联系，七拼八凑，好象一个杂货摊”。我敢问：他们的许多蜘蛛网之间有什么內在联系呢？如沒有內在联系，有沒有外在联系呢？他们的文章中沒有说明。我在这篇大型文章中也说到“网”，但我的“网”是蜘蛛网式的水利网，蜘蛛网式的电站网，蜘蛛网式的工业网，蜘蛛网式的交通运输网，而这许多不同的网，不但有外在联系，也有內在联系，而內在联系比外在联系更紧密，而且紧密得互相协作，相得益彰。它们以內部联系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来推动事物向前发展，使一个死气沉沉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生气蓬勃的新中国。反之，从二位先生的许多蜘蛛网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把活中国弄成死中国，象蜘蛛网一样，一年到头，停在那里，无变化，无发展。

批判者说：“团团转”的联系，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环节的联系，只是一个单一的一条线式的联系。如甲只与乙有联系，乙只与丙有联系，与其它各字都沒有联系。这个批评也是不对的。譬如水、土、肥、密、种、保、工、管八个环节，每一个字都不是独立的，是同时与其他七个字都有內在联系的。例如“水”与“土”固然是紧密地联系着，但同时与

“肥”也有密切的联系。“肥”无“水”，即最好的肥，亦不能生效。“水”与“保”离开得很远，也是有密切的联系。无水就旱，旱即生虫，有虫即要防治（保）。“水”与“工”离开得更远，但它们的关系亦不亚于“水”和“肥”或“水”和“保”。今年夏季大旱，因抽水工具（抽水机）不够，丰收受些影响。因此，虽然每个字与其余的字都有联系，但排列起来，只能排成水、土、肥、密、种、保、工、管；看上去，好象是单一的一条线式的联系。如水与土，土与肥，肥与密，密与种，种与保，保与工，和工与管；但这只是外表，人是有脑子的，只要用思维想一想，就可以找出其本质，即“水”不但是与“土”有內在联系，与其余的六个字也有內在联系。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要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一定要用思考。这证明了这八个字不只是一个单一的一条线式的联系，仍是一条多方面式的联系。

再进一步来谈一谈“水”与“管”。“水”与“管”是离开得最远的，倘能把它们衔接起来，它们也是最近的，因为“水”与“管”的內在联系，与其他的联系一样，也是很紧密的。在国家內若干地方，因管理上有些缺点，造的沟渠沒有造好，应平整的土地，沒有平整好，使水流不到田里去，才影响了收成。所以有了水，不去好好管，好事就会变成坏事。“水”与“管”的內在联系于此可见。即有內在的联系，则首尾两端衔接起来了，形成了一个团团转。

倘我们把水、土、肥、密、种、保、工、管，八个字倒置起来，也能证明它们不是一条单一的僵化的直线。让我们把水、土、肥、密、种、保、工、管，八字倒置为管、工、保、种、密、肥、土、水。“管”不仅仅管“工”，置其余于不管，它也管“保”，在旱天虫害未发生的时候，要预先防备。下种之先，必择良种，但良种是会转化为劣种的，必须经常另选，非管不可。至于密度，也应该密得恰如其分，过稀固然不可，过密亦不宜，也不能不管。“肥”与“管”最有关系。何时施追肥；施什么肥，施多少肥，

都要经过个别的细致的考虑。至于“土”则要求深翻，深度多少，因地而异，有的七寸，有的一尺，不能不好好地“管”。“管”与“水”的关系上面已说过了，不必再谈。这八个字或以水为起点，或以管为起点，或以任何其余六个字之一为起点，均与其余七个字有內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决不是如管与工，工与保，保与种，种与密，密与肥，肥与土，土与水这样一条单一的僵化的直线联系。当然与农业生产有关系的东西，不仅仅是这八个，但我们做研究工作的时候，不能不把关系较浅的隔离开来，否则弄得很复杂，科学研究无从着手。化学研究室，物理研究室都是这样做，决不能搞得象蜘蛛网一样的复杂，使科学研究成为不可能。

2. 从“八字宪法”得出来的“团团转”理论反映了它济世救人的伟大力量

以上说明了“八字宪法”中的八个字，无论怎么样安排，“水、土、肥、密、种、保、工、管”也好，或倒过来“管、工、保、种、密、肥、土、水”也好，都不是一条单一的直线式的联系，乃是多方面的联系，更不是循环论。最重要的是“水”与“管”的內在联系，首尾衔接，形成一个团团转，而这个团团转就反映了“八字宪法”有济世救人的伟大力量。仅以河北而论，我们有比十三陵水库大七十倍的密云水库，还有西大洋、岗南、王快、黄壁庄、官厅等五个大型水库。其中大多数是今年完成或将完成的。此外还有不少中、小型水库。沒有这些水库，你想今年河北将呈现什么样的一幅光景；我说这是螺旋式的上升，他们肯定地说这是循环论。今年河北，尤其是大北京，能免于水灾，是因为“八字宪法”中之“水”与“管”衔接起来了，如河北省政府和北京市不去管“水”，不及时计划计划和动工，我想不但河北成为泽国，即北京市亦必成为北京水库了。密云水库负责人说：周总理曾亲自到密云细致地看过后才把水库壩址决定下来，足见政府领导人把“水”“管”得很彻底。我们能够免于灾难，就是因为“八字宪法”之“水”与“管”首尾两端相衔接，形成了一

个团团转的缘故。沒有这个团团转，试想一想，多少性命财产要被大水吃掉。1939年在倭寇统治时期，因“水”与管”脱节，沒有一个团团转，大水泛滥了天津市，积水两公尺之深。但自以为辯证法通的人还说，我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他们的是无产阶级的；我的经济学观点是庸俗的，他们的是非庸俗的；我的“团团转”理论，螺旋式上升的理论，是违反辯证法的，反动的，是一枝毒草要连根拔掉。他们还要我低头认错。依照他们的意见，我从“八字宪法”得出来的小型“团团转”，从辯证法核心（对立的统一）得出来的大型“团团转”都是违反辯证法。依此推论，势必陷于辯证法违反辯证法的谬论。

此外，我的“团团转”理论既然反映了济世救人的力量，怎么会变成毒草呢？就是退一万步，假设自以为辯证法通的人，能够拔掉这两枝根，试问拔掉之后，有什么好处呢！这个理论既有利于人民，怎么我的立场，还是资产阶级的呢？我的经济学观点还是庸俗的呢！江苏《群众》第16期社论曾说：现在“有小部分人，不仅自己少想少说少做，还非难人敢想敢说敢做，站在群众运动之外，指手划脚，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大泼冷水，散布消极情绪，那更是错误的。列宁在1907年曾经说过：‘俄国工人阶级用其充满错误的革命行动，是定会爭得自由，推动欧洲前进的，让那些在革命方面无所动作的庸夫俗子去以不犯错误自夸吧。’列宁的这几句话，值得人们深思”。

我认为我的“团团转”理论是“八字宪法”伟大力量的反映，就是杨献珍先生所说的“理论联系实际”。“团团转”理论违反辯证法的说法，充分地表达了批判的人对于辯证法的认识还是不正确的，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是模模糊糊的，昏昏然，飘飘然的。他们自以为辯证法通，还有什么话可说？不过我要请他们把两枝毒草连根拔掉。

3. 从辯证法核心得出来的大型“团团转”理论反映了核心

推动大跃进的巨大力量。

（附带说明不低头认错的理由并请求批判者们另立一个学说来替代）

这篇大型的“团团转”理论反映了辩证法核心的巨大威力。我们的主流是“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但把一切带动起来之后，这一切反过来要求炼钢厂供给更多的钢，更多类型的钢，迫得炼钢厂以更大速度向前迈进。在本文中，最后一个环节是铁道部要自己炼钢，这样与冶金工业部的炼钢结合起来，首尾两端相衔接了。看上去似乎是一条单一的直线式的联系，其实不然。“以钢为纲”，把一切带动起来之后，这一切更需要钢，容易把铁道部所需要的钢挤掉一部分，使铁道部不能百分之百地如愿以偿。何况今年又添设了一个农业机械部。过去制造农业机械所需要的钢经常被挤掉；设一个专部不仅可以促进农业早些机械化，而且可以使钢量不致被挤掉。今年须提出七十多万吨来供给这个部，更增加对炼钢厂的压力，就更影响了对铁道部的供给量。诸如此类，使铁道部感觉到“今后铁路建设规模越来越大，材料消耗越来越多，不能完全取给于人，铁道部门必须自己制造一部分器材和工业原料，必须以运输为钢，在各地统一安排下，自己炼钢炼铁，轧制钢轨钢材，制造机床，制造水泥等等，做到部分自给，向运输、冶炼、建筑、制造、修理等多种经营方向发展”。这表达了这个大型“团团转”内的各个环节都在万马奔腾地发展，相互推动，相互制约，使整个国民经济波浪式地前进，螺旋式地上升。这就是辩证法核心的巨大威力。

我说相互推动，相互制约，因为铁道部向炼钢厂要钢，向煤炭部门要煤，向机械部门要车床，向建筑部门要建筑材料，向水泥厂要水泥，而这些部门和厂矿因此和因别种需要，要扩建或新建，也向炼钢厂要钢，同时也向铁道部门要求提供运输，使铁道部门忙得透不过气来，尖锐地暴露了运力与运量之两不相称，使

货物堆积如山，运不出来，迫得铁道部门也向炼钢厂要钢；因不能如愿以偿，只得自己炼钢，自己轧钢。这就是各环节相互推动，相互制约的结果。所以大型“团团转”的各环节间如小型的“团团转”一样，都有内在联系，决不是一条单一的，僵死的，直线式的联系。总的结果，使整个国民经济向前推进。

我曾邀请马列学院杨献珍先生到北京大学作一次报告，题目是理论联系实际。他说此后要研究哲学，最好向各省党委地委请教请教，因为他们知道实际情况比任何人都深刻。我听了，得了一个很大的启发。从那天起我对于各省委第一书记和书记所说的话都很注意。后来我在报上看到了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先生和书记赵紫阳先生的关于水、土、肥、密、种、保、工、管八项措施的文章，才利用了这八个字作了一篇小型的“团团转”综合性的平衡论（原文载于1958年8月30日和31日的《光明日报》，和1959年第1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有两位批判者不信这八个字能做出什么奇迹来，认为与农业增产有关的因素不只八种，有许许多多种，多得象蜘蛛网一样，甚至象几个蜘蛛网一样。足见他们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是模模糊糊的，昏昏然飘飘然的。我现在以十二万分的诚意请求他们另立一个学说，以蜘蛛网的结构作模型，把大跃进的情形作出一个科学的解释。过去他们所做的工作是破，但徒破而不立，是不够的。我想他们以大学教师，杂志总编辑的学问，一定能够作出一篇更具体而又更抽象，更全面而又更动人的文章。那个时候，我当先读为快，如拜读之后觉得真有所得，再来低首投降。此刻似乎觉得太早。

四

1. 为什么在本文中同时讨论新人口论？

我认为人口论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今后我们还是要走总路线的道路，还是要向大跃进方向迈进。我们已进入了原子能时

代，科学的发明一定层出不穷；要利用这些新发明，利用者非有相当的知识和技术不可。这些人不在乎再多，而在于精。且我们要在十二年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所谓赶上，是在“量”的方面赶上。惟在人口问题上，我们要赶的是“质”，不是“量”，因为以量而论，我们早已赶上了。不但早已赶上了英美，而并也早已赶上了印度和苏联。因此我想在这里附带谈一谈人口的质量是很适当的。

2. 为什么强调人口的质量？
（附带重申对北京大学人口理论研究会的请求）
第二十个对立的统一……………………质和量

数量和质量往往发生矛盾。有时人们过分强调了质量，忽略了数量。但质量一定要通过相当的数量才能表达出来。过去我们有过一个相当长的时候，连一吨洋钢都沒有；倘能把洋钢炼出来，一吨也好，十吨也好，就是莫大的成功，不能再斤斤计较质量，因为炼出来的钢本身一面代表了数量，一面也代表了质量。无论炼出来的钢是高炭钢，还是低炭钢，它们总是钢，而不是其他。因此过分强调质量是不对的。这就是沒有数量就沒有质量一个最好的例子。

但有时我们过分强调数量，忽略了质量。当我们已炼出了八百万吨洋钢来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追求钢的质量，否则量与质太不相称。我们不但要炼出钢来，而且要炼出好钢来。有了数量，还不能令人满意，一定还要从数量中去求质量。而且不求质量，已有的数量是不可靠的。要打折扣的。几百几千台的机床制造出来之后，如不能转动自如，或不能起应有的作用，只得抛在一旁，作废物处理，不但给国家带来了一大笔损失，而且完不成数量计划的任务。这就是合乎“沒有质量就沒有数量”的辩证法提法。现在我们所要求的是质和量要配得适当，要统一起来。

我国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之两不相称，几乎无人不知。现在我

们已进入了原子能时代，非把人口的质和量快快适当地统一起来，很难完成原子能时代的任务。这就是我在本文中为什么强调人口质量的缘故。

南方有一位大学校长，人民大学有一位教师，某经济杂志有一位总编辑，以及北京大学经济系若干教师们认为我的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思想体系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批评是他们不知如何看问题最明显的表现。让我慢慢说来。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呈现一种冷酷忧郁的色彩，他似乎说：工人的工资已不能再提高，因为即有机会提高，亦必为新增加的人口所压低，结果工资仍回到原来的水平。救贫税和工会活动亦不能有所帮助。贫民的痛苦，不是外来的，是他们自己所造成的。他们缺乏先见，多生子女，故要消灭他们的痛苦莫如他们自己。马尔萨斯就这样把贫苦的责任放在贫民自己的身上，把富人的责任推得净光。富人闻此可以高枕无忧矣。虽然他建议采用预防人口增加的方法，他的人口学说给劳动群众一个沒有希望的悲惨远景。

里加图就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财富分配学说。他认为人口日益增加，粮食生产不得不向逐步贫瘠的土地推进；土地愈贫瘠，每单位的产量愈少。假定最好的地每单位生产25斗，次一等地生产20斗，再次一等地生产15斗，最后一批地每单位生产10斗。粮食价格由最后的一批地决定。假定每斗二元，计收入二十元，这二十元的收入适足以偿付一切费用连同工资利息在內。所以最后一批地沒有地租。在高一级的土地上每单位生产15斗，每斗二元共收入三十元，除开支二十元外，尙剩十元，这十元就是地租。再高一级的土地，就收入四十元，能出地租二十元。最高一级，就是最好一级土地收入五十元，能出地租三十元。如人口继续增加，粮食又不够吃，再向低一级地推广。假定每单位只产 5 斗，每斗非卖四元不可了；共计收入二十元，只足以偿付一切开支，工资利息在內，但沒有地租。上次的无租地

（即产粮食10斗的地）现在能出租二十元了。最高的一块地现在收入一百元，除开支外，尙剩八十元的地租，比上次增加50元，因此人口愈多，食物生产愈从好地向坏地推广，地租愈增。因此里嘉图相信人口愈增，社会愈不得不仰仗于日益贫瘠的土地，以取得食物，而日益增加的一部分产物，就以地租的形态，归地主所有。所以在里嘉图的眼目中，地主阶级是反社会进化的，就是他们的利益是与社会的利益相反的。他研究的结果也是很悲观的。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尔萨斯在人口增殖超过食物增加一个自然性质的观点中，去寻找贫民痛苦的原因。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贫民痛苦的原因，不是如马尔萨斯所说的自然界的吝啬，乃是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眞正的原因是社会性质的，不是自然性质的。因为贫民千辛万苦得来的成果，大部分被地主掠夺去了。所以根本原因是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现在我国的某些大学经济系一部分教授和某些经济杂志的编辑、总编辑仍抱这种见解，仍以“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个社会性质的理论来对抗马尔萨斯的自然性质的理论。殊不知中国的情形已经大变了。这个社会性质的理论在中国已经失败，不能再用来对抗马尔萨斯了。我们的人民公社制度是最先进的制度，其组织形式也是最完善，不能再说我国的生产关系还沒有搞好，还在那里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既然说人民公社好，不能再说生产关系还沒有搞好，还在那里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这几位大学教授和经济杂志的总编辑仍以这种过时的理论来对抗马尔萨斯，还说我拜马尔萨斯为老师，他们称马尔萨斯为我的先师。

现在中国的情形与过去大不相同了，过去可以说“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来一个民主主义革命，来一个政治革命。如现在继续宣传“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推论结果就是还要来一个政治革命。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定会危害国家的大事。现在的情形不是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

展，乃是恰恰相反，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应于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个社会性的旧理论虽于资本主义国家和沒有解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仍然有用，但于中国已失其效力了。中国已跳出这个阶段而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的缺点不是生产关系沒有搞好，乃是劳动生产率不高。救济的方法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决不是政治革命。因此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学说来对抗马尔萨斯。这个学说的目的在于把劳动人民的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把科学研究的成就日益提高和扩大，直到我们能制造人造食物来补充马尔萨斯食物的不足。这个新的学说不同于旧理论。“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的旧理论只适用于一时；一旦生产关系搞好了（如中国建立了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这个旧理论就不适用了。我的新学说永远可用，而且时间愈久，科学上的发明更多，适用的范围愈广，学说的说服力愈大；不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即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亦不难把马尔萨斯的学说送到坟墓里去。但是这些大学校长、教授和总编辑说我的思想体系是和马尔萨斯一模一样的。当时我忍受，不是因为别有用心，乃是因为他们是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教授和科学院某经济杂志的总编辑，地位高，学问好，你对他们无可奈何。有一位人民大学的教授说我的学说总不对他的口径，就是不合他的口味，我百思不得其解，大概是由于他平日西餐吃得太多所致。中国人应该多吃中餐，吃惯了决不致不合他的口味。

现在我更进一步谈一谈不负责任的言论将闯出什么样的大乱子来。现在我们已进入了原子时代，将来科学的日益昌明，不知要领导我们走得多么远。暂举一例说明我的意思。在1959年5月29日苏联《眞理报》上有一篇苏联科学家写的文章，讨论电子计算机的功能。他的意思就是如计算机的工作，比计算员的工作快二万倍，我们就可以用一部计算机来代替二万人的工作。这二万人的工资，每人每年以一万二千五百卢布算，每年须付二亿五千万卢布；但一部计算机的生产费不过二百万。在这里每年不知能

够节省多少钱。但节省经费虽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但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说计算机工作的速度比计算员大二万倍，并不意味着这二万个计算员能把计算机的工作取而代之。计算机的功能就在于运算的连续性，即下一步计算的开始，一定要在上一步计算结束之后，不能使所有二万人同时动手。要解答一个问题，只能由一个计算员进行计算。这位科学家说现在常有需要用机器连续计算十小时左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时急待解决。如用计算员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非工作十年不可。无论计算人员怎么多，二万甚至四万六万，亦不能缩短它的计算时间。但问题是这样用十年功夫算出来的结果有什么意义呢？国防问题有时急须于几小时内解决，你用几年的功夫得出来的结果有什么用处呢？一国的元首，或国务总理或因要事明日即需飞欧洲或美洲，我们要的是很准确的天气预告。倘然这个预告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算得出来的话，那末这个预告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人就多至二万、四万、六万有什么能力能够替代计算机的工作呢？就中国今日进展的速度来推测，我想十年十五年之内，这些问题就要摆在桌上来讨论。那时，用一部计算机好呢？还是安插二万、四万、六万人好呢？安插了人，就抛弃了计算机，就是人多拖住了技术进展和科学前进的后腿。反之用了计算机，这许多人如何安插呢？这些教授总编辑拆了烂污，到那时可以不问不闻，但政治家不能不问不闻，弄得他退既不能，进亦不无困难。那个时候，恐怕你们还要在旁讥笑政治家的无能，其实罪魁祸首都是你。现在苏联专家们已在讨论自动化之后腾出来的人如何安排的问题，他们也觉得不是沒有许多困难的（见《关于全面自动化》一文载1959年第9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苏联国土面积是二二,四〇四,〇〇〇平方公里，中国是九,六〇〇,〇〇〇平方公里，故苏联国土大于中国二、三倍。苏联人口只二亿〇八百万人，中国人口恐怕不止六亿五千万人，故中国人口大于苏联三倍多。如把两国人口放在同一水平上来讨论，则苏联应有十五亿多的人口。现在它只有二

亿〇八百万人，只等于应有的七分之一以下，而科学家就在开始讨论如何安排因自动化而腾出来的过剩人口，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一定要造成大量的失业，在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可以克服困难，但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何况你们还坚持人多是好事，人多可以办事，中国工人们就不赞成你们这种说法。1959年《劳动》杂志第15期载有一篇以《人员步步减，采煤月月多》为题的文章，说人多并不是好办事，正如淮南矿务局工人大字报所批评的："人多了造成五多，思想问题多，生活问题多，工作扯皮多，官僚主义多，窝工浪费多"。但在一穷二白的中国，资金少，人口多，把人民组织起来，利用它作为一种资源，不是沒有好处的，但不要忘记亦有人多的坏处。人多固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我的新人口论主张保留它的好处，去掉它的坏处；保存这个大资源，但去掉这个大负担。方法是提高人口的质量，控制人口的数量，因为提高人口的质量等于增加人口的数量。这样有人口增加的好处，沒有人口增加的坏处；有保存资源的好处，沒有增加负担的坏处；且与马列主义的理论——人是最宝贵的财富——亦不相抵触，不但不相抵触，而且相互印证，因为马克思与列宁亦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华罗庚先生介绍我看一篇讨论电子计算机的文章，载在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现代科学技术新成就》一书中，作者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教师胡世华先生。这篇文章说："假如敌机是在一万八千公尺高空飞行，可能在它开始轰炸之前只有十分钟发出警报，因此，我们消灭敌人的时间只有十分钟……假如敌人是用核武器或破坏力很大的氢武器来进行空袭的，那么我们会感觉到消灭敌人的时间更加紧迫了。我们希望能在敌机飞到它预定的轰炸目标上空之前就把它打下来，而且最好能在距离海岸线比较远的海上就把它打下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办法就是把探测敌机的装置（如雷达）和计算机都装在导弹里面，使导弹能自己探测敌人的位置，计算敌机的未来位置与自己应当如何纠正航行路线，并自

动地纠正自己的航线。这样电子计算机在导弹里面就担任了'驾驶员'的任务，就好象在导弹里装上了一个思想活动很快，动作很敏捷又能忍受导弹里面那种极为恶劣的环境的'驾驶员'。”由此推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此后战争的能否取胜，决定于人的智识，不决定于人的数量。这是智识的斗争，不是人数的斗争。在一万八千公尺高空飞行的敌机，非地面上密集的高射炮火所能打得下来的。我们只能使用导弹，而导弹里面必须装上雷达和计算机。万一我们沒有计算机，一旦敌人使用氢武器进行空袭，结果如何，你能想象得到吗？牺牲的人不是二万、四万、六万，乃是六十万、六百万甚至六千万。遗留下来的残废，毁灭的财产尙不计算在內。你们要人多，岂不更少了吗？你们诅咒马尔萨斯主义者是反动的，反人民的，因为他们主张以战爭来消灭人口。你们呢？你们难道不以战爭来消灭人口吗？这就足以证明你们的思想体系是与马尔萨斯主义者一模一样的。时代不同了。新时代要有新理论来配合。

赫鲁晓夫在美国的谈话，除裁军问题外，大半涉及生产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和平竞赛。他的意思就是苏联具有必要的条件，来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在产品总产量方面，以及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美国。这里的三个方面以最后一个为最重要，所谓生活水平就是指最后一个而言。苏美两国的人口差不多，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容易接近或赶上或超过。但中国与英国相比，怎么样呢？在总量方面要超过英国幷不是难事；问题是在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中英两国的生活水平的高低是以此为标准，不以总产量为标准。我们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之后，就要实行按需分配，至少把生活水平提高到与英国一样。但英国的人口到现在还不过中国的十分之一；因此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一定要超过英国十倍方可。我们人民公社的组织是最先进的，所以生产关系已经搞得很好，问题是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们的问题不是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乃是恰恰相

反，生产力的发展还赶不上生产关系。人民公社的建立，一定可以扩大劳动协作，创造出更为良好的条件促进生产力的更快发展。但是还有人主张把中国的人口提高到九亿、十亿，食物还是够吃的。讲到食物够吃不够吃，那是回到马尔萨斯的老路去了。我不讲食物够吃不够吃，我讲的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能不能保证全国人民早些走进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这个大门迟早要走进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早些呢，还是晚些呢？你们要人多，要人口增至九亿、十亿，岂不拖住我们进共产主义社会大门的后腿吗？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似应留在政治经济学中去讨论。

五

附 带 声 明

1. 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

据去年 7 月24日和11月29日的《光明日报》估计，批判我的学术思想的人不下二百多人，而《光明日报》又要开辟一个战场，而且把这个战场由《光明日报》逐渐延伸至几家报纸和许多杂志，并说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些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坚持学术批判必须深入进行。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沒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如我国的革命，只破而不立，决不能有今天。你我都不欢迎那些如李达先生所说的：“扣名词、扣概念、语义晦涩，内容空洞，带一些八股气”的文章（1958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第7版）。更不欢迎如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所说的那种作风。王任重同志在他的《读书、谈心、想问题》一文中（载今年 4 月 9 日的《人民日报》）说：“讲共产主义风格，还要敢于

坚持眞理，从实际出发，而不要‘随风倒’。学习先进，力爭上游，永远都是需要的。但是有些同志并不是眞正学习先进，而是按‘空气’办事。听到人家一点风声，他就赶紧照办，不问一问人家究竟是怎么做的，也不想一想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和自己的情况适合不适合。事后看来，这些同志闹了许多笑话。为什么‘随风倒’？这里面有个‘抢先’的思想在作怪。有的同志怕落后，不管条件如何，事事都想站到头里。也有的同志是图虛名，好出风头。这种‘抢先’的思想，和党所教导我们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的精神，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共产党人要赤胆忠心地为人民工作，不要为虛名工作；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不要按‘空气’办事”。

我们所最欢迎的，是如潘梓年先生所说的那种概括各种新变化的哲学或经济文章，因为哲学的中国要求有中国化的哲学（《哲学研究》1958年第7期）。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来示一个范，使我们也可经常学习。

2. 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去年有二百多位批判者向我进攻，对我的两篇平衡论和新人口论提出种种意见，其中有些是好的，我吸取过来，并在小型的团团转综合性平衡论中做了些修改（共七点），但是他们的批判沒有击中要害，沒有动摇我的主要的或者说根本的据点——“团团转”的理论“螺旋式上升”的理论，和“理在事中”的理论，也无法驳倒我的新人口论。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摯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爭辯，愈辯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沒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旣写之

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眞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沒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沒有接受他的眞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原载《新建设》一九五九年第十一期）

重 申 我 的 请 求

（一九六〇年一月）

我在拙著《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中（载《新建设》1959年11月号）有一个附带声明，就是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我说："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沒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如我国的革命，只破而不立，决不能有今天"云云。但11月30日和12月7日、14日《光明日报》和《新建设》12月号所发表的评论，仍属于"破"的性质，不过写的人换了一批新的，素年沒有见过面的人，原来的一批"老手"不出面了。这倒是一件好事。人越多，意见越多，使我领教的机会更多，不难最后只要以一篇文章来答谢几百位先生的好意。这予我以极大的方便，几百位先生愿以困难留给自己，以方便让给了我，这眞是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才做得到。不过过去二百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都是大同小异，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11月30日《光明日报》登了庄次彭先生的一篇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沒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最近在11月30日和12月7日、14日的《光明日报》上和《新建设》12月号上所发表的五篇文章更帮助我把我的几个理论弄得益加完整和坚固。我要对这五篇文章作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过了新年我就要出京视察三、四个月后才回京。回京后再加以一番分析和研究，拟以一篇文章来答谢诸位先生的盛意，可惜以后在《光明日报》上登出来的好文

章，我是看不见了。去年我花了五个月的工夫视察九个省份，南自海南岛北至长春，买不到一份《光明日报》。直到了广州，请我的秘书，托广东交际处向广东科学院借用，自8月1日到9月底二个月的《光明日报》，因为我的文章是分四次登出的（登在去年7月24、29、30、31日的《光明日报》），所以我要借8、9二月的《光明日报》看看有沒有人批评我的文章。结果大失所望，借来的报残缺不全，只得请《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编辑委员会把我的这篇文章在1959年第1期中转载一下，以资保存而便参考。因此在我视察的期间，既然看不到《光明日报》上所载的文章，恕不答复。迨回京后再行答谢。但我要一再重申我的请求，过去的二百多篇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现在的五篇也是“破”的，我总希望诸位先生多费些时间，做些眞正的研究工作，写出一篇“立”的文章出来。你既然说：“马寅初对大跃进情形的解释是不科学的”，那么，读者们都希望你作出一个科学的解释来。你们说：我要独树一帜以示异鸣高。这话怎么说得出口？正因为我不要独树，所以请你们来共树；正因为我不要一家独鸣，所以请你们来大家共鸣。你们不来共鸣，也是一种示异鸣高。有些人更变本加厉地说我要独树一帜，以与马克思对抗，这眞是千古奇谈了。比如11月30日《光明日报》所载的庄次彭先生的文章末段所说，马寅初要独树一帜，以与马克思对抗，他把重点放在“我的”两字（因为我的文章是以《我的经济理论和哲学思想》为题），我用“我的”两字完全是一个责任问题，我立的学说当然是我的，我负责任，你立的学说，当然是你的，你负责任。你立得好，我不来平分秋色，你立得不好，我亦不来代你负责。如果不说“我的”“你的”，请问谁来代我们负责啊？党和政府决定“百花齐放，百家爭鸣”的方针的时候，决不会怀疑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有与马克思对抗的企图。

江苏《群众》杂志第16期社论反对对敢想敢说的人泼冷水。在这里我要很“坦白”地对诸位先生说一说：泼冷水是不好的，但对我倒有好处。我最不怕的是冷水，因为我洗惯了冷水澡，已经洗

了五十多年了，天天洗，夜夜洗，一天洗两次，冬夏不分。因此对我泼冷水，是最受欢迎的。这虽然是锻炼身体的一个好方法，但直接间接影响我的头脑，因此我获得了一个冷静的头脑，很适宜于做科学研究工作。话不多谈了，我相信党，我也拥护党，所以我从党报和党刊（《人民日报》和《红旗》）上引文两段作为对诸位先生的一种贡献。

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说得好。它说：

“学术批判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批判的过程中，应当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不同的意见，都能得到充分发表的机会。眞理是越辩越明的。不同的意见多一些，争辩的时间长一些，是好事。这便于把眞理弄得更鲜明。辩论中要充分摆事实，讲道理，一时还找不到充分事实和理由来驳倒对方的，就应该进一步去分析研究。如果不能说服，而企图压服，那只是学术上无能的表现。‘压服’在思想领域中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学术思想问题和一般思想问题又有不尽相同之处。它需要以丰富的事实为依据。某些学术问题，在一定的时期內，由于材料还不够充分，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就不能下结论”云云。

1959年第10期《红旗》有施东向先生以《为了追求眞理》为题的一篇文章，它给盲目批判的人一个很好的指导。施先生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是我们在追求眞理的道路上所必需依靠的指南针，……但是有了这个指南针，并不能使我们在还沒有解决的科学问题上不费吹灰之力而可达到正确的结论。因此，就是人们确实依靠马克思主义为指南而向前摸索眞理，也会发生不同意见的爭论。要在任何科学问题上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就必须详尽地掌握有关的资料，进行认眞的分析和研究；在越是复杂的问题上，就越是需要穷年累月的努力，才能有眞正的成就”。

“对于学术问题的错误，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要分辨两种性质的错误。有一种人并沒有花过收集材料、认眞研究的功夫，

只是从感想出发，随便说出些错误的意见。这种错误应该说并不是在科学研究中的错误，而是根本不进行科学研究的错误，这种错误除了证明人们不应当这样做以外，沒有任何意义。另一种人是认眞做了研究工作，但是因为方法不对头，掌握材料不完备或其他原因而作出了不正确的，不全面的结论。这种错误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往往是在达到眞理的过程中所难免要经过的过程。科学史证明，在科学问题上，提出正确的结论的人固然是有功劳的，而那些勇于在新的科学问题上进行试探，提出终于被修正甚至被推翻了的假说的人，也是有一定功劳的……参加学术讨论的人，都应当有坚持眞理的勇气。我们的社会，是眞理能够开花结果的社会。但是有人却会因为自己的意见不被多数人赞同而动摇。……如果是正确的意见，即使只有少数人，甚至一二人同意，也应当坚持。在学术讨论中，眞理有时并不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缺乏坚持眞理的勇气的人就会随波逐流，沒有主张”云云。

我很高兴地告诉施东向先生：自《新建设》11月号登出我的文章后，同意我的信已经不是少数了，有的虽表示同意，但不敢签名，只写“读者谨上”字样，这部分地表明了今日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鸣”的眞实情况，我只得唱“独脚戏”。我只得单身匹马出来应战。

在我的文章中沒有把中国人口分为“高等人”和“低等人”，我只说把中国人口的质量提高，包括所有阶层在內，工农和知识分子都在內。不错，国內报上常用“高级知识分子”字样，但这并不是我开始用的，而且这几个字并不代表一个阶级。现代“高级知识分子”都入了工会，大家都是工会会员，只有职务上的区别，沒有阶级上的区别。有的人如宗正把中国人口分为“高等人”“劣等人”，根本不反映今日的现实。至于英国的罗苏和赫胥黎，美国的柯克和爱伦·台耳怎么想、怎么说，那是英国美国的事，我们知道得太少；即有所知，亦不过书本上的知识，死记几句教条主

义，亦不能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无论英美学者怎样说，无关于我们的事。他们尽管说：资本家是“优秀遗传的人”，是“坚强有力的人”，属于“高等人”,劳动人民是“心理不健全”的劣等人，应实行节育，他们尽管把人类分成“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并宣传白种人是“优等民族”应该担负领导世界的任务，主张“劣等民族”应该限制繁殖，“改良人种”，这是他们的胡说八道，与我何干？我所主张的，中国人口，包括各阶层在内都要节制生育，都要提高知识水平。文盲固然要教他们读书，高级知识分子亦要努力研究，提高自己，于必要时要向苏联或其他兄弟国家学习，分阶级的说法对我是不能套用的。中国现在正在形成沒有阶级的社会，地主与资本家已经不存在，抄写几句外国书本的教条主义是纸上谈兵，工人和农民听起来亦不会感兴趣。如果在工人和农民沒有解放之前，在反动党统治时代，在反动党统治的南京或重庆，这些人能勇气百倍，不顾死活，把这些话讲出来写出来，那倒是富有意义的，工人和农民听了，不但会感兴趣，亦且会感激无既。或在共产党境遇很困难的时期，能够说出这些话来，那倒是能起作用的。现在工人和农民已经变为国家的主人翁了，资产阶级已经基本上消灭了，中国已站起来了，不再是半殖民地了，而共产党也已掌握政权，你还来说这些话，既不及时，亦不切实际；不但不切实际，亦是无的放矢。这些人从外国书本上的教条主义中得出“马寅初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结论，这个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讲的是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特殊问题，不是世界人口问题。中国的资产阶级基本上已经消灭，我要为它服务亦无从服起。反过来，法国的学者们和政府如这些人一模一样，正在竭力鼓吹人口增殖，难道法国的学者们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吗？这些人既然要硬说我的控制人口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我何尝不可硬说他们的人口增殖论是为法国人服务呢？因此从书本知识来推论，是非常危险的，不免把一把火烧到自己的身上来。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外国的书本子上，乃在于中国人民的心理

上，广大群众对人口问题到底怎么想，每一对年轻的夫妇是不是还要“儿孙满堂，五世共昌”呢！是不是还相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呢？抑情愿少生几个来提高自己和子女的文化和物质生活呢！因此我们要做一番调查、分析和研究工作，不能徒凭感想来发言。

有的人还把我三、四十年前的老文章拿出来作为我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证据。挖老根，那是挖不胜挖的，这笔帐是算不清的，可以不必费心。不错，在1939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我也作过文章批评过马克思。但在那年我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我自己的阶级，否定了过去的我。所以对1939年以前的老文章，我不负责任了，我自己亦不引用了，正如马克思否定了自己的阶级一样。自那年起直到现在，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挑拨离间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总而言之，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特殊的人口问题，要调查、分析和研究，要用大量的有关资料来立自己的，不能专凭教条来破别人的。毛泽东主席说过：“眞正的理论，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的理论”，因此我重申我的请求。

（原载《新建设》一九六〇年第一期）

附录一

马寅初在中华医学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会上谈控制人口问题

在3月31日中华医学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会上，专家们就控制人口和开展节育工作发表很多意见。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着重谈了控制人口。他说，他以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曾三次到浙江视察，调查了浙江人口增长的情况，浙江每年人口增长率平均是2.5—3%，有的地方高达5%。如果全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以3%来推算，十年以后人口将达八亿多，十五年后将达九亿八千万，五十年后将增加到二十六亿，这个数字是惊人的。马寅初认为，马尔萨斯说生活资料是按算术级数增长，是错误的。他的学说在当时就已破产，因为当时德国科学已相当发达，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同样也按几何级数增加。在目前的我国，人口和生活资料都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生活资料的增长不能说不快，即使这样，人民的生活也只能维持现状，不能够得到改善。今天我们的目的是要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那么，生活资料的增长必须要比人口增长的快，方能达到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的目的。又因为我们中国科学落后，因此，我们就要一面控制人口，一面发展科学，控制人口必须用政治力量才能达到。

马寅初说，生活资料的增长决定于科学的发展，人民政府对发展科学是花了很大的力量的。还没有见过一个政府这样重视科学。英国的科学有三百年历史，美国的科学历史有二百年，苏联从罗蒙诺索夫算起，也是二百年，我国要在十二年内赶上这些国家是有困难的，这就必须一方面发展科学，一方面控制人口的增长。

马寅初说，有人说我国人口出生率是2.2%，即以这个百

分比计算，一年也要增加一千三百万人，据李富春副总理说，在最近几年，工业方面每年只能安插一百万人，其余绝大部分要由农村容纳。但科学发展的结果，工业和农业都要机械化，甚至自动化，那时，一个人就可以做几千人做的事情，这样看来，人口过多与机械化是有矛盾的，与科学发展也有矛盾。控制人口必须要由政府来做，这件事只有我们这个政府做得到。要做这件事的政府，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必须是强有力的，一个是必须是人民拥护的，我们的政府是有这两个条件的。

再者，我们的经济是计划经济，生育也必须要有计划。这两件事必须同时进行，否则要给计划经济带来很多困难。

（原载《光明日报》一九五七年四月三日）

马寅初谈人口问题

（一九五七年四月）

“人口太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马寅初先生在接见记者的时候首先就提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他说：“你想，1953年6月30日我们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人口是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现在过了四年，按照我国人口增殖率千分之二十五计算，每年要增加一千五百万，那么现在我国的人口至少是六亿五千万，以我的估计，人口增殖率不止千分之二十五，而是千分之三十，照这样计算下去，五十年后我国人口就有二十六亿。超过现在全世界人口的总和。你看这还得了！”

我们常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口众多正是我们的骄傲条件之一，现在怎么倒成了问题呢？

我们的老教授说：“你看看我们的人过去是怎样生活的，过去很多人是糠菜半年粮，饥荒时连糠菜都吃不到，吃草根，吃树皮，死亡遍野，乞丐满天下。”

马老认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固然是造成我们贫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口众多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我们贫困的原因。解放后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但是这个改善受到很大限制。

他说：“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早就认识到了。陈云同志是管米的，他当然对这个问题很清楚，过去所以沒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可能是时机不到，现在如果再不谈就不得了啦！”

马寅初教授认为这个问题过去不谈，教条主义从中作祟也发生了影响。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马老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小组会议通不过，有人说苏联沒谈，我们也不能谈，他那篇发言稿子一直到今天还压在那儿。

马老说：“时间过了两年，现在人口问题可以公开谈了，这说明我们国家进步眞快，也说明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了，今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还要谈这个问题。”

人口繁殖的确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马老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现在有计划经济，同时也应该有计划生育。

马老主张推迟结婚年龄，大力宣传避孕，而且这还不够，要用行政手段控制生育。

他说：“赫鲁晓夫曾经说过一个家庭最好只有三个孩子，苏联地大、人少，他们的耕地面积和我国比是二点二比一，而人口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用数学计算，我们比他们大六倍，他们主张三个，我们只能有两个。”

马老说，他个人的主张是两个孩子的有奖，三个孩子的要征税，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就以征来的税款作奖金，国家的预算上既不支出，也不收入。

这样的主张会不会有人反对呢？马老认为一定会有。事情总是这样的。过去北京就有一些顽固的老人，他们认为北京街头的牌坊一个也不能拆，城墙的豁口也不能开，现在豁口打开了，交通便利了，牌坊送到公园安装起来了，这又有什么不好。

他说，年前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在场的科学家都赞成，非科学家有人反对，有人守中立。他认为不管赞成或反对，只要有道理，可以听，最招人生气的是那么一种人，他们见风使舵，看着共产党员反对的多，他也就反对，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马老很气愤地说："这种人在那一行里都有，共产党要听他们这些人的话，早晚要上当。"

接着马老回到本题上说，现在粮食紧张，猪肉紧张，布票对折使用，煤也不够烧，这一切都牵连着人口众多的问题。人口多了，疾病、瘟疫都来了，粮食不够吃要闹事，马老拍拍肚子说："毛病就出在这里，六亿五千万人要吃啊，有人说猪食不够，人要吃饱还有问题呢，还谈得到猪吗？"

"我们不是有很多荒地可以开垦吗？开荒不是可以容纳大量的人口吗？"记者问。

"是的，我们有不少荒地"，马老说，"但是数量并不那么多，我们的耕地只有十六亿市亩，生荒地只有十五亿市亩，加在一起只有二亿公顷多一点，而且不是所有的荒地都能开垦，譬如荒山。说实在的，开荒又谈何容易。"

马老说，大量开荒需要拖拉机，拖拉机从哪里来？即使说我们能造拖拉机，也不能把钢铁都用在拖拉机上；有了拖拉机，也不顶事，拖拉机要喝，汽油从哪儿来？玉门石油矿因为缺少钢板水泥和木料，不能扩建，就是有了这三项材料，运输也成问题。现在从石家庄、郑州往西的铁路线上货物到处都堆满了，运输能力不够，都囤在那儿了。另外开荒要人，要盖房子，修马路，办医院，设学校，还需要大卡车，火车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去，而且有些地方有地方病，有人去了，不服水土，抗不了。

马老认为人口问题不仅是量的问题，也有质的问题。他举例子说，一辆大板车过桥，要十来个人前拉后推，哼呀哼呀地，拉的人脑袋都要碰着地了，干吗不用机器，一推就上去呢？我们要给他们技术，给他们知识，有了机器，一千人做的苦工，只要一

个人操纵机器就够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了，那九百九十九人做什么呢，哪里去找那九百九十九部机器呢？

马老说："也许有人想过，将来自动化了，生产力提高了，每人每天做两小时工作就够了。这个想法很美丽，可是空下来的时间做什么，读书吗？有很多人连扫盲过程都沒经过，书也读不懂，中国现在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人还不能阅读。好，即使能读书，教员在哪儿，书在哪儿，纸张这么贵。"

马老接着说："我们总的情况是劳力多，资金少。资金少，投资就少，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自动化，所以现在安插人是第一，大型工业不要多，可以因地制宜，多搞一些中小型工业，这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一个办法。"

马老再次地提出来必须计划生育和控制生育，我们既然认识教育是国家的事情，那末生育同样是国家的事情。我国的经济是由小农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私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我们的社会是集体的社会，集体的社会要有集体的生活，因此不能够认为结婚生孩子，仅仅是私人的事情，它牵涉到我们的集体利益。

"那么你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看法怎样？"记者问。

马老答道："马尔萨斯的理论肯定是反动的。他说食粮按算术级数增加，是不对的。食粮也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

他举出我国的例子，人口增加率是千分之三十，食粮增加率几年来是千分之四十到五十，可见食粮增加得快，但是食粮增加的速率不能长期地这样下去，因为耕地有限，将来总要成为问题的。

他认为马尔萨斯理论的出发点是维护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我们是为人民，为了我们人民自己的政府，我们不要战争，更不能想象用战争来消灭人，我们从爱人出发，要我们的人生活得幸福和繁荣。

最后马老谈到他对刮子宫和人工流产的看法。他说："邵力老赞成，我可反对。这对母亲的身体影响很大。"他有几个亲戚

身体本来很好，刮了子宫后不是生这样病，就生那样病，而且马老认为这样做，也是犯罪行为。孩子在母体里已经成形了，它就有了生命权，除非母亲身体不好，一般不能这样做。他说："如果一提倡，医院就得专门搞刮子宫了，别的病不用看了，我们哪有那么多医生和床位呀，再说提倡人工流产就会冲淡迟婚的宣传，男性觉得反正可以刮子宫，就更无顾忌了。"

马老非常兴奋。他同记者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英明。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来后，过去多少不敢谈和不能谈的问题都开始谈了，可以想见今后学术界的繁荣和兴旺，他愿意把这个问题摊开来，提供大家研究、讨论。

（原载《文汇报》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马寅初在北京大学谈我国人口问题

关于中国人口问题，曾在全国各方面引起广泛的注意和讨论。七十六岁的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二十七日向北京大学师生发表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

主 要 论 点

马寅初在报告中说，我国目前有一个新的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从人口问题和科学研究两方面着想。

马寅初认为，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大力进行科学研究。大学要同科学院、产业部门密切合作，眞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特别要结合中国实际，提高生产水平。他说，光是这样做还不够，如果对人口的增加不加以控制，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马寅初在报告中还提出了这样的论点：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

人口增长速度惊人

马寅初用具体数字说明中国人口增加的速度。他说，一九五三年，国家曾经对全国人口进行过一次深入的普查，并且得出中国人口的增加率平均每年为千分之二十二。四年以来，国家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如就业的人多了，组织家庭比过去容易了；妇女在产前产后都有休假，加上保健事业的发展，婴儿和母亲的死亡率大大下降；内战消灭了，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已经没有了；还有社会环境改变了，许多尼姑、和尚也结了婚。这些条件都是使人口增加得比过去快的原因。因此，他认为人口增加率应该是千分之三十，而这个数字还是很保守的。他说，中国的人口这样增加下去，五十年后就是二十六亿了。因此他主张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必须实行计划生育。

采取措施控制人口　坚决反对人工流产

关于如何控制人口的问题，马寅初主张用避孕和适当地推迟结婚年龄的办法。马寅初坚决反对人工流产。他说，在这一点上，他跟邵力子先生的意见不同。他说，既然已经怀孕，“人”形成了，“他”就应该有生的权利，把他杀掉，就是犯罪。父母杀子女，还成什么话！同时，人工流产对母亲的健康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他认为，赞成人工堕胎，就会把避孕冲淡了。他还说，我国人口多，耕地少，最好是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他主张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

（原载《北京日报》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录二

马寅初主要论著目录

纽约市财政　　　　纽约　　　　1914年

马寅初教授论法科应废止毕业论文

　　《北京大学月刊》1918年5月17日

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

　　《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3号　1919年3月

战时之物价与货币

　　《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4号　1919年4月

大战前欧美各国之不换货币与我国的金钞

　　《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4号　1919年4月

吾国信托公司前途的推测

　　《总商会月刊》第1卷1号　1921年1月

马寅初先生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讲演辞

　　《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3号　1921年12月5日

中国之九大经济问题

　　《东方杂志》第19卷1号　1922年1月10日

中国国际贸易之眞相

　　《东方杂志》第19卷10号　1922年5月25日

马寅初演讲集（1—4）

　　《商务印书馆》1923年9月

第1集

银行之根本问题（1920年10月）

吾国恶币之影响（1920年11月）

中国的交易所（1920年12月）

上海交易所前途之推测（1921年2月）
上海140个交易所（1921年12月）
吾国币制之整理（1921年1月）
外国货币买卖之危险（1921年2月）
经济学中之重要哲理（1921年3月）
通货派与银行之学说（1921年5月）
中外国际贸易之比较（1921年5月）
今日之轻质铜元问题如何解决（1921年5月）
中外汇兑之缺点（1921年5月）
货币之起源（1921年6月）
信托公司（1921年6月）
吾国信托公司前途之推测（1921年7月）
中国的经济问题（1921年8月）
评今日我国之讲社会主义者（1922年3月）
银行及交易所与社会之关系（1921年4月）
批评普通人对于银行与钱庄之心理（1921年4月）
吾国商界与银行界须注意于商业票据（1921年4月）
国钞挤兑不合乎经济原则（1921年11月）
世界最大之国家银行如何维持（1921年11月）
关于与国钞挤兑之关系（1921年12月）
今日洋商银行之势力（1921年12月）
中国之九大经济问题（1922年1月）
1400万盐余国库券之利息如何计算（1922年2月）
中国国际贸易之眞相（1922年3月）
十一年公债之市价如何计算（1922年10月）
创设农工银行之必要（1922年10月）
马克思学说与李士特学说二者孰宜于中国（1922年5月）
上海金融状况（1922年2月）
太平洋会议与吾国关税问题（1921年11月）

裁厘加税问题（1922年10月）
中国银行所居之地位（1922年11月）
地方财政（1922年10月）
中国重利问题（1922年11月）
吾国银行发行钞票困难之原因（1922年12月）
何谓经济（1922年12月）
金融界应注意之要点（1922年11月）
好政府与好商人（1921年12月）
吾国关税与币制的关系
读晏君才杰著公债论抒所见（1922年1月）
经济界之危险预防法（1920年5月）
中国公债问题（1921年7月）

第2集

以科学眼光观察中国之财政与金融（1924年3月）
读第五届银联会议决各案随抒我见（1924年4月）
中外救济银根紧急方法之不同（1924年1月）
中国何以如此之穷（1924年5月）
欧战后之货币
整理案内各种公债涨价原因（1924年5月）
中国财政与教育之关系
中国银行界前途之危机
何以上海必须设立票据交换所（1924年4月）
改革吾国币制之第1步
价值
出洋学经济与商科的留学生应有何种预备
吾国创办公司之困难
公库制与集中制之比较
中国财政之根本问题

上海之银洋并用问题
短期财政计划我见（1923年 4 月）
今日吾国经济状况之一班（1923年 3 月）
中外信用制度之异同（1922年 1 月）
吾国滥铸铜元之原因（1922年10月）
中国女子经济问题
吾国银行业与欧美银行业之比较
何谓九八规元
日本震灾后金价何以看跌投机家何以失败
我国经济界之三滥（1923年12月）
吾国新式银行之准备金问题
上海金融紧缩之原因（1922年 3 月）
票据交换所与上海钱业汇划总会（1922年 1 月）
吾国银行业历史上之色彩
银之市场与银之现期两种买卖
吾国关税问题（1924年 8 月）
经济与教育之关系（1924年 8 月）
中国之银行问题
兑换纸币
吾国公债票之买卖
有奖储蓄存款之害及其推算方法
格来森法则之研究
吾国公司之弊病
中国外债之特色（1924年 8 月）
金佛郎问题之研究
无确实抵押品之内外债问题（1924年 8 月）
中国币制问题（1924年 8 月）
德发债票问题（1924年 8 月）
一年来之金融

第3集

如何提倡中国工商业
吾国之财政适合于对外宣战否（1925年7月）
汇丰银行
不平等条约与中国经济之关系（1925年8月）
上海不宜继续罢市（1925年6月）
中英日之经济关系（1925年6月）
以抵制英日货代保护关税
上海租界之历史及其性质
筹款方法与抵制英日货
总罢市总罢工之足以自杀
不平等条约于我国经济上之影响（1925年6月）
中国预算之缺点
上海经济新闻如何读法（1924年）
中国国家税与地方税之划分
吾国何以不能施行贴现政策
中国财政之紊乱
英国之过去现在和将来（1925年10月）
上海之工部局（1925年10月）
十三年中国经济恐慌之根本原因（1924年12月）
中国劳资问题（1925年8月）
中国缺乏资本之影响（1925年10月）
经济要素（1925年9月）
中国财政之改造（1925年10月）
中国经济之分裂（1925年8月）
吾国之入超如何补救
中国农工商矿之状况（1925年7月）
五卅事件后中国经济上之损失（1925年10月）

我国银行间相互往来何以不甚密切
中国关税问题之研究
关税特别会议（1925年10月）
收回权利与关税问题
中国关税问题（1925年10月）
关税自主权何以必须收回（1925年11月）
国民对于关税会议应注意之要点（1925年11月）
关税会议日美提案之比较（1925年11月）
关税自主与出厂税问题
关税会议与英日美（1925年12月）
关税会议与关款存放问题（1925年12月）
关税会议与出口税（1925年12月）
中国整金与外国厘金之比较（1925年12月）
日本之对于二五附加税与法国之对于奢侈税

第4集

反对今日之禁烟办法（1927年11月）
评财政部浙江禁烟局改组宣言
鸦片问题（1928年1月）
本省之禁烟问题（1927年11月）
北大之责任与鸦片问题（1928年2月）
北大之精神（1927年12月）
中国之经济组织（1927年11月）
吾国编制预算之困难（1927年11月）
中国银行制度问题（1927年11月）
中国之劳资问题（1928年1月）
何谓商（1927年11月）
马克思价值论之批评（1927年10月）
帝国主义与新经济政策（1927年8月）

营业税在税制中之地位（1927年 9 月）
市财政（1927年 7 月）
银价低落救济问题（1927年 2 月）
中国之劳农与经济（1927年10月）
新经济政策下之金融问题（1927年 5 月）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实行之可能性否？（1927年 5 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之劳农（1927年 4 月）
实行新经济政策之障碍（1927年 5 月）
中国今日之劳资问题（1927年 3 月）
中国历代经济政策，尚共产乎，抑尚均富乎？（1927年 3 月）
在中国的洋商（1925年11月）
附致北京英文日报及北京英文导报记者的信（1925年12月）
中国经济上之根本问题（1926年10月）
中俄经济上之关系（1927年 4 月）
为整理内外债所发行一种统一公债究以何种货币为宜
（1926年12月）
营口由银码头渐变为空码头之原因及其经过（1925年10月）
思想与经济（1927年 6 月）
平均地权（1927年10月）
现代之新经济政策（1928年 3 月）
女子之正当运动（1927年 5 月）
投机与赌博之区别（1927年 2 月）
农村信用合作社（1926年10月）
不平等条约外的不平等（1927年10月）
吾国内债亟应改良之几点（1926年）
禁烟应归财政部办理乎？（1928年 4 月）
有价证券之贷借（1926年）
关于禁烟问题之几个要点（1928年 4 月）
俄国庚款之估计（1926年）

台湾禁烟之办法（1928年3月）
浙江之两税制（1928年3月）
今日之佛教（1928年5月）
东三省之货币交易与套印
上海之银洋并用问题

《东方杂志》第21卷6号　1924年1月

中国财政之根本问题

《东方杂志》第21卷3号　1924年2月10日

价值论

《东方杂志》第21卷11号　1924年6月

利用外资的三种方法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1卷1号　1924年

不平等条约于我国经济上之影响

《东方杂志》第22卷16号　1925年8月

汇丰银行

《东方杂志》第22卷18号　1925年9月25日

汇丰银行

《东方杂志》第22卷19号　1925年10月10日

中国国外汇兑

《商务印书馆》1925年12月

银行之势力何以不如钱庄

《东方杂志》第23卷4号　1926年2月

中国历年入超之解释及其危险

《东方杂志》第23卷8号　1926年4月

中国之财政与金融

《东方杂志》第23卷21号　1926年11月

中日现行通商航海条约之研究

《东方杂志》第23卷23号　1926年12月

中国经济上之根本问题

《东方杂志》第24卷4号　1927年2月

中华银行论

《商务印书馆》1929年7月

中国租佃制度之研究

《经济学季刊》第1卷1期　1930年4月

关税征金与改革币制

《经济学季刊》第1卷2期　1930年7月

中国关税问题

《商务印书馆》1930年

裁厘后的营业税问题

《经济学季刊》第2卷2号　1931年6月

德国之营业税

《经济学季刊》第2卷2号　1931年6月

营业税在税制上之地位

《经济学季刊》第2卷2号　1931年6月

浙江之营业税

《经济学季刊》第2卷2号　1931年6月

资本主义欤共产主义欤

《东方杂志》第28卷24号　1931年12月25日

长期抵抗的准备

《时事月报》第6号　1932年6月

马寅初经济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1932年12月

第1集目录

票据法原则

票据法总说明

新颁布之票据施行法

新颁布之交易所法

公司法施行法之精意
平均地权
怎样去平均地权
中国的租佃制度
英国停止金本位之前因后果
日本的金解禁问题
购买力平价
商标与商标法
再论商标与商标法
新颁布之商标法
营业税法之精意
裁厘后的营业税问题
浙江之营业税
营业税在税制上之地位
浙江营业税之现状
营业税之模范
田赋改革之必要
中国之盐税问题
外货倾销亟应取缔论
普通银行法草案具体说明
对于钱庄法之意见
关于储蓄银行法之各种意见
读徐青甫先生“国难期间经济之设计”书后
国难期间之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制
长期抵抗之准备
战债和赔款之缓付问题
世界经济之大势
国难期间世界经济大势
废两改元问题

再论废两改元并答吴经熊先生（附吴经熊先生文）
银价跌落救济问题
银价跌落与人民生活之关系
物价变动之影响
银贱潮中应注意前因后果
读财政部甘末尔设计委员会改革币制计划书后
印度之改用金块本位制
关税征舍问题
反对今日之鸦片政策
浙江土地陈报及改正赋额
辽宁之金融
中国土地整理问题
《银行周报》第17卷29号　1933年2月1日
新商会法与工商同业工会法
《经济学季刊》第4卷1号　1933年3月
棉麦借款问题
《军需杂志》第22号　1933年6月
凯塞尔社会经济学原理之解释
《经济学季刊》第3卷3号　1933年9月
中国之工资与利息问题
《银行周报》第17卷39号　1933年10月
世界经济大势
《经济学报》第5卷8—9号　1933年10月
马寅初讲世界经济会议失败与中国之关系
《之江校刊》第58期　1933年10月31日
复兴农村的途径
《华安》第2卷1期　1933年11月10日
中国家庭思想与经济关系
《商学期刊》第2卷3号　1933年11月

提倡国货的方法

《南京市政》第35期　1933年11月30日

个人计划

《东方杂志》第31卷1号　1934年1月1日

中国币制本位问题

《经济学月刊》第1卷2号　1934年1月

中国金融制度之缺点与其改革方案

《申报月刊》第3卷1号　1934年1月

上海金融组织及其缺点

《商学期刊》第8号　1934年1月

世界经济会议之失败与我国统制经济之关系

《军需》第24期　1934年1月

统制经济问题

《时事》第10卷2期　1934年2月1日

白银协定批准问题

《河北财政》第53期　1934年2月

中国之土地整理问题

《军需》第25期　1934年5月

美国白银政策与我国之利害

《时事》第10卷4期　1934年4月1日

美国白银政策与白银协定

《银行周报》第18卷12号　1934年4月

对白银协定意见

《民智》第3卷4期　1934年4月16日

美国之吸收黄金白银政策与我国之关系

《东方杂志》第31卷8号　1934年4月16日

制度学派康孟氏之价值论(上)

《经济学季刊》第5卷1号　1934年4月

余对于银行资本额股东负双倍责任及储蓄银行董事监察负连带无

限责任之意见

《银行周报》第18卷18号　1934年5月

全国财政会议议决之重要原则

《东方杂志》第31卷14期　1934年7月16日

田赋改革之必要

《浙江财政》第7期　1934年7月

利用外资之三种方法

《中山文化》第1期　1934年8月

制度学派康孟氏之价值论（下）

《经济学季刊》第5卷2号　1934年8月

有奖储蓄及白银问题

《武汉日报》　1934年9月5日

亟应准备之战时财政问题

《银行周报》第18卷34号　1934年9月

白银出口问题

《国货日报》第1卷9期　1934年9月

湖南之经济与金融

《银行周报》第18卷39号　1934年10月

如何使上海游资及外国余资流入内地以为复兴农村之准备

《武汉日报》　1934年11月10日

马寅初讲白银问题

《晨报》　1934年11月9日

国富与未来大战之关系

《武汉日报》　1934年11月11日

世界第二次大战我国经济上的准备

《青年》第1卷12期　1934年11月16日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思想之两大派

《银行周报》第18卷46号　1934年11月

评财政部之白银政策

《时事月报》第11卷6期　1934年12月1日

快乐之生活

《东方杂志》第31卷24号　1934年12月16日

发展工农与集中力量

《银行周报》第18卷50号　1934年12月25日

白银问题

《国府文职》第1期　1934年12月

《武汉日报》1935年1月20日

入超问题

《国府文职》第1期　1934年12月

资本主义发展史

《商务印书馆》　1934年

经济力量集中之途径与运用之范围

《文化建设》第1卷4号　1935年1月1日

《四川经济月刊》第3卷1期　1935年1月

中国棉业之前途

《东方杂志》第34卷13号　1935年1月

有奖储蓄与民族自觉

《中央日报》　1935年1月24、27日

中国经济改造

《商务印书馆》　1935年1月

马寅初对最近几件金融立法的说明

《武汉日报》　1935年2月3日

《中央日报》　1935年2月16日

个人主义与全体主义

《武汉日报》　1935年2月17日

最近的几件金融立法

《时代公论》第3卷47号　1935年2月

利用外资方式中之华洋合资问题

《银行周报》第19卷11号　1935年3月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真谛

《中央日报》　1935年5月23日

入超问题与利用外资

《时事月报》第13卷5号　1935年5月

我国银本位应放弃乎抑应维持

《中央日报》　1935年6月3日

对白银问题意见

《中央时事》第4卷23期　1935年6月22日

金融与财政

《武汉日报》　1935年6月30日

中国之经济危机

《学校生活》第109期　1935年6月30日

公库制问题

《国府文职》第2期　1935年6月

定额分配输入制问题

《国府文职》第42期　1935年6月

请国人注意银向及幷对美国经济考察团进一忠告

《交易所周刊》第1卷23号　1935年6月

吾国生产问题中之两方面——货币方面与经济方面

《银行周报》第19卷24号　1935年6月

世界经济恐慌之起源过程及其结果

《国府文职》第2期　1935年6月

中国经济问题与中国货币问题

《国府文职》第2期　1935年6月

《武汉日报》　1936年1月1日

中国与中国之对策

《东方杂志》第32卷13号　1935年7月1日

中国经济之危机（续）

《学校生活》第110期　1935年7月10日

苏俄经济生活之鸟瞰

《银行周报》第19卷29号　1935年7月

世界经济恐慌如何影响及于中国与中国之对策

《东方杂志》第32卷13号　1935年7月

就银本位之资格论中国可否放弃银本位

《武汉日报》　1935年8月11日

中国要早日实行工业化

《津浦铁路》第5卷8期　1935年8月

《交大季刊》第17期　1935年9月

吾对于经济建设之意见

《银行周报》第19卷32号　1935年8月

英日联合对华投资问题

《武汉日报》　1935年10月26日

个人主义之将崩溃

《银行周报》第19卷41号　1935年10月

欲解决入超非利用外资不可

《银行周报》第19卷38号　1935年10月

补救金本位制之四种方案

《银行周报》第19卷46号　1935年10月

中国之经济建设

《上海党事》第1卷45期　1935年12月1日

上海证卷交易所有开拍产业证卷之可能乎

《东方杂志》第33卷1号　1936年1月1日

中国经济改造之中心问题

《武汉日报》　1936年1月19日

再论物产证卷与按劳分配

《银行周报》第20卷4号　1936年2月

物产证卷与按劳分配

《劳动生活》第1卷3—4期　1936年3月1日
入超与币制改造问题
《武汉日报》　1936年3月16日
论纸本位
《银行周报》第20卷9号　1936年3月
论英国之外汇平准基金
《银行周报》第20卷14号　1936年4月
中国新金融政策与银价跌落之关系
《武汉日报》　1936年5月17日
稳定物价与稳定汇价
《银行周报》第20卷19号　1936年5月
非常时期之财政问题
《上海申报》　1936年5月24、26日
防止走私最好方法
《中央日报》　1936年6月7日
内价与外价之关系
《武汉日报》　1936年6月10日
非常时期之经济问题
《武汉日报》　1936年6月14日
非常时期的管理经济
《管理》第1卷2期　1936年7月6日
我国币制能不受任何国家币制度变动之牵制乎
《银行周报》第20卷32号　1936年8月
国际贸易何以有统制之必要
《武汉日报》　1936年9月13日
马寅初在中国经济学新13届年会闭幕词
《经济学季刊》1936年9月
各国经济统制之理论与实际
《银行周报》第20卷36号　1936年9月

经济统制之理论与实际（续）

《银行周报》第20卷41期　1936年10月20日

法郎贬值与中国

《银行周报》第20卷24期　1936年10月27日

法郎贬值与我国所受影响

《中央日报》　1936年10月17日

意大利之经济统制

《银行周报》第20卷45期　1936年11月7日

非常时期之物价问题及货币政策

《经济学季刊》第70卷3号　1936年11月

世界经济大势与中国前途

《银行周报》第20卷45期　1936年12月8日

中日问题

《东方杂志》第34卷1号　1937年1月1日

二种主义之相互影响

《武汉日报》　1937年1月1日

日本工业进步之原因

《银行周报》第21卷2期　1937年1月9日

经济思想随社会环境变迁之程序

《东方杂志》第34卷1号　1937年1月

中国之工业化

《银行周报》第21卷7期　1937年2月3日

马寅初讲国际经济

《杭州市教》　1937年2月6日

中国国际外贸易如何失去权利与古典派学说应如何更正

《武汉日报》　1937年2月14日

非常时期之物价问题与纸币政策

《新商业》第2卷2期　1937年3月6日

非大量生产之中国经济及其救济办法

《银行周报》第21卷10期　1937年3月6日

奖励国货工厂困难与增加资本之方法

《银行周报》第21卷14期　1937年4月3日

中国经济之复兴与减抵利息之必要

《中山文化》第4卷2期　1937年4月6日

中国工业进步迟滞之原因及其救济办法

《海王》第9卷24期　1937年5月1日

我国预算法币与工业之连锁关系

《银行周报》第21卷18期　1937年5月1日

解决分配世界资源问题当从自由贸易做起

《世界政治》第1卷5期　1937年5月5日

中国保险事业与新中国建立之关系

《银行周报》第21卷19期　1937年5月8日

中国之新金融政策（上、下册）

《商务印书馆》　1937年7月

法郎贬值

《武汉日报》　1937年11月29日

国际经济大势与中国之危机

《武汉日报》　1937年12月20日

战时财政问题

《四川经济月刊》第9卷12号　1938年2月

二十六年暑期庐山谈话会讨论战时财政问题

《四川经济月刊》第9卷1·2合期　1938年2月

统一公债之检讨

《四川经济月刊》第9卷4号　1938年4月

中国社会组织与传统的经济思想的关系

《四川经济月刊》第9卷5号　1938年5月

余对于改善地方金融机构之意见

《四川经济月刊》第9卷6号　1938年6月

法币与公债政策

《时事类编》第15期 1938年6月

大工业之外同时维持小工业

《现代读物》第2卷7期 1938年7月

非常时期的法币与外汇

《四川经济月刊》第10卷3号 1938年9月

欧战后马克何以崩溃

《四川经济月刊》第10卷3号 1938年9月

消极的经济制裁不如积极的实施援助

《四川经济月刊》第10卷3号 1938年9月

论立法院通过之总遗产税

《武汉日报》 1938年10月18日

所得税暂行条例施行以来所表现之流弊

《重庆·扫荡报》 1938年10月30日

论战时过分利得税

《经济动员》第8号 1938年11月

统制物价为节约运动与长期抗战之先绝

《四川经济月刊》第10卷6号 1938年12月

中国法币与英币联系之理由

重庆与桂林的《扫荡报》 1938年12月4日

政府对于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办法之要点

《国民公报》 1938年12月11日

门户开放与高尚思想

《经济动员》第2卷2期 1938年12月31日

读书与经济

《经济知识》第1卷1期 1938年12月

论总遗产税与分遗产税

《财政评论》 第1卷1号 1939年1月

法币法价打破之危险

《财政评论》第1卷2号　1939年2月

法币与抗战

《新华日报》　1939年2月20日

统治物价政策中之最高价与最低价

《国民公报》　1939年2月26日

日本支那通提出破坏法币之种种方案及其结果

《时事新报》　1939年3月5日

核减利率应以一般经济情形为对象

《国民公报》　1939年3月26日

中国的专利法

贵阳《中央日报》1939年4月30日

论华北伪“临时政府”之币制统制及其对策

《时事月报》　1939年4月号

论外汇平准基金

《财政评论》第1卷5期　1939年5月

何以急需吸收国内资金

《经济动员》第3卷7、8合期　1939年9月

中国之国际贸易

《西南实业通讯》第1卷4号　1940年4月

怎样稳定法币

《新华日报》1940年6月1日

抗战第四年经济

《新华日报》1940年7月3日

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

《时事类编》特刊第54号　1940年7月

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

《时事类编》特刊第57期　1940年10月20日

战时经济问题

《新华日报》1940年11月8日

战时经济政策

《新华日报》1940年11月11日

西南经济建设与继续抗战的先决条件

香港《工商日报》1940年12月6日

战后的经济问题

香港《大公报》1940年12月8日

经济学概论

《商务印书馆》1943年1月

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

《民主与科学》第1卷1号 1945年1月

在世界和平的民主潮流中，中国需要伟大政治家，能够眞正膺总理遗教，为老百姓做事

《新华日报》1945年3月6日

在欢宴文化战士郭沫若会上的讲话

《新华日报》1945年4月9日

国际形势与国内政治的联系——记马寅初先生在交大的演讲

《新华日报》1945年5月19日

战时经济论文集《作家书屋》1945年5月

（书目）

经济力量集中之途径与运用之范围（1935年1月）

意大利之经济统制（1936年11月）

我国预算法币与工业之连锁关系（1937年2月）

中国之银行制度（1937年6月）

二十六年暑期庐山谈话会讨论战时财政问题（1938年2月）

统一公债之检讨（1938年4月）

论战时过分利得税（1938年5月）

将来之法币（1938年5月）

余对于改善地方金融机构之意见（1938年6月）

大工业之外同时维持小工业（1938年7月）

非常时期的法币与外汇（1938年8月）
第一次欧战后马克何以崩溃？（1938年9月）
消极的经济制裁不如积极的实施援助（1938年9月）
论立法院通过之总遗产税（1938年10月）
所得税暂行条例施行以来所表现之流弊（1938年7月）
中国法币与英币联系之理由（1938年12月）
政府对于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办法之要点（1938年12月）
法币法价打破之危险（1938年12月）
门户开放与高尚思想（1938年12月）
统制物价为节约运动与长期抗战之先决问题（1939年1月）
统制物价政策中之最高价与最低价（1939年2月）
日本支那通提出破坏法币之种种方案及其结果（1939年3月）
核减利率应以一般经济情形为对象（1939年3月）
中国的专利法（1939年4月）
论华北伪临时政府之币制统制及其政策（1939年4月）
论外汇平准基金（1939年5月）
中国之国际贸易（1939年6月）
中日货币战（1939年6月）
何以急须吸收国内资金（1939年9月）
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1940年7月）
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惟一的出路（1940年10月）
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收回膨胀的纸货（1940年11月）
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1944年12月）
经济力量集中之途径与运用之范围（1935年1月）
中国战后之福利经济

《民主与科学》第1卷5、6合期　1945年5、6月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9日

黄金政策所表现之经济政策

《商务日报》1945年9月17日

肃清贪污才能实现工业化，一切都取决于民主

——马寅初先生讲妇女问题

《新华日报》1945年9月17日

马寅初讲投资与国际贸易

《商务日报》1945年10月25日

工业革命与土地政策

《新民报》1946年1月1日

急起自救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

吾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希望（人民对政治协商会议意见）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

我国经济问题

《新蜀报》1946年1月10日

新公司法和官僚资本

《商务日报》1946年2月5日

马寅初教授在各校演讲——为什么要庆祝政协成功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4日

中国工业要有发展，必须坚决反对官僚资本——在中国经济事业协会四川分会成立会上讲话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

中国战后之经济建设

《商务日报》1946年3月30日

中国今后应采的经济政策

《商务日报》1946年4月1日

挽救目前经济危机非打倒官僚资本不可

《新华日报》1946年4月9日

马寅初讲当前经济问题

《商务日报》1946年4月10日

向王若飞诸先生学习

《新华日报》1946年4月19日

马寅初谈外汇问题

《商务日报》1946年5月2日

中国目前经济之危机

《商务日报》1946年5月4日

经济政策要通盘打算

《世界日报》1946年5月21日

外汇问题

《银行通讯》第6号1946年5月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商务日报》1946年5月21日

马寅初讲黄金政策

《商务日报》1946年5月26日

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

——马寅初先生在沪江大学讲演纪录

上海《文汇报》1946年6月5日

解救当前经济危机，首须解决政治问题

《新华日报》1946年6月15日

农业、工业与国防工业之连锁

《经济周报》第2卷22号 1946年6月

关于中美商约

《经济周报》第3卷20号 1946年11月14日

消息传出上海震动，民主人士一致愤慨

《新华日报》1946年12月31日

土地税

《观察》第1卷18号 1946年12月

上海《文汇报》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十二日

1947年经济展望

《经济周报》第4卷1号 1947年1月2日

农工配合与力量集中

《大学月刊》第6卷1期 1947年1月

今日我国经济的总检讨

上海《文汇报》1947年1月10、11日

《现代经济文摘》第1年1号1947年2月

英美经济问题与中国经济问题（二月七日在暨南大学讲词，湖深笔录）

上海《文汇报》1947年2月9日

金钞黑市禁不掉

上海《联合晚报》1947年2月19日

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

上海《文汇报》1947年2月27日

《商务日报》1947年3月3日

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行得通吗？

《现代经济文摘》第1年1号 1947年3月

经济学者工作的对象

上海《文汇报》1947年3月4日

在今日的中国，何以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上海《文汇报》1947年3月5日

人权

《文汇报》1947年3月26日

马寅初论美金债卷

上海《文汇报》1947年3月30日

以德服人欤抑以力服人欤？

上海《文汇报》1947年4月12日

中国经济之路

《经济评论》第1卷4号 1947年4月

弊病太多了

上海《大公报》1947年3月30日

《现代经济文摘》第1年5号 1947年4月

对日贸易开放与损害赔偿问题

《大学月刊》第6卷3、4合刊 1947年4月

论外汇政策与魏使声明

《金融汇报》第54号 1947年9月17日

中国经济问题决于政治

《经济评论》第2卷1期 1947年10月4日

如何建设国民经济

《中国建设》第3卷2号 1947年

通货新论

《商务印书馆》1947年

论"恢复银本位"

《中国建设》第6卷2号 1948年5月

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

《商务印书馆》1948年

我为什么赞成开征财产税和资本税

《经济评论》第2卷15期 1948年1月10日

马寅初先生在欢迎会上讲演词

《人民日报》1949年5月26日

中国现阶段统一财经工作的轮廓

《展望》第5期 1950年4月29日

革命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反动政府经济政策之比较

《经济周报》第11卷7期1号 1950年8月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展望》第6卷5期 1950年8月

加强保卫世界和平运动

《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6日

我对二届世界和大的感想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9日

绝不能等待和平必须争取和平

《上海工商》第2卷8号　1951年1月

看得见的成就看不见的成就和想不到的成就

《光明日报》1951年6月24日

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

《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3日

在毛主席领导下努力完成抗美援朝任务

(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一届三次会议上发言)

《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9日

华东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报告

《解放日报》1951年11月26日

驳资产阶级的荒谬论调(马寅初八日对上海解放日报记者发表谈话)

《人民日报》1952年2月11日

彻底粉碎美国侵略军的阴谋

《人民日报》1952年3月14日

我国1952年度国家财政收支预算的优越性和特点

《经济周报》第34期　1952年

《人民日报》1952年8月17日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团结起来为拯救和平而斗争

《人民日报》1952年9月5日

1953年国家财政收支预算的特点

《人民日报》1953年3月27日

庆祝1953年的胜利

《经济周报》第39期　1953年

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新华月报》1953年3月号

为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而努力（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新华月报》1954年6期

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谈话（祝贺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

《人民日报》1954年7月27日

马寅初代表的发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人民日报》1954年9月27日

坚决反对使用原子武器欢呼我国和平使用原子能的研究

《光明日报》1955年2月18日

新中国货币制度的特点与优越性

《人民日报》1955年3月9日

愤怒和哀悼

《光明日报》1955年4月17日

向莫斯科大学致热烈的祝贺——为莫斯科大学校刊而作

《光明日报》1955年5月7日

亚洲区域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人民日报》1955年5月18日

发刊词

《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5年7月1日

庆祝莫斯科大学开学二百周年

《人民日报》1955年8月7日

热烈欢迎新同学

《北京大学校刊》1955年9月9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周年

《北京大学校刊》1955年9月30日

视察中的八个印象（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新华半月刊》第88期

《光明日报》1956年6月23日

我也来谈百家争鸣

《人民日报》1956年7月11日

我国预算的优越性

《人民日报》1956年7月18日

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

《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8、29日

马寅初在中华医学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会上谈控制人口问题

《光明日报》1957年4月3日

马寅初谈人口问题

《文汇报》1957年4月27日

《北京日报》1957年4月29日

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

《大公报》1957年5月9日

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12日

两种性质不同物价上涨

《大公报》1957年5月12日

民主党派也要拆墙，学校党委制不能退出学校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6日

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等言论发表些意见

《人民日报》1957年6月15日

新人口论（在第一届全国人代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人民日报》1957年7月5日

我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与经济学的复辟

《文汇报》1957年10月3日

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

学习苏联贯彻社会主义教育路线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0日

谈谈我锻炼身体的体会

《新体育》1957年第8期

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

《财政出版社》1958年2月

马寅初校长的两张大字报

《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3月21日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五四”

《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4月30日

再谈我的平衡理论中的“团团转”理论

《光明日报》1958年5月9日

有计划的生育和文化技术下乡（人大一届五次会议的发言）

《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6期

再谈平衡论和团团转

《光明日报》1958年7月24、29、30、31日

《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

两个请求转载的理由

《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1号

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

《新建设》1959年11月

重申我的请求

《新建设》1960年第1期

新人口论

《北京出版社》1979年11月

有关报导马寅初先生重要活动和谈话的文章目录

马寅初先生的特别演讲题目

《北大日刊》1919年12月6日

马寅初先生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演讲辞

《北大日刊》1921年12月5日

马寅初社长在中国经济学社第九届年会致词

《经济学季刊》1933年9月16日

马寅初昨日讲演“法币与抗战”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0日

基督教各大学旅渝校友联谊会请马寅初讲“西南建设问题与法币问题”

《新华日报》1940年6月28日

马寅初在渝实验剧院讲演“战时经济政策”

《新华日报》1940年11月11日

马寅初氏在重大演讲“英美德的税制是否适宜于中国”

《新华日报》1940年11月25日

各方系念之马寅初赴前线工作

《新华日报》1940年12月13日

要求国民党政府保障人权释放马寅初氏（社论）

《新中华日报》1940年12月29日

马寅初教授被捕经过

《新中华日报》1941年3月23日

重大学生定期庆祝马寅初云秩大寿

《新华日报》1941年3月24日

重要声明“纪念马寅初寿辰文章二篇奉令免登”

《新华日报》1941年3月30日

美国人民愿意前来投资、希望我国和平民主团结——马寅初先生讲演“黄金政策所表现的经济政策”中的论点

《新华日报》1945年9月17日

马寅初先生讲话：经济内战也要制止，官僚资本摧残民族工业是工业界的“浩劫”中共赞成中国民族资本发展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24日

名经济学家教授马寅初先生昨在中大演讲官僚资本、兼论新公司法诸问题

《新华日报》1946年2月5日

经济学家马寅初等抨击“经济紧急措施”指出该方案施后，将招致社会更大不安，对官僚资本更形有利，内战不停，任何方案都难避免崩溃的命运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9日

资本更形有利，内战不停，任何方案都难免崩溃之命运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9日

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教授讲演：中国经济建设问题

《新华日报》1946年3月30日

马寅初教授昨在商会讲演，进出口平衡不容乐观

《新华日报》1946年3月14日

上海经济学术团体联合欢迎马寅初，会后并献旗

《商务日报》1946年5月21日

马寅初氏在上海讲演：痛论中国经济危机，兼指出只有国内和平，经济危机才能克服

《新华日报》1946年5月22日

要求全面停止内战实现民主，杭州学生举行反内战游行，参加学生四千人，马寅初教授冒雨参加，市民感动落泪向游行行列脱帽致敬

《新华日报》1946年6月15日

解决当前经济危机，首须解决政治问题、军费庞大是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的主要原因——马寅初教授在沪讲演

《新华日报》1946年6月15日

马寅初博士在沪演说：痛斥官僚资本与洋商勾结，我国中小工业悉遭其摧残；并呼吁实现政治的民主与经济的民主

《新华日报》1946年10月1日

马寅初先生反对美军驻华，并坚信人民终必胜利

《新华日报》1946年10月4日

美国可以此约为根据，雄厚资本将排山而来——马寅初、马叙伦诸先生谈话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7日

马寅初说：中国经济危机好比吸食毒品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24日

中国经济学前辈马寅初（人物介绍）

《现代经济文摘》第1年5期 1947年

马寅初在北大谈人口和科学研究问题

《光明日报》1957年4月28日

马老在统战部继续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6日

中国人民对印度干涉者的挑衅不能沉默不理（马寅初、邵力子等人联合发言）

《人民日报》1959年5月4日

统战部副部长李贵专程拜访马寅初通知他党组织要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光明日报》1979年7月26日

马寅初就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

《光明日报》1979年9月16日

马寅初被推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人民日报》1981年2月28日